



以文学之名

卷三十六 2023.12

小小鳥

手里握着锤子的人 | 田野中国

岁末将至 | 小鸟问答

打工人的乐队，名字里不能提“工人” | 接力访问

木星时刻 | 新书推荐





小说

- 新书试读 | P.05 今天海德薇跳舞了吗 李静睿
P.15 秘密花园 皮拉尔·金塔纳 我该走了吗？ 李翊云
P.27 寻找丽贝卡 格雷姆·麦克雷·伯内特
P.33 岔路 青山七惠

非虚构

- 田野中国 | P.39 你是怎么成为左派的？ | 革命者陈一真③ /
P.45 你觉得你是“小粉红”吗？ | 革命者陈一真④ /
P.49 电解氯气，以及地理课代表的三本书 | 手里握着锤子的人① /
P.57 “实事求是”是什么意思？ | 手里握着锤子的人② 伊险峰
新书试读 | P.63 后真相时代，与传统媒体的衰落 李·麦金太尔
P.71 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出现了吗？ 迈克尔·曼
P.81 用基因工程消灭入侵物种，真的能保护世界吗？ 伊丽莎白·科尔伯特
P.93 像看电影一样，阅读流亡诗人布罗茨基的一生 马克西姆·古列耶夫
P.103 为什么食物的种类变得越来越少？ 丹·萨拉迪诺

专栏

- 接力访问 | P.111 082 Jack：所以，你原本依赖的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 /
P.115 083 A 鬼：这几年，你的精神支持从哪儿来？ /
P.119 084 牟昌非：当一个人在城市里想留又留不下的时候 /
P.127 085 小王：为什么一个 i 人会愿意上街摆摊为人写诗？ 杨樱



题图为电影《布鲁克林》(2015)剧照

小鸟回答 Vol.36

小鸟 | 小鸟回答

岁末将至，大家好。

i

2021年1月，三年以前，小鸟文学面世的时候，我们说：

“世界变得模糊不定。”

我们说：

“这里的文学，指的是以往冠之以‘纯文学’或者‘严肃文学’的创作，作者以文学为使命，写普世之人性，承继文明之光。”

我们说：

“这本杂志的诞生还基于一个很朴实的想法：把更好的读者介绍给更好的作者；把更好的作者介绍给更好的读者。定义什么叫做‘好’一方面极为容易，因为万事皆有既定之规，另一方面也极为困难，因为心灵有多少种，‘好’的方式就有多少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站在包容和灵活的那一端，我们认为好的文学不应该囿于小圈子里的吹捧，也不应该是对流行的谄媚，它应当来自于对自我和这个世界的诚实。”

我们还说：

“文学杂志的价值是在一个崩坏的语言环境里，让人保持对文字的敬意。我们希望读者看到《小鸟 Aves》时候，会说：‘真好看啊！’既有文字之美，也有我们对杂志的理解。”

ii

对于我们来说，三年中最有趣的工作在于进入到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我们看了至少 2400 篇各种小说。它们至少有三分之二来自于新一代的小说作者，九〇甚至九五后吧，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那种有活力的文字，不论是表达的内容，还是对文字的感觉，也许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视野——就像几乎各行各业里很厉害的那些人一样，他们从小就接触了很顶尖的文学，他们有好的品味，当他们决定写作的时候，没有像前几代人那样带着课本和作文的腐败的气味。

iii

三年前，我们说：

“小鸟代表自由，有时代表高度，天空是属于它们的。我们还向往一点天空上的事。算是我们的追求。”

iv

三年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丰富。大多数时候我们是不自由的，因为在上海，这份不自由还刷新了我们的想象和认知。

因此我们也更爱天空，不管是虚构文学还是非虚构，我们观照我们身处的世界，做了一些天空上的事。

v

我们做了很多计划。

大部分没有完善始终。

如同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消息。

vi

接部分应用商店通知，小鸟文学 App 内容生产相关资质即将到期。鉴于我们无法继续更新资质，届时（大约是 2024 年 1 月 1 日左右）小鸟文学 App 可能无法继续在应用商店被下载、更新。因为各商店管理流程不同，最终下架时间也不会一致。

关于这一点，我们做一些额外的说明：

- 1、根据既往经验，已下载用户还可以继续使用小鸟文学 App，但后续可能因为系统升级遭遇无法适配的情况；
- 2、如果你换了手机，小鸟文学 App 可能无法迁移到新手机里；
- 3、鉴于以上原因，如果你担心有一天 App 会无法访问，又希望看到既往内容，建议尽快登陆并下载 PDF；
- 4、小鸟文学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后，将不再设置 588 元的年费入口，12 元三篇和单期 PDF 下载仍会保留；
- 5、小鸟文学 App 的内容将正常更新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止。
- 6、对于后续无法使用 App 的小鸟文学年费用户，我们将通过 Newsletter，以每月一卷 PDF 的形式推送新内容。请务必联系我们，留下你的邮箱。

vii

订阅期未满一年订阅用户，如果不满意以上替代服务方式，也可以选择退款。我们将按照每月 49 元（年订阅费用 588 元分摊到每一月）计算年度费用余下的额度。联系方式请看文末。

viii

如无意外，“小鸟与好奇心”微信公众号不受 App 变动影响，会持续更新免费内容。请继续关注“小鸟与好奇心”微信公众号账号。

ix

如果期间遇政策调整至宽松状态，小鸟文学服务状态恢复或者有新的调整，我们将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第一时间内通知读者。

x

再提醒一次，当前年费订阅用户，可以选择下载“书架”中过去各卷杂志及其它所

有内容。

xi

关于小鸟的 logo



三年以前，我们介绍过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集于鲁迅书法。

其中，“小”，取自鲁迅《赠坪井先生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幅字写于 1932 年，目前收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
“鸟”，取自鲁迅《录夏穗卿诗联》。“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此夏穗卿先生诗也。故用僻典，令人难解可恶之至。鲁迅”。这幅字目前收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xii

本期封面的鸟

美洲雕鸮，Great Horned Owl。

xiii

联系我们

微博留言 @ 小鸟文学，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或写邮件到 info@aves.art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题图来自 [Dezaldy Irfan](#) on Unsplash

小说

今天海德薇跳舞了吗

李静睿 | 新书推荐

九则故事，从火一样的爱情燃烧，
到海水冷凝般的悲哀现实

《木星时刻》为当代青年作家李静睿的最新短篇小说集，收录《火花》《温榆河》《皇后》等九则短篇小说。十年的写作时间，与众不同的故事类型，科幻、现实、民国……在天马行空的纸上王国，李静睿扎根于自贡，流连于北京，写爱情、觉醒、抗争与成长，时而冷酷，时而感伤，时而充满烟火气。从城镇青年安身立命的梦想，到都市男女互相缠斗的欲望，九则故事，显露出作者十年来不断变化的精神内核。

经上海贝特授权，我们摘选了《今天海德薇跳舞了吗》分享给读者。



都说他们是天生一对，他们自己也这么想。重新在一起好几年了，树青还要这样说服自己，“我们是命中注定的”，树青会对着不知道哪里说，爱情到了后面，也就是信教，需要默诵箴言，跪下祷告。

他们十一岁就认识了，云松住在山上，树青住在山下，山有好几重，开了隧道，曾经通过铁路，快到山顶的地方有一个废弃车站，通往山顶的沿途满是野生花椒树，树下密密匝匝的蚂蚁窝，花椒五月开出白色小花，成熟时已是处暑，暑气蒸腾，九叶青花椒的香气像一条蛇，

偷偷摸摸往山上走。树青也想上山，但山上就是农村了。你少给老子朝农村走，妈妈说。妈妈在厂里三班倒，这两年不知道为什么永远在上夜班，心情不好，每一句话都在咬牙切齿。树青后来才知道，从那一年开始，妈妈一个月来两次月经，一次七天，舍不得买卫生巾，一直在用月经带，草纸一箱一箱堆在阳台，树青的床也在那里，草纸有一股腐败草香，只有夜最深的时候才能闻到。

树青住在山下贡井盐厂的红砖宿舍，宿舍一共四栋，围住一块水泥地，盐厂子弟校也是四栋红砖楼，也围住一块水泥地，四时没有太阳，风找不到出口，一路回旋上升，像要把所有人卷走。树青就在两块一模一样的水泥地之间穿梭，踢毽子，扔沙包，跳绳，撮箕撒一点米扣麻雀。别的小孩会用作业本生火，当场把麻雀烧了撕腿子吃，不过是胡闹，连毛也拔不干净，作业本不够烧，肉一大半是生的，嚼也嚼不动，大家却还是围成一圈，传递一只半生不熟的死麻雀，一人一口，人人都怕自己在圈子之外，嚼不上那腥味扑鼻的一口。树青一直在圈子外面，有一次扣到一只猫头鹰，火都生起来了，她假装摔了一跤，把撮箕打翻，猫头鹰愣了好一会儿，圆圆眼睛看着树青，这才扑棱棱飞走。都知道树青是故意的，那一段时间她的日子就不怎么好过，但她反正习惯了，她的日子一直不怎么好过。

有时候人人都回家吃饭，妈妈还没有起床，回家也不敢开灯，树青就蹲下看地上的蚂蚁，或者一个人对着墙壁打板羽球。水泥地开裂，夹缝中长出蓬蓬官司草，一到傍晚，蚂蚁就从官司草里头排着队往外走，蚂蚁走完了，天差不多擦着黑下去，妈妈这才在单元门口吼一声，方树青，给老子回屋头吃饭。他们遇到那天，蚂蚁怎么走也走不完，树青在窗前张望两次，又三次偷偷溜回家吃饼干，天迟迟不黑，妈妈始终不醒，夕阳在楼和楼的缺口照出一条出路，树青吃完最后一块葱油饼干，她终于决定跟着流水一般的蚂蚁，沿着光指出的路往山上走。

一上山蚂蚁就四下散开，涌进这一株或者那一株花椒树下，花椒熟透了，整座山都有一种让人眩晕的香气。云松已经长得很高，赤着上身，穿着两道杠的蓝色运动裤和一双塑料大拖鞋，手里拎一个破破烂烂的水红色塑料桶，他在最后的残光下摘花椒，青花椒一小簇一小簇，像青色的火，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青色的火。

这就是他们初次见面的那个傍晚，树青和云松。树青后来总问，那时候你在想什么？

云松每一次都说，谁还记得。

树青又问，那你对我有什么感觉。

云松说，能有什么感觉，大家都是小朋友……你是穿了一条黄裙子？

树青是穿了一条黄裙子，黄色塔夫绸。这边白事收礼都是收布，一匹匹挂出来，死者家属戴白花白纱，急匆匆在绫罗绸缎中穿梭。有时候白事办得盛大，院子里挂不下，只能沿着进院的路挂在两旁。竹竿不够用，就挂在树上，树上有鸟，鸟踩在布上休憩、唱歌和拉屎，从早到晚。树青爸爸死时就是这样，来路挂了两百米，白事上送的布都是深黑、深灰、藏青，偶尔有几匹大花布，用来做床单和被套，只有这匹挂在榕树上的塔夫绸，黄到没有一点商量，大半夜做完法事，树青和妈妈送道士出门，远远就看见绸子在闪光，在满是哀乐和香烛的夜里。树青总担心绸子被偷走，她搬了长板凳，坐在路边，隔几个小时就有不知道谁在门口叫她，让她进去磕头，她就进去磕头，磕完头再出来守着。夏夜长得不得了，她就睡在板凳上，塔夫绸半悬空中，像一个迟迟不肯落下的太阳。

丧事一结束，妈妈断断续续把布料卖给裁缝店，因为不想被人看见，她假装把布料搬回外婆家，天远地远扛着布回到镇上，又天远地远扛到另一个镇去卖。一周只有那么一天有空，卖到最后，已经是第二个夏天，妈妈终于留下这匹塔夫绸，给树青做了一条大摆连衣裙，剩下大半匹放在衣柜顶上，用塑料雨布遮住挡灰。妈妈也可以做一条裙子，树青总这么想。妈妈是很美的，结婚照挂在墙上，穿一条翻领红裙子，树青每次抬头看见，还是觉得美到惊心，但妈妈一直没有再穿过裙子。妈妈现在穿蓝色工作服，洗得发硬的牛仔裤，看电视的时候把旧羊毛衫拆了打，打了又拆，高领改低领，又改回高领，冬天一直穿爸爸留下的褐色真皮外套，但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

他们后来反复确认过两个人说的第一句话。云松说，是树青问他，你在干嘛子？

树青却记得，是云松皱着眉头说，你是哪个？你这个衣服不得行，招墨蚊。

黄裙子确实招墨蚊，铺天盖地的墨蚊呼啸而至，树青被困在当中，像四周笼着一朵又一朵淡黑色的云。树青怎么跑也跑不开，急得胡乱跺脚，叫道，喂，喂，你救救我啊，你咋子不来救救我啊。

云松徒劳地挥了几下手，那些云却毫不退却，最终他把塑料桶里的花椒倒在地上，又翻出一盒火柴。云松后来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一盒火柴。

因为我们是命中注定的，树青想，花椒，墨蚊，火柴，一切都是。

青花椒烧起来不是青色的火，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青色的火。所有火都像晚霞，他们坐在

花椒树间，看人间的火烧到终点，而天空又烧了起来，树青记得自己当时想，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不知道住在哪里，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她希望有，这样什么都有个解释。他们应该说了很多很多话，但最终一切都烧尽了，云、云一般的墨蚊、惹人发笑的话语、盛大的晚霞，树青什么都忘了，爸爸的惨死，爸爸死后再也没有笑过的妈妈，回家后必然要挨的一顿打。月亮升到中天，牛郎和织女无限接近银河，露水渐渐下坠，猫头鹰在露水之间呜咽，这就是树青和云松认识的第一天。

直到上了高中，他们的关系还是在暗地里生长，像大树如盖，树荫底下长了两个蘑菇。盐厂子弟校和村里学校都只到初中，树青一年前就开始憧憬，高一前的最后一个暑假，他们每天爬到山顶，顶着烈日在小堰塘里游泳。我们可以做同桌，树青半躺在一个废弃轮胎上说。堰塘不怎么干净，一半漂满水浮莲，水浮莲开紫花，她试图让轮胎从紫花中穿过，那时候热播的一个连续剧，男女主角坐了小船，在荷塘中穿梭。他们没有荷塘，只有这个山顶深处的小小堰塘，池水混浊，水浮莲下面不时有死鱼翻起，那股腥臭久久不散，树青却仍觉得满足。

云松则一直潜在水底摸螃蟹，半晌才出来透气。你不要跟人说认识我，云松摸到一长串小螃蟹，他游到岸边，扔进水红色塑料桶，塑料桶还是那一个。他顺势上了岸，坐在李子树下吃李子，青李子又脆又甜，云松下山会摘一篓子，和着一篓子螃蟹，坐在路边卖。他一声也不肯出，有时候从傍晚坐到天黑，并没有人知道他是在卖螃蟹，他于是又背上山回家，在月光下经过那两排九叶花椒树。树青有两次想帮他叫卖，但云松下了山就像不认识她，给她一串螃蟹，又递给她一网兜熟透了的李子，挥手让她走。树青回到家，蒸饭，炒螃蟹，把李子洗出来，妈妈睡够了起床，吃螃蟹和李子，妈妈问，李子好多钱一斤？

树青说，一块五。

妈妈照常骂起来，螃蟹炒太咸，浪费了嫩姜，李子买贵了，李子永远是买贵了，树青渐渐明白，妈妈是不会变的了，就着这些话妈妈才能吃两碗饭，才有力气继续去上班，才能咬着牙一直当她的妈妈。树青也不怪妈妈，她只是把耳朵放得很远，眼前的这些话早就失去了意义，树青觉得自己这些年一直住在山上，只是为了照顾妈妈，她才每天下山。树青一面洗碗，一面想到刚才。轮胎被水浮莲的根缠住，她大声说，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跟人说？

云松游过来帮她，轮胎好容易出来了，他也爬上去，躺在树青身旁，像同桌和同桌。过了很久很久，云松才说，对你不好，你不懂。

他们当然不是同桌。树青坐第二排中间，云松最后一排靠窗，窗外一棵泡桐，树枝伸进教室里来，开淡紫色花朵。山上有很多泡桐树，他们最喜欢的那一排在半山坡，两个人坐在树下，看树青从工厂图书室借来的书，《读者》《青年文摘》和《世界博览》，厚厚一叠，装在那个水红塑料桶里。书是云松让树青去借的，两个人都喜欢看书，什么书都行，云松卖了很久很久李子、核桃和野葡萄，存下一点钱，他们会选一个周末，在山下租好三毛钱一本的漫画，还是装在水红塑料桶里，拎到山上来看，看完了又下山，再换另外一桶。他们习惯于把一切甜美的事情都留在山上，好像山的四周施展了什么咒语，确保不被山下的世界侵扰。书拎起来有点重，沿途两个人得换好几次手，有一次遇上下雨，云松摔了一跤，一水桶的漫画糊满泥，树青在租书的地方哭了半天，老板终于答应只罚他们二十块钱。冬天山上没有什么果子，为了这二十块，云松把堰塘底下冬眠的青蛙全部抠了出来，城里人爱吃青蛙，冬天尤其卖得出价钱。这件事过去很久了，云松还能听见青蛙的叫声，就在耳边，一声声。

树青说，你知道吗？泡桐树会引来凤凰。云松笑起来，梧桐不是泡桐，凤栖梧桐，你懂不懂？树青说，日本的，泡桐会引来日本的凤凰，你看，《世界博览》就这么说。云松一直觉得树青有点傻，但有时候周末树青上不来，他一个人坐在泡桐树下，又会希望看见凤凰。

凤凰也被困在了山上。和别的农村学生一样，云松开始住校，学校周末要上自习，一屋子人埋头坐在教室里，树青在第二排中间，云松最后一排靠窗，泡桐挂满青色果实，熟透后一个个砸到桌上，那印子迟迟不消，像青色的血，流而不尽。树青和云松前面一个叫玉梅的女生变得很好，有时候她和玉梅隔着好几排人说话，树青会狠狠看云松几眼，似乎这样就可以把看见的东西存起来，就像松鼠存起松果，以熬过冬天。云松却永远埋着头做题，他的头发原本很长，但剪头贵而麻烦，现在近乎光头，露出青色头皮。树青想，云松连头皮的颜色，都和别人不一样，他那种青特别青，像我名字里的那个青。

只看名字也知道，玉梅是农村学生，她和云松是一个村的，一起上村里的学校。班上第一次摸底考试，云松和玉梅都考得不好，和别的农村考上来的学生一样，“农村孩子要多努力，你们家庭条件差，基础薄弱”，老师们公然这么说。云松都听见了，但他很少抬头，他整日整日做题，山上的那些时间，起先变成回忆，后来成为传说。树青给云松写纸条，夹

在一本数学习题册里，她筹划了很久，才能让玉梅把习题册递给云松，“星期天下午三点”，下面画了一棵泡桐树，树青不大会画画，她只是用了红笔，把泡桐果涂得特别红。高中周末也要自习，每周只放半天假，树青在泡桐树下等了又等，泡桐果满地乱滚，天早就黑了，树青眼睛发红，像真的有鲜红果子在眼前发光。周一再到学校，早上七点半，云松已经坐在那里做题，面前摊开的正是那本数学习题册，左手拿一个馒头。他瘦了好多，树青想。往后她没有再尝试过这件事，她觉得自己以前手里攥着一个秘密，现在攥着更大的一个。

班上五十个人，十二个农村孩子，还有十三个城市孩子父母一同下岗。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名单写在教室后面黑板报上，二十五个名字，整整齐齐排在“爱心助学”四个粉色大字下面。云松的名字在倒数第三个，树青的名字倒不在上面，厂里的双职工都要下一个，她们家孤儿寡母，妈妈就轻轻松松逃掉了。好像这是多少年来，妈妈第一次逃掉一种写进骨血里的命运，她甚至调去了办公室，批哪些人应该下岗。妈妈突然变得重要，工人们送来腊排骨、养得半大的兔子、一咕噜一咕噜香肠。兔子吃了太多鱼鳞串，在阳台上疯狂拉屎，香肠蒸熟后满屋异香，妈妈就在这股异香中清理阳台，兔子屎非常臭，但妈妈一直哼着歌。妈妈当然不是因为香肠快乐，她快乐是因为正在和副厂长耍朋友，妈妈死了老公，副厂长死了老婆，按理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如果结婚了妈妈就要下岗，于是他们就没有结婚，惊心动魄地谈着地下恋情。副厂长每晚过了十点才敢上来，早上五点又要回去，他原本就有点老，这一年更是白了大半头发，都以为他为厂里业绩操碎了心。副厂长是个好人，他不过是想和妈妈在一起。有一次树青回家早了十分钟，看见他们手牵手坐在一起吃饭，为了能用右手牵住妈妈的左手，副厂长正用左手艰难地吃抄手，红油溅在衬衫上，晚上睡觉前，树青还看见他蹲在卫生间里洗衬衫，那天以后，树青开始叫他“叔叔”。树青想，他和妈妈，就像自己和云松，既然我们是可以被原谅的，那他们也是，既然他们可以手牵着手吃抄手，那我们也可以，迟或者早。

云松大概三年都没有吃过抄手，食堂里来来回回就那几个荤菜，回锅肉、爆炒猪肝、心肺汤，鱼只有白鲢，没有鸡，没有牛肉。学校门口有家店卖芋儿鸡和烧鸭公，副厂长带树青和妈妈吃过两次，树青就总希望云松能吃到，但这是不可能的，“爱心助学”名单上的人不应该吃鸡，吃肉也要谨慎，偶尔可以吃鱼。

树青值日的时候偷偷把云松的名字从“爱心助学”里擦掉过两次，第二天又被不知道谁补了上去，描得更粗更醒目，树青渐渐明白，那些名字是擦不掉的。有时候她会感到庆幸，为自己不在这个名单上，又为这种庆幸愧疚，好像这同时背叛了爸爸和云松。妈妈和副厂长的事情终于传开，他反而想通了，辞职下海，承包了一个私人铁丝厂，副厂长变成厂长，买了大哥大，妈妈右手伸出去三个金戒指。树青每周日下午去逛新华书店，她不再租书了，她买了一套又一套全集，鲁迅，金庸，托尔斯泰，契诃夫。树青反反复复读契诃夫，古罗夫和谢尔盖耶芙娜相亲相爱，“他们觉得他们的相遇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他们不懂为什么他已经娶了妻子，她也已经嫁了丈夫。他们仿佛是两只候鸟，一雌一雄，被人捉住，硬关在两只笼子里，分开生活似的”。树青想，契诃夫什么都懂，契诃夫认识所有人，包括她和云松。这一段她睡前老翻出来看，云松已经很久没有和她说过话了，云松变得更瘦，有时候老师叫他上去做题，树青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一团火，不知道为什么，他看上去总是很饿。

到了高三，树青什么书都不看了，只是疯狂做题。半年前他们就搬进新房，一套在河边的三室两厅，后面带个花园，妈妈在花园里做了假山，假山上一棵歪歪扭扭的小黄桷树，假山上的树是长不高的，秋天会落叶，春天会发芽，但终究仍是假树，凝神看久了会觉得别扭。有时候做题太累了，树青会抬头看一会儿小黄桷树，山上有真正的黄桷树，大树参天，秋天挂番茄大小的果实。但到了现在，真正的山已经离他们很远，他们只有眼前这些，假的山，假的树，困在假的人生里。古罗夫和谢尔盖耶芙娜抱在一起哭泣，“似乎再过一会儿，答案就可以找到。到那时候，一种崭新的、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不过，两个人心里都明白：离着结束还很远很远，那最复杂、最艰难的道路现在才刚刚开始”。

“爱心助学”名单旁边是五十个人的考试排名，期中考试排一次，期末考试再排一次。高一第一次排，云松第十三名，树青二十一，后来分科了，两个人都去了理科，摆脱了政治和历史之后，云松一直在前三名，树青则在十名到二十名之间徘徊。树青有时候会不服气，想往前冲一冲，但她也知道，她眼睛里没有这团火。以前大概也有过，在爸爸摔进沸腾的盐卤锅子被活活烫死的时候，在妈妈为李子一块五一斤放开嗓子骂人的时候，但现在的树青和当年不一样了，火变得温吞，像水一样无所谓，往怎么都行的方向流。副厂长的生意越来越好，他对妈妈有一种难以置信的迷恋和忠诚，他又买了一套房子，不管不顾装修出来，也不出租，就空在那里，说要留给以后树青结婚的时候住，房子甚至比他们这套装饰得更好，一屋子大理石，厕所里不是蹲坑，是白色陶瓷马桶。树青去看过一次，高考前的三月，春寒料峭，走进去四下冰凉，为了散味，每个房间都有呼啦啦穿堂风。树青无端端想，这

里真冷，像爸爸开追悼会那天火葬场的灵堂，在那天之后，树青还没有那么冷过。

再冷的春天也过去了，四月填志愿前的最后一次摸底考试，云松考了全市第二，这个区级中学多少年没有出过这种成绩了，老师们逼着他填北大清华，不惜把志愿表藏起来，但云松出奇固执，他和班主任吵了一架，坚持填了南京大学计算机系。班主任气得两天没有收那张表，云松就把表贴在黑板上，于是每个人都知道他只填了三个志愿：南京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沿着长江一路上溯。在此之前，云松从来没有提过他对长江有什么执念，他根本没有见过长江。倒是初二的时候，树青妈妈评上市里的三八红旗手，被组织去了一次三峡，树青也去了，妈妈终于翻出那半匹塔夫绸，做了一条连衣裙，树青现在才发现，那种明黄太确定了，穿出去让人不安。妈妈却浑然不觉，她像是卸下了什么重负，站在船头读《神女峰》，树青第一次知道，原来妈妈读过舒婷，妈妈也想伏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树青给云松带回一网兜血橙，血橙切开真的有血，他们坐在泡桐树下一气吃完，云松没有问过一句话，关于长江或者血橙，关于一次他从未有过的旅行。

三所大学树青都考不上，高三之后她成绩又往下滑了滑，大概能上一个比较差的重本，但她的志愿填得很细，连专科都填上了，所有志愿都在南京，包括“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树青想，她力气很大，以前掰手腕连云松也掰不过，也许可以做个钳工，虽然她不大知道，现在哪里还需要钳工。

高考三天一直暴雨，树青和云松不在一个考室，考完最后一门，考生出了校门，却谁也不肯走，雨大到像把每个人囚禁其中，同学们在雨中撕书、唱歌和大哭，哭声大到那种程度，连这样的暴雨也盖不住，树青也在哭，她一面哭一面远远看见云松，他买了一根雪糕，站在路旁，微笑着看着大家。这种天气，吃雪糕显得很滑稽，但他一口口吃完了，又走了好一阵，把那根木棍仔仔细细扔进垃圾桶。回来之后他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撕着一本化学习题册就加入了大家。雨狠狠打在每个人身上，地面排水不好，平地里生出浩瀚波浪，水越过所有障碍一路往下，汇进不远处的旭水河，再往下便入了沱江，它们终究会往长江的尽头走。火一直催促，但最终是水带给每个人自由。

玉梅也进了南京林业大学，她们都填的英语，玉梅顺利地进去了，树青没考好，被调配进制浆造纸工程。树青为这个专业哭过几次，制浆造纸系让她想到自贡新华印刷厂，姨妈是厂里的切纸工，厂里这工种有二十五个人，其中十三个人少了一根至三根手指头，少手指头是没什么的，还在切纸，还是照样三班倒。只有个小姑娘技校毕业，刚过入厂培训，小姑娘爱漂亮，上班时也围了一根红色羊毛长围巾，围巾被卷进切纸机，她伸手去扯，于是整只手也卷了进去。那台机器就是姨妈平日里用的，姨妈说，好几天了，切刀上还往下掉肉渣子。小姑娘后来进了工会，她很快学会了用左手抱茶杯、写材料和填表。残疾人不用下岗，工会的工作人人想要，到了后面几年，厂里还有不少人说，这是命好。姨妈的命就差一些，工龄二十三年，十个手指头完完整整，在第一批下岗名单上。

玉梅说，我们这是本科学校，毕业了不会进印刷厂。树青说，制浆造纸，那就是进造纸厂。玉梅说，也不会的。树青说，那能去哪里？玉梅说，这个周末你去不去浦口？树青思考了一会儿才说，去的，我也去。

到南京后树青见了两次云松，都是和玉梅一起。班上只有他们三个人考来南京，林业大学在市区，但南大新生都去浦口。那地方已经过了长江大桥，先坐车到大桥南路，再在一个乱糟糟的公交站等高新线。大桥南路有家乐福，酱鸭翅一盒四块五，玉梅去之前会三天不吃早饭，存十块钱买两盒带过去，树青当然有钱，但在这个故事里，钱有点无耻，也有点可悲，钱让一切都变得赤裸。浦口没什么可逛，云松带她们上一座小山去看南大天文台，三个人坐在天文台后面的水泥坝子上啃鸭翅膀，鸭翅膀啃到最后非常咸，但树青太谨慎了，连一块钱一瓶的矿泉水也不敢擅自去买。高考结束之后，树青和云松没有再见过面，树青去了云松在山上的家，他的父母在水泥坝上晒苞谷和干海椒，那房子几乎快倒了，围墙上写着一个血红的“拆”。云松不在家，他妈妈笑眯眯问树青，幺妹，要不要吃苞谷杆？树青就坐在院子里吃了一根苞谷杆，不知道怎么回事，云松家里连苞谷杆都比别的苞谷杆要甜，干海椒有让人眩晕的香气，树青在院子里等了云松很久，他却一直没有回来。天黑透了，猫头鹰站在屋顶，严肃地俯视人间。树青想到云松说过，他家有猫头鹰，把鸟窝做在门前一根废弃的钢管里面，有时候猫头鹰心情愉快，就会在钢管里拍着翅膀跳舞，她又想到云松学猫头鹰跳舞，手向外翻飞，拍打一根并不存在的钢管，不由坐在院子里笑出来。月亮升到最高点，树青这才下了山，她拎着两串云松妈妈送的干海椒，回到副厂长那套三室两厅的房子。那个梦已经很远了，干海椒的味道还在梦的残留中出现。

酱鸭翅实在咸，玉梅终于提出想去买水，她看着云松，云松却没有搭话，玉梅于是自己下了山，教育超市就在山下，一来一回大概是十五分钟，他们就有这十五分钟时间。开始

五分钟都是沉默，一直到云松开口，他说，我妈说你哭了。

我没有哭。我妈说你哭了。

只哭了一点点。干海椒太辣了。你家的海椒是什么种，寒假回去能不能给我一点，我现在也种菜。

云松突然放松下来，我回去问问他们，但是我妈不种菜了，我爸也是。

树青觉得他在等着自己提问，但她停了一会儿，直到看见玉梅已经在山坡下面，这才问，为什么？

云松有点着急，像必须赶在玉梅上山前做出交代，他说，我家拆了。说要拆说了很久，后来又说政府没钱。但最后还是拆了。就是前几天。整个山都要搞一个度假村，他们现在跟着盖房子，等以后建好了，就在里头上班。都说好了，我妈可以进厨房，我爸当保安，农转非，以后不算农村户口。

树青并没有真的反应过来，那你爸妈现在住哪里？

云松一下怔住，玉梅都快到眼前了，他才说，可能就住工地上吧，暂时的，以后就好了，以后他们就有工作了，两个人都有工作了。

玉梅买了两瓶可乐，云松一瓶，她俩合着一瓶，两个人都悬空喝，可乐倒灌进鼻子里，一直到上了回去的高新线，树青还觉得鼻腔里的气泡一点点裂开。那种碎裂感非常明确，却又难以描述，树青想，谁会知道一个人鼻子里的气泡呢，更不会有人知道它是如何裂开。高新线从长江大桥上驶过，货船顶上有灯，在江上浓重的水雾中徒劳地闪烁，雾让一切都变得模糊，树青就在那个时候接到云松的短信，他说周末来学校找她。他还说，你想办法，别让玉梅知道。

他们在一起大半年了，玉梅才知道。已经是第二年初夏，两个人去夫子庙吃金顺鸭血粉丝汤，牵着手排队等小笼包，人多得不得了，他们排了许久，忽地看见玉梅在几十米开外，和同宿舍的女孩子挤成一团，玉梅先看见树青，大声叫她，随后才看见云松的手。那段时间他们非常快乐，有时候树青去南大，云松带她去吃浦苑餐厅的三鲜砂锅，那个餐厅要上一个很陡的楼梯，只能单人通过，云松走在前面，会忍不住转头亲她，后面的人就都停在楼梯上，等他们亲完。他们在各自的图书馆里读完《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树青想到她放走的那个猫头鹰，又想到那时候刚好十一岁，她可笑又固执地无法释怀，树青甚至让云松夜里陪着去龙王山上找过几回，他们走到山的最深处，在一个比人还高的草丛里停了下来，那是他们第一次尝试做爱，猫头鹰的鸣叫在即将结束前出现，树青说，海德薇，那是不是海德薇？云松生生停了下来，两个人又穿上衣服四下去找，海德薇没有找到，露水已经下来，空气黏稠，草丛潮湿，他们又在猫头鹰的叫声中一路下山。树青原本以为云松会提出去宾馆开房，但最后他们在网吧里待了整晚，在那段时间里，云松有一种惊人的温柔和耐心，他甚至故意让自己过得不怎么愉快，好像这样才可能补偿她整个少年时代。

但回到玉梅这里，有那么一瞬间，树青以为云松会扔下她跑掉，只是他最终控制住了那种一目了然的冲动，他放开树青的手，还算镇定地和玉梅挥手打了招呼。玉梅愣在那里，似乎想说什么，但中间隔了几十笼灌汤小笼包，她只是更大力地挥了挥手。那天晚上云松和树青都没有再提过这件事，鸭血粉丝汤一股味精味儿，小笼包烫了两个人的嘴，一直到他们急匆匆各自回到学校，嘴里那股火还没有熄灭，树青反复用凉水漱口，睡前连电话也没有打给云松，她坐立不安，爬到上铺时几乎跌了下来。什么都要变了，什么都会不一样了，猫头鹰的叫声会就此中断，树青整夜整夜想，她甚至半夜爬起来，借着楼道的灯光写了两页纸，以备之后向玉梅解释清楚，楼道尽头的窗下是花圃，小玫瑰在夜里开得清清楚楚，衬得她写下的两页纸更显糊涂。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第二天玉梅没有来找她“解释清楚”。她们下一次遇到是在食堂，玉梅打了糖醋小排和麻婆豆腐，欢快地招呼树青坐在一起。树青叫了一个大排面，等面的三分钟里玉梅笑起来，啥子意思哦，还要搞地下恋哦，怪不得这段时间云松都不让我去学校耍了哦，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哦，恭喜了哦。玉梅当然是喜欢过云松的，她和树青一样，甚至为此考到了南京，她大概也有点失落，但玉梅过着一种正当的十八岁生活，也就是说，她把过往轻轻松松甩在了后面，压根没想过这会和自己的一生产生什么关联。树青却总是想到一生，什么都让她总结为命运，命中注定的，树青习惯了这么想。只有在那个瞬间，树青也被这种轻松感染，她快乐地吃完了大排面，两个人又一起拎着水瓶去打水，龙头有点漏，树青故意把小小的滚烫的水滴溅在手背上，感受那种什么也不怕的痛快。

树青在电话里说，玉梅啥子都没问。云松说，她不好意思问。树青说，我觉得好像不是。云松说，你不了解玉梅，我们小学就是同学，我晓得她。树青故意说，玉梅也交了个男朋友，计算机系的。云松说，我们学校计算机系？树青说，不是，我们学校计算机系。云松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这才笑起来，你们学校还有计算机系。又过了一会儿，云松没头没

脑说，她家也马上要拆了。她家两层楼，拿的补偿比我家要多点。

树青和云松似乎就此自由了，整个南京并没有另一个人知道他们的过往，这样想起来，又好像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过往。他们的恋情在中学同学里渐渐传开，大二那个寒假，班上搞了一个同学会，在一家非常辣的鳝鱼火锅店里，大家逼着他们当众舌吻一分钟，那一分钟辉煌极了，整个气氛比特辣锅底还要沸腾，但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一分钟以后，大家都坐下来，专心致志烫鳝鱼和毛肚，用漏勺烫脑花，再用另一个漏勺捞沉底的香肠和排骨，树青和云松几乎是立刻就被遗忘了，往后的两年，没有人再在同学会上关心过他们的进展。树青有时候想到往事，会觉得好笑，我们是不是很傻啊，她说，翻出那两页纸给云松看。云松不大喜欢她提这些，他把纸撕了，沉着脸说，那是因为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确实不一样了，度假村居然真的在两年后建了起来，云松的父母拥有了拆迁补偿、安置房、工资和城市户口。安置房就在度假村外面，山坡上孤零零两栋七层楼房，暑假回家，云松带着树青去看，七楼的两室一厅，瓷砖、沙发和卫生间，云松重点带树青看了卫生间。卫生间非常大，窗户对着度假村的橘子林，这个时候刚挂上青绿色小果，有些果子是长不大的，三三两两掉在贴了蓝色马赛克的窗台上，又滚进同样用马赛克砌成的浴缸，浴缸里头养了五六条鲫鱼，两只小龙虾沉在水底，偶尔浮上去，吞食水面上的几点碎面。那时候没见过谁家里有浴缸，树青自己家也没有，卫生间只是空荡到可以打拳。树青很高兴说，这太好了，你还记不得以前我们上厕所，半山上的草棚子，要蹲在一个大缸上面。云松说，不记得了。树青说，怎么会？夏天蚊子多得不得了，去次要咬二十几个包，你怎么会不记得？云松只是不耐烦，不记得就是不记得了。他那天就此不开心起来，他们是特意来新家做爱的，树青穿了一条绿裙子，裙子式样大胆，露出锁骨和后背。云松原本最喜欢树青穿绿色，他们原本就是两棵树，但那天他们做得很仓促，中途云松几次扭头看窗外的橘子林，树青感受到那种力不从心，那是一颗心在烦躁、自我厌恶、忍耐、不可忍耐后终于离家出走，为心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也许心是知道的，它只是扭头不想面对。

一直到最后，树青也没有想清楚他们分手的原因，但她也没有努力去想，她努力了太漫长的时间，终于感到疲倦。分手是她提出来的，通过一个短信，云松始终没有回答，他只是没有再找过树青，树青倒是又去了一次浦口，她在校园里逛荡许久，走到天文台前才想起来，云松已经去了鼓楼校区。没有他的校园原来并没有什么不一样，树青在那个时刻感到一种久违的自由，她甚至借别人的饭卡，去浦苑吃了三鲜砂锅，楼梯还是那个楼梯，树青上去又下来，楼梯没有任何震动，她也没有。

树青于 2004 年大学毕业，她果然进了造纸厂，厂在北京顺义，以一种获得专利的“干法静电复印纸”闻名。树青在制浆车间做 DCS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操作员，操作员需要三班倒，像妈妈当年一样。她也像妈妈一样穿蓝色工作服，把头发拢进蓝色工作帽中，在燥热、喧闹和灰尘漫天的造纸车间来回巡检，工人们叫她“方工”。这个头衔让她快乐，她大学成绩不过中等，但成为方工之后，她经常读论文读到很晚。造纸厂都自动化了，如果不出故障，机器就二十四小时转动，她甚至会盼着卡纸，这样她就能把 I/O 模块、通信模块和 AI/AO 模块拆下又重装，她喜欢上了机油的味道，有时候故意蹭到工作服上，她总穿着工作服。毕业后的第一个春节，树青没有回家，她去了广西大化，那边山里有个村子，有上百家手工造纸坊，树青和村民们一起，把嫩竹变成纸浆，把纸浆变成料泥，再把料泥变成纸。她带着几刀纸回到北京，手工纸摸上去有明显的颗粒感，又软又韧，墨汁一下去就能往里吸透，树青想，这倒是像伏地魔留下的那个日记本。她自己裁了纸，打孔后用麻绳订成本子，从此便每天在上面写日记，仿佛这真的是一个魂器，树青把灵魂的碎片装了进去。

整个少年时代树青都在渴望离开工厂的一切，红砖楼，子弟校，娘们们赤裸着身体在里面搓衣服的大澡堂，但现在树青又回来了，回到工厂的庇护下，并且为此感到一种扎实的安心。工厂真好，提供三十平方米的宿舍、每天三顿的食堂、还不错的薪水以及北京户口。北京户口似乎很重要，因为中学群里多次有人提起，方树青，方树青拿到了北京户口。户口本办下来那天，厂里正好发了一笔奖金，厂长郑重其事让财务取了现金，封进红包里，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发下来。树青捏着那叠钱，又翻开手边的户口本，她终于懂了，正是这些东西多年来都横亘在她和云松之间，两个少年的爱因此而来，又因此腐蚀朽坏，她感到恶心，这种恶心久久无法消散。树青把户口本锁进抽屉，她默默发誓，要尽自己的可能不使用它，树青决心拒绝一种被视为正常和正当的人生，在二十三岁这一年。

但是云松又出现了。云松为什么还要出现？因为我们是命中注定的，树青只能这样想。已经是 2008 年，这两年厂里效益不太好，校招停了，一些技术人员被“转岗”，树青作为技术骨干留在了原地，只是更累，三班倒时不时会变成两班，她瘦了很多，毫无怨言。地

震那天树青刚上了十二个小时班回来，进宿舍倒下便睡，困到极致后梦变得纷繁，她先是梦见自己上了山，然后又是一场大雪。自贡是不会下雪的，多少年都没有下过了，树青在梦中也知道这是梦，但她被眼前的东西迷住了，雪，雪下的花椒树，雪下的猫头鹰，站在花椒树树梢。梦中她感到谁猛地推了自己一把，一个她往前扑倒在雪地里，另一个她半醒过来。以前云松会这样，他睡得不好，总在梦中拳打脚踢，他平日里已经够累了，梦中更是，他一直在打仗的，永远兵荒马乱。树青说，云松，别推我，我还要睡呢，我在做梦。这句话一出口她就醒了，树青坐起身，看见桌上一包纸巾掉在地上，她去捡纸巾，这才发现自己满脸是泪。地震的消息是之后才知道的，起先也不知道震中是哪里，有人说成都，那就和自贡很近了，又说 8.2 级，树青于是搜了很久八级以上地震的视频，有时候发生在海边，海浪像山一样扑过来，树青从中找到一点安慰，自贡毕竟没有海。四川的电话都打不通了，中学同学的 QQ 集体下线，整整四个小时，树青和那块她一直想脱离的陆地终于实现了脱离，她发现身边涌出了大海，而自己孤身于其中，毫无办法阻拦，也是在那四个小时中，树青接到了云松的电话，他在上海。

云松说，你家里没事吧？树青说，不知道，电话打不通，你家里呢？云松说，也打不通。树青说，他们还住山上？云松说，还住山上。树青说，度假村生意还好吗？云松说，应该还可以，你妈还好吗？树青说，应该还可以。

树青确实不知道，她两年没有回家了，上一次回家是 2006 年 4 月，她请了年假，想给爸爸迁坟。爸爸的坟原本在艾叶镇边缘的半山上，姑婆家住那边，山里有几块地，当年从爸爸的抚恤金里拿出一千块租了下来，最后选中的那块一面挨竹林，一面挨姑婆家的菜田，那地方什么都长得好，春笋挖了又有挖了又有，蒜苗一节节往上蹿，血皮菜怎么割都割不完，坟上杂草茂盛到看不见坟头，每年都拔，第二年一开春又扑了上来。妈妈说，这是好事，说明坟是活坟。中国人真是有一些奇异的想法，人死了，坟却可以活着。这两年市里开始清坟，镇上找了几回，让他们把坟迁进公墓，一个坟补偿一千五百块。姑婆家里人都想拿这一千五，支支吾吾提了好几回，妈妈的意思是一直装傻拖着，树青却想，爸爸爱面子，别人不欢迎他了，他自己也想走，于是迁坟就这么决定了下来。

迁坟跟副厂长没关系，但他忙上忙下，一定要出所有的钱，树青想自己出，递了几次现金他都坚决不收，到最后已经是真正动了气，树青觉得困惑，却又有点感动。爸爸在公墓里的地方非常气派，仿佛他也从厂里共用卫生间的红砖房子，搬到了三室两厅的商品房。那天原本一切都好，三个人喜气洋洋，在墓碑前上香、烧纸、放鞭炮，好像他们在一起磕头鞠躬感谢爸爸，是他及时退场，成全了这个新的无可指摘的家庭。妈妈和副厂长是为一点点琐事吵起来的，大概是妈妈拿来上供的那刀三线肉没有烧毛，十几根黑猪毛又粗又短，在风中飘舞，副厂长觉得这不体面，妈妈觉得这根本没什么，两个人起先只是小声吵嘴，往事就此滚滚而来，像造纸机一般越吐越多，这么多纸是会把人压死的。回去车上妈妈几乎要去跳车，副厂长也想把车往河里开，前轮都探出去了，终于在河沿上生生刹住。他们都哭了，哭到惊天动地，用头去撞窗户，像要把这十几年的秘密哭成一条河。树青先是一头雾水，听到最后终于懂了：他们老早老早就上了，起先都以为是一时的，谁知道渐渐大家都动了真情，妈妈想离婚又不敢，副厂长便找爸爸当面去说，前一天晚上说的，爸爸正要下班，他当即调了个晚班，第二天又连着上了个中班，然后又是一个晚班，掉进盐卤锅子的时候爸爸已经超过三十六个小时没有睡过。班是他私下调的，没有上排班表，都不知道他熬了这么久。树青还记得，当时厂里的人都说，爸爸掉进去是因为喝多了酒，“脑壳有包唆，晓得自己在锅炉边儿打转，还要喝恁多找死唆”，办丧事那几天，总有男人一面喝酒，一面这样说，到了今天树青才知道，爸爸一滴酒也没有喝。妈妈和副厂长都是好人，往后好几年了，他们还没能从捞起来的那副白骨中过去，当然最后都过去了，重新在一起后两个人的感情好到可怕，好像不是如此，就无以彼此说服，又好像他们拼了命幸福，爸爸的死才有个正当理由。那天晚上他们又和好了，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四川的清明就是这样，下很小很小的雨，雨中带泥，一家人坐在院子里泥渍斑斑的玻璃顶下吃饭，吃的正是那天上供的猪肉，猪毛已经清理干净，切成大片和蒜苗一起回锅。小区里的野猫抓了池子里的小鲫鱼，跑到玻璃顶才开膛破肚，谋杀就发生在头顶，他们却浑然不知，埋头吃着回锅肉，只有树青看见了，野猫一口咬掉鱼头。

树青和云松重新在一起之后，她说过一次那个清明，从爸爸长满野草的坟头，一直说到最后那盘回锅肉。那段时间里他们有点像妈妈和副厂长，比赛着把心掏出来，血淋淋放在对方面前。云松说，他父母其实已经失业了，度假村还在，生意也好，但老板不要他爸妈了，他们老了，不怎么干得动，样子也不体面，度假村现在想走高端路线，不再招他爸妈那种农转非的员工。他们都招城里人了，农村人还是一眼能看出来，有没有户口都一样，云松

语气平淡，进行一种公正客观的叙述。他爸妈现在就在家里，他们没有地了，又总想种点什么，就往更远的山上走。那边没有度假村，住那边的人还是农村户口，他们开了一小片山，种四时的绿叶菜，每天摘两筐下山去卖。楼房无法养猪，他们便在楼道里一笼一笼地养兔子。他们现在又是农民了，云松说，兔子屎非常臭。他也好几年没回家了，他和树青很快组成了一个新的家，这样两个人又重新拥有了家庭，人总要有个地方可以回去，他们大概都这样想，何况他们是天生一对，命运进行了如此漫长的铺垫，难道不就是为了这个最终结局？婚讯在同学群里传开后，大家都这么说，太好了，这是命中注定。

云松在上海的事业很好，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副总，但他毫不犹豫，为树青来了北京分公司。树青问他，会有什么影响吗？云松说，会有一点吧，老板见不到人，就不大会想起你，但没关系，钱不会少的。一开始他甚至住在树青三十平方米的宿舍里，每天早上打一个半小时车去朝阳公园边上的办公室，晚上再一个半小时回来，后来他们在顺义租了一个小别墅，再后来，连树青也认为这说不过去，她辞职了，他们住到了朝阳公园边上的小区，云松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到了她辞职的时候，他也没有阻止。云松说，一直租房不大稳定，不如买下他们租的那套房，树青的北京户口于是被找了出来，那套房子上了千万，树青取出自己这几年工作存的六十万，剩下的都是云松出了，后面去办房本，可以约定夫妻份额，云松给自己写了5%，那段时间树青总在半夜醒来，好像要想清楚什么事情。有一天云松出差，她半夜起身，在卧室的八角飘窗上坐了一会儿，朝阳公园的湖面盈盈波光，映出每个人的幻影，树青看到云松的影子投身其中，她终于想到，云松如今多像副厂长啊，他们身上都有那种迫不及待的诚意。云松也说过，树青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树青能做什么喜欢的事情呢？她总不能开一个造纸厂，她只是买了很多很多那种干法静电复印纸放在家里，她一辈子都用不完这么多纸了，而她的一辈子还长得很。

他们终于一起回了一次自贡，在结婚的第三年春节。他们补办了婚礼，妈妈和副厂长为这件事哭了又哭，副厂长提前半年就四处找高级地方，但树青和云松想也未想，就定了山上那个度假村，顶格消费1688一桌，每桌都有个甲鱼汤。婚礼日期定下来之后，他们喜欢一直回忆山上的日子，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事无巨细，好像这样就能给当下提供充分而可靠的证据。树青那时候正在准备司法考试，经济法和民法很难，树青并不是一心要过，就一遍遍看她最喜欢的刑法和刑诉法，有些法条她背得很熟，一开口就能列举出所有的犯罪要件。有一次她无端端想，其实只有定罪的时候，才会需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婚礼一塌糊涂。云松早早给树青订了一条薇拉王，因为浑身钉满水钻，那条裙子非常贵，但在度假村那个铺着污糟糟红地毯的大厅里出场，也就像山下婚纱影楼里现租的那种。副厂长致辞花了整整四十分钟，后面又喝醉了吐在现场，妈妈起先还绷着面子到处敬酒递烟，但不知道敬到哪一桌，她那根弦突然断了，甲鱼汤还没上，妈妈就不知所踪，把她的Gucci老花包留在座位上，面前碗碟干干净净，妈妈连一根莴笋丝也没吃。云松偷偷告诉树青，问要不要去找找，树青想了想说，不用找了，她还能去哪里，就这么大的地方，我们都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晚点她自然就回来了。

妈妈一直没有回来。那天冷得不得了，度假村打开了所有的空调，电闸跳过一次，在跳闸的那个瞬间，整座山都黑了下来，黑暗中却还有鼎沸人声。树青那时候正在房间里换敬酒的红旗袍，她裸着身体在严寒中等了一会儿，来电后才又继续穿衣服，那半分多钟像是她在全速运转的梦中获得了片刻暂停。黑暗中的那些东西确实是树青多年的梦了，一个家庭，另一个家庭，她和云松的、崭新的家庭，梦是如此合理、正当、令人羡慕，树青想，妈妈就是这样，在一个正当的梦中，无处辩驳。

客人们都走了，婚礼在结束之后原来是这样潦草，地毯脏得要命，服务员们把一盆又一盆的甲鱼汤倒进潲水桶用以喂猪。度假村里有自己的猪场，甲鱼汤腥味扑鼻，猪也不会喜欢，猪也喜欢正常的日子吧，喜欢玉米和剩饭，而不是甲鱼汤。云松和树青坐在大厅门口，他们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地方可去，副厂长没醒，躺在本来为他们准备的蜜月套房里。云松说，不如去找找妈妈，树青同意了，两个人都换了牛仔裤和羽绒服，但谁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云松又说，要去看看，妈妈可能会想上山走走。树青说，这不就是山上了吗。云松说，更上面的山，我们以前经常去的，你记不记得？

树青当然记得，她什么都记得。池塘，泡桐，九叶花椒树。她记得妈妈最恨她往山上走，山上就是农村了，妈妈总这么说，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她说这些只是因为人人都这样说，这些话只是水一样顺滑地流出来，妈妈并不是故意让水变成刀，让每个人刺痛。当然现在这些都不再重要，妈妈太喜欢下山之后的云松，她几乎是怕他，话也不怎么敢和他说，只偷偷给他买了一身又一身衣服。树青把那些衣服胡乱扔进衣帽间，曾经困扰他们的一切都变得可笑了，这让树青甚至感到愤怒，然而她的愤怒也是可笑的，在这样美满的结局里，

已经容不下愤怒。

十五岁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一起上过山。野生花椒树的香味在冬天淡了下来，但也足够指引出通往山顶的那条路。天黑极了，他们在黑暗中准确辨认出了黄桷树和泡桐。树青突然想到，以前云松说，他小时候见过山上有一棵大树，平日里看不出什么特别，但一到冬天，就会满树发出新芽，越冷发得越多，他妈妈说，这叫拗春树，树青一面说，这不可能，一面却找了又找，在隧道内外穿梭，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在很多个冬天里徒劳奔波。

天冷极了，树青把手放进云松的口袋，说，后来你找到拗春树没有。云松说，没有，再也没有，但我小时候真的见到过。树青说，这不可能。云松说，是真的，拗春树很高，最上面也发了芽，有一年下雪，顶上发得最多。树青说，自贡哪里下过雪。云松说，下的，山上经常下，晚上的时候。树青说，这个山没有那么高。云松说，我们再走走。

他们继续往山上走，妈妈是不会在这里的，他们都知道。

他们穿过隧道，在废弃的站台上坐了坐，一过了隧道，雪就真的来了，雪在半空中是确凿存在的，树青借着手机电筒看得清清楚楚，但除此之外，雪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地上连水迹都没有。树青关上电筒说，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云松说，什么？树青说，没什么，我们再走走。云松说，没有什么走的了，到顶了。树青说，还没有到呢，我们再走走。

最后一点路是没有路的，他们在树和树的缝隙中艰难往前，似乎有一些半高的荆棘，又有一些更高的野草，树青感到自己踩到动物的粪便和尸体，踩了不止一次之后，这才真正到顶。山顶是一块小小平地，他们以前也来过，满地当年开山留下的碎石，碎石缝里长出酸浆草和紫色地丁，有一块石头有一米多高，爬上去之后往下看，山下的一切都如此明确，他们在灯火中认出了所有的地方，盐厂红砖楼，盐厂子弟校，他们的高中，树青如今的家，家旁边挨着波光闪烁的旭水河。

云松说，走吧。树青说，等等，你听到没有？云松说，什么？树青说，猫头鹰呀，你听到猫头鹰没有？云松说，哪里有？树青不理他，自顾自打开电筒往四周找。四周黑得不得了，但她确实找到了，确实是猫头鹰，站在一棵高高的树的顶端，猫头鹰在灯光里几乎是白色的，雪洒在它的身上，证据确凿，而那棵树，那棵树发满了新芽，每一朵嫩绿嫩绿的芽尖上，都有一点点雪光，像刚刚开始燃烧的，青色的火。树青说，海德薇，今天海德薇跳舞了吗？云松说，什么？树青说，没什么，我们再走走。云松说，真的没有什么走的了，到顶了。树青说，还没有到呢，我们再走走。



李静睿

以前是法律记者，现在写小说。出版有《慎余堂》《北方大道》《微小的命运》《小城：十二种人生》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Johannes Hofmann](#) on Unsplash

小说

秘密花园

皮拉尔·金塔纳 | 新书试读

当控制的爱变成暴力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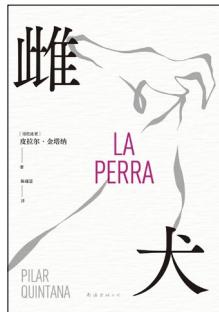
坐落于海岸边丛林深处的小村庄里，达玛丽斯和丈夫过着潦倒的生活，她无比盼望孕育一个孩子，却迟迟不能如愿。

一天，达玛丽斯得到了一只小母狗，她全心全意地照顾它、爱它，给它起了本来要给自己女儿的名字——绮里。绮里总是逃跑，让达玛丽斯担心不已，但又总能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

直到达玛丽斯的爱变成怨恨，直到她发现——绮里怀孕了。

《雌犬》收录了同名中篇小说和五篇人物互相关联、故事线索勾连的短篇小说，聚焦于一群被自然、社会乃至内心世界围堵的人，探讨了在严酷、压抑的环境中，爱究竟意味着什么。亲手勒死“女儿”，将爱人喂给美洲豹，嘲笑情人的疾病是活该……当暴力充溢日常，爱也在一次次挫败后露出爪牙，他们陡然发现，爱与暴烈原为一体，它们根本不讲逻辑。

经新经典文化授权，我们摘选了第五个故事《秘密花园》分享给读者。



罗莎坐在雨林中的一个树桩子上，定睛看着像窗帘一般蔓延的灌木丛。几只蚊子趁机向她发起了攻击。

和其他会围着猎物绕圈的蚊子不一样，这种蚊子会直接对猎物发起进攻。它们成群出动，被叮的地方痛得像被针刺过一样。

罗莎全身都被蚊子叮了。脸上、胳膊上、脚上，蚊子甚至透过衣服和头发叮她，她却浑然不觉。

达玛丽斯教过她如何区分各种蚊子和雨林里的其他吸血动物。达玛丽斯只上到小学二年级，但她知道的东西比罗莎在中学、在大学社会学系和为取得另外两个硕士文凭所学的东西更有用。

罗莎也没发现她的手机从睡袍的口袋里掉出来了，淹没在地上床垫般又宽又软的枯树叶堆里。那是个老款黑色手机，按键密密麻麻。

基恩叫这个地方秘密花园。

在他们还没动工建老屋的时候，基恩就发现了这个地方。那天，他到处走着，想找一根长棍子罗莎已经忘了他为什么要找长棍子了他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它藏在一片草木丛之后，被翠绿繁茂的植物包围着。于是，他开始动手设计，想把这里变成一座花园，栽满雨林里的热带花朵，放置天然材质的家具和吊床，将它打造成一个用来读书或休息的完美空间，一个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秘密空间。一方远离一切的小天地，在他们搬来的这个远离世俗之地中。

于是，他满怀热情地动起手来，和他每次开始一个新项目时一样。

他清除了茂盛的杂草，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工作：有杂乱的蕨类植物，可以刮伤皮肤的带锯齿的杂草还有一些寄生植物必须连根拔起，否则它们会继续从大树身上汲取养分，只会越砍越茂盛。

之后，他从屋子另一侧拖来一段巨大的树桩，那棵树原本长在电缆附近，电力公司不得不把它砍掉。他把树桩放在树下当作板凳，这比清理杂草难多了，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干完的。

基恩就把它晾在那儿了，不是因为他的病——他的病症很久以后才出现，而是因为他做事总是这样虎头蛇尾。比如水池边上的观景台，只建了水泥地基；从雨林里砍来的树枝，本是用来撑起凉棚的，却从来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用处；由凉棚那堆树枝和被遗弃的树桩划定的小路，永远到不了原定的目的地；被大风刮倒的树干，他原本想打磨成独木舟，用来种植作物，最后却在风吹日晒中腐烂；还有他们根据圣奥古斯丁和北美部落图腾设计的战士雕像，原本应该摆放在门口保护家宅，彩色图案和设计却始终停留在图纸上；还有那扇原本想装在新屋那边、现在却只有一个门框的吊轨门，没有盖子的衣箱，还没抛光的书桌，书房墙上的搁板（最后还是罗莎自己动手打磨和上色的），没有抽屉的床头柜……三天三夜都数不完。

现在，只有罗莎一个人还会来秘密花园，但她也不常来了。许多年过去，花园变得阴森：被修理成排的灌木乱作一团，地上的深色树叶积了厚厚一堆，被当作板凳的树桩正在腐烂，野草一次又一次地冒出头来。

如果罗莎随身带着砍刀，一把轻便的短刃砍刀，她会把野草都割掉。但她今天没有带刀。走进花园时，她的手臂碰到了一枝蒲苇，留下了像被猫咪抓伤的痕迹。

被蒲苇擦伤的人不会立刻感到疼痛。有时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被擦伤了，过了好一会儿发现伤痕时，人已经走远，身边根本没有蒲苇。

罗莎的伤口开始疼了。

被蚊子叮咬的无数地方已经变红，本应开始发痒，她却仍像石头般一动不动。

天空开始下雨，豆大的雨点落到她的身上和石头上，她这才回过神来。

她拍死一只叮在脖子上的蚊子，挥动双手驱赶身边的其他蚊子，挠了挠双腿和手臂，这才发现手臂上的擦伤。尽管有些疼痛，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接着，她站了起来。地上的手机被厚厚的枯叶埋住，而她浑然不觉。

她没去游泳。她穿着黄色睡袍，光着脚，头发凌乱，脸上夸张的妆容让她看上去像个杂耍演员。一滴雨落到她的眼角边，顺着脸庞滑落，留下一条黑色的痕迹。

她踏上了回家的路。

她离开秘密花园，沿着小路朝悬崖走去，小心翼翼地避免碰到路上的蒲苇。天空和大海都灰蒙蒙的，像是被人用橡皮擦擦过，让人分不清界限。但她并没有停下欣赏这忧伤的景象，因为她的脚边生长着脚踝高的荆棘，地上还有落叶，她要留意脚下，以防被树叶和荆棘弄伤。

她走到屋子前的花园时，刚刚还只是零星落下的雨下得更大了，砸落在她全身。在倾盆大雨到来之前，她爬上门口的斜坡，走进了屋子。

屋里正播放着伊斯梅尔·里维拉的《坟墓》。

大学毕业后，她参与了一系列值得称道但报酬微薄的市内贫民区项目。后来，她进了一家跨国广告公司做市场营销助理，创意总监毛里西奥很欣赏她。三年后，他创办自己的广告公司，邀请她当了合伙人。

《坟墓》曾经风靡一时，她常听着这首歌跳莎莎舞。那时，她才三十三岁，却已经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对她来说，加利这个城市就像监狱。

现在，罗莎只想听雨声。

她径直走到书房，关掉音乐和电脑，突然她的动作定住了，看向墙壁木板的眼神变得迷茫，就像在秘密花园时一样。

当她回过神来时，已不知过了多久，她觉得口渴。

她来到厨房，想倒杯水喝，却在吧台上发现了一瓶烈酒。她把它从柜子里拿出来，本是想带到秘密花园去的，却落在这儿了。

她总是记不住事：忘了洗澡，忘了洗内衣（她已经好几天没找到干净的内裤了），忘了人们的名字，忘了带工具，忘了要吃什么，忘了今天是星期几和几月份，忘了手臂上的擦伤是怎么来的，甚至忘了她为什么要到厨房来。

她没有倒水，而是打开了酒瓶。然而，喝酒之前，她突然意识到，在秘密花园时她不需要喝酒，现在她也不需要。

这让她很惊讶。

在毛里西奥的广告公司工作的那段日子是她人生中最沮丧的时期，那时的她还只在派对上喝酒。

到雨林生活后，大概是建新屋的那段时间，她真正爱上了喝酒。那时候，基恩的身体很好，有时也会和她喝上一杯，但随着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就不再喝了。基恩是爱尔兰人，对喝酒司空见惯，即使罗莎整天不离酒瓶子，他也从来不过问。她想，在某种程度上，基恩的态度让她的酗酒更加严重了。

她一口也没喝，将酒瓶的盖子盖上，放回柜子。

就像忘掉其他东西一样，她也在慢慢忘掉喝酒的习惯。

她的奶奶失忆之后，罗莎曾想过，遗忘就像一个人将自己身上的外壳一件件剥下。

也许她现在就在剥掉自己身上的外壳。

剥掉酗酒的外壳，她会变成四十多岁的她，那时她刚结婚，和外国丈夫住进了雨林里。剥掉刚到雨林的四十多岁的外壳，她会变成生活在加利的抑郁的职业女性，广告公司的合伙人。剥掉合伙人的外壳，她会变成满腔热血、带着点嬉皮士调调的女大学生。再之前，是一个笨拙的少女，一个瘦弱的、不和陌生人讲话的害羞女孩，一个长着大眼睛的婴儿，一个在母亲的肚子中毫无知觉地漂浮着的胚胎，以及最初的，一片虚无。仿佛她与世界毫无关系，从未存在。

也许，她并没有逐渐忘记喝酒的习惯，也没有剥掉身上的这些外壳，只是雨声掩盖了世界的一切喧嚣，而她需要的仅仅是独自一人在厨房里，听着雨点落在屋顶上的声音。

厨房在老屋这一侧。

他们首先建起的是一个四平方米的小房间，也就是现在的书房，他们在这个小房间里睡觉、做饭，干活用的工具也堆在这里。之后建了厨房和环绕着它的阳台。最后，他们建了门廊（现在装上了轮椅专用的小斜坡）、一个小工具房，还有后来他们睡觉的小阁楼。

那时，他们会到屋外洗澡，有时候就在雨中洗澡。他们住的地方很小，并不舒适，装修的木屑弄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他们每天都很累，浑身酸痛，但在罗莎的记忆里，那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现在，基恩只在新屋那一侧活动，因为他的轮椅太大，进不了老屋的门。于是，老屋就成了她的专属空间：在他们两人的秘密花园中，一个只属于她的秘密花园。

雨下得更大了，宽大的屋檐并不管用，雨水打进了屋里。

罗莎一扇扇关上厨房和书房的门窗，它们是用精致、密实的深色木材制成的，是基恩为数不多真正完成的作品之一。也许是因为他们当时刚到这儿，基恩想试试自己的手艺。他精准地测量了尺寸，还在缝隙间加了封条，以防雨水渗入。但大雨倾盆时，雨水还是会渗进屋子，弄湿屋里的东西：枕头、床垫、厨房里的抹布、袋子里的餐巾，装在罐子里的盐、面粉和糖，衣柜里的衣服和抽屉里的东西。

在这片雨林里，几乎每天都会下雨，有时候还会连续下好几天。

有一次在他们做厨房的收尾工作时，连续下了七天雨。有时雨势会变小，让人以为要停了，但过一会儿或几个小时后，雨又会倾盆而下。

即使在不下雨的日子里，雨林似乎也总是被一片水汽笼罩着。

如果不考虑没有盖子的衣箱、没有抛光的书桌、没有完成的工具房和天花板，老屋算是

完工了。屋顶的横梁和石棉瓦都暴露在外，为这一侧营造出一种乡村风情。建成的时间太久，地板已经开始剥落，需要重新上漆了。但在罗莎眼中，这样的地板就像风化的石头一样，有着别样的美感。

相反，新屋一侧停留在了未完成的一片灰色之中。屋里大部分的门、几扇窗户和天花板都还没装上，工具房也没弄好，粗糙的木地板像是刚被锯开的一段段木块，每块之间的缝隙还没填上，墙壁光秃秃的。家具也很简陋，卧室里只有一张床和缺了抽屉的床头柜，客厅摆着罗赫略帮忙做的难看的架子，来摆放他们收集的贝壳和石头。

建新屋的过程中，基恩开始说自己的左手臂疼。但他一直很忙碌，罗莎以为是干活累的，没怎么在意。直到某个周日，他们在柴火灶上煮豆子时，她看见他赤手拿着烧红的炭块。

“你在做什么？”她大吃一惊，问道。

他转过身来，手里仍然拿着炽热的炭块。

“我不知道，”他说，似乎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他的手感觉不到炭火的温度，却被烧伤了。

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非常可怕：一种慢性复合硬化症，会不断恶化，而且无法治愈。罗莎永远忘不了诊断书上那两个直白的词：不断恶化，无法治愈。

那时还没有现在的药物，基恩的病情发展得很快。

他们终于把新屋收拾得可以住了，基恩却不能再干活了。他们雇了达玛丽斯和罗赫略来帮忙，一开始只在有需要时才叫他们过来，后来变成了每天都来。

八年后，基恩坐上了轮椅。

那时，罗莎心中充满愤怒，她甚至想过，基恩的病就是对他那虎头蛇尾的性格的报应。

现在，她走出书房，顺着连通两侧屋子的走廊进入新屋一侧，穿过客厅，走进卧室。她以为基恩会在房间里，坐在轮椅上，支撑不住的头耷拉在肩膀上，因而当她发现他不在时，她很惊讶。

轮椅是电动的，基恩的手指还能活动，他可能坐轮椅去别的地方了。他喜欢坐在面朝花园的窗户边。

罗莎觉得基恩应该不会在屋外，但她还是把头伸出窗外看了看。基恩果然不在外面。雨水让窗外的世界变得灰蒙蒙一片，已经看不见大海和天空了，雨滴随着大风四处飘落。罗莎感觉到落在脸上的雨点，冰冷而锋利，像钢刀似的。窗边的地板被雨水浸透了，她关上了窗户。

她走回客厅，那里的地板也湿了。除了推拉门的门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挡窗户。罗莎将黑色塑料布铺开，那是罗赫略留下的，给他们当挡雨的窗帘用。她又压了几块石头，以免风把塑料布吹起。

她去了浴室，基恩不在那儿。

她朝后院望去，基恩也不在那儿。

她不知道他会去哪儿。

“基恩，”她知道他不在屋里，但还是大声地喊他的名字，“基恩！”

如果基恩在屋外，他应该有足够的空间在雨势变大前回来。

以前他在屋前的花园里看海，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但有一次，他的轮椅翻了，他顺着悬崖滚下去好几米。没多久罗赫略就把他救回来了，身上只有几处擦伤。但从那以后，他几乎不再到屋外去了，即便出去，也不再走远。

天色很暗，如同夜晚一般。狂风与雨水像海浪一样袭来，将屋顶吹起，又狠狠摔下。响声过后，罗莎听到远处传来长长的雷声，就像美洲豹的低吼。

罗莎的脑海中浮现出基恩在屋外的样子，他的轮椅可能陷在坑里，被树根、石头或任何其他东西卡住。他的头抬不起来，浑身湿透，在雨中瑟瑟发抖。或者他可能又从悬崖边滚落，雨水灌入他的耳朵，泥土埋住了他，而这次，罗赫略也救不了他了。

当她发现还有比这些想象更糟的可能性时，她惊慌失措：如果基恩已经不在了，如果他几天前、几个月或几年前就死了，而她把这事忘了呢？

她吓坏了，跑遍新屋的每个角落，寻找基恩存在的证据。

她看见基恩轮椅的颈枕就放在他那一侧的床上，按摩的精油和药瓶摆在床头柜上。她看见几个她收藏的贝壳掉在客厅地板上，其中有个缺了一角的六角海螺壳，她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是好兆头还是坏兆头，或者什么也不是。她看见基恩的衣服挂在衣柜里，有衬衫、裤子，抽屉里有他的睡衣、袜子和内裤。她还看见他的牙刷和剃须膏在洗手台上，抽水马桶上是他的书。

基恩的东西都在。

只有他和轮椅不在了。

罗莎无法平静下来。他的东西还在并不意味着他没死。也可能他死了，但她没有勇气清理他的东西，因为她并不会为不用再照顾一个瘫子而感到释怀，反而觉得悲痛自责和愤怒。

她抬头看着镜子，想从镜中的脸上找出这些情绪的蛛丝马迹，但她看到的是她最恐惧的脸——她奶奶的脸。一个头发花白、凌乱，浓妆艳抹的老妇人，一个怕别人看见而被锁在家里的疯女人。她被绑在床上，这样就不用人跟在她后面到处乱跑，时刻提防她把自己弄伤。最后，她被扔在客房的一张垫子上，蜷缩着，嘴巴大张，手臂和双腿上的皮肤松弛垮掉。

罗莎苦恼地翻着睡袍口袋，寻找手机，想给达玛丽斯打电话。达玛丽斯就是她的现实，能告诉她为什么基恩不在了。

哎，罗莎夫人，您怎么忘了呢，达玛丽斯可能会说，昨天，基恩先生和罗赫略一起去城里看病了呀。

手机不在口袋里。她知道，接下来她一定会拼命把家里翻个底朝天，就像上次她的手机不见时一样，几天后才在冰箱冷冻层里发现。

但她什么都没做。

罗莎一动不动地站在镜子前，迷失在自己的镜像中。在她的脸后面，有一个只有她才能到达的遥远的点，突然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浓重的虚无之中，消失不见。屋外正下着倾盆大雨，如世界末日一般，她的丈夫杳无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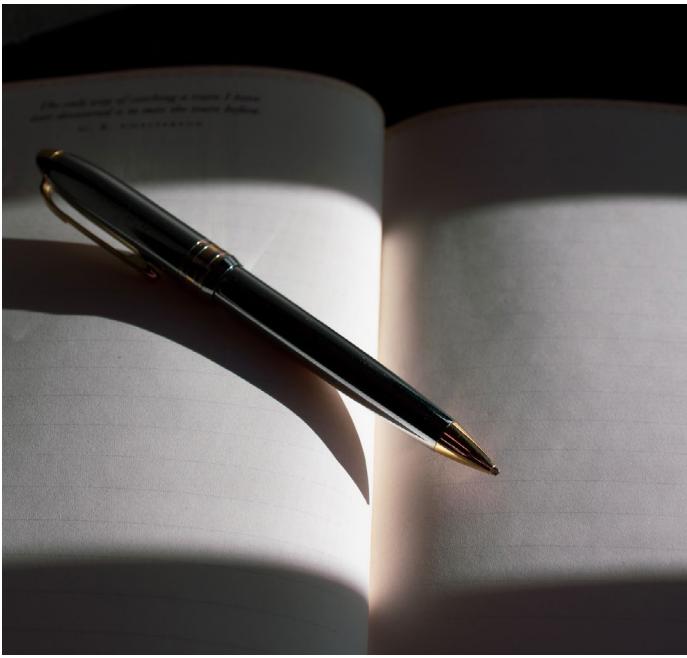


皮拉尔·金塔纳

生于 1972 年，哥伦比亚最著名的当代作家之一，于 2007 年入选英国海伊文学节评选的最佳拉美青年作家名单“波哥大 39 人”。著有五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小红帽吃了狼》。《雌犬》（2017）获得哥伦比亚小说图书馆奖，《深渊》（2021）获西班牙丰泉文学奖。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JK Sloan on Unsplash](#)

小说

我该走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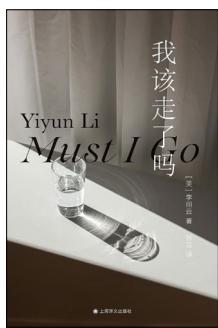
李翊云 | 新书试读

海外华人作家李翊云
首部中文版小说

莉莉亚经历过三次婚姻，抚养五个子女长大，眼下正期盼着第十七个孙辈的降生。她一生都在帮助身边人认清自己，到了八十五岁，她开始为故人罗兰的日记着迷——年少时，他们曾有过一段露水情缘——她想看看，自己能为后辈留下些什么。

日记里巨细靡遗地记录了罗兰的情事。莉莉亚不厌其烦，为每件事添加注脚。一段持续数十年的隐秘关系缓缓揭开，包括连罗兰本人都不知晓的女儿露西的存在。火焰般的激情，湮没一切的悲痛，人心在这两极之间往返，却又不得不寻找归宿与出口，继续巡航。李翊云在小说中给予了生命缭乱的礼赞，关于莉莉亚，也关于来去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人。

经群岛图书授权，我们节选了《我该走了吗？》第一部分享给读者。



“后人，注意了！”

这句敦促或恳求，在罗兰·布莱的日记里出现了二十三次。莉莉亚每次读到这行字时，总安慰他：好的，罗兰，我在这儿，仔细听着呢。假如她的孩子中有人在年幼时要求她千万不能死，莉莉亚会用同等肯定的语气说：我绝不会死。可她注定食言。罗兰要求的仅

是永存，并非不可能之事。除了她，他还会有的后人吗？

这本单卷本日记有七百多页，是罗兰唯一出版的著作。他从他六十年所写的日记中挑拣出这些，留下指示，请一位朋友所在的出版社将它们付印成书。他把一切留给威尔逊夫妇：彼得和安妮，安妮是他妻子赫蒂最心爱的侄女。

莉莉亚不赞同威尔逊夫妇的做法。打心眼里讨厌他们。他们把罗兰的日记从三卷压缩为一卷，在本应保留完整记录的地方插入省略号。第一次阅读该书以及彼得·威尔逊为删减申辩的序言时，莉莉亚给奥布雷·莱恩出版社寄了一封信，地址是新斯科舍省达特茅斯的一个邮政信箱。说罗兰的日记“时有重复”，可真傲慢自大。“人生是重复的，”她写道，“忠于死者应当是编辑最重要的守则。”她未收到答复。

三卷变成一卷：这些人不如去兼差当厨子，把罗兰一生的事业搅拌浓缩成一碗肉汁。彼得·威尔逊在序言中夸耀自己的编辑功夫，称许自己在决定略去哪些内容上的慎重态度和在既尊重罗兰的意愿，又不给家庭成员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上所持的节操。

哪样的痛苦？哪些家人？赫蒂没给罗兰诞下一儿一女。在这本完成的著作里，超过一半写的是罗兰的婚姻。倘若威尔逊夫妇认为通过删节他们可以把赫蒂变成罗兰人生的主角，那是愚弄自己。凡是阅读了罗兰日记的人都明白，西德尓·奥格登才是唯一在他心中占有席之地的人。就一个大多数时候只爱自己的男人而言，能做到那样，实属了不起。

莉莉亚不在乎。在她看来，衡量一个女人的价值，不是根据她生命中男人的优劣，而是那些男人生命中女人的优劣。在罗兰的日记里，莉莉亚虽然仅被一笔带过，但她的出现恐怕会使任何女人感到自豪。

莉莉亚一生见过罗兰四次。如果她告诉人们，至今她已经反复阅读他的日记数年，人们大概会说她疯了——为男人疯，为书疯——可人们经常错得离谱。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爱情故事。一本书远远不止那几页字。

但这个世上到处是像威尔逊夫妇那样什么也不懂的人。他们以为把罗兰的几页日记付印就是达成他的愿望。他们心安理得将罗兰遗忘。的确是罗兰的作风，把自己传世的东西托付给丝毫不致力于铭记他的人。

“相。”莉莉亚教那两个小孩怎么拼写她的姓。她不具备耐心这种美德，可如果她已有足够的耐心活到八十一岁，没道理不能分一点给这几个三年级的学生。抑或是二年级？这点无关紧要。在他们长大、变得些微有意思以前，她将早已作古。不过连那渺小的希望也不能打包票。莉莉亚是六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她自己又抚养了五个孩子，这些孩子为她带来十七个孙儿孙女，所以她很了解青少年未来的命运。没错，他们起步时温热纯净得像一桶鲜奶，但迟早会发馊。

谈到小孩，莉莉亚有许多可发表的高见。最可怕的一条是她给她的曾外孙女约拉下的断言。倘若约拉是别人家的孩子，莉莉亚会直言不讳地讲出来。生来一事无成，那姑娘正是如此。可当然，莉莉亚不会对约拉的母亲凯瑟琳说这番话。到了莉莉亚的年纪，其他孙儿孙女都是她人生的点缀，但凯瑟琳除外。不曾被亲生父母当作必要一员的她，对莉莉亚而言，是她有生之年不可失去的人。

上周，凯瑟琳前来探望，她一个劲儿地讲约拉的事，搞得莉莉亚没时间询问凯瑟琳自己的婚姻状况，而她似乎前景不妙。由于预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莉莉亚认为凯瑟琳应当向她报告每一步恶化的动向。关于泰坦尼克号，假如我们知道的只有它从港口出发（还是处女）和在海上沉没（穿着新娘的礼服），那故事肯定枯燥乏味。

还有可怜的约拉。到头来，她有可能无法足以成为一艘船，被命运摧毁。

以下是约拉的最新战绩。有个玩伴的父亲是房地产开发商，他让他上幼儿园的女儿负责用她朋友的名字给街道和死胡同取名。约拉班上只有两个小姑娘没入选。

什么样的父母会那么做，凯瑟琳抱怨道。

没有一条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街道怎么啦？莉莉亚努力不点破，假如约拉的名字被选中，凯瑟琳又会觉得这个主意别出心裁。“约拉”这名字太短，包含太多元音，太不同寻常。但莉莉亚没把这些看法讲出来。另一个女孩叫什么？莉莉亚问。我的天哪，但愿她不是姓库普，她说。她叫米妮，凯瑟琳接着说，并不耐烦地讲解了一番具体的写法，和莉莉亚现在向年少的来访者讲解“相”的写法一样。

“记得怎么写，别写错。”她对他们说。莉莉亚保留了她第二任丈夫的姓。不是因为她对诺尔曼·相有多么特殊的感情，而是因为她喜欢这个姓的发音，不愿为了米尔特·哈里森而舍弃。“相太太，”莉莉亚此时说，“叫我相太太。”

吉尔伯特·默里若在的话，准会安慰凯瑟琳，说约拉这个名字太宝贝，不能用在街道上。而诺尔曼·相会和凯瑟琳一样哭丧着脸，哀叹这个世界不公平，发最没用的牢骚。米尔特·哈

里森会用那些入选的名字编一首打油诗，罗莎莉、纳塔莉、凯特琳、吉纳维芙，让她们个都遭殃。

有些女人专门嫁错人。莉利亚不在其列。只是丈夫们都已经走了，记忆中他们的宽厚和微瑕无非是餐桌上的香草布丁：低卡、无糖、滋味寡淡。谁曾料想，她会活着看到有一天食物以尽可能不填饱肚子为荣？

对待凯瑟琳，莉利亚必须讲究策略。和她母亲露西一样，她善于用失落谱写人生。露西在二十七岁时自杀身亡，那时她刚诞下凯瑟琳两个月。早年，莉利亚曾幻想向凯瑟琳死去的母亲炫耀她取得的无论多微小的成就。瞧小凯瑟琳新长出的牙齿！瞧她柔软的卷发！瞧你错过了多少东西。莉利亚从未如此激烈地与谁在一片名叫可爱的战场上较量过。

现在，约拉似有赶超之势，算在她身上的失落多得与她的年龄不符。她们三人的这一共同特点从何而来？不是来自莉利亚。她没有一颗千疮百孔的心，她知道，那是失落滋生所需的土壤条件。会不会是遗传自罗兰？不过他本人肯定第一个反对，坚称他天生没有心。

“不著书，无子嗣——至少没有名正言顺的后人。就算我有私生子，身上流着我的血，我也不知情，”罗兰在他 1962 年 6 月 5 日的日记中写道，“没有女人温暖到能融化我的心，当然，前提是我的体内真有一颗心。”

没错，罗兰，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呢：你女儿的出生，你外孙女的出生，你女儿的死。

“响太太，我们可以把这段采访录下来吗？”莉利亚面前的男孩检查了一遍他的笔记，然后抬起头，黑白分明的眼睛令她一惊。时下在滨海花园养老院，见到的尽是下垂的眼睑和浑浊的双目。

孩子们还在这儿呢！果不其然，莉利亚心想，意识多么灵巧地穿越时间，身体却在这岁月中变得无法舒适地在椅子上久坐。

有些日子，莉利亚想从人生这堂课上逃逸，今天是其中一日。早餐的咖啡不够热也不够劲，但那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因为厨房只供应没劲道的咖啡，一如住在这儿的男士的双腿；菲莉丝挑了个莉利亚旁边的位置坐下（不请自来，不过谁坐到她旁边都会被归入不受欢迎之列）；坐在莉利亚对面的米尔德丽德，正在讨论该给她的孙女买什么生日礼物（谁关心这个）；伊莱恩强烈要求大家参加附近一所学校主办的一个口述历史项目。那儿的校长是她侄女，伊莱恩介绍道。

莉利亚先前断定，开点小差会对她有益。现在她发现是失策了。“请叫我相太太，”她说，“你是不是把字搞错了？”

男孩低头看他的拍纸簿。他旁边的女孩抬起一张无辜的脸。“我们可以把这段采访录下来吗，相太太？”那个女孩说。

莉利亚不耐烦地表示同意。这项晨间活动的通知传单上写明有曲奇饼、小柑橘和加了棉花糖的热巧克力。她想象琼和她的助手在隔壁茶水间，剥开一只小柑橘分着吃。侵犯住客的权益。严格来讲，属于偷盗，不过在这儿没有人严格追究情节轻微的罪行。人离死亡越近，理所当然对越多东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去计较。计较得越来越少，直至毫无所谓，到那时，他们就把你打发到隔壁那栋楼。记忆护理科：仿佛你的记忆，像孩子或狗一样，仅是暂时交给没心没肺的他人照管，等着你下班后把它们接回去。你必须小心，要不知不觉得毫无所谓。斤斤计较地活着，释怀地死去，死了便了无牵挂。“可谁在乎呢？”莉利亚大声说。

男孩端详莉利亚的脸。女孩轻拍他的背。莉利亚凑上前，看了一眼女孩的耳钉。“是钻石的吗？”

男孩也看了看。“你知道吗，有颗钻石叫‘希望之星’？”他对着空气说。

正常情况下，莉利亚会提醒男孩，当问的不是他时，开口发言是不礼貌的。但在她体内的某个地方，有种奇怪的感觉。换作六十年前，她会称之为欲望，但现在这欲望想必和她一样长了皱纹。记忆中的欲望。

“是水晶的。我在温哥华的表姐给我做的。”女孩说。

莉利亚转向那男孩。“那是水晶的。比你的‘希望之星’便宜吧？”那颗“希望之星”钻石曾是罗兰在与一个女人做完爱后聊天的话题，他的日记里这么记道。和莉利亚一样，在那本书里，另外这个女人也被简化成单个大写字母。

莉利亚自己是“L”，在那本日记里出现了五次。第一次是在第 124 页，彼得·威尔逊加了一条脚注：“L，身份不明的情人。”

身份不明。几乎所有罗兰的情人都归于那一类，莉利亚经常寻思，有没有一些遗漏的。假如没在那本书里找到她自己——无从知晓是哪个男人删去了她——她的心会刺痛。抹杀她，不管有意或无意，会令她一样气恼。

“去年，我妈妈带我和弟弟去看那颗钻石，”男孩说，“在首都华盛顿。”

“是吗？”莉利亚说。把女人和钻石放在一起，可以写出一千个故事，无一有趣。“我跟你赌一百块钱，你的母亲准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怎么养出乖巧的儿子。”

“我没有一百块钱。”

“我也没有。只是讲讲而已。”

“可我的母亲死了。”

女孩环顾四周，搜寻可以出面干预的成年人。

“听你那么讲，我很难过，”莉利亚说，“但没关系。每个人都会死。什么时候死，不由你和我说了算。”

男孩本就表情不丰富的脸，变得出奇木讷。

“相太太，我们可以开始采访吗？”女孩问。

相太太不喜欢听话的小女孩，莉利亚心想。

那采访比莉利亚预期的短。五个问题，全都无关痛痒、平淡无奇。你在何时何地出生？你小时候的家庭状况怎么样？你上学时最喜欢的老师是谁？小时候你的家乡是什么样的？讲一件你做过的、引以为傲的事。

“我引以为傲的一件事？很难选。太多了。比如，我曾认识一个男的，他的朋友想要借你说的那颗钻石，”莉利亚朝男孩颌首，“去展出。”

“他们借到了吗？”女孩问。

“是‘她’。我说想要借的人是个女的。”

“他们不借给她吗？”

“她的祖国，”莉利亚说，“正巧是加拿大。”

“我的爸爸是加拿大人。”那女孩又说。

“哎，他们不让加拿大借那颗钻石。”莉利亚说。

“为什么？”

“问你旁边的同学。”

“我不知道。”男孩说。

“我以为你亲眼见过那颗钻石。”

“我的妈妈带我们去的。”男孩说。

而你的妈妈死了。“你能帮我一个忙吗？”莉利亚对女孩说，“跑去找那位女士——对，站在手推车旁的那一位。问她是否需要你的帮助。”

女孩走开后，莉利亚凑那男孩更近些。“你的妈妈怎么死的？”

“心脏问题。”

“什么样的心脏问题？”

那男孩摇头。他黑白分明的眼睛没有一刻因泪水而模糊。不掉眼泪是莉利亚认可的一个优点。她考虑把那位老师或她年轻的助手拉到一旁，打听这男孩的母亲是不是自杀身亡（若是，怎么自杀的）。死于心脏病发作和死于心碎是两回事。无论发生什么，应当如实讲述，这点至关重要。

露西死后，吉尔伯特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诉人们，死因是突发的疾病，某种产后并发症。不，莉利亚说，在死亡这件事上，我们不撒谎。凯瑟琳长到一定年纪，问起她的父母时，莉利亚说，她的爸爸史蒂夫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而露西病了。她明白没有医生能治愈她，所以她自己把问题解决了，莉利亚说。她知道，她可以放心地把你交给我们照顾。对那些自杀的人，人们会议论纷纷。但是，凯瑟琳，你妈妈是个勇敢的女人。

凯瑟琳那时还不满六岁，没有追问更多细节。后来也没有，莉利亚便未再提起那个话题。可在全家人看电视的晚上，每当情景喜剧里冒出一个讲自杀的笑话时，凯瑟琳会大笑，笑得比莉利亚更大声，像是在比赛。那一刻，莉利亚难得见到凯瑟琳身上露西倔强的一面。她们私下鲜少提起露西的名字。对莉利亚来说，露西走后的这种家庭生活是新的一页。而对凯瑟琳来说，只有这一页。

琼拍着双手，招呼养老院的人去吃点心。莉利亚示意那个男孩需感谢她接受采访，男孩照做了，然后旋即与另一个男孩在地毯上打起滚来。

角落里有一台小型三角钢琴，是一个活到一百零四岁的老头留给机构的，有人上前演奏，先是怯生生地，后来，当连最吵闹的男孩也安静下来时，琴声变得更有底气。弗兰克靠近莉利亚，告诉她，弹的是巴赫的小步舞曲。弗兰克得意于自己的学识，每当他认为有必要时就忍不住和莉利亚分享。

一点不出所料，令满屋子人陶醉其中的是采访莉利亚的那个女孩。不安于现状，总是好表现，莉利亚心想。这时，那些吃完点心的人正要找个地方坐下来。瓦尔特一手拄着拐杖，

用另一只手臂在指挥。人离死亡近了，不需要找太多借口来假装重获生机。莉利亚在屋内走了一圈，寻找那个失去母亲的男孩。他坐在一张桌前，桌上有时会摆着切花，但今天花瓶是空的。他的脸上再度露出那种迟钝的表情。莉利亚招手叫他出来，他没有动。

世人也许不会喜爱这个男孩。世人也许根本不会觉得他可爱。但没关系，因为有个秘密，一个除了莉利亚以外，无人能向他揭示的秘密：一件大多数人不懂的事。人们指望你永远记住有母亲在时的甜美或失去她的苦痛。他们给你找来替代品，认为这样做是在帮你。可相信我失去至爱后的日子漫长空洞要使这些日子不显得那么漫长空洞靠的是你和我。其他那些人，他们对我们没用。

莉利亚，像你这类女孩，我未来的妻子不会喜欢。

罗兰在他们第二次见面时对莉利亚讲了上述话，露西就是在那天怀上的。有时，莉利亚觉得她能回想起罗兰在讲那番话时脑袋确切的倾斜角度和脸上的表情，但她越努力回想，想象中的那个男人就越像亨弗莱·鲍嘉。人怎么会分毫不差地记得六十五年前发生的一幕？莉利亚拥有的仅是罗兰的话。还有露西，不过露西也成了回忆。关于她的一切，无一会被遗忘，但假如露西留下一本，莉利亚绝不会打开它。

莉利亚每次翻到罗兰日记的第 154 页时，总会津津有味地读着那句话：“L——我未来妻子不会喜欢的女孩类型。”罗兰习惯在他的日记里重复同样的话。往后翻两页，他再度发表这一定论，但这次提到莉利亚时，是与其他几个女人一起，她们全被视为不适合做他的妻子。每人均以单个字母来指称。

没有人躲得过罗兰的重复赘述。有个 G，是一名芭蕾舞伶，在 1943 年的日记里出现了三次，前后相隔不超过十页。在那三篇日记里，罗兰次次将她比作纸风车，用不到一两个月就结束了。还有 S，“一个误把多愁善感当成浪漫的花瓶”，那段短暂的恋情（发生在 1956 年，持续了三周）两度被说成是“出于自恨，在已经被另一具身体泡过的温吞的洗澡水里洗了一个澡，皮肤上沾着陌生人的肥皂沫。”1972 年，写道 C“成为寡妇得正是时候”。往后翻几页，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并补充道：“C 是上天送的礼物。我也是上天送她的礼物。”但接下来不出二十页，C 消失不见，而罗兰的妻子赫蒂还将再活十五载。

那天，当罗兰向莉利亚讲到他未来的妻子时，他正坐在酒店的床上，抽着他所说的最后一根烟。时间是下午四五点，雾正从太平洋上升起。金门大桥映在面西的窗户上，桥身一半悬于薄雾中，等夜幕降临时，桥很快会消失不见。莉利亚对现场只有他们感到不可置信。这一幕十足是电影场景，表现一段不折不扣的风流韵事。他世故、英俊，她年轻、撩人。那些应当忙着在他们四周架设镜头、打光的人去哪里了？

怎么不说话？罗兰问未作声的莉利亚。我这么说是褒奖。

你未来的妻子为什么会不喜欢我？莉利亚问。

否则我怎么会娶她呢？

后来，当莉利亚准备要走时，她问他，他们下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

为什么？罗兰说。

因为总有下一次，莉利亚说。

那点没人能够保证，他说。我可能一迈出酒店就被有轨电车撞倒。你可能明天爱上别人，到星期六已经结婚。

但那种事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为什么不会？你和我凭什么有别于他人？

我们不是好人，莉利亚说。悲剧只发生在比我们善良的人身上。

一见钟情呢？

发生在傻子身上。

罗兰大笑。像你这类女孩，大概会得西德·奥格登的欢心，他说，在她愿意有人讨她欢心的情况下。

当天，莉利亚没有自问，罗兰为何提起西德。日后，她将明白两件事：罗兰迫切地想与人谈论西德，莉利亚如此无足轻重，与床头板无异。

集仙女和巫婆于一身的那类女人。罗兰在莉利亚问起西德是个什么样的人时说。这回答对莉利亚几乎没用。不过她怕什么？她十六岁，西德，虽然罗兰未透露她的年纪，但老得多。两个女人之间获胜的总是较年轻的一方。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想得奥格登小姐的欢心。

奥格登太太，罗兰纠正她。以前有一位奥格登先生。

他死了吗？莉利亚问。

是的，很不幸，他死了。

你一定很高兴。

高兴？不，我欣赏奥格登先生，一点不亚于我对西德的欣赏。我甚至可以说，我们都必须承受那难以承受的失去的伤痛。可当然，你年纪还小，不懂那些事。

你没觉得我年纪太小，不能当情人。

你没觉得自己年纪太小，不能有情人，罗兰说。瞧，我说有人能得西德的欢心，我不是在开玩笑。或者说有人不会受到我未来妻子的认可，也不是开玩笑。

这些话，你对其他女孩讲过吗？莉利亚问。

实事求是地讲，没有。

那么，你对她们说什么呢？

哦，不同的话。

莉利亚思索了片刻，又问道，为什么我会想得奥格登太太的欢心？她估计年长得可以当我的母亲。连我母亲在世时，我也没想得她的欢心。

莉利亚的母亲于上个月过世。一个更孝顺点的女儿不会在这样的谈话中提起死去的母亲，可话说回来，莉利亚人生中有另外哪个女人可以让她用来对抗西德·奥格登？

你得西德的欢心，不像你会得你母亲或你姨妈的欢心一样，罗兰说。

但像得你母亲或你姨妈的欢心一样吗？

别要嘴皮子。我想说的只是，我看得出她会被你逗乐。

你会因此而想娶我吗？莉利亚说。

你，莉利亚？还是你，一个加利福尼亚来的小女孩？

有何区别？

我肯定不会娶一个加利福尼亚来的小女孩。

可假如我只是我，假如我只是莉利亚，那样你会娶我吗？

你还没到考虑结婚的年纪。

过去，像我这个年纪的姑娘，现在都有小孩了。

操作过去，我早抛弃你了，罗兰说。别再上这儿来。我知道去哪里找你。我说了算，好吗？

这么说，莉利亚盘算着，未来还有机会。和奥格登太太的关系也是如此吗？她问。你是那个说了算的人？

听着，莉利亚，罗兰说。你和我之间，让我始终是自私的一方。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我保证。



李翊云

美籍华裔作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刘易斯艺术中心创意写作教授、创意写作项目主任。李翊云 1972 年生于北京，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赴美留学，2005 年获得艾奥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学位。首部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获 2005 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她于 2012 年获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她已出版五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一部回忆录。2020 年出版的《我该走了吗》是她首部被译成中文出版的长篇小说。她的第五部长篇小说《鹅之书》于 2023 年获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Milada Vigerova](#) on Unsplash

小说

寻找丽贝卡

格雷姆·麦克雷·伯内特 | 新书试读

一本心理悬疑的书中书，
一出追问自我的戏中戏。

2019年年底，作家GMB正在潜心研究英国20世纪60年代“最危险的人”——精神病学家布雷思维特，此时他收到了一个装着5个笔记本的包裹，上面记录了一名年轻女性的故事：1965年，伦敦，她怀疑布雷思维特杀死了自己的姐姐韦罗妮卡，于是假扮精神病人，化名“丽贝卡”，前往他的咨询室一探究竟，但她很快意识到，事态的发展渐渐超出自己的掌控……一番思索后，GMB决定将笔记本的内容和自己对布雷思维特的研究作为一本书出版，忠实呈现给读者。2021年，包裹的寄件人主动提出和他见面，然而他发现，这一切的真相远在他意料之外……

在这本书中书里，真实人物和虚构角色轮番登场，历史事件和想象情节交织一片，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人、任何事，包括自己的判断。

以下经译林出版社授权，节选自《寻找丽贝卡》。



多萝西二十五六岁，是一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在英国大城市的中产阶层家庭长大，在两姐妹中排行老大。父母亲是冷淡疏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多萝西从未见过

他们之间有什么亲昵的举止。多萝西说她父亲是性情温顺的公务员，总是用默许的方式来顺从妻子的要求。她16岁时，母亲骤然离世，在此之前她从未经历过什么重大的人生创伤，可是当你问她童年是否快乐时，她回答不上来。最后她承认，从小她就对自己有一个比很多人都宽裕舒适的成长环境却并不觉得快乐这一点心怀愧疚。然而，她经常假装开心，以取悦父亲，因为她父亲似乎要看到她开心才会开心。他经常哄她一起玩游戏，但她宁可自己一个人玩。另一方面，她母亲则不断提醒她和她妹妹，她们有多幸运，因此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变得很克制，特别是当父亲用冰激淋、生日礼物、糖果等物品来诱惑她的时候。从孩提时代起，她就讨厌妹妹，她坚持认为这与那种弟弟妹妹出生后瓜分了父母的关注与宠爱而产生的正常嫉妒无关。实际上，她讨厌妹妹是因为妹妹经常捣乱且不守规矩，却平等地得到了父母同样的对待。她安分守己的行为没有得到奖励，妹妹任性胡来也没有得到惩罚，她觉得这不公平。

多萝西在校期间成绩非常优异，因此获得了去牛津大学学习数学的奖学金。在牛津，她依然出类拔萃，虽说性格内向，但她能较好地融入校园生活，在那里她发现“没有义务去参与”，也没有必要表现得开心，于是变得孤僻疏离。她说，这是她第一次能够“做自己”。即便如此，当她的同学参加舞会或在宿舍开即兴派对时，她依然十分嫉妒。她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遇见了一位年资较浅的教师，两人后来订了婚。她说，她对未婚夫没有强烈的情感，当然也没有性欲；她之所以跟人家订婚，是因为她觉得他是那种她父亲会认可的正派年轻人。后来，多萝西的未婚夫以打算暂时专注于事业为借口跟她解除了婚约。不过，多萝西认为真正的悔婚原因是有一段时间她神经衰弱，不得不在疗养院短期休养，他担心她的状况会不稳定。不管怎么样，对方主动解除婚约都让多萝西松了一口气，毕竟她还没准备好要嫁人。

第一次来办公室见我时，多萝西打扮得很好，言行举止都显得很专业，好像是来参加面试一样。那天很暖和，但她仍穿着一套斜纹软呢套装，这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她只化了很淡的妆或没化妆。对来找我的中产阶层访客来说，这很常见。他们通常都渴望给人留下好的印象，以便与想象中那些在心理医生咨询时流着口水的疯子区别开来。但多萝西比大多数人更进一步。我们还没坐下来，她就问：“那么，布雷思韦特医生，您觉得我们怎样做才比较好？”

这是一个掌控欲极强的年轻女子在这种情形下的表现。我顶了她一句，“你想怎么进行就怎么进行。”她为了拖时间，脱下手套，仔仔细细地收到放在脚边的手提包里，然后开始跟我讨论我们见面的时间和次数等实际安排。我让她说，直到她没话可说。在这种情况下，对治疗师来说沉默是金，我还没见过哪个访客能够抑制住说话的冲动。多萝西摸摸她的头发，理了理裙子的下摆，动作一丝不苟。然后，她问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了。我告诉她我们已经开始。她张口想抗议，但话说到一半就咽了回去。

“哦，对，我们当然已经开始了，”她说，“我想你正在研究我的身体语言，可能觉得我想回避跟你说来这里的原因。”

我点点头示意，表示她说得可能没错。

“还有，你觉得只要你不说话，我就会东拉西扯，把我最隐秘的秘密都说出来。”

“你没有必要一定要说什么。”我说。

“但我说的任何话都可能被记录下来，作为对我不利的呈堂证供。”她为自己这个机智的笑话笑了起来。

知识分子是最难攻克的硬茬。他们打算凭借对自己状况的了解来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所以他们常常在叙述的时候加入自己的评论。“又来了，我又偏离了真正的问题，”他们会说，“我希望你会觉得我的措辞能揭示真相。所有这些表演都是为了证明他们和我旗鼓相当，而且他们对自己有什么毛病一清二楚。显然，这样做很蠢。首先，如果他们真的像他们所演的那样那么了解自己，他们又何必来找我呢？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正是他们的才智，以及他们不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这件事本身，才是他们的问题的根本所在。

但在这个案例中，多萝西的小玩笑还是说明了很多事情：她觉得自己即将被人指控，被人审判。而且，即便是自愿来找我的，她也仍视我为敌。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把我的想法告知她，只是重复问了一次，她想要怎么进行。

“好啦，我还以为你在这方面会有一些想法。”她说。然后，她傻傻地笑着说：“难道这不是我付钱请你的原因吗？”退回到金钱问题上，这也是中产阶层经常做的事。他们总是忍不住要提醒你，你是给他们干活的。

多萝西进入房间时，一副习惯事事都在掌控之中的样子，但只要真的把掌控权交给她，她就会全盘放弃。要么放弃，要么她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份权力。我把这个问题告诉了她。

她的回应是哈哈一笑。“对，对，当然，你都对，布雷思韦特医生，你简直是个人精。我现

在能够明白为什么大家对你的评价都这么高了。”(奉承话: 另一个转移注意力的策略。)

虽然很有趣, 但这种情况很快就令人厌倦, 而且, 毕竟满足访客的预期本身也没有错。我问她为什么来找我咨询。

“嗯, 是这样的,”她说, “可能这就是我东拉西扯的原因。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能说出来。”我鼓励她继续说下去。“我的意思是, 我没有疯, 没有幻听, 也没有看到什么幻象, 我不想跟我父亲做爱, 也没想过类似的事情。我确信很多人比我更疯。”

“那还有待观察。”我说。“或许我可以参加某种测试,”她提议, “我向来对测试很在行。说不定我们可以用那种墨迹测试。我现在就能告诉你, 在我看来, 它们都跟蝴蝶差不多。”

“真的吗?”我问。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也不是, 不全是”。

我完全没有让她做罗夏墨迹测试的意思。我也不是精神病学界所钟爱的 50 分钟工作时限的拥趸, 不过提醒访客时钟的嘀答声就是金钱的嘀答声, 倒也不失为一种鞭策。每一个走进治疗师办公室的访客肯定在心里早已上百次地演练过进来后的情景, 但他们肯定无法想象, 直至离开都没有触及来到这里的真正原因。这种动力学对多萝西这种务实、有科学思维的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她的数学训练和素养很有可能让她相信, 只要她向我描述她的症状, 我就可以直接套入某个公式, 并神奇地开出疗方。尽管某些理论会让我们相信存在一个人类行为普遍遵循的公式, 但其实并没有这种东西。身为个体, 我们全都不可避免地遭受一系列独一无二的情景冲击。这些情景以及个体对这些情景的反应组合在一起, 才造就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看到多萝西瞥了一眼腕上的男式手表,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你会觉得我真的很傻,”她开始说, “我只是做了些被压垮的梦; 这些梦正在把我慢慢压垮。”我点点头。“你是说梦吗? 我不确定我对梦境有特别的兴趣。”

“哦, 它们不仅仅是梦,”她接着说, “也是思绪, 清醒时的想法。我会被建筑物、汽车或人群压垮碾碎的想法。有时, 甚至是被像苍蝇那样微小的物体压垮。前几天, 有一只青蝇飞进了我的房间, 我就强烈地觉得, 它如果飞到我身上, 会把我整个人都压垮碾碎的。”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多萝西每周来找我咨询两次。她慢慢舍弃了掌控局面的企图。事实上, 她似乎很快就喜欢上了扮演更加顺从的角色。在第五次或第六次来咨询时, 她问我她是否可以躺在长沙发上, 而不是好好地坐在上面。我跟她说, 她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 不需要得到我的许可。

“那, 我是坐着好, 还是躺着好呢?”她问。

我没有回答, 她好像要躺在一张针床上似的心翼翼地躺下了, 我还没见过哪个人像她那样在长沙发上躺着还那么不放松的。但几周之后, 她一进咨询室就会脱掉鞋子, 并以某种近似慵懒的姿态伸展开来。

多萝西最初的几次咨询, 差不多让我了解到我所需要的关于她的一切信息。在孩童时期, 她被父母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拉扯。父亲想要溺爱她, 希望她开开心心的; 母亲却诱导她对任何一段愉快的经历都充满了负疚感。她不可能同时满足父亲和母亲的期待, 而且由于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 所以她从未发展出取悦自己的能力。她厌恶妹妹, 是因为妹妹做了她想做的事, 却没有因此受到惩罚。

相较于前几章讨论的约翰和安妮特的案例, 多萝西并不渴望恢复那个自认为失去了的、被理想化了的“真我”。事实上, 她根本就没有发展出适当的自我意识。第七次咨询时, 在我的怂恿劝诱之下, 她终于承认, 在母亲去世后, 她有一种得到了解放的感觉。她解释说, 这就好像是一个独裁政权垮台后, 她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了。她开玩笑地将母亲去世之事与独裁者之死相提并论, 然后又习惯性地斥责自己做了一个如此不恰当的类比。

当我问这种环境的变化是如何改变了她的行为时, 她回答说没有任何改变。她解释说, 对母亲之死表现得欢欣喜悦并不会有任何帮助。我问她究竟什么才是她想做的事。

她没办法说得很详细。“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 如果有的话, 再也不会有人阻止我去了。”在牛津大学上学的那些年, 无论是在性方面还是酒精或毒品等方面, 多萝西都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在成长过程中去放纵自己的天性, 去尝试各种可能性。她甚至连烟都没怎么抽过。她坚称不是她拒绝了这些“所谓的欢愉”, 而是她首先就无意去尝试。

我问她, 她是否在学术成就中找到了快乐。她摇了摇头。这些对她来说都没有意义。不过她承认, 能让父亲引以为傲, 她确实会有一些满足感。同样, 至于她那短暂的婚约, 她对自己能吸引到一个抢手的年轻男人而感到欣慰。而当被问到喜欢她的未婚夫哪一点时, 她最多只能说他很干净, 从未对她有过任何不适当的举动。

隔了几周后, 我才重提多萝西那个害怕被压垮的话题。一开始, 她试图想把这当成一个

笑话, 一笑而过。“恐怕之前我有点一惊一乍,”她说, “自从来到这里后, 我就没有那种想法了。”

尽管如此, 我并没有放过她。我坚持认为, 那些想法是真实存在的, 当她告诉我那些话时, 我看得出来, 她非常焦虑不安。

“是的,”她回答, “但我也很清楚那些建筑物不会突然倒塌并把我活埋。”

我之前和她解释过, 她将事情合理化的习惯是一种逃避, 用以背叛那些想法带给她的感受。建筑物确实不可能坍塌并把她活埋, 这个物理上的事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所经历的恐惧是真实存在的。

我仔细问她第一天来时曾提过的青蝇, 她略显尴尬。至少在物理上, 建筑物或汽车确实有可能压垮一个人, 青蝇则不可能。她再次试图对她的恐惧进行合理化的解释, 说青蝇是携带很多病菌的肮脏昆虫。是的, 我回答, 但这并不是你向我表达的恐惧。也许青蝇只是一种象征, 她又说, 显然她误认为自己只是溜达进了精神分析家的办公室。我解释说, 我对象征不感兴趣, 只对事物的本来面目感兴趣。她反驳说, 在数学中, 象征符号或代数常被用来解决问题。我告诉她, 如果她的问题可以用数学来解决, 那么她自己就能解决。

当然, 多萝西的问题既不是建筑物也不是青蝇。问题在于, 多萝西感到外部世界正在压迫她, 这让她感到很压抑。她对此做出的习惯性反应是告诉自己, 她没有做出反应的欲望。多萝西否认了这一点。她内在的压抑系统太有效率且过于完善, 以至于她很难意识到它的存在。对她来说, 相信自己无欲无求比相信自己在压抑欲望要容易得多。要说服她外部世界实际上并没有在压迫她, 也很简单 (我只需要诉诸她高度发达的理性思维即可)。难的是让她相信她所感受到的压迫是来自内在而非外在。她压抑得太彻底了, 以至于她在这世间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套纯粹想象出来的约束做出反应。

“所以, 我活得更不受约束, 就更能做自己?”

“这不是更能做自己的问题,”我说, “你的自我与现在的你并不是独立独立的两个实体。问题的关键在于, 少做自己, 以及做一个不同的自己。”

这个问题让多萝西沉思了一下。我想起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的故事, 当盟军终于抵达并释放他们时, 他们竟没办法自行离开营地。“但如果变成了另一个自我, 我就不再是我了。我将成为另外一个人。”

我告诉她, 如果她“做自己”很安逸舒坦的话, 根本就不会来寻求治疗师的帮助。

我没必要强迫她接受我的观点。但如果人生的全部意义取决于自己是否取悦他人的多萝西, 仅仅为了讨我的欢心就改变她的行为方式的话, 那就太讽刺了。我终止了这次咨询, 因为我知道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 多萝西有能力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我们的最后一次咨询中, 我让她想象自己得到了一张许可证, 允许她在 24 小时内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她做了什么, 她的任何行为都不会有任何后果。我问她, 在这种情况下她会怎么做。她在这个概念上挣扎摇摆, 问了很多问题, 一一厘清这个想象中的许可证有哪些详细的规则。经过一番安抚之后, 她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最后, 她的双颊变得绯红。我问她在想什么, 她的脸却更红了, 这证明我的目的已经达到。她不需要把她的想法说出来, 生出这些想法就表明她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对多萝西来说, 这已经是进步。我让她把注意力专注于那些想法上, 并问她如果她真的这样做了, 会有什么后果。“没事,”她说, “不会有任何后果。”

我告诉她, 她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她看上去松了一口气, 跟我说再也不想当多萝西了。在向我致谢之后, 她就迈着一种我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轻盈步伐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格雷姆·麦克雷·伯内特

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苏格兰耀眼的文学明星，曾数次入围布克奖，获都柏林奖提名。苏格兰《星期日先驱报》文化奖 2017 年度作者，偶尔为《卫报》《观察家》《世界报》撰稿。

1967 年生于基尔马诺克，现住在格拉斯哥。拥有国际安全研究硕士和文学学士学位，曾担任英语教师，并在独立电视公司工作八年。著有《寻找丽贝卡》《麦克雷计划》等四部小说，作品被翻译成 20 多种语言。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Emil Karlsson](#) on Unsplash

小说

岔路

青山七惠 | 新书试读

六个短篇，六位女性，
六段非典型的人生片段

《蓝色夏威夷》是日本新锐女作家青山七惠的短篇小说集。讲述了《蓝色夏威夷》《龙年》《圣尼古拉斯日》等六篇以女性为主人公的故事。

从大城市回到家乡小镇的优子非常失意，曾经当过老师的她目前在当地的一家玩偶制作公司打零工，日子沉闷平淡。一次偶然的机会，优子中了夏威夷旅行的大奖，这让她重新对生活有了希望。可是公司里面热爱管闲事的大婶们却误以为优子会和公司的一个男同事一起去旅行。这种气氛宛若泥淖困住了不善言辞的优子，更让优子不知所措的是，一名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出现在眼前……

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岔路》这个故事分享给读者。



忘记了是祖母家，还是姐姐最喜欢的击球练习场，抑或是旧中山道近旁的那家商场……总之，那一次，是我们从其中一处正在回家的路上。

每个星期日的午后，我们全家会坐上家里的那辆墨绿色蓝鸟，开车去邻市玩。在市中心，JR、民营铁道和新干线的线路交织在同一座车站里。车站周边是一处还算热闹的商圈。

到了夏天，这里举办的花火大会在县里也称得上老幼皆知。当时，这个地方全市人口大约还不到十万人，也没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不过，对于在满目田野的乡下长大的孩子来说，这里已经是足以瞠目的大城市了。祖母家、击球场和商场，三处都在这座城市的市区。

有的时候，我们整个午后都会在同一个地方消磨。还有的时候，我们会走马灯似的三处都要去一趟。在祖母家享受过午餐后，姐姐和我还有堂兄们一起去带狗狗散步。母亲会和祖母聊聊家常，父亲呢，没有人和他聊天，他总会一个人倒头大睡。在击球场的时候，握着球棒的通常都是母亲和姐姐。姐姐总盼望和其他男孩子一样，去击打棒球。但是大人觉得危险，只会让她去垒球机挥棒，往一个四方形的投币机里投入两枚一百日元的硬币，对面的发球机就会发来二十球。通常，我只能打中其中的一两个球。姐姐只要一握紧球棒，就不会轻易离开击球区半步。父亲呢，只要在击球区站一会，打一个球，就会心满意足了。然后，他会踱步到自动售货机跟前，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等着我们三个女人。到了商场，我们会排成一个纵队，母亲打头阵，带领我们在拥挤的地下一层食品卖场长时间游荡。平均每个月，总有那么一天，父亲都会一时兴起，称一些上好的螃蟹或牛肉，用木纹纸包起来，放在汽车后座上带回家享用。

说起往返邻市的路线，经过国道的公交车走的那一条其实是最好记的，用时也是最短的。不过，父亲总嫌弃那条路的红绿灯太多，就开拓出了一条原创的线路。尽管有些绕远，不过路上的车辆不算多。我上了小学以后，就把这条用时三十分钟的线路完完全全印在了脑海里，我开始幻想自己坐在驾驶席上手握方向盘的样子。父亲的那辆蓝鸟驾驶席的座位从里到外都泛着烟味，墨绿色的车身也让我喜欢不起来。我好想早点拥有自己的车子，可以驰骋到想去的地方，不是祖母家，不是击球练习场，也不是那家百货商场。有一天，我在便道上走路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同学。同学的哥哥比我们年长好几岁，他当时开着一辆车从我身旁经过。同学就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向我挥了挥手。那一刻，我对姐姐瞬间燃起了期望——姐姐，到了十八岁，你就要第一时间考下驾照！你也要像同学的哥哥那样载着我去兜风哦！然而，最最关键的人物——我的姐姐——她最最讨厌的就是汽车。姐姐的性格是开朗的，可她竟然晕车，暑假全家去远途自驾游的时候她的脸全程都是煞白的。只要开始觉得恶心了，她就会用力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记住路线，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这种心思，在姐姐身上一点也观察不到。

大约是我十岁时候的事情了。

那一天，我也同往常一样，坐在副驾驶后面的座位上。我的右侧是空着的，姐姐坐的是副驾驶的位子。平时都是母亲坐在那里，我也记不清，那天为什么母亲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了。她可能是出门去见以前的朋友，也可能是得了感冒，一个人留在家里养病。

独自占据第二排，我却没有躺下来享受宽敞的空间，而是和平时一样，身体靠近左侧的玻璃，咔嚓咔嚓地用手摆弄着车门的开关。我还会时不时偷偷瞄一眼姐姐的表情，她的脸就映在副驾驶车窗外侧的后视镜上。我在看她的时候，一下子和姐姐在镜子里对视了。她向后伸出胳膊，想要来摸摸我的脸，和我闹着玩。我就抓住了姐姐的手，感觉她的手心湿漉漉的、凉飕飕的，温度比正常体温要低得多。

每次遇到红灯，父亲都会停下车。然后打开车窗，吸两口烟提神。车内轻声流淌着音乐，音源不是广播，而是父亲自己录的磁带。他搜集了喜欢听的民谣，制作成了属于他的民谣专辑——也就是说，这一天是晴天。因为每逢阴天父亲会放猫王的歌。到了雨天他又会在车里放童谣。虽然对英语一窍不通，甚至完全不懂歌词的意思，但姐姐和我却大展歌喉，胡乱地模仿着。曲子听了不知多少遍，旋律已经渗透进我们的身体里了。和姐姐一起放声歌唱，别提有多开心。姐姐能用球棒把每一个飞来的球都远远打飞，同样，她的歌也唱得棒极了。

不清楚为什么，那一天我们莫名其妙地大吵了起来。记得一开始，还是因为一些小事情，我们拌了嘴。原因可能是姐姐的指甲抓痛了我的胳膊，也有可能是我的口水溅到了姐姐的脸颊。这一切开始得那么自然，那么随意，我们开始各执一词。接下来的争吵就发展到强词夺理和胡搅蛮缠。再往后，针尖对麦芒一样的冷言冷语都不能让我们满意。终于，我们动手了。直到对方流泪或出血，否则怒火不会得到平息。我们打得难解难分，直到有人强行把我们分开。

泪水首先决堤的人是姐姐。我是从来不会轻易掉眼泪的。不过，每次姐姐哭起来的时候，我的眼泪也一定会不甘人后。我和姐姐一边哭着，一边骂着，骂声中夹杂着一些含糊不清的碎碎念。面对我们姐俩，父亲没有吭声。父亲说话时不喜欢提高声调。看到母亲呵斥我们的时候，他从来不掩饰他脸上的不快。这种表情又会吸引来母亲更为猛烈的火力。她常常会把我们忘到脑后，开始一场他们两个之间的战争。无论母亲的喊声有多么狂暴，

父亲几乎一点都不受影响，反而会变得一声不吭。看着在洗礼中沉默的父亲，我的内心会感到有些莫名的不安。因为父亲的沉默看起来不像是在忍耐着怒气，反而显得有一些窝囊。在长时间的耳濡目染之下，姐姐和我也的确从父亲的态度中领悟到了一些什么。

那一天，姐妹两个的争吵终于进入高潮。这时，父亲说了一声：“别吵了。”我们两个不约而同都无视了父亲的话。我们继续吵闹，继续哭喊。情绪上头时，我们两个都已经顾不上为什么吵闹，为什么哭喊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比对方喊的分贝高，流的眼泪多。父亲试着换了几种表达方式，想让我们两个冷静下来。和母亲相比，父亲对于如何让孩子停止吵架，理解得似乎还不够透彻。因此我和姐姐多少都有些轻视他。在我们的眼中，握着方向盘的那双手似乎并不具备分开我们姐俩的力量。

“要吵架的话，你们两个就下车吧。”

即使父亲这么说，我们两个还是不以为然，继续热衷于我们的竞争。

“下车吧，我这就把车停下。”

父亲已经不在表达方式上做文章了，他开始重复类似的话语。姐姐本来跪在座位上，从椅背上方向高高地对着我哭喊着，听到父亲这么说，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偷偷瞥了父亲一眼。接着，她马上转回头，用充血的双眼恶狠狠地瞪了我一下，就转过身去坐了回去。然后，从椅背对面，传来了“呜……呜……”的哽咽声。显然，姐姐开始控制自己的输出了。我很恼火。你怎么能擅自提前停战？！我变得更加亢奋，哭喊得更加激烈，一个人在宽敞的后排座椅上乱抓乱踢起来。前面的信号灯由绿变黄，父亲用力踩了一脚急刹车。我向前一蹿，险些从座位上摔下来。这一下更让我燃起了斗志，发出的声音足以刺破耳膜，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

姐姐已经停止了啜泣。后视镜里，她的脸显得有些疲惫，眼睛呆呆地望着远方。父亲也没有再说话。

超市里亮堂堂的。

粉色的购物车高度正好到我的眼睛。有的里面装满了晚餐的食材，还有的装了足够吃一周的零食。购物车们在超市的货架间来回穿梭着。

从父亲的车里跑出来的时候，我的大脑里还没有任何计划。一个人逛着超市，看着身边和家人在一起的孩子们，渐渐地，我的心情产生了一些变化。我感觉自己太强大了，我要完成一件同龄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将执行一项伟大的任务。不过，我转念一想，这也不算不得什么，又不是离家出走。我只不过做了一个决定，要自己一个人走回家而已。我这样对自己说着，走路的时候，还是不自觉会挺起胸脯。

我在零食货架发现了一种巧克力，在我家附近的超市里从来没有见过。包装的图片上除了巧克力，还有亮晶晶的吊坠儿，有红色的，还有黄色的。每个包装里貌似都会有一个。可惜我那个塑料的蛙嘴式零钱包忘在车座上了，要是带了钱，就能买一盒这种巧克力了。想到这里，我懊恼得不得了。话说回来，我还没有一个人买过东西。尽管每个月都会去一次镇子里的书店买漫画杂志，但一定会和姐姐或是小伙伴同行。

我把巧克力的盒子放回了货架，继续在超市里走着。店里有很多小孩子有的在过道乱跑，不时摔倒仰面翻；有的紧紧抓住购物车，一步也不敢远离。都是一群小宝宝，我有些嗤之以鼻。我独自一人在超市里旁若无人地快步走着。说来奇怪，我一点也没有感到心慌。从货架的这头走到那头，然后偷偷离开超市，自己走回家。一定不能让父亲和姐姐发现，我要偷偷地一个人溜回家。毕竟回家的路线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能感觉到我的全身充满了能量。尽管我什么也买不起，但是我生出一种错觉，甚至自信地觉得，整个超市里的东西，其实都归我一个人所有。

就在这个时候，超市里的音乐戛然而止。“各位顾客，一位小朋友与家人走散，她是来自 M 镇的……”没错，就是我接下来要独自回去的那座到处都是葱田的小镇。接着，广播里传来了小朋友的名字，的确是我的，年龄也是相同的。她身着白色的上衣，深色的裤子……“这里不对！那一天，我明明穿的是淡粉色的毛衣，还有深蓝色的裙子。”

哼！父亲和姐姐都一样，没有一个人用心看我。父亲穿的是什么，姐姐的鞋子是什么颜色的，我都看得仔仔细细，记得清清楚楚——姐姐穿着暗红色的连衣裙，父亲穿着黑色的毛衣，还有第一次上身的牛仔裤，那条裤子的布料还很硬实。“小朋友的右侧脸颊上，有一颗痘子，是心形的……”听到这里，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蛋。我的痘子才不是什么心形！明明是三角形的！父亲和姐姐，连我的脸都没有好好看过！

远处，一个女人拿着一打鸡蛋，正目不转睛地朝我望着。她的身旁站着一个小男孩，一边拽着她的花裙子的裙摆，一边喊着“妈妈，妈妈”。

为了让更多的人注意到，我一路小跑出了超市。宽敞的停车场里，某处一定停着父亲的那辆车。此刻，他一定就在超市里找我。我可不想找到父亲的车，在那里等着他们回来，

在车前向他们摇尾乞怜。弯弯曲曲的道路尽头，是一个大大的十字路口，正好是绿灯。我迈开步子，想要跑过去，这时，人行横道的绿灯已经开始一闪一闪的了。我向前倾着身子，全力奔跑起来。刚刚踩到对面的便道，信号灯就变成了红色。

我在便道上向前走着，右侧是跟我同向的双车道。便道的左侧有弹子机房，还有什锦烧餐厅。马路对面的店从上到下铺满了玻璃，那是一家麦当劳。再往前走走，就可以看到市民体育场了。四周都很亮堂。只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算太阳落山了，我觉得自己也不会害怕。一旁的机动车道上，不停有汽车从我身后疾驰而过。我猜想，一会一定会有一辆车，从我身边开过的时候会放慢速度，副驾驶的车窗也会摇下，接着，父亲和姐姐会一起呼唤我的名字。我呢，我会等他们喊得累了，然后冷冷地说一句：“我一个人可以回家，不要你们管。”或者，可以压根就不搭理他们两个。

又一辆车，从我身边开过。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双脚不自觉停了下来，那是父亲的车。

没错，那辆渐行渐远的车，就是父亲的。我永远不会喜欢的墨绿色，车牌上的一串数字也和我的生日近似，绝对是父亲的车！左侧的后排座椅上，我看到有人坐在那里。那个人的脸，还朝后面看着。

没有减速……在前面的拐角处，那辆车不见了踪影。

一种奇特的感觉开始从头到脚笼罩我。久久地，我在原地一动不动。周围的景物开始变得朦胧。一股寒流，从我的心底升腾。

父亲和姐姐，他们为什么会没有注意到我？难道在路边走着的我，和家里的、车里的我，看起来根本就是两个人？还有那个孩子……副驾驶后面坐着的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我的脑海里氤氲着疑雾，然而，一个轮廓却在模糊中逐渐清晰——一个女孩，穿着白色的上衣，深色的裤子，脸颊上有一颗心形的痘子。在超市里，父亲和姐姐找到了她。她和他们一起，坐上了那辆汽车。她假装成我，回到了我家。接下来，等着我们回家的妈妈对他们三个亲切地喊一声：“你们回来啦。”然后，餐桌旁，她坐在我的座位上。该睡觉了，她躺在了我的床上……

不知不觉中，夜幕降临了。对面开来的车，远光灯让我目眩。在超市蓄满全身的能量，已经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我发现，大滴大滴的泪珠正从我的眼睛里夺眶而出。

我僵在原地，渐渐感觉到了寒意。单穿的毛衣已经无法抵御夜风。我缩着脖子，双手缩进了毛衣的袖管里，迈开了沉重的双腿。原本信心满满的路线，这个时候，也已经有些犹疑了。印象里，再往前走一段，这条路才会向右或者向左拐。可眼前的这个转角，又是通向哪里的呢？我完全想不起来了。平常的记忆，已经不知去了哪里。

头顶上的夜空中，有几颗星星开始眨眼睛。我又一次停下来，我想找到北极星。暑假在天文馆看星象仪的时候，我记住了它的位置。从入夜到黎明，这颗星星都会在相同的位置闪烁。从很久很久以前，它就在指引沙漠的旅人，告诉他们回家的路……在院子里，我和姐姐不知一起看了多少次，可今天，为什么我怎么睁大眼睛，都找不到它了呢？

如果……还能——我重新迈步的那一刻，我在心里暗暗发誓——如果还能再一次坐到父亲的那辆车里，如果还能再一次和大家一起去祖母家，如果还能再一次在练习场击球，如果还能再一次在商场的食品卖场走来走去……我绝不会再在车里哭闹，绝不会再呵斥姐姐，绝不会觉得沉默不语的父亲有些窝囊。

脚下的路，终于来到了前面的转角。过了转角，路开始向左前方延伸。转角正中的路旁，坐落着一家那一年新建的便利店。店里灯火通明，泛着白光。便利店前的停车场一角停着一辆车，车身是我看过无数次的墨绿色。

“你怎么在这儿？！”

姐姐正好从店门出来，看到我的瞬间，她惊叫了出来。

“爸爸，快来！”

店门半开着，姐姐对着店里大声喊道。父亲也从店里出来了，和姐姐一样，他看到我后，眼睛也瞪得像两个铜铃。

“你是走来这里？”

我点了点头。“天！”姐姐又尖叫了一声，手中的白色购物袋，险些飞出去。

“今天你不是和妈妈一起看家吗？你干吗从家里一个人走到这里来？”

“我不是从家里来的呀，是从刚刚那家……”

话刚说到一半，我猛然发现，姐姐的衣着有些问题。她穿的虽然是连衣裙，但连衣裙的颜色不是我记忆中的暗红色，而是微微泛青的紫色。姐姐身后的父亲，毛衣是灰色的，牛仔裤也不是硬邦邦的，是松松垮垮的那种。他们两个的衣服和我的记忆，都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出门前跟妈妈说了没？”

父亲来到我面前，躬下身子问我。那天早上，父亲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而现在他的鼻子下面已经有了一些青茬。

“能走到这么远，真的很棒。可一个人这么晚出来，是不行的哦。要是不能在这里碰到爸爸，你可怎么办呀。”

父亲拍了拍我的后背，领着我和姐姐往车那边走。“12-18”，车牌上的数字和我的出生日期，一模一样。可是，最后一位数字不应该是“7”吗？父亲第一次把这辆车开回家的时候，我不是还禁不住一直埋怨他，“就差一个数字，为什么要申请这个号码呢？！”

“爸爸，咱们家的车，什么时候换了车牌？”

父亲扑哧笑了，回答我说：“没换过呀。”

姐姐没有打开副驾驶的车门，而是绕到了对面，坐进了后排的座位。副驾驶的座位竟然被空了下来。印象里忘在后排座位的零钱包，也没有半个影子。父亲踩下了油门，汽车提速向前，街灯下向两侧划过的风景和往常没有一点不同。住宅区、田地、学校依次呈现，和我记忆中的顺序完全相同。这条路，就是我已经烂熟于胸的那条路，就是我已经完完全全印在脑海中的那条每次都要经过的路。

车内的音响低声吟唱着父亲喜欢的民谣，姐姐和我又胡乱编了一些歌词，一起大声合唱。路上，我跟姐姐说起，我找不到北极星了。姐姐马上把额头贴在玻璃上，用手指把那颗小小的银白色的星星指给我看。回到家以后，隔着窗子，我久久凝视着那颗星星。我想把那遥远而微弱的星光，深深镌刻在我的眼中。今后，就算是我一个人走夜路，我也不会再找不到它了……

那一天过后时光又走过了三十年。上个月久病在床的堂兄，离开了这个世界。葬礼的那天，姐姐和我都穿着丧服，分别从各自的家里坐车到了车站。在站前的环岛处，我们上了父亲的车。如今，父亲驾驶的是白色的普锐斯。去年才刚刚换购的新车，座椅上已经沾染了香烟的味道。母亲坐在副驾驶的座位，我在母亲的身后，姐姐在我的身边。每个人的位置，都没有变，和以前一模一样。

葬礼结束后，那一天的记忆忽然复苏。我坐在副驾驶的后面，把这个难忘又不可思议的午后讲给了他们三个听。没有一个人相信。“是个梦吧？”父亲说道。“真让人脊背发凉。”这是母亲的评价。姐姐在后排半睁着眼睛，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脸颊上的那个痦子，随着时光流逝，也一点一点地改变了形状。现在呢，已经是一个完美的心形。



青山七惠

日本新锐小说家。2005年凭借小说处女作《窗灯》获第42届日本文艺奖，在文学界崭露头角。2007年以《一个人的好天气》获得第136届芥川龙之介奖。2009年以《碎片》获得第35届川端康成文学奖。2012年任群像文学新人奖评委。近作有长篇小说《快乐》《命运的长线》，短篇集《风》《跳舞的星座》《蓝色夏威夷》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Pavel Neznanov](#) on Unsplash

非虚构

你是怎么成为左派的？ | 革命者陈一真③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和观念有关的一场对话

导师的名字在陈一真那里也是不可透露的秘密，不过，他是一个理性的人，冷静分析下来，觉得于情于理没有必要为导师设置“密级”，犹疑的结果是他有限放出一些信息，导师是俄裔，以研究俄罗斯流亡者而知名。而陈一真的硕士论文与中苏关系有关——它们之间的交集按陈一真的说法，中苏关系中有如何处理白俄神父相关的事。跟陈一真聊天的时候对此还无感，后来看一些历史资料说，流亡白俄最后离开中国要到1950年代……不过，陈一真对此应该兴趣不大。他对苏联的兴趣很有可能来自于的家庭背景：他爷爷，他爷爷十几岁从天津到邯郸，作为画图员进而成长为工程师，带他入行的领路人就是苏联专家；他成长的环境：一个巨大的计划经济时代的“钢铁厂”的厂区是他童年、少年成长期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为了拉近我们聊天的距离，在说到小时候生长环境的时候，杨樱说她也在一个大工厂区内长大——是生产火车头的，陈一真这个时候很认真地抬起头：“火车头？常州啊？”

我们惊讶于他知识的广博，事后想起来，对于他来说，让他痴迷的不仅有他爷爷的红色工程师成长之路，也仅有邯钢这种计划经济大生产工业样本，而是整个一个时代。

“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有哪些东西是你最关注的呢？”

“苏联没有那么坏。我看过《红色工程师》。也有我家里的切身体会吧。”

《红色工程师》是谢善晓的一本小说，另外有安舟的《红色工程师的崛起》，写“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内地没有公开出版。“家里的切身体会”是指他爷爷与苏联专家打交道的历史。关于苏联没有那么坏，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为他

们争一点分的机会，“即使到1958年苏联专家也没有全部走光，当时大跃进，苏联专家是反对的。”

但转而他推荐起了俄罗斯文学。

“我推荐俄罗斯小说。哲学法学社会学都不懂，自然科学更不行了。屠格涅夫，我喜欢他的小说，简洁优美克制；契诃夫也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太喜欢，看不太懂；托尔斯泰不是很喜欢，太罗嗦了。”这听起来跟任何一个俄罗斯文学爱好者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斯大林时期的作家，流亡的作家，有什么喜欢的吗？”他导师研究流亡俄罗斯贵族和知识分子，我头脑中闪现出纳博科夫这些人，不算一件很过分的诱导性问题。

“索尔仁尼琴不太了解，”陈一真也在揣测我想说的是什么人，他一定以为我要说这些异议人士，“斯大林那个时代有许多被埋没的作家。有不得不歌颂斯大林的地方。第一，在歌颂的同时还是传达出了一些现代人不知道的事实，第二，这个时候，确实没有什么文化摧残，有好多继承了俄罗斯文化传统的东西，只是现代人不知道。”

气氛是这个时候开始一点点崩掉的。因为我脑子中闪过在远东不明不白死掉的曼德施塔姆，做洗碗工不成而上吊的茨维塔耶娃，我很难想象陈一真说的“没有什么文化摧残”是什么……

“摧残肯定有案例，肉体上封杀你，这个是有。但也有一些作家，延续了、继承了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在二三十年代，只是现代人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

“第一是不再版了，第二是没有人提。没有人提就是不知道。比如我提扎莫伊斯基，潘绥洛夫，在二三十年代有很多作品。”

我的反应有点跟不上他的思路。“不再版”是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还是艺术性原因，“没有人提”是不值一提还是讳莫如深，它们是“因”还是“果”，这些在陈一真这里是糊在一起的存在。

他继续说些我们不是特别理解的观点：“那被人叫严苛时期，你得看什么叫严苛。那时如果你支持斯大林，你还是有很多说话空间的。如果你被人检举出来你反对斯大林，那你就是纳粹了是不是？如果有一个支持斯大林的表向，那你还是有表达丰富内涵的空间，或者非常大胆的尺度。比如说《夏伯阳》，可以提肃反。它就公然提肃反。而且表现了对肃反的恐怖的怀疑。”

《夏伯阳》是写十月革命之后国内战争的作品，似乎并不涉及肃反内容。而只有支持斯大林才有表达的机会，这似乎也不值得赞美。

我得承认，他这么讲的时候，我们是不冷静甚至是愤怒的。这在采访伦理上是件很丢人的事。

“我是真的蛮怀疑的。一个人能做，另一个不能做，能做的这个人是特权阶级吗？他可以得到斯大林的赦免？如果一个人写了集体农庄，按你的说法，他只要赞美集体农庄，以赞美农庄的形式来保存对集体农庄的真实性记录，他没有被流放，还留存到今天，作为呈堂证供告诉今天的我们，那个世界并不严苛。这逻辑上是对的？另一个人，白银时代的诗人，只敢背诗，我背给你听，只能以这种方式来完成诗的传播，甚至都不敢写出来，因为写出来就可能被告密被流放，这恐怖气氛又是哪里来的呢？我们说比较严苛的创作环境，我不知道是不是史学界公认，但这是逻辑上推导出的一个结论。我不明白你说的那一部分，有，假设是有的，但如果它们普遍存在的话，就不能解释，苏联时期对文学创作和文化精神的压制，不可能同时存在的。要么是你对，要么是我对。”

“这其中不是谁对谁错。我在英国学一门课，革命化的人类学。什么叫革命，革命是一个特别大的自由，支持这个革命，认同这个革命，就可以获得批评这个革命的自由。”

这是以赛亚·伯林说过的那个“积极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的那个自由。伯林所爱的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讲过这样一段故事：

他（路易·勃朗）喜欢谈大道理，也许已经反反复复谈了许多年，从未想到任何人可能提出反驳，他自己也从未对它们产生过疑问，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例如：“人的一生是履行重大的社会责任；一个人应该不断为社会牺牲自己……”等等。我有时便跟他开玩笑，打断了他的话，突然问道：

“这是为什么？”

“怎么为什么？要知道，人生的全部目的，全部任务，便是为社会造福。”

“如果大家只是牺牲，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享受，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是玩弄词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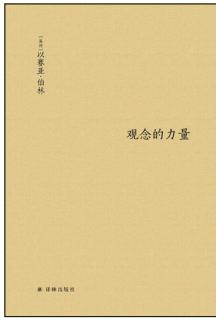
“野蛮人的概念混乱。”我笑道。（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当然，在与陈一真的聊天现场，我想不起来这样有力量的故事来与他争论。我们只是本能地想到了王实味：“他支持这一革命，他到了延安，他获得批评这个革命的自由了吗？他死得很惨吧？”

“是，是。”

他突然唯唯诺诺起来。我们知道并不是我们说服了他，他只是不喜欢跟我们争论，而且这其中的潜台词很有可能是，“像你们这种思维方式的人太多了，我不想为你们浪费时间”。这个时候，往往就是他把自己包裹起来的时候，让我们加倍感觉把采访搞砸了。

在我们各自调理情绪的时候，以赛亚爵士开始在我头脑当中出现：陈一真的导师是不是会与他探讨伯林呢？理论上伯林符合“俄罗斯流亡者”的所有特征。不仅如此，伯林思想的丰富性，还有对俄罗斯——不管是革命后的流亡者还是留在苏联的艺术家、哲学家、作家和诗人——的深入了解和洞察，都是他的导师研究领域中不可回避的存在。



有人诉诸普遍原理，为野蛮行径辩护，为屠杀成千上万的人辩解，他们承诺，在遥远的未来，千百万人将因此而过上幸福的生活，因此他们呼吁，为了这一遥远而无可比拟的福祉，人们应该宽恕那些闻所未闻的悲惨遭遇和不仁不义；赫尔岑猛烈抨击这种观点。他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错觉，也许是在故意骗人，因为遥远的目标可能无法实现，而以它们作辩护的巨大的痛苦、不幸的遭遇和违法犯罪行为，在当前则不容置疑。我们对未来所知甚少，不能做出准确预测，因此肯定对立面、用虚伪的允诺来设法宽恕我们的野蛮行径所造成的恶果，这些做法不是精神失常，就是蓄意诈骗。我们无法保证，千百万民众一定能过上我们满怀信心地许愿给他们的幸福生活；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现在千百万人将无声无息地死去。对赫尔岑来说，远期目标根本不是什么目标，而是荒诞不经的错觉——目标必须近在咫尺，必须化作“劳动者每天的工资，或工作带给他的快乐”。（以赛亚·伯林《观念的力量》）

他不喜欢伯林。我们后来和陈一真有一段有趣的对话，他明确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表达得太激烈，对你影响很大吗？”

陈一真已经沉默一会儿了。“有点，不愿意很激烈的对峙，我还是很温和的。”

“我觉得没有讨论的必要和空间，避免不喜欢上纲上线，不喜欢这种东西。”

“我们要是说错话了，你可以随时说。”

“人都是这么说……”

“你是怎么成为左派的？”

“这个历史挺长的，大三大四的时候意识到了。”

“你大三大四的时候发生好多事。”

“对啊，挺晚的了，但这也算不上什么颠覆性的事。”

“看书，还是有其它契机？”

“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的。要找原因嘛。那时候开始看马列毛，大三大四才开始认真看毛选马选，才觉得有道理。”

“我们见到一些人，毛派，他们是从大资本开始思考问题的。”

“我不是毛派，我也不是从大资本角度入手的。”

“看毛选是个结果。”

“不，这是个历史起点。”

“从哪儿开始决定看毛选的呢？想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不看以赛亚·伯林呢？”

“为什么不看伯林，不看哈耶克，可能有逆反心理吧。”

“因为老师喜欢伯林吗？”

“对，还有别的系的老师，社会学系老师。我看了一眼，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背后的好恶是什么？”

“观点，不喜欢。”

接下来我们从中国到外国，从革命者到思想家，能想到的问了一遍：

哈耶克？

——不喜欢。

格瓦拉？

——还行吧。

布尔波特呢？

——不喜欢。

萨特？

——还行吧。

卡斯特罗？

——还行。

罗斯福喜欢吗？

——不喜欢。

美国总统有喜欢的吗？

——都不喜欢。

丘吉尔呢？

——更讨厌。他很虚伪，是个残忍的屠夫。跟苏联签条约的时候，他老婆说友谊长存，而他日记里说苏联是我们长期的敌人。

政客不都是这样吗？

——对，就很虚伪。

——赫鲁晓夫不喜欢。

——勃列日涅夫更不喜欢。

——罗莎·卢森堡很喜欢的。

在政客都很虚伪这样的话题之后，他主动说起了这些人的名字，而且几乎表达了对所有政客的排斥态度。特别提到了罗莎·卢森堡，并且表达了特别的喜欢。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可贵之处在于她没有受到权力的污染。我也很喜欢罗莎·卢森堡，并深以为她有关自由和社会主义那一段话，超越了一个革命者的阶级性，充满人性的崇高：

没有普选，没有出版与集会自由，没有为表达意见而据理力争的自由，公共机构的生命力将消逝，只剩徒具外表的空壳；只有官僚机关得以存活。公共生活逐渐沉睡，只有少数活力四射肯拥有崇高理念的政党领导人能够领导这个国家。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那些极为优秀的党领导人进行统治，同时将会有劳工阶级的精英受到召唤，前去聆听领导人的演说，献出热烈的掌声，并毫无歧见地坚定支持其理念。就实而论，这就是朋党派系的统治，而他们口中的专政不是劳工阶级的专政，而是一群干练政客的专政……没有政治自由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支持政府的人才能获得的自由，也绝对不是自由。（卢森堡 1918 年在狱中的信）

我把这句话从我的记事本中翻出来，挑最后两句念给他听：“你的全网下架的号召就是你对卢森堡这句话的背叛啊。”他显然是知道这句话的，一个喜欢罗莎·卢森堡

的人怎么会忽略它呢？

“是。”可能是对罗莎·卢森堡的共同的好感，也可能是把最不堪的那一面都摆出来之后，他的心态因此放松了，也可能是这个游戏一样、有关“喜欢与不喜欢”的问答缓解了气氛。我们关于罗莎·卢森堡的对话更像是一种感慨。

喜欢《一九八四》吗？

——还行。

你应该喜欢奥威尔。

——一般。

看过奈保尔的书吗？

——没看过。

福山？有人会喜欢福山吗？

——我喜欢齐泽克。（这个答非所问倒是有趣。）

汉娜·阿伦特呢？

——不喜欢。她比较种族主义，看不起黑人。我比较关注这一点嘛，所以发现得特别多。

你喜欢列宁吗？你喜欢毛所以喜欢列宁也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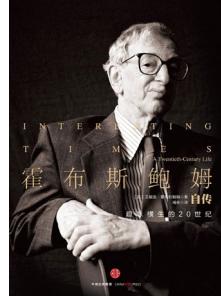
——喜欢。

列宁主义政党原则你都喜欢？

——什么原则？

我又翻出记事本，找到霍布斯鲍姆说到的那一段话：

列宁主义政党的成功秘诀，并不在于梦想自己将站在街头障碍物后面进行抗争，甚至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说。那可以用两个短语来总结：“决策必须贯彻执行”，以及“党的纪律高于一切”。共产党吸引人之处，在于它能够完成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趣味横生的时光》）



霍布斯鲍姆自传

陈一真说他只知道“阶级斗争”和“国家专政”，是在《国家与革命》里面提到的。

不过，借此他很快讲到了他喜欢或者不喜欢某个人的逻辑。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想法，就像他对《通往北京的道路》的反感一样，他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反殖民主义者。

“关注第三世界，然后站在殖民地立场上了解这些东西。就像萨特，支持阿尔及利亚，我就有好感的；加缪，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我就不喜欢。”

“殖民主义者，压迫与被压迫，你是用阿尔及利亚来衡量一切？雷蒙·阿隆喜欢吗？”

“阿隆没看过，我喜欢法农。”

“啊，那个人像个刽子手一样，恨不得亲自上场。”我把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记成是法农说的了，我想我当时一定表露出了嫌弃的神色。那句话实际上出自于萨特为法农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所写的序：

当农民们接触到枪支，古老的神话就变得苍白无力了，那些禁令被一个个地推翻：战士的武器就是他的人道。因为，造反在最初时，必须杀人：杀死一个欧洲人，这是一举两得，即同时清除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压迫者：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幸存者第一次感到他脚下植物下面的国土。（让-保罗·萨特《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版序言》）

“按你的说法，为第三世界国家所遭受的屈辱，因而产生的愤怒的情绪，要超过民族主义的情绪？”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一下他。

“我表达的还算清楚，小粉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反应。”他为自己与他的拥趸——可能是大部分弹幕、以实际行动响应“举报”号召、包括知乎和观察者网上对他的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广的大V们——之间画了一条分界线。

“不喜欢观察者网。不认同它们。”

“是因为它们亲资本？”我问。

“对。人民富豪就是观察者网说的嘛，说曹德旺，美国建工厂，都人民富豪了。”

“肯定没有又人民又富豪这种存在？”

“没有吧。”

“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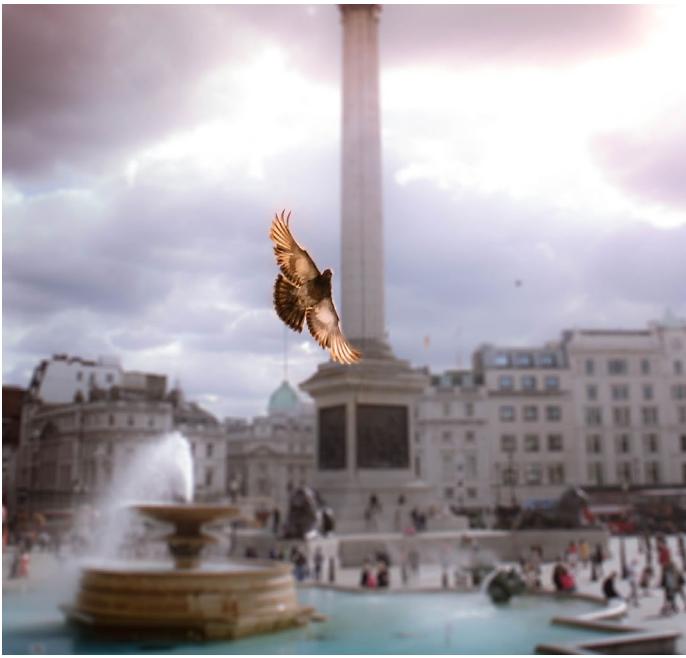
我们都笑了。

“你的视频里很难看出这一点。”

“能，有。我真的是这样，我讲云南、烟台相关条约的条件，需要国际主义立场，我就只提国际主义这个词，我就怕有这样的争议。”

“我看的时候就没感觉出来。它实际上完全被民族主义淹没掉了。”

“我主观上确实是这样。我很犹豫嘛，就是犹豫在这一点。”



题图来自 [Mike Lacey](#) on Unsplash

非虚构

你觉得你是小粉红吗？ | 革命者陈一真④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对于一个有备而来的诡辩者，
通常你的理论和价值观在他的咄咄逼人面前不值一提。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怀第三世界的？”

“自发的关怀，很早之前就开始吧，应该是来自于成长环境。”

“邯郸让你有关怀第三世界的契机？”

“有啊，援建越南。七十年代，抗美援越。这是一个大的环境。陈一真是不是夸大了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在他视野中的权重，很难判断，不过他承认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屈辱史”——他在视频中所号召的“屈辱感”也是他对殖民主义批判的一个来源。“也是从大三大四开始的，开始学近代史的时候，屈辱感也可以上升为人类关怀。”

我们现在可以再次回顾，在陈一真大三大四的时候发生的事：

他觉得文科学错了，应该学理科才对；

他开始读毛选马选；

他成为左派；

他对在国内受学术训练失望，以及放弃这一路径；

他认为学术环境是被一批“学阀”所垄断的；

他对老师和公共知识分子界的理论开始怀疑；

他在学习近代史之后，强化了表现为民族主义的一种屈辱感。

“中国历史跟殖民地并没有什么关系。”我这个说法也不是很严谨，即使按官方标准来看，我们也只是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我学历史，觉得很有关系，中国就是一个殖民地。”他很干脆地否定我的意见。

“我以为中国骨子里是一个帝国转型问题，三百年转型期，‘历史三峡’。虽然提法上很文艺，但可能确实如此。”我那时候还不是很了解柯文、魏斐德这一派历史学者的观点。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是殖民地解放问题。”

“不是周期问题？太平天国也不是？”

“不是，太平天国不是李自成。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殖民地问题。”

“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帝国。有被殖民的历史，但它不是一个被殖民的国家。”

“您可以这么认为。我也可以认为我的。比如说，开始中国农民怎么生产，自给自足，面向国外的商品，它交税的部分，是用在哪里？用在农业再生产，还是国家机构的维持；税收流向哪里，是还外债，还是其它，这也是一种殖民。中国与阿尔及利亚、与印度完全可以类比、对比。”

我在看他批判《通向北京的道路》的视频中也特别提及了赔款、税收和外债这些问题。他主要是用来批驳“我们的赫德”。

“为什么不把它理解成 19 世纪那一波的全球化呢？”我在历史知识的素养上技不如人。

“这不是英国造成的吗？我们农民和他们的税收，反正是我的一个观点。”他也表现得很客气。

这似乎还是可以回到柯文那里。如同庄女士批评的那样，陈一真是个“西方中心主义者”，至少他是认可“西方冲击 – 中国应对”这个传统的史学研究框架。

第一次我们在聊阿尔及利亚的时候，话赶话，他说自己是个进步主义者，我知道这做不得数。对于一个拿阿尔及利亚作为尺度来衡量世界的人来说，如果持进步主义立场，他为什么不主张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的融合？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我们难以想象两个独立国家怎么可能有探讨融合的可能性，但在 1950 年代末 1960 年代，即使全世界殖民地兴起解放运动，但这还是一个可以在历史范畴里探讨的话题。柯文和陈一真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不能拿现代的东西去衡量历史上发生的事。

当然，还有一个是一定要说的，以加缪的激进，所有人都对他在阿尔及利亚独立解放运动面前表现的保守持一种疑问态度，而所有人也都知道这其中的缘由所在，相比于萨特、法农来说，他是真正实体意义上的阿尔及利亚当事人——他的母亲就在阿尔及利亚。因为他要保护他的母亲，所以他没有签字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

不恭敬地说，这像柴子亮说的两头牛的故事。

左派历史学家理查德·沃林曾经如此评价：“加缪从未明确地发表很多左派分子所期待的、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声明。他的崇拜者备感失望，因为他在 1957 年诺贝尔获奖演讲中没有提到阿尔及利亚战火。事后看来，加缪没有践行他在诺贝尔获奖演讲中详细阐述的、有关知识分子良知的两条戒律：（1）拒绝对已知之事撒谎；（2）反抗压迫。”

加缪自己说：“地中海把我内心割裂成两个世界，一个世界精心存放着记忆和名字，另一个世界里，风沙远远、远远地卷走了人迹。”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人类的困惑和退缩，而非一个革命者。

萧先生在与我们聊天时感慨说：“谁不爱加缪呢？”对啊，他在革命的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一种摇摆不定、矛盾的可笑，还有人性的柔弱。

“在英国的时候那种屈辱感受特别强烈。”他开始主动说他的故事了，我们有点意外。但他又马上意识到这句话可能会被误解，跟跳起来一样强调说，“不是离岸爱国！不是！”

“那岂不是很甘地？”

“我特别讨厌甘地。在南非，面对白人感受到屈辱，面对黑人就觉得高人一等。还有，我觉得他很虚伪。”不是所有殖民地解放运动都会得到他的认可，有一些很细小的地方暴露出来的弱点瑕疵，会被他放大，比如他在说到钱穆对理学的推崇的时候，他在说到“变节”和“转向”的李泽厚的时候（注：在一次我们提到李泽厚的时候，陈一真讳莫如深地笑了。我们问：“你的笑有点意味深长。”他说：“李泽厚文革时出了一本哲学史。”李泽厚文革时出哲学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八十年代之后，他反水了。”）

意味着他跟余秋雨一样，文革时是个棍子。”），说到丘吉尔和他太太的虚伪的时候，也包括本来应该像反殖民主义灯塔一样的甘地。

“在英国的时候，我参加过支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接到过恐吓信，匿名的。伦敦市中心不是有很多的纪念碑吗？那其中有一个八国联军的纪念碑，上面有个十字架，我爬上去给它掰了，很多人围观。屈辱感，因为屈辱，我才去掰的。”

“这是之前屈辱感的结果？”

“如果我没去英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对帝国主义就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它旁边就是丘吉尔啊、纳尔逊啊这些人的偶像纪念碑。这是天然的……一个结果，看近代史，有这种共情也很正常。”

“英国有这些我觉得倒是正常。它是一个多元的国家，你掰的是多元的一部分。中国你不用去掰什么，想评价一点什么都可能的啊。”我根深蒂固地会想这个行为本身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我可能砸孔子的像。”

“你也可以说是英国包容了你的这个行为。这有点像丘吉尔说的打赢反法西斯战争，就是要保护你可以掰这个十字架的权利。”

“我觉得丘吉尔打赢二战是要保护英帝国主义的利益。”

“丘吉尔喜欢那么说，不管他是不是虚伪，实际结果就是他的那个说法保护了你，你得到了掰十字架的机会，在中国你根本不敢掰任何象征物。”

“对。”

“这不是有点讽刺吗？”

“是啊。”我有点拿不准他此时是重新陷入到“我懒得跟你说”的状态，还是认同这其中的讽刺。

“那你内心要怎么面对这样的讽刺呢？”

“这个也挺难的。确实挺难的，包括像我做视频，它到底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是我，我大概会再度走到人生思考的十字路口。足够我想一想了。”

“我可能跟您不一样。我肯定不会对丘吉尔感恩戴德。我不会说他包容了我，不会对英国体系感恩戴德。”

“嗯，如果你这样，你就喜欢伯林了。”

“对，如果是这样，我就喜欢伯林了，喜欢甘地了。”他几乎重复了一遍我说的话。

“如果抛开帝国主义者发明的这些，你相信个人的解放和相对宽容一点的自由吗？”

“我觉得只有坚持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我这种人才更有生存空间。我觉得我付出的代价太多了，人生已经受到威胁了。”

那个匿名信不仅威胁了他，显然更激起了他的斗志，他被赋予了全球范围内，或者说在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前线直面敌人的悲壮色彩。

“匿名信还留着吗？”

“撕了。”

“他恐吓你什么了？”

“什么地狱的审判之类，上帝什么的。那人肯定是支持以色列的。”

我理解的是匿名信的投递者，用的是陈一真掰十字架的勇气和态度，发出了终极审判的威胁。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权利捍卫者”，因为权利的捍卫而走向“身份”的捍卫，继而困在“身份政治”中，或者称为“身份政治”的受害者，或者说牺牲品。

隔不久，我们去拜访一位自称持“保守主义”立场的资深时政观察者。我们给他讲了因为在B站上批评《通向北京的道路》导致这部剧下架的主角陈一真。他用他的保守主义立场评价了他：“这人你说是什么特征呢？典型的白左，受欧美教育那种。强调个人强调进步强调理性，反殖民。反歧视。白左。全是西方教育出来的。他们还没有国内的那些西方教育的国家主义分子，或者毛左什么的左，更纯粹。”

关于身份政治，近几年知识界反思者众。关于它对权利与政治的影响、对2016年以来政治环境影响的论述和专著颇多。因为几十年巨大的惯性使然，它的影响还在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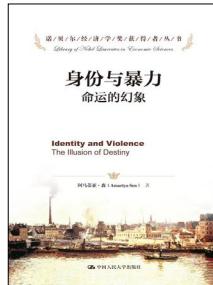
我注意到早期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中所提及的一些见解，对于解读陈一真的思想，有一些很有趣的助益。

当然，除了“身份”本身的话题之外，有趣之处还在于：

(1) 阿马蒂亚·森的殖民地出身的背景；

(2) 他特别提到了甘地的贡献，与陈一真的“非黑即白”式的对甘地的厌恶（毕竟他很主动地提及对甘地的厌恶），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对比；

(3) 英国，这个殖民地宗主国，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它的价值。



阿马蒂亚·森的观点：

单一性幻象依赖于这样的假设，即它不把人视为有许多关系的个体，也不把人看成分别属于许多不同团体，相反，他或她仅仅是某一个特殊群体的成员，这个群体给了他或她唯一重要的身份。对这种对单一性分类的总括作用的信念，不仅作为描述和预测的视角而言是粗糙的，而且其形式和含义中都渗透着明显的对抗性。一种对世界人口的绝对的单维度划分，不仅与“世界上的人大体相同”这一古老的信念相对立，而且也与人们在许多方面都不相同这一重要而合情合理的认识相违背。人们的差异并不仅存在于某个单个维度。

除了不可靠地依赖于单一分类外，文明冲突视角还忽略了同一个文明内部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广泛的联系。这一视角在描述上的贫乏不只限于它对单一性的片面依赖。

(《身份与暴力》 p37, 38)

印度的穆斯林人口几乎比世界上所有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都要多（印度有1.45亿穆斯林，几乎与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一样多），然而，印度却很少产生以伊斯兰教为名义的本土恐怖主义，与基地组织也几乎没有联系，这一事实早已被很多人指出过了。这有许多原因（其中包括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强调的印度日益增长且趋于一体化的经济）。但是必须有一部分功劳要归于印度的民主政治本质，同样应感谢的是印度广泛接受了由甘地倡导的这样一种思想：除了宗教族裔之外，还有很多身份认同对人的自我认识以及国家内部不同背景的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都至关重要。

(《身份与暴力》 p135)

“你自我不确定的东西是什么，有让你自我怀疑的东西吗？”

“只能说还没有。很多人没有历史感，以为现实是一成不变的，然后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我觉得现实是可以逐步改变的，消除或者减少这些矛盾。我指的是我有耐心有信心看到舆论环境的开放……”

“你是认真的吗？”他说的话听起来像是我们要表达的。

“主要是有耐心有信心让人去做，如果只是坐那儿冷嘲热讽是不会改变的。”他大概是认真的。

“但是，如果有耐心、有信心，有人去推动言论自由的开放的话，你那视频……”

“第一，言论自由我是支持的，对不对？第二，我的视频表达的是我的另一个观点，殖民地解放。”

“你这里是矛盾的啊。”

“一般人会认为，殖民地解放和丘吉尔的体系是有矛盾的。”

“我说的矛盾是殖民地解放和言论自由不是对立的。”我发现我们在说三个事——殖民地解放、丘吉尔体系和言论自由。

“但很多人会把它对立起来。”

“你会不会认为发的那个视频，结尾的呼吁是有问题的。”我的意思是不管你有多

支持殖民地解放，你不能先把别人发声的自由给“抹掉”。

“不认为。”

“但你支持也相信这个舆论环境会变好变自由，同时你举报了一个人。”

“我没有举报。”

“但你在号召举报。”

“舆论环境变好变自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支持殖民地解放的人越来越多。”

“我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同时希望鼓吹殖民主义的人……”

“越来越少。”

“甚至消失？这就是矛盾啊。你支持 A，我支持 B，你希望通过举报让 B 完全消失，这显然是扼杀言论的自由表达。”

“我就是通过辩论的啊。”

“但是你让它消失无益于这种辩论啊。因为谁都知道你呼唤的不仅是举报，你肯定知道起决定作用的是权力。”

“我没有让它消失啊，对不对？”

“你们也觉得我是支持民族解放的，你们觉得片子说得对不对？”

“或者你可以跟大家说，这部片子是错误的，大家不要相信它讲的这些东西。但没有必要让这部片子消失。如果这部片子没有了，你就是在对空气说话。你的战斗也没有意义，别人对你的支持也没有意义。你希望更好的更宽松的言论环境也是不会存在的啊。”

“但这个环境里，共存的，更重要的事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解放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片子消失了，你得到的不会是对你的真正的支持。这时如果有另一个更激进的人，我支持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最后大家倒向极端民族主义，这也不是你希望的反殖民者。”

“我是一个行动派。华夏民族主义这种极端情况是可以避免的。”

这就又回到那个问题了。行动派或者革命者希望的是一个具体的目标的实现，他并不在意这其中使用了什么手段，付出的代价如何。

“我说服的是一般的观众。我用质量来说服。我摆的是事实。尽管他们可能倒向了民族主义。”果然他决定放弃革命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你要争取的是摇摆不定、要倒向你的人。这个人如果只看到你，没看到你批判的本体，那怎么相信你？”

“所以我说这个挺难的嘛，本体不在。”

“那你还号召别人举报。”

“那这么说，让他们的言论消失吧，策略上让这个言论没有市场，消失是为了推广另一种观点。”

“这不是洗脑吗？”

“这不是洗脑。”

“让别的声音消失，只留下我的声音。这不是洗脑？”

“我的希望就是有人真心认同我，认同我的观点。”

“如果这个人不真心，但他先站在这你这边。也是……”

“策略上也是可以的，我只能这么说。”

“你觉得你是小粉红吗？”

“我不是。小粉红也可以进步吧，至少不倒向大国沙文主义吧。”

有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它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但最后我们还是忍不住问了陈一真。

“你要是跟马老师探讨这个问题呢？会怎么样？”

“写书界没有这样的事。之前有一个普通的读者，搞音乐的，他看我的视频之后给庄女士发邮件，说有一个人说了这种问题，他把他的截图给我看了。庄女士说，不愿意回复。我做了这么多工作，为什么大家还不理解我，我以后不会做了。”

庄女士拒绝讨论的一个原因是对“话术”的厌倦。这是一个与“站”“黑”“粉”这些词相近的词汇，它并不强调价值观或者立场或者道理，它强调语言和交流是一种技巧，有时也会有糊涂人把它归结到逻辑范畴里。对于一个有备而来的诡辩者，通常你的理论和价值观在他的咄咄逼人面前不值一提。“你以为你凌驾于这个文化之上，”她说的“这

个文化”是指气势汹汹来骂她的那些不同意见者，“你 PUA 人家，最后你变成了人家。

你影响不了他们。”

PUA 确实是一种话术。



题图来自 [烧不酥在上海 老的](#) on Unsplash

他再一次爽朗地笑了。我觉得就差他拍一拍我的肩膀了。

杜斌是北京一所 985 工科大学读材料学的博士，刚刚读到第二年，考博之前他在中部一所 985 大学毕业，再之前就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在老家山东日照读到高中毕业，之后父母到北京工作，所以他现在说起来算是家和学校都在北京。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好学生，再加上杜斌五官精致，笑容友善，给人感觉是一个听话的乖巧的好孩子，就像楼下一家中看到的那个穿校服款运动装的男孩，通常来说，这样的孩子一定会成为父母的骄傲，家族的荣耀。

在人生的大多数时候，他应该也确实如此。

他的家庭就是典型的中国家庭，与所有中国家庭一样，到了孩子上中学的时候，这个家庭里的大部分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小孩呢，成为“考试机器”。我们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杜斌纠正——他强调说不是学生，而是这个家庭完全成为“考试机器”。杜斌初中是走读生，不住学校，所以他们整个家庭的所有时间安排、大事小情的安排，都以他的考试为中心。他说上海或者其它大城市可能还会有一些其它的活动，但对于日照这样的地方来说，时间只能用于两件事：学习和耍。杜斌从小被家里寄予厚望，所以他的时间就是学习。他总结自己人生：像他这种中产阶级出身的小孩没有受过什么苦，唯一的压力就是学习。

初中考高中，日照市第三名，山东与河北、湖南不一样，河北衡水模式是全省掐尖模式，山东只掐到市，所以日照第三名称得上是尖子里的尖子。但学霸模式在高中时受到挑战，“高中时想学好，怎么也学不会啊。”这是杜斌谦虚，即使高中不再顶尖，但成绩从来没差过，学习成绩最差的时候也只是在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之间，用他的说法，并没有离开过“学霸圈”，只是没有办法“跳上去”，脱颖而出、一骑绝尘，不现实，所以高中时的杜斌有“焦虑，很无力”之感。

到了高中，性格逐渐养成，这时，有两个特征在他身上越发明显。一个是他和他的亲戚朋友们公认的，爱看书，另一个是“动手能力”差——这两个特征放在一起，人们很容易会想到“书呆子”这个词。但杜斌并不 nerd，他发挥了看书带来的“动嘴能力”，这是后话。

先说弱项。按他的说法，只要不让他动手做实验，他哪一科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实验不行。他会讲各种跟实验有关的痛苦经历，电解食盐水，他不至于做反，但电池电量的问题可能就落下了。这种能力缺陷一直到大学，大二做化学实验，材料系理论课他都可以高分通过，实验课他都是“飘”着过，我们问他实验到底难在哪儿，他想了一下反问一句：“这么说吧，男同志做家务难在哪儿？”

我想不到他会有这种中老年语言，尤其是他的“男同志”。

“这不好说啊，谁说男同志做家务就一定不行了？”

“我这几年，研究的不是谁能谁不能的问题，而是不能的人为什么不能。”

我有点被他绕糊涂了。“动手完全不能？”

“基本上是这样。”

“你的‘完全不能’是什么概念？洗袜子会吗？”

“洗袜子，这么说吧。洗衣服的事，男孩子家长不太让洗衣服。”几句话工夫，杜斌营造出多个刻板印象的苗头，比如前面的“男同志”，此刻我要拼命抑制住脑子里出现的“呵呵山东男人”几个大字，“我妈一直问我为什么不好好洗衣服，除了因为懒、费时间以外，最关键的一个点是，我眼神儿有点近视，不是非戴眼镜不可，平常不戴眼镜模模糊糊的，上课要戴，开车要戴……”

这听起来就很像一个借口了。他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反客为主，重新掌握主动：“我永远会问一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洗衣服啥叫洗得干净。”

“你洗碗的时候总是会打碎几个碗吗？”

“那倒不至于，但洗碗的时候永远是油腻腻的。”

“永远油腻腻？往死里放洗洁精也可以啊。”

杜斌觉得这样解决问题不够专业性。他认为自己虽然没有学化学的动手能力，但好在他有学化学的人特有的纠结：第一，不要浪费，第二，用多了会造成污染，所以要尽可能地少。不过，虽然他嘴上这么说，但还是对没有实现目标而遗憾，他举二战的例子来反思自己：“以前是你很怕浪费，后来就是因为从小接触动手的机会比较少。不知不觉中他转到第二人称，看起来这样的客体化有助于他对自己进行剖析，

非虚构 电解氯气， 以及地理课代表的三本书 | 手里握着锤子的人①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这是杜斌。

北京西单北大街，一家商场的咖啡店。

从楼上的窗口看下去，一个穿着运动服的男生，拎着两个纸袋，往楼上扫一眼，犹疑了几秒钟，掏手机看下时间，然后钻进楼里，我们猜这个人可能是杜斌。过片刻，楼梯口出现了运动服男生，一张瘦脸，眼睛大，鼻子尖，时下有竞争力的网红面相，运动服更像是校服的款式，说起来是阳光的。果然是他。

我们寒暄，说起介绍我们相识的中间人的近况，疫情，疫情里的学校，管控有多严格，出校门不容易。2020 年的 9 月，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影响。

我们每个人要了杯美式，还有每人一杯免费的水。

我们说我们在做什么，介绍我们已经聊的或者计划聊的各种类型的人。这些例行动作结束之后，我们请他放松，别紧张。

然后，他摆摆手。

“放心。我见记者见得多了，在宣传口干过，他开始就表现出跟运动服不一样的气势，这是一种油亮的背头、中山装、叉开双腿或抬腿站立的气势，他留意到我们询问的目光，表现出了对我们的耐心，“有时是在学校，我自己接受过一两次采访，以前我做学生工作，校报记者比较多；有时是学校领导采访我坐陪，湖南省里的台要来采访，帮领导写写稿，做些准备，也是配合记者的工作；再有一种是以前搞社会实践，展示成果嘛，我们表现不错，当成一个样板树起来，我们跟记者聊两句。”他哈哈笑起来。他手里的咖啡杯恍然间就像一个白色会议专用马克杯，仿佛看到他吹了吹漂浮的茶叶，“再有一个我自己，没在媒体干过，但一直在宣传口，实事求是地说，调研工作做得比较多，懂行，哈哈哈哈。”

“举个例子，二战的时候为什么德国兵日本兵没有美国兵能打？你说他们是狠劲不足吗？单兵作战的话不一定。为什么呢？美国兵是工人出身，德国日本兵是农民出身，所以美国人玩枪玩坦克玩得溜啊。从小接触这些东西很重要。”

这个笨拙到有点邋遢的男孩，对动手能力始终保持了一种战略上的藐视。据说屡败屡战，已经修成正果。从 2019 年 7 月开始做实验，中间赶上疫情，一直到这一年的 8 月才结束，杜斌所在的组实验项目是造磁铁，连吹风机带豆浆机要用到十七八台仪器，杜斌说没让他弄坏的只有三台，第一轮实验做完之后，他已经成为实验室里的维修权威，所有实验室培训都从他这里开始，一方面仪器都是他用坏的，另一方面他会修，不是所有仪器都还保留着说明书，只有杜斌上穷碧落下黄泉在网上找到各种说明书，给厂家和工程师打电话。一句话，再也不担心用坏了。杜斌毕竟是学霸出身，虽然动手能力差，但脑子还能记得住，他现在是安全规范使用机器的标兵。老师赞美了他：干练了。

他说他这几年里学会了不断调整预期。杜斌以中考第一名入校，高考以全校一百多名考出，应届生一千人出头，差不多是前 10%，不算太差；放在全省，排 6996 名，山东那年 80 几万考生，可以上 985。但如果认真算起当初预期，排将近 7000，自己不能接受。他说数学一直没有突破，挫败感很强。

这挫败感如此鲜明，又因为生在青春期，所以它大约被无形当中放大成一个巨大的苦恼。“高中时我就意识到，我有苦恼，那你说比我差不是更苦恼的吗？当然不想学的另当别论。无论谁在学习上都会遇到极大困扰，高中之后，学生遇到的困扰也极多。到了大学里面，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其它所有问题都是小问题，除非遇到男女朋友甩了、父母离异这样的事，其它事都是小事。”

他说这两个问题甚至可以合并为一个问题，一个是学习成绩，一个是职业规划。“你说学习是为了什么？不说高大上这些，学习就是为了找一个工作，养家糊口或者赚钱或者为共产主义事业做贡献，这些都另当别论，首要的是你找一个工作，有一个落脚点。”

高中的痛苦经历，让杜斌相信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他要帮助这些人，他要做一个好人。最重要的践行好人计划就从这件事开始。

潜伏在他身体里那个爱看书的杜斌，开始发挥作用了。

“人生阶段不同，对我人生转折产生作用的有三本书。”杜斌看我一眼，自信回来，摆出一副开讲的架势，我怀疑在他的认知世界里，我是一个迷途中挣扎的“小同志”，而他毫无疑问掌握了人类光辉前景的密钥，恨我不幸，怒我冥顽无知，但又很有长者之风，所以总是语重心长循循善诱，“第一本书呢，是集中在高二下学期到大一上学期这将近两年时间城看的，叫《农业学大寨始末》，宋连生写的；第二本书是小说家叫邓贤，他到缅北考察之后写了《流浪金三角》，你可能知道这个事，解放战争结束后，一小股国民党残军逃到缅甸，建立一个反共的基地，最后一路被缅甸打、被国际社会打，我们也会打，一路跑，金三角局势全搞乱了，成为现在的毒品王国。第三本呢相对独立一点，中央党校一个姓万的老师（万资姿，实际是供职于中央团校，就是中国青年干部学院），《人的全面发展：从理论到指标体系》，这本书我没全看，我看的是第二单元，人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论述。”

杜斌说他看过很多书，家里的书就有很多。杜斌自己的论据是他家从山东搬到北京时，搬家公司对他提出抗议——书太多了，足足有三吨。我对富有达三吨的书没有什么感性认识，只是疑问既然有这么多书，为什么不同凡响的会是这三本书。

“为什么这三本对你来说很重要？”

“我这个年龄说这几个事就挺不容易。之前知道农业学大寨这个词，看了这本书知道山西黄土高原艰苦环境就不用说了，陈永贵带着全体农民三战狼窝，打造一个海绵田，炸掉几座山变成良田，把黄土地变成海绵田，夏天能保墒能蓄水，雨来了能蓄水，春天来了能保墒。生生地把黄土高原改成了塞上江南，让那儿的人民……”

“你确认？你去过大寨了？”在我的知识谱系里，那里并没有变成塞上江南，不论是大寨、昔阳县还是晋中山西或者黄土高原，如果只是一块梯田变成塞上江南，那能有什么好说的呢？挑水上去也可以，谁家里还没有一个大花盆呢……不过，他能把保墒蓄水什么的顺嘴说出来，也算是有点科学精神吧。

“我没去过。一直想去。但是可信，家里人老一辈都在乡下生活过，所以经历也信。”

“山东和山西不一样……”他老家是山东海边的日照，跟黄土高原可一点也不一样。

“种地打渔的经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是地理科代表。山西的地质条件，我知道得七七八八。”

唔。地理科代表也行？而且，他好像并没有开玩笑，他也不是一个会开玩笑的人，直接启用了一个“因为……所以……”的句式，这倒让我们刮目相看。后来聊得更多，我发现一个他的特征，就是他有一个低配版的语言体系来对接我们习惯于在官方媒体中看到的那个宏观宏大的表述体系，这个“地理科代表”对接“水文地质条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按他的说法，“七七八八”差不多一样。

与杜斌见过面之后，我特意跑到图书馆借了《流浪金三角》和《农业学大寨始末》来看。宋连生这本书出版于新世纪初，我以为隔了三十多年，更多科学认知，更长期对水文土壤生态环境的观察应该会让我们的观察者有更深入的科学上的认识，甚至就是单纯从对“农业学大寨”的认知来说，找到一些新资料来佐证历史，也是很正常的事，当然，更有可能的是反思能力和深度……结果都不是，他引用的所有材料还是在 1970 年代，你说它是当年陈永贵和大寨的钦定官宣版本也并不意外，唯一的时代特色是，它把自己装扮成学术书的样子：加上了参考文献索引，比如：1974 年的《大寨红旗》、1975 年的《昔阳学大寨》和《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经验选编》，还有《普及大寨县》。

我可以确认的是，看这本书可能倒真的不需要太多地理科代表的知识，他说懂得七七八八，我觉得至少不比宋连生的水文知识差。而且，很显然，杜斌志不在此。

“第一个是自力更生。第二是讲科学。第三是以互助组起家的，做起来之后还是继续帮助。后来还推广先进经验。当然了，受制于当时的条件局限，跟文化大革命搅在一起，走了一些弯路。影响是什么，他奠定了我的一个方法论的基础，第一自力更生，第二讲科学，第三是我最常干的，朋辈互助。这也是现在高校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只有靠互助，才能搞起来。这是当时共产主义精神体现。这是我方法论的基础。”

这倒是证明了宋连生没有白写这本书，他至少收获了一个真正读懂这本书意义的人。在这本书里，宋连生热情洋溢地讲述了一遍当年大寨的故事，同时以更饱满的热情赞美了当家人、领路人的工作方法：

“60 年代初，还不是这样的说法。陈永贵当时的法宝是开会。先开支委会，说服党支部的几个委员，支委们统一思想了，再开党支部大会，就这样一层层地开下去。谁要是不同意，就说服教育，给他讲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受苦受难，给他讲亚非拉美人民还没有解放。一次不行两次，三次不行五次，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每天说服不止，早晚让他同意了就算解决了问题。这种办法应当是行之有效的，因为一个村子总要有个权威性，陈永贵的说服教育要比强迫命令来得温和些。但如果村民们都真心实意地信服了，恐怕也言过其实。”



我感兴趣的点其实在于，如果没有那本跑到他前面的《农业学大寨始末》，他是否了解有“大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关键点，就跟生命里突然会出现一个缅北的“金三角”一样，这完全是一个随机事件。作为一个习惯于在班级里有一个“首长”感觉、并且很在意“权威性”、热衷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他来说，他的思想武器，或者说工作手段，甚至是方法论到底从哪里学来。

但事实就是这样。这个自力更生的故事可能强化了杜斌的某种选择，让他的语言体系、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处世哲学，或者换一种他自己的语言体系——他的战斗性、他的理论水平、他的思想武装完全走到一个不一样的体系里。

那天与杜斌告别之后，他觉得意犹未尽，一是没有说服我——“一次不行两次，三次不行五次”的愚公移山精神没有来得及施展于我们身上；二是当天他表现不够从容，没有展现出他的完整风范；三是没有赢得我们的信任。他决定从三吨书入手，来强调他知识体系的完备。

他发来了几张书房照片。

第一张照片：

《解析几何》
《钛合金相变及热处理》
《材料科学名人典故与经典文献》
《无机化学》
《精细无机化学品生产技术》
《热学（第二版）》
《粉末烧结理论》
《最想要的英文句式书》
《光的语言》
《分析化学》
《XX 结构力学》（没看清前面两个字）
《中国式联合重组》
《化工工艺学》
《无机材料工艺学》
《非金属矿加工与应用》

两本包着书皮的书

第二张照片：

《自控力》
《学哲学用哲学》
《分析化学》
《国际贸易地理》
《无机材料科学基础》
《无机化学 XX》（还是看不清）
《基础化学》

三本包着书皮的书

《物理学的故事》
《全球通史》
《材料科学基础》
(看不清)
《工厂供电》
《全球通史》

横着的两本书：

《平易近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第三张照片：

《机械基础知识入门》
(看不清)
《XX 基本理论概要》

《中医诊断基本功能与临床》
《塞尔伯恩博物志》
《英文字根字典》
《XX 写作教程》（疑似）

（两本看不清的书）

《好词好句好 X》
《瓦尔登湖》
(看不清)
《实用建筑五金手册》
《现代西方经济学》

横着放的：

《有色金属冶金 1200 问》
《八股文百题》
《法语》
(两本看不清的书)

我猜想，以他的好胜心和竞争意识，这应该是他的大部分书了，或者至少是搬到北京之后的大部分书。它基本上涵盖了大部分范围。可以确定地说，没有三吨。

在三张照片提供的信息中，包括 12 本看不清楚和包着书皮的书，一共 54 本书。

其中：

他的材料学专业相关的书占大多数，有 24 本。

外语学习相关有 3 本。包括一本法语教材。

通识相关 3 本。《物理学的故事》和《全球通史》接近于通识教育类书籍，但看起来不会比《上下五千年》更高深。

哲学相关 3 本，姑且叫为哲学吧。《学哲学用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和《平易近人》这几本跟哲学、马列主义哲学和时政读物有关的书，似乎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写作相关有 3 本，这也不代表什么，并且，我怀疑这些东西可能与考公务员有关。

经济相关 2 本。《现代西方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地理》，都看不出来是哪个版本。所以很难判断这些书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他对经济兴趣看起来不是太大，不过，即使再不重视经济，生在这个时代，总是要懂得一点全球化道理。

励志类、心理学相关有 1 本，《自控力》在这个书架里，看起来像一本专业书。

文学相关有 2 本。《塞尔伯恩博物志》勉强算作文学类吧，就像《瓦尔登湖》勉强也可以算作博物类，他的文学品味都偏向于博物学。《塞尔伯恩博物志》的另外一个版本叫《塞尔彭自然史》。我不知道他对这些书的热爱程度，但我很高兴我们在这么少的一个选择范围里，我们居然还可以有交集，这交集算起比例来，已经在 4% 上下了。

中医相关的有 1 本，可以理解成是生活服务。不过，可能比一般的生活服务信仰更坚定一些。

实事求是地说——这是杜斌的口头语，他特别喜欢说“实事求是”——这不能证明什么，比如他希望以“看书多”而赢得思想深邃的印象，它们无法让我信服他。从这些书看，他是个目光狭窄的人。他的阅读范围大概不会超过一个高中生的水准，而且他似乎只看学校里的事，当然作为一个学生，哪怕是博士这也是可以原谅的，但如果他试图扮演一个马列主义权威，试图要解释世界，而且时刻准备着“治”点什么“理”点什么的人，这几排书说不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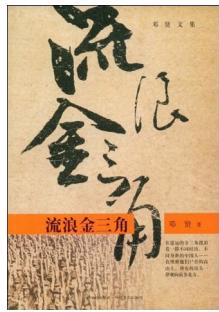
这些东西让我觉得兴趣寡然。如果我没看到这个书架，我还会想，为什么一个人会在看很多书之后选那三本书作为人生最重要的书，现在，我觉得一切都很正常。

我的成见更加深了一步。并且我还安慰自己，有的时候也不用为成见而自责——哪怕你的身份是个记者。毕竟，他的亲戚们也会诧异于为什么这个乖巧的小孩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但显然，三本书，至少我认真看过的那两本，对我们来说有更多的启发。它不是“加速”了杜斌“变成那个样子”的过程那么简单，更重要在于它的时机。因为在恰当的时机出现，它不光变成了锚定某个重要人生节点的参照物，而且它还会发挥持久的影响力。怎么说呢，这东西可能像青春期的初恋或者暗恋，你说某个初中生高中生能有什么伟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呢？但他（她）占据了时机；它可能还像那个鸟的隐喻：一只雏鸟第一次睁开眼，那第一个出现在眼前的活物成了它的妈妈。

“一个是什么事都不支持的条件下，它最后打赢了。认同这种方法，认同这种精神。这是理想的状态。同样的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怎么挣扎拼杀，最后还是一个荒诞的结果。最后在泰国北部血性的中华儿女，国民党残军，一个赢一个输了，我在学习上就是这种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想拼想杀，压力巨大，最后高考生也是一刀死也是一刀。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掉下来砍脑袋那种。有些时候心理投射，高考好与不好，成与败都是这个结果。这个艰难奋斗的过程与我的经历产生投射。在情感上我倾向于大寨，但在现实上，我可能觉得金三角，我的数学成绩怎么学都学不好，甚至还在往下掉，像金三角的感觉。高考前夕，高三下学期，《流浪金三角》这本书我翻了三十多遍。就是从这本书看到的东西。大寨是理想中的自己。现实中的是金三角。”

杜斌总结《流浪金三角》于他的意义，证明了这一点。



高考结束之后，他觉得自己考砸了。自己前途未卜是很小的一个问题，大问题是别人怎么看他这个从小名声在外的学霸，父母吹出的牛如何收场，还有，如何面对父母……没有答案，他决定自杀。

在杜斌对自己成长的描述中，与他饱读诗书自信满满洞察一切的风格最不匹配的事件，就是这个自杀。

“实事求是，自杀了一次没死成……”在无数次地说到“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中，这一次用得最准确。自杀以及自杀未遂的方式即使在严肃刻板的杜斌说起来也过于搞笑，“电解氯气，电池到半夜没有电了，把分解出来的气体又吸回去了。第二次是……”

我脑子里闪过又哭又笑那个 emoji，有半个房子那么大。我想起他的电解实验，这是他“动手”能力的一个死穴，“你是要以一次成功的实验来结束自己一生吗？”这么问一点也没有同情心……

啊，还有第二次？

“第二次是逃，想着逃到缅甸去吧。从山东骑自行车去缅甸，死在半路上算了。”

“您是骑到哪儿被找回来的？”

“开车库门的时候，被老爹老娘抓回来了。说来话长，我们自行车放在车库里，开车库门前还在家里放了份遗书。前脚开车库门，我老爹老妈就就醒了，抓了个现形。”

……

成长经历，听他们完整的人生故事，琢磨他们的想法如何产生……

“我不考虑他的对与错，只想知道他的成长经历是怎么影响的。”

不仅仅是做个好人，他有更大抱负。

他说他的偶像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在说起他做的这些事的时候，头脑当中有一个蓝本，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杜斌结束了他的青春期。像所有临时起意的自杀或者离家出走一样，这个家庭风波很快过去。杜斌还是家里和家族中懂事乖巧学业优秀的好孩子。他后来说到了他如何从这痛苦中走出来，他如何坚定了他做个好人的信念。他希望自己在道德上更加完美，他希望建立一套自己的价值观。他说他按人生正常进度向前走，增加自己人生阅历。他相信要想做咨询——把他的人生一部分使命定义为要做学业辅导、生涯规划，肚子里就必须要有“货”，一方面是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是思想政治社会学理论，坚持看。他真正的本行——材料学也不能扔下，坚持学。而面对更宏大的社会，跟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沟通，增长自己的见识，他说他会跟卖煎饼的，跟农民工，跟保安，跟外卖小哥，所有这些基层社会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沟通，听他们的



题图来自 [Soviet Artefacts](#) on Unsplash

非虚构

“实事求是”是什么意思？ | 手里握着锤子的人②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这位宣传口上的同志。

就像开始几句话里的“宣传口”“样板”“实事求是”这些词汇让我们有点游离于他乖巧到有点笨拙的形象之外，某种意义上，这个时时打着“官腔”，像一位老干部一样的小同志，可能更接近于他的本色。或者说，这是训练出来的本色。他有一个可以对标整个官方语言体系的低配版体系，随时拿出来让我们审视这位年龄还很小的“老同志”究竟是怎么回事。

很快我们还发现，在这种语言的运用中，他恰恰是如鱼得水一样地表达——他的表达有时陈腐，有时恐怖，有时一言难尽。

“你是怎么做了宣传口？”

“我是搞思政的，难免要接触宣传口。”

“那你怎么搞起了思政？”我觉得他的回答和我的问题都很没有营养，只是在同义反复。但对他来说可不是这样。

“我是怎么搞的思政……”他沉吟了一下。感觉就像有一道追光此时聚焦在他脸上，周围的光线暗下来，一个人进入沉思与回忆中，“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上大学以后，先是在基层，就是班里做过班长团支书。那时还在读本科，发现有很多现实问题想解决。”他挑起眉毛，饶有兴趣地看向我：“对学生来说，最关心的是什么？”

我在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发现他无意问我，此刻他目光从我脸上移走，望向更远处的虚空，我明白这只是他沉吟的一部分，“无论他关心什么，最后他心里的那一怕，就是考试考不好。”果断，坚定的结论，之后就流畅了许多，“保研的想保研，低分的怕挂科，这怕，都在考试上。有些人想学学不动啊，包括自己想学学不会啊……”继续果断而且坚定。“二年级的时候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学业辅导，当时的话，搞学业辅导，搞了一段时间，慢慢地、慢慢地，这不就入党了嘛。学业辅导，顾名思

义，谁学习不好，就来辅导谁。谁来辅导，学校成立一个学生组织，聚拢一票，大意原理是学习比较好的带学习比较差的，模式是也有学长带学弟学妹的，这样一种。还有同年级的同学。这几种我都搞过，一来二去带过四五个。”他的语气始终稳定，控制着输出的节奏。“再有一个就是入党了。入党的党务工作比较多，考博后，正式彻底加入思政队伍。现在是西四宣讲团的团长。”

这个时候，他适时地停顿下来，很贴心地望向我，期待我做出呼应。

杜斌 2014 年考大学，2015 年入党。按他对组织章程的理解，这是最快的速度了：入学，交申请书，成为积极分子，过一年，大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什么时候能入党？成绩会有一些要求，但主要还得是学生干部。2016 年入党要求严了，高中时毕竟大家都在准备高考，不适合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各种活动比较乱，而且，底下人容易胡搞。”他不经意间突然转换了一个角度，更高屋建瓴了，更中央了。不过，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入党时间——“除非你上了大学，或进军队，否则的话，高中是禁止发展党员的。我呢。年龄小，高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我是十月份的生日，差几个月，不行哈哈哈哈。入党，原来说法是年满 18 岁，留一个机会就是 17 岁可以成为积极分子，现在更严了，18 岁才可以提交入党申请书，所以入党现在最快最快也得 19 岁。”

他还是有点在意自己的党龄，没有在 18 岁第一时间入党，有点不甘心。

“入党是你人生规划的必经之路。”我说，这显然毫无疑问。

他并不满意于这样的表达：“必经之路也对，毕生追求也对。我们现在搞新思想，我们讲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说句大话也是实话，为共产主义终身。这个玩意，这个玩意是毕生追求。入党是什么？不是第一步吧，也是必须要走的一步。”

我们问他什么时候意识到“自我”，我们会问很多人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家会很认真地说某一本书或者某个事件，时间大多是发生在高中。杜斌不一样，杜斌第一步把它转译成他的理解，继而用他更熟悉的语言体系来重新解释。

“嗯，这个问题好。我自己也是搞心理的。”第一步。

“你怎么还成搞心理的了？材料学算是心理？”

“我长期从事学生工作啊，”这是他的第二步，“我一手搞磁铁，一手搞马列。磁铁是主业，马列是副业。他对成建制的语言的运用有一种天分。这种套话往往很有气势，说一不二，常见于各种媒体的标题。

“马列和心理学算是一回事？”我们连自我意识的发掘到底算不算心理学都不太叫得准。不过，没关系，杜斌会把它们统合在一起。

“我是搞学生工作的，所以说马列主义、学业辅导、思想教育、心理工作、职业规划……学工口一个辅导员，他必须在这六七个口里来回倒。我没当过辅导员，但做的是类似于辅导员的工作，这六七口多多少少都懂一些。”他拉了一根叫“辅导员”的辅助线，把他与心理学建立了关联，他觉得光是这样说还不够充分，又补充了一句，“而且这一些，拿出去的还不少。”

“我们说是你自己的那个自我，自我意识，自我觉醒。”

“单纯说自己的话，我反倒觉得，打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很自我的。”他又思考了几秒钟，大约意识到他说的“一直很自我”与老师家长经常批评的“这孩子太自我”画上了等号，这个局面一旦出现，接下来聊天就会很被动，万万不可出现，几秒钟后，杜斌重整旗鼓，现在再度把我们的提问纳入到他的语言体系中，“其实，应该这么说，人的自我意识，我个人，对自我意识理解是什么呢？一个人当他感觉到对这个社会的底层有一些认识，往大里说，看透这个世界的门道，能够认识一些规律，并且根据规律来做一些事情。认识规律做事情的过程，就已经逃脱了蒙昧状态。”我能感觉出他大概偷偷长出了一口气，接下来就顺当很多，“然后呢，人无非就是七情六欲，如果能感知这个七情六欲，并对这个七情六欲加以一些引导和控制，产生冥想性、思想性的认识，这个自我意识就诞生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比一般人认识要早得多，可能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吧，至少这个进程就已经开始了。开始是个渐进过程，我明确记忆到的时间点能到这个时候。”

成功转移，接下来就顺畅了。

“原因是什么，其实也并不复杂。自我意识最简单的话说就是能跟自己对话，能反思和叩问自己。当时反思和叩问自己是什么，会想什么问题？我说五四运动对中国到底是一场革命还是对中国文化的毁灭你信吗？”

可以娓娓道来了。

“我们家打我爷爷、我姥爷不识字，看书的习惯从父亲这辈开始。我有看书习惯，去年我家搬家，我的东西我和父母的东西分开搬嘛。嚯，那工人师傅把我骂的，你家的书，多，压秤。又帮我算，你们家这书加在一起有三吨！我从小就爱看书。从小啊，有漫画书，看得不多，史书看得多，政治书看得多。注意到五四运动，知道一个谁呢？北大有一位学者叫辜鸿铭，留长辫子的怪人。那时候对他挺迷的。说老实话，那时候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区别还不是太清楚，因为辜鸿铭思考的问题也就成了我思考的问题。”

“现在还迷吗？”

“现在知道的人多了，对这位老爷子，有清晰的判断。如果说偶像，唯一的偶像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了。现在说已经不再是偶像式的崇拜。”

还记得当年自杀，走出困难的也是靠马列主义。“那时候心如死灰，成天宛如行尸走肉，脑子也不灵光。后来整个人，怎么说呢，你们可能觉得我矫情，当时整个人浑浑噩噩，什么也不想干，什么也不能做。整天想一个问题：人活着到底为什么？慢慢地，还是从马列主义找到了答案。列宁说，物质世界……”再一次感受到一束光打亮了世界，“这话之前看过，只是到这个时候看出了新东西：物质世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实很多老师指出我学习上的问题……”

“他们预判了你的自杀或者出走？”

“当然了，也没有指到根上，毕竟是高中老师。”他那掩饰不住的鄙夷又不合时宜地跑了出来，“我的那些问题，可能要以最新的教育设计来解释，他们解释不了。有的说我自作聪明，有的说我不打基础。不像一般学生跟老师倡导的方式，导致的后果是，我自己也到底是……”

他善于把犯错误当成学习的机会。就像他说到犯错误最多的做实验，“仪器也好，其它事也好，多摸两遍，门道熟了，就了解了。”然后，他迅速地上升到“朋辈相助”，“我们实验室人多，权责很分散，每个人都窝着一肚子火，但谁也没想找我的麻烦。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是，仙人指路，有这个领域里深耕了多少年的人，不光是说浅浅的知识，把经验都告诉你。如果身边有一个同志犯了错误，一个同志，师兄师姐，毛手毛脚，班干部、辅导员，有些同学就是不会报表，在领导面前说话没个数……”

嗯？什么叫在领导面前没个数？

“举个例子，他循循善诱，“大一，班里评贫困生，军训时临时班长交材料，个人自述。师姐说了，交纸质版，临时班长是个小姑娘，找张信纸，熬夜写到两点，工工整整，交给师姐，师姐不满意了，我说不是纸质稿吗，纸质稿是指电子版打印版。你说谁对？不存在谁对谁错，知识背景误差，我怼了师姐。毕竟学校要求电子版打印，又敲一夜，第二天辅导员找我谈话，以后不要跟师姐怼。现在我做学生干部也明白这个问题，辅导员后来说：你要跟师姐怼，以后师姐怎么有权威？”

“不应该谁有道理听谁的吗？”我想不到这里还有一个权威的问题。

“我自己就是一个挺有感念的干部，特别理解一旦威信崩塌的后果。学生干部跟政府国家机关不一样，人家是有强制性的，学生这里你要是崩塌了，谁服你管？”

“没有利益关系的管理不应该更纯粹一点才对吗？”我虽然一直不是很友好地打量着杜斌时不时冒出来的各种很腐朽的“官气”，但也实在想不出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官本位”思想。不过，杜斌倒是很快就诠释了“官本位”完整的冬烘气。

“后面辅导员也说了师姐，对低年级学生，你要永远保持耐心包容理解，你永远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不知道。”

我还是不理解：“你们不能把这些交流替换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吗？”我的意思是，但凡想着师姐的尊严、低年级的无知，这里都充满了我们马克思说的那种人的异化啊。

杜斌继续宣讲：“这不是不知者无罪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办事，企业招聘，你这个人能用你，符合我用你，你参加高考，符合学校要求我要你，不符合要求我不要。包括爱情，这个姑娘这个小伙子。对路子爱你，不对路子不爱你。人与人之间无非就是各取所需，道不同不相为谋。问题就在这儿，一个人不适应社会，什么意思，至少说它不适应自己的这个小圈子，他就可能在这个环境里过得磕磕绊绊，甚至会被这个环境抛弃。”

年轻人啊，你要适应社会。虽然中间偷换了几次概念，但我还是理解了他要表达的良苦用心。但我觉得这社会之所以变得庸俗，每个人都有责任，大家想办法让社

会变得更清澈一些才是正确选择，而不是一起把世界变得污浊化，然后再想办法博出一个胜利的身段。

杜斌跟我想得不一样，他又引入一个新的概念：“现在让你看材料基础，没有先生来教你，就一课本，你能考几分？假如你无法选择呢。比如说我必须得高考，我还想考高一点分。我有强迫症吗？必须要考很高的分，我数学就考不高，物理化学实验就是做不好。两口子在家，希望对方有所改变，就是改变不了。世界就是这样。什么意思呢，人总有想改变的事情。人有没有义务想拯救他。我是站在 loser 的角度去想他的。”

他觉得还不足以振奋发聩：“一个人在这个环境不适应的时候，环境到底负不负担拯救这个人。”

我还是低估了残酷性，杜斌看到的是 loser，想的是拯救。我想起他说的普天下人得解放，我面对的是个伟人啊。

但是，谁是 loser，谁需要拯救？

“每个人可能都是，我也可能是。”杜斌可能意识到我们对 loser 的惊诧，他在评估这个词，在没有明朗之前，以退为进是最好的策略，“非常具体的例子，有的同学，有些小姑娘非常勤奋，高等数学她就是学不会，快要挂科了，我们要不要帮她？两个学期高数，就是学不好，自信心没有了，胆也吓破了，信心磨没了，荒废了。有人因为家庭原因和环境荒废，有人本身斗志也不行，混日子，高等数学还是要挂科。你有能力帮他，他可能因为害怕被拒绝从来没人帮过，可能不知道找人帮，反正最后都是不会想到去求助，你帮不帮他？”

“帮不帮是一回事，但人家小姑娘是不是 loser，是另外一回事。”我这次没打算由着他把概念换掉。

“我做这么多年学生工作。这样的人就是我说的 loser，高数没学好要挂科，你要主动伸出援手，细致地做学生工作。”

是不是通过做学生工作可以帮助人考过高数，我不是太了解。我关心的还是谁以及为什么是 loser 和一个一门心思要解救 loser 的人到底在想什么。“挂就挂呗。毕不了业是一个人自己的事，他自己可以为这事负责。”

“我的看法很朴素，宣讲的时候我不会这么讲，做学生工作时我可能会跟他们讲得很功利。我个人观点，追求不追求理想是你个人认知。你总要生活得好一点，待遇稳一点，收入高一点。”

他选择这种态度可能没错。这是一个中产阶级价值取向的、中庸的甚至庸俗的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只是对于一个充满革命豪情的青年来说，这未免太消极以至于婆婆妈妈了。“你这么说没错，但对于一个对高数提不起兴趣的人来说，我可能不一定非要这个，我甚至可能连大学都不想上，我更希望自由发展一些。”我们替那些被杜斌反复做工作的落后倒霉蛋们思考对策。

“我搞的是生涯规划，在我自己的岗位上，我要让大家明白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意识到那个问题：那个人有一个锤子，所以，他看到哪里都像是一个钉子。因为杜斌做的生涯规划，他必须要为你做这件事。

“你假设我是需要辅导那个人。我只是特别丧，我不应该出现在北航，你说得都有道理，但不是我要的方向。”

“我首先，要跟你交朋友……”

“我不想跟你交朋友……”

“当一个人偏执的时候，他会很痛苦。他迷不迷茫、痛不痛苦，我们是感受得到的。不是他愿意不愿意与我说的问题，痛苦迷茫在精气神上能表现出来。朋友圈都会说自己很丧，我自己有时候也说。但我们面对的是具体的问题，对与不对不说，丧，你会舒服吗？你不舒服，你难受。我能感受到你的难受，我也跟着难受。我要帮你解决。你开心了，你不难受了，我也就不难受了。”

有一点拯救的意思了。但拯救是给被救者还是施救者以更大的快感？尤其是在挂不挂科的问题上，尤其是……我想象了一下有一位“生涯规划”的杜斌，努力地来劝我打起精神笑对人生，直到我从落后变先进，从挂科青年到浪子回头，然后在他的小本本上打一个对勾，他满意地微笑……我宁可退学啊。

“理论上倒是这样，但我真正舒服的方式是我退学，或者我推着自行车去缅甸，流浪好不好吗？”我想起他的未遂离家出走。

“所以啊，这就是生涯规划的问题。你想要什么，如果说你能接受得了，最坏最坏

的情况，流浪街头。另一方面，我在你们面前说这话可能像吹牛，这一行五行八作的人都见过，最底层的、最顶层的都见过，我会给他算账，你想当三和大神，那你每天要付出多少的劳动量，你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家里人什么样……求生之途，求死之途，不生不死之途。生涯规划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一般来说我都会先了解他的家庭，结合家庭情况，把所有可能的路展示在他面前……”

“三和大神”本义是指深圳劳工市场中一群打零工的人，他们生活态度随意，并不想保持一个具体的职业身份，过有今天没明天的生活。这个群体因为 2018 年日本 NHK 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而知名，三和是深圳当地的一个大型劳务公司。我跟他说：“你拿三和大神来吓唬人家，有点像爹妈的唠叨，人家不是更烦你了吗？”

“谁都不爱听道理。我爸妈跟我唠叨，我也烦得要死。”他这么讲的时候，可能只是他用来讲道理的讲话艺术的一部分，比如以己推人，比如将心比心，比如设身处地，这些的好处是拉近话事者与被拯救者之间的距离，此刻他为了划清与父母唠叨的界线，他强调他的专业性，“我要讲具体操作，遇到实际情况你如何操作，只要你有实操性，他就愿意听。我们日常做的最多的工作，我是材料类的，‘生化环材，四大天坑’，很深的坑。泛泛而谈，工资低、劳动环境差、就业岗位不多，同样分同样优秀，有些人考计算机收入高，有些人学这四门，差距就出现了。甭说这话对不对，你清华北大北航北化，一本三本，盘踞在每一个学生脑袋上的挥之不去的阴影。有的人没有动力学好材料学，焦虑、压力……实事求是，给我们的管理教育带来了很多困难，我毫不讳言这事。”

这个时候，他说话的主体似乎是材料学院的院长，而不是那个试图拯救落后者的热心青年。

“有些人暴露出这个问题，看到了舆情的苗头。选课过程中，产生一些重大干扰……”说到“舆情”的时候，他应该又回到学院的宣传口了，守土有责，“这时候，就很有必要讲道理。前几天我还给一些师弟做咨询，他们问我，师兄，我到底要不要转计算机？甚至还要问我这个专业找什么工作，很现实的问题。我作为学生干部也好，作为老学长也好。反正尽可能负责的态度，我至少要告诉他们实事求是的答案。第一，材料到底坑与不坑，要调查校友要看过去数据……”他再一次强调了他“生涯规划”所服务的那一群人，“总有人是缺信息的，总有人是缺能力的，或者缺技能。”

我也又一次感觉到他头脑当中有个九宫格一样的存在，每个格子里摆着各种人，有些格子不那么高级，简单点说，就是用来装他所说的 loser 的，善良、友好而且充满使命感的他，很愿意去拯救他们，“一些人缺乏某些知识，历史上它培养的缺失，它失去了一些能力。毛主席说过自由是什么？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识世界，实质上就是信息；它是改造世界的前提。”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为电视剧《新闻编辑室 第一季》剧照

新闻业就是刊登别人不想被刊登的东西，其余一切都是公关。

——乔治·奥威尔

众所周知，社交媒体的兴起是近来推动“信息孤岛”现象的因素之一，它满足了我们对证实性偏差的固有偏好。不过，如果不先认真面对传统媒体的衰落，就无法说明问题。

在传统媒体的鼎盛时期，今天所谓的美国主流媒体”(prestige press)（《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 ）和电视网（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是美国人的主要新闻来源。“1950 年，美国日报日均总付费发行量为 5380 万份（相当于家庭总数量的 123.6% ）。”分析一下这个数据。它超过了 100%。因此，有些家庭订阅的不是一份报纸，而是两份。“到 2010 年，美国日报的日均总付费发行量约为 4340 万份（相当于家庭总数量的 36.7% ）。”再进一步分析，这意味着读者流失了近 70%。至于电视网，从 50 年代起，新闻都是由一名主播每天晚上用半小时向全国播送的。沃尔特·克朗凯特 (Walter Cronkite) 从 1962 年到 1981 年都坐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大办公桌后播报新闻，常常被称为“全美最受信任的人”。

许多人将此阶段视为新闻业的“黄金时代”。在整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来自电视网的竞争导致许多小报纸歇业倒闭。“大浪淘沙实际上给美国大部分主要城市留下了一份垄断报纸，一份比 20 年前更好、更丰富、更严肃的报纸。”电视方面呢？因为被期望每天只播出半小时的新闻，这些电视网就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调查性报道中。除了偶尔（可怕地）提醒说“我们现在为您插播特别报道”，这意味着发生了战争或暗杀事件，否则新闻内容都被限制在自己的利基市场之内，以便让电视台从娱乐节目中盈利。

虽然电视上的新闻不多，但这对新闻部门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人们不指望它们带来任何盈利。泰德·科佩尔 (Ted Koppel) 解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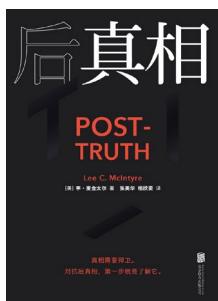
电视网的主管们担心，如果不能按照《1927 年无线电法》 (Radio Act of 1927) 中阐述的“公共利益、便利和必要性”行事，可能会导致联邦通信委员会暂停甚至吊销他们的执照。三大电视网指出，他们的新闻部门（处于亏损经营或勉强收支平衡状态）证明他们正在履行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要求。不妨说，新闻是在赔本赚吆喝，无法盈利，这也使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得以证明，利用其娱乐部门创造巨额利润是合理的。

随着 1968 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60 分钟》 (60 Minutes) 的出现，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该节目（在播出三年后）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盈利的新闻节目。这让电视网从业者有了新的灵感。尽管这并没有立即改变电视新闻的模式或预期，但电视网的主管们开始意识到，新闻也是有利可图的。



约翰尼·卡森《今夜秀》

尽管如此，无线电视业的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但是，1979 年的伊朗人质危机导致了一个困境。公众突然渴望更多的新闻，然而如何才能在不中断利润丰厚的娱乐节目的前提下，满足这一需求呢？约翰尼·卡森 (Johnny Carson)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主持的《今夜秀》 (Tonight Show) 成为一匹黑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几乎已经放弃了那个时段的运营，仅用来播放一部深夜电影。美国广播公司则选择在该时段重播黄金时间的节目。后来有人提出了一个想法：



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当时决定尝试不同的做法——将每日伊朗简报移至深夜。这也是一个营销策略：其竞争对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有颇受好评的约翰尼·卡森脱口秀，而美国广播公司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深夜节目，而且新闻节目相比之下成本也较为低廉。美国广播公司在晚间时段推出了一档名为《夜线》（Nightline）的新节目，专门报道（人质）危机。每天晚上，美国广播公司都会在荧屏中展示“美国被俘人质”以及被俘的天数。主播通常是美国广播公司资深新闻记者泰德·科佩尔，他会通过采访专家、记者和其他与危机有关的人物来填满时间。

节目非常成功，一年后人质危机结束，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节目还在，却依然有一个问题待解：除此之外，还有人想看更多的新闻吗？

下一个入场的是 1980 年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几乎是一场赌博。突然之间就有长达 24 小时的新闻节目要播出了。虽然科佩尔可以罗列一连串拟邀请的专家一起讨论伊朗问题，但有多少专家能到节目现场，又有多少有新闻价值的话题呢？在观众这边，他们是否愿意把新闻当成 24 小时的自助餐，随心所欲地转台，而不是等待下一期报纸或电视网主播的“晚餐”播报？他们确实曾经如此。虽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因提供相比无线电视网而言“注水”的报道而遭到批评，但它的成功立竿见影。1983 年，《纽约时报》商业版报道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第一次盈利。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及以后，其收视率不断增长，一系列危机吸引着人们收看：“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柏林墙倒塌，最后还有海湾战争。

当然，也有人批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偏见，但这些偏见是几十年来报纸、无线电视和有线电视新闻挥之不去的主题。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讨厌新闻网在越战时期对他的报道。尼克松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将华盛顿记者团斥为“一群喋喋不休的牢骚大王”。右翼人士一直在抱怨新闻反映了一种顽固的“自由派偏见”，但直到 80 年代末，人们真的也别无选择。

在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出现之前，电台广播谈话节目已经播出了 30 年，但是，正如汤姆·尼科尔斯（Tom Nichols）在他的书《专家之死》（The Death of Expertise）中所解释的那样，林堡确有创举：“（他设定）自己为一个与美国其他媒体对立的真相来源。”林堡感到其他媒体都在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这样的自由派“站台”，于是他试图为美国其他地区发声，结果大获成功。

林堡的节目开播几年内，全国就有 600 多个电台播出……（林堡）让听众打电话表达支持，以此在全国建立忠实的粉丝团体。据林堡早期分支机构的某位经理说，电话都是经过筛选和审查的，这是因为林堡觉得自己不太擅长辩论。然而，辩论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其目的是在那些早已倾向于彼此认可的人中间创造一种团体意识。



人们收听林堡的节目，并不是为了去了解新的“事实”，而是认为报纸和电视的新闻报道有政治偏见，他们与这些偏见格格不入。除此之外，在热线电话首次亮相之前，媒体是单向的：一直是别人在告诉他们真相是什么。林堡的节目让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参与到团体之中。在媒体谈论证实性偏差之前，拉什·林堡已经发现了它。这使他成为一名主宰者。

那时，人们才意识到党派新闻报道所具有的潜在市场。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成立于 1996 年 7 月。随后是 1996 年 10 月推出的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两家公司都把自己视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替代者。你会发现，直到今天，人们都不愿意接受微软全国广播公司是有党派色彩的。它在最初的几年里并非如此，安·库尔特（Ann Coulter）和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等保守派评论员经常

出现在节目中。然而，在某些时刻，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已经安于自己的（有时是不舒服的）利基市场，对新闻持有自由派的视角。福克斯新闻——由保守派媒体顾问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创立——并没有表现出这种矛盾情绪：

福克斯新闻的出现是党派分歧的最终表现，展现出人们如何在新的电子虚拟市场中寻找新闻来源。林堡试图用电台广播做的事……艾尔斯通过电视网实现了。如果不是艾尔斯创造了福克斯，一定会有其他人创造福克斯，因为正如电台脱口秀节目所证明的那样，市场已经存在了。就像保守派作家兼福克斯评论员查尔斯·克鲁瑟默（Charles Kruthammer）喜欢拿来打趣所说的那样，艾尔斯“发现了一批利基受众：一半的美国人”。

福克斯将党派新闻报道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康涅狄格州纽敦市 20 名小学生惨遭枪杀的第二天，福克斯新闻集团的高管们向其制作人发出指令，禁止任何人在广播中讨论枪支管制问题。他们试图让新闻报道偏向保守派的做法事实上众所周知。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新闻内容。2013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69% 的福克斯新闻嘉宾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而《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这一比例则分别为 29% 和 17%。另一项研究发现，68% 的福克斯新闻专题报道反映了个人观点，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只有 4%。因此，在硬新闻（hard news）和党派观点之间没有清晰界限的情况下，福克斯新闻的铁杆观众相信并传播他们所了解到的一些错误信息或许情有可原。事实上，2011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福克斯新闻的观众比那些不看任何新闻的观众更无知。

近年来，泰德·科佩尔把自己塑造成这种党派媒体的坚定反对者——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他认为这是对民主的威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节目《夜线》是首批显示出采访类新闻报道具备盈利潜力的节目之一，但科佩尔仍然觉得形势已经失去控制：

福克斯新闻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商业成功让我感到了超越党派的悲哀。虽然我可以理解其中的财务逻辑，他们将电视观众淹没在旨在证实自身偏见的观点之中，但这种趋势对共和制是不利的……也许，从合理角度出发，绝对客观性是无法实现的，但福克斯新闻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甚至完全放弃了追求客观性。他们向人们所展示的不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是政治谱系两端的党派（及其忠实受众）所希望看到的世界。这种做法对于新闻业来说，与伯尼·麦道夫（Bernie Madoff）对投资者的所作所为别无二致：把客户想听的天花乱坠地讲给客户听，而真相揭开时，钱已经挥霍一空。

自从特朗普当选以来，科佩尔把目光精准地瞄向福克斯。在最近接受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蒂（Sean Hannity）采访时，两人进行了如下交流：

汉尼蒂 我们必须相信美国民众，相信他们有几分才智，他们知道观点类节目与新闻类节目的区别。你太愤世嫉俗了。

科佩尔 我愤世嫉俗。

汉尼蒂 你觉得我们这样做对美国不好吗？你觉得我对美国不好吗？

科佩尔 是的……从长远来看，我认为你和所有这些观点类节目（都对美国不利）——汉尼蒂真的吗？太可悲了，泰德。那太可悲了。

科佩尔 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非常擅长这份工作，还因为你吸引了一些更具影响力的人……

汉尼蒂 你低估了美国民众。

科佩尔 不，在讨论美国民众之前，请你让我先把这句话说完。

汉尼蒂 我在听。恕我冒昧。请发言。

科佩尔 你吸引了那些坚信意识形态比事实更重要的人。

有些人会将福克斯新闻的所有节目斥为“假新闻”的鼻祖。（人们不必花太多时间，就会在对该电视网的批评中听到一些滑稽的笑话，说它真的应该被称为“仿克斯新闻”[Faux News]。）“假新闻”的问题及其与后真相现象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主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因为一些评论员声称“假新闻”不

是从福克斯新闻开始的，而是从讽刺作品开始的。

在 2014 年的一项皮尤 (Pew) 调查中，美国人被要求说出他们“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来源，其中存在着可预见的党派分歧。在自称为保守派的人士中，福克斯以 44% 领先。在自由派中，有线电视新闻占 24%，而大致并列第二的三方分别是公共电视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乔恩·斯图尔特 (Jon Stewart) 的《每日秀》 (The Daily Show)。但是请注意：《每日秀》是喜剧节目。在 2015 年乔恩·斯图尔特作为《每日秀》的“主播”退休之前，他自己说他报道的是“搞笑”新闻。他的工作是引人发笑，而不是挖掘事实。在他任职期间，越来越多“真正的”新闻从业者担心许多年轻人仍然从他的节目中获知新闻，斯图尔特为自己辩护说：“如果你想和我对质是因为我没有提出足够尖锐的新闻问题，那我们就遭殃了，伙计们。”

有人不愿意这么轻易地放过斯图尔特、《纽约客》 (New Yorker) 的安迪·博罗维茨 (Andy Borowitz) 和《洋葱》 (The Onion)。在《洛杉矶时报》最近一篇题为《左派也有后真相问题：它被称为喜剧》 (“The Left Has a Post-Truth Problem Too: It's Called Comedy”) 的专栏文章中，斯蒂芬·马奇 (Stephen Marche) 指出：“特朗普主义盛行的后真相状况根源在于左翼的讽刺。……2009 年，《时代》 (Time) 杂志的一项民意调查宣布 (乔恩) 斯图尔特是最值得信任的新闻主播。”但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恰当的理解。讽刺反衬了政客们长期试图让人接受的谎言和废话。它无意让自己被当成真事。这就是它的部分意义所在。嘲讽现实，旨在突出现实中的荒谬。如果一个人认为讽刺是真实的，那就没有意义了。讽刺的目的不是欺骗，而是嘲笑。正如马奇本人在他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讽刺是假新闻的反面。讽刺作家撕开新闻业的伪装，揭露他们认为真实的东西。假新闻网站利用新闻业的幌子传播他们明知错误的信息。”然而马奇认为，尽管他们的意图不同，结果却是一样的：“政治讽刺作家和他们的受众已经把新闻本身变成了笑话。无论他们的政治内容为何，他们都为美国政治话语的后真相状态做出了贡献。”

这似乎是政治讽刺的沉重负担，令其难以行动。然而，人们已听到汉尼蒂对福克斯新闻的辩护：“我们必须相信美国民众，相信他们有几分才智，他们知道观点类节目与新闻类节目的区别。”信息传递者要对粉丝群体中可能产生的错误印象负责吗？还是说，这种责任只该落在那些故意误导他人相信不实信息的人身上？但是，如果讲故事的方式确实制造了一些误解，那该怎么办呢？将责任转嫁到观众身上，是否就足以免除制造偏见的罪恶？

媒体倾向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更具党派色彩的模式带来挑战之后，传统媒体在这种竞争性条件下是如何衰落的。而我现在要探讨的是，传统媒体的质量，以及对于优秀新闻在价值观上的责任，是否也一样在衰落。

随着 1996 年有线电视“新闻”节目的兴起，传统媒体开始褪色。他们不想和那些媒体混淆！因此，无论是无线电视网的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是“主流媒体”报纸，它们都试图通过更强调“客观性”以脱颖而出。福克斯新闻“公正而均衡”的报道口号无疑是为了嘲弄传统媒体。这并不是说福克斯会认为他们自己的报道更加均衡；相反，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以自身取得整体的均衡。其他媒体过于左倾，因此他们进行了偏右的平衡。但由于传统媒体永远无法接受他们实际上就是偏左的观点，他们决心表明其在报道中确实可以做到“公正而均衡”，因而开始报道所有争议问题的“两面”。

这非但没有增强客观性，反而有一种讽刺效果，有损于他们提供准确新闻报道的承诺。在一个党派人士急于传递其观点的环境中，向党派雇用的骗子提供一个宣泄不满的平台，肯定无法维护新闻诚信的最高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讲真话）。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客观性的口号反映在提供“均等时间”的决心，以及“讲述故事的两面性”的本能反应上，即使在事实问题上也是如此。虽然涉及到观点争议时，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甚至值得称赞的目标，但是对于科学的研究的报道而言，这是一场灾难。媒体通过给予“均等时间”，仅仅创造了“虚假的均衡”，它们报道一项议题的两个方面，即便当时并不存在两个可信的方面。

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科学否定论者怎样利用媒体对客观性的担忧。他们不再需要拿出整版广告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只要胁迫媒体，使其相信，如果在科学话题上存在“其他研究”，但没有报道出来，那一定是因为媒体有偏见。媒体人就此上钩，

即使这些争议只有那些在金融或政治上有利害关系的人提出，他们也开始报道气候变化和疫苗等“争议性”话题的两面。结果就是公众对媒体煽动的假信息感到了彻底的迷惑。

1988 年，早在气候变化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之前，老布什 (George H. W. Bush) 总统就承诺用“白宫效应”来对抗“温室效应”。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全球变暖问题成为激烈的党派之争。石油公司已经开始做他们自己的“研究”，并希望媒体进行报道。同时，他们也在为政府部门捐款并游说他们。我们现在明白，所有这些都只是“人为制造的怀疑”，企图掩盖一项事实，即世界气候科学家几乎已经达成以下两点共识：一是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二是人类活动对此负有责任。但是，无法把这个问题留给科学家们去解决，因为它牵涉到太多利益。反正只要场上还有“怀疑论者”，媒体就觉得有责任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来报道。

詹姆斯·汉森 (James Hansen) 是气候变化问题最早的吹哨人之一。1988 年，他在国会做证，使得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两项法案。作为美国宇航局 (NASA) 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前任所长，他是该领域的世界顶尖专家之一。然而，面对媒体对事实的“客观性”认定时，他的一手资料遭到侮辱：

我过去总是一视同仁地划分责任，直到有一天，我上公共电视时，制作人告诉我：这个节目还“必须”纳入一个“反方”人物，他会对全球变暖的说法提出异议。他告诉我，商业电视就像电台广播和报纸一样，提出这样的反对观点是一种惯例。公共电视的支持者或广告商出于自身的特定利益考虑，要求“均衡”报道，才会持续给予财务上的支持。（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书中揭示，尽管最近报纸上一半以上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章都对这种相反观点给予了同等的重视，但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几乎没有一篇科学文章质疑人类活动排放导致全球变暖的共识。因此，即使在科学证据明确的情况下，反对者在技术上吹毛求疵也会给公众留下一个错误印象，以为气候变化的现实和原因仍然存在很大的科学不确定性。

此外，汉森的遭遇完全算不上特例。一夜之间，公众都开始参与电视分屏“辩论”，屏幕的一边是科学家，另一边是“怀疑论者”。主持人会给双方大致相同的时间去讨论，然后宣布这个问题“有争议”。有一段时间，大多数电视新闻节目似乎都在模仿福克斯新闻的口号“我们报道，你来决定”。

公众自然会感到困惑。气候变化到底有没有科学上的争议？如果没有，为什么电视节目如此呈现呢？媒体可能会告诉自己，在“党派”问题上表明立场不是他们的职责，但稍作调查，他们便会知道，科学家对此并没有分歧，如此报道相当于新闻舞弊 (journalistic malpractice)。追求客观性的目的不是在真相和假话之间给予平等的时间——而是要促成真相。既然科学家们已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共识，唯一正在发生的“争议”就是由石油公司和那些相信他们谎言的人挑起的政治争议。结局就是，即便并没有真正的科学争论，但公众仍然认为存在争议——就像四十年前关于吸烟与癌症之间关系的争议一样。

谁又能责怪公众呢？他们是在新闻上看到的！时至今日，媒体已经放弃了“说真话”的职责，转而“遮遮掩掩”，表明他们没有偏见；于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趁虚而入，用假怀疑论混淆视听。媒体为什么会允许他们这样做？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报道时的惰性。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

客观性为惰性提供了借口。在截稿日前，哪怕你只有“故事的两面”，那通常也足够了。这并不是说列出争论要点对读者来说毫无价值，而是我们常常沉迷于……“最近更新”，这样就难以推动报道逐步深入，去理解其中的是非曲直。

但这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因为如果你对真实的事物提供假话之反叙事，它会让动机推理生根发芽，直至根深蒂固。政治流氓在利用媒体，媒体在误导观众。但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角度：利润。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媒体环境中，电视网可能一直在寻找有一定戏剧性的“故事”。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在《交易的艺术》 (The Art of the Deal) 一书中说了什么真事的话，那就是：媒体更喜欢争议而不是真相。人们如何证明这样的指控是正当的，而非得出结论，说这只是在一个公认的复杂主题上发生的异常现象？其实这种情况一再发生，比如在 1998 年安德鲁·韦克菲尔德 (Andrew Wakefield) 博士伪造的研究中，他宣称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存在所谓的联系。

这里的戏剧性更强。生病的孩子和他们悲伤的父母！好莱坞名人选边站！也许有阴谋以及政府遮掩！一次又一次，媒体完全没有报道基于证据得出的最有可能的结论：韦克菲尔德的研究几乎可以肯定是真的。他有大量未公开的利益冲突，他的研究无法重复，他的医疗执照也被吊销了。这一切到 2004 年已经众所周知，当时正值报道疫苗和自闭症新闻的高潮。后来，当韦克菲尔德的研究就是一场欺诈和骗局的确切消息传出时，损害已经造成了。多年的电视分屏辩论已经让人付出代价。疫苗接种率急剧下降，一度几乎被根除的麻疹后来在 14 个州暴发，有 84 人患病。

如果你认为印刷媒体在发生的这一切中是无可指摘的，那你就错了。在 2004 年题为《作为偏见的平衡：全球变暖与美国主流媒体》（“Balance as Bias: Global Warming and the US Prestige Press”）的研究中，麦克斯韦·博伊科夫（Maxwell Boykoff）和朱尔斯·博伊科夫（Jules Boykoff）发现，“均衡报道”模式导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严重误导公众。这里的问题不是任何所谓政治偏见，而是研究人员所谓的“信息偏差”（information bias），即记者所遵循的新闻采集和报道程序会制造出歪曲真相的新闻报道。简言之，“（信息）偏差是主流媒体对全球变暖的报道与科学界的普遍共识之间的差异”。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坚持客观、公正、准确和均衡的新闻价值观怎么可能让人远离真相？答案就是因为记者们屈服于“均衡报道”，将那些党徒提供的信息纳入其中，而那些党徒的目标在于将记者推离真相。这就产生了一种“否定性论述”（denial discourse），可能会给边缘观点带来过多的可信度：“均衡的报道放大了一小群全球变暖怀疑论者的观点。”问题其实很简单。哪怕一道菜中只用了一种腐烂的食材，整道菜就会充满腐烂的味道。

均衡的目的是保持中立。它要求记者在任何重大争议中陈述冲突双方合法发言人的观点，并给予双方大致等同的关注。

但也存在一种危险，因为均衡往往是事实核查的替代品：

一般记者，即使是一个受过科学写作训练的记者，也没有时间和专业知识来亲自检查这些说法的真实性。

因此，意识形态上的“专家”利用这种情况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的利益与某一特定科学问题的报道方式存在相关性。

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出现过这种情况吗？即使有也并不奇怪。还记得 1998 年由美国石油协会召开的会议和后来泄露的战略备忘录吗？石油公司招募的那些“独立科学家”获得了回报。麦克斯韦·博伊科夫和朱尔斯·博伊科夫明确指出，美国石油协会成功的媒体战略是造成气候变化报道偏差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均衡报道占了上风；这些内容“大致对等地关注”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导致全球变暖；另一种则认为，单纯的自然周期波动也可以解释地球温度升高。

像电视记者一样，纸媒记者也被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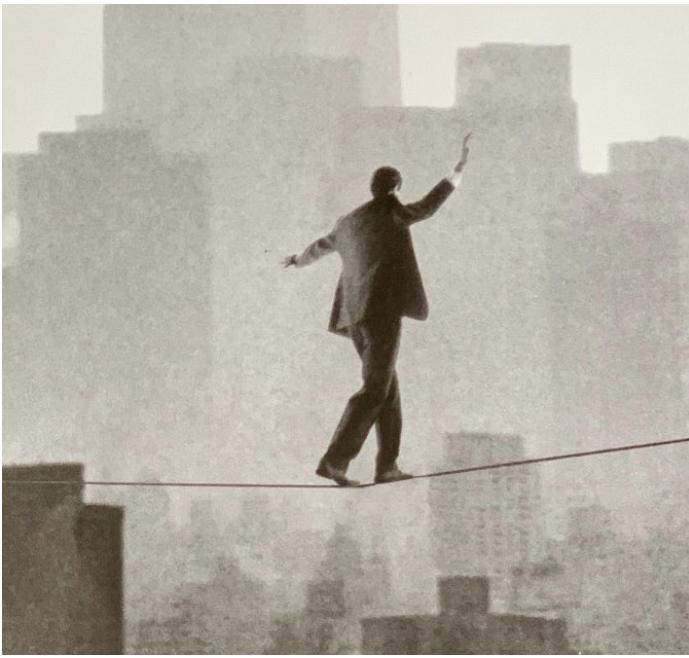


李·麦金太尔

波士顿大学哲学与科学史中心研究员，哈佛拓展学院伦理学讲师。著有《如何与科学否认者对话》（*How to Talk to a Science Denier*）、《善恶的艺术》（*The Art of Good and Evil*）、《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食罪人》（*The Sin Eater*）、《科学态度》（*The Scientific Attitude*）、《尊重真理》（*Respecting Truth*）、《黑暗时代》（*Dark Ages*）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图为英国国家剧院舞台剧《雷曼兄弟三部曲》海报

非虚构 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 出现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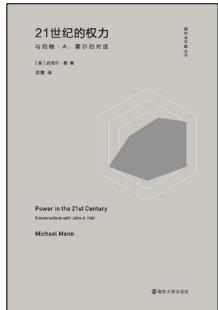
迈克尔·曼 | 新书试读

两位杰出历史社会学学者有关人类社会命运的谈话

用约翰·霍尔的话说，迈克尔·曼就像“我们时代的马克斯·韦伯”。在其跨越漫长历史时段的研究中，曼试图发展出从整体上理解历史记录的工具，形成了他关于社会权力来源的理论。

《21世纪的权力》一书源自曼与霍尔之间的一系列对话。曼在其中展示了如何用四种权力来源——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概念工具追踪权力的前沿，并发展了他对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全球权力变化形式的看法。曼认为，全球化的出现同时改变了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帝国的性质。对话总结了不同地区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探讨了中国、印度、中东、欧盟的角色，论述了可能导致国家强弱变化的原因，也提示我们金融资本不可遏制的力量和环境问题带来的重大危机。这些讨论同时构成对如下问题的考察，即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解释结构性的趋势和令人震惊的单一事件。

经三辉图书授权，我们摘选了第六章《强国家和弱国家》分享给读者。



约翰·A. 霍尔：我用英国开头，谈谈作为变革动因的国家。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它曾是世界权力的领导者，因此谈论其命运会帮助我们提出理解当代世界的问题——在当代世界，新的领导权力正在面临挑战，而其中一些挑战就和其盎格鲁—撒克逊前辈如出一辙。

你的长文《英国的衰退》现在是否仍有时效？布莱尔政权下的英国看起来在经济上更为强大，尽管它正病痛连连。在你看来，英国是否大势已去？

迈克尔·曼：英国已被永远夺去了锋芒，但其曾经的强势权力对这样一个小国家来说，仍是杰出的成就。其权力基于特定时期的海军—商业帝国。它成功地建立了主要的白人定居殖民地，征服了印度，这一切又被其工业革命的发明所加固。当工业革命扩展的时候，其他国家也发展出了强大的权力，产生了各自的主张，英国名列前茅的角色注定会结束。

撒切尔和布莱尔带来了些许恢复，但在地缘政治上使英国比以前更依赖美国。它经历了一定的经济恢复，但这恢复在其传统的金融方面比在工业方面更显著，这在近期带来了更大的不稳定。在军事和地缘政治上英国和法国相近，但其自主性更小。就经济权力而言，英国某些方面还不如德国和日本，但在剩下的西方国家中它还是名列前茅。它在欧盟中的地位要更低了，其货币的国际贸易水平也下降了。衰退虽然停止了，但英国的地位大打折扣。

约翰·A. 霍尔：我完全同意你刚才提出的地缘政治分析。但你怎么看待那些坚持认为经济受困是因为金融资本主义压倒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评论呢？那么无疑经济的相对恢复不符合你最初的判断。

迈克尔·曼：不。伴随更为强大的金融权力的是更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在这次衰退中，英国比法国和德国更加陷于困顿，而且英国的不平等也显著加剧了。不管其整体GDP数字如何，比起从前其分配更为不公，更多人民实际上失去了其社会公民权，并且也不能如愿参与经济。英国面临了和美国一样的失业问题。其正式失业率是8%，但比起欧洲其他地方，英国有更多临时和兼职的工作。它只是对部分人的恢复。

约翰·A. 霍尔：其恢复正处于一个金融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时期，伦敦市的技巧还有用武之地。但如果金融资本在某些方面改变了，比如说迁移了，那么英国的立场可能就并不强硬了。

迈克尔·曼：嗯，英国政府会继续保护伦敦市，它不会同意可能削弱这个城市的任何国际金融部分规则的重订，并且在这一方面，美国与它是同盟。所以我并不认为会看到激烈的变迁，只会有轻微的紧缩。显然长期来看，美国的权力相对下降，亚洲国家经济日渐增长，这会影响伦敦市，而英国的经济或许会进一步轻微衰落。

约翰·A. 霍尔：近年来你在美国上投注的精力非常惊人。美国被视作近来历史中的权力前沿——虽然有重复的危险，但是我们仍必须继续考察其地位。当你写作《英国的衰退》时，你提到导致一个主导的强国失去其地位的三个过程：技术向更为广泛的资本主义社会扩散；其成功时刻（success moment）的制度化，如此一来它会发现它很难吸取新的观念和技术；而且在地缘政治上，它发现自己被削去锋芒。现在还没有人可以在地缘政治上冲击美国的地位，我有点儿难想象它的发生。我也要重申美国在经济上的隐藏力量，不只是支撑其科技创新的制度。20年前，似乎日本就要成为第一，但现在这并没发生。然后就是成功时刻制度化的问题。应当说美国并没有太困厄于你发现的因素？它并不会经受突然的衰退，它可能还会在很长的时间里维持其地位。

迈克尔·曼：这是对的。美国主导分不同的时期。第一，美国从20世纪初开始成为最大的经济体。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缘起地便是美国，德国和英国紧随其后。20世纪剩下的时光便是这一时期出现的科技的应用，目前还没有哪场科技革命可以与其相比，对经济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当出于一般目的的科技，比如电力，使得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激发出各种各样的发明，比如铁、钢、化学，并使得农业也革命化时，在战后出现的革命却并没有如此激进的效果。我们很容易为电脑和生物科技惊叹，但它们远未带来类似的增长。



图片来自 NASA on Unsplash

第二，使得美国的权力突然大增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美国贡献了世界 GDP 的 15%，但到了 1950 年它贡献了世界经济的一半。这是战争的意外结果——更准确地说，它在战争中获得了胜利而自身牺牲不多，本土完全没受破坏。第三，当说美国只有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系统时，人们没把教育算进去，而这方面美国可算是领先的国家之一。19 世纪它在基础教育方面领先，20 世纪上半叶它在中等教育方面占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以及斯普特尼克 (Sputnik) 发射后，它开始发展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大学部分，这显然与其在科研方面的能力有密切联系。我们仍处在美国经济统领的时期——当然在军事上也是如此。

约翰·A. 霍尔：既然在未来将科技运用到工业生产在未来非常重要，而这在美国十分发达，美国的这种统领就很有可能持续。

迈克尔·曼：但是美国并未实现独占，并且它现在在用于对抗气候变迁的新科技方面未起到主导作用。在这个领域，中国、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同样取得了重要成就。美国先前的主要科技优势，是尽可能廉价而且广泛地利用其自然资源的能力。现在，美国是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我们现在认为这是极端浪费的，并且对环境是极其有害的。面临环境问题，美国比任何发达国家都更需要转向，但这是艰巨的任务。

约翰·A. 霍尔：只有欧洲权力均衡的时候，英帝国才能持续，这使得它可以主宰其他地方。目前美国尚未遇到当时德国给英国带来的挑战那样的冲击。

迈克尔·曼：是的，美国并没有地缘政治上的竞争者。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场景便是美元作为世界单一储备货币地位终结后面临的挑战。这意味着美国人必须为其军队花费更多，这会使其暂停下来。中国或许是竞争对手，它在亚洲或许甚至非洲都有自己的影响力。所以不会再有单极权力主导世界的时期了。

约翰·A. 霍尔：那你分析中的第三种元素，即成功的制度化呢？我的印象中，你写到今日的美国是一个非常静态的、深陷泥沼的社会，走不出特定的模式。这说得对吗？

迈克尔·曼：这个概括对美国很恰当，目前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似乎确实如此。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人依然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棒的，将秩序带到世界各地，但现在这变得没那么真实了。同样，无政府主义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潮流会阻碍其在经济和环境问题上的调整。共和党似乎首当其冲，它处于一个令人遗憾的状态。在政治上，权力的分割使得权力陷入僵局。

共和党是朝着意识形态内聚型政党方向发展的，拒绝任何变化，并且变得更为无政府主义、“小美国”，乃至反科学。无政府主义正是那些被认为是过去创造了伟大美国的条件制度化的绝好例证。这在民主党中并不那么明显，但他们相对的多样性使得他们和以前相比更不趋向改革，他们中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蓝狗”和“黑狗”，他们出于对日渐上升的保守主义以及对依赖石油和煤矿等保守工业的担心，不再支持改革。选区被分割，国会委员会结构变化意味着是政党而非资历决定谁会主持国会委员会，而对冗长演说规则的更宽泛的诠释也渐增。过去，冗长演说只用于那些代表们深感重要的事务，比如南方人和去隔离化、州的权利等。现在，冗长演说几乎威胁所有事务。结果便是接近死结，或者是虽然立法了，但有时其本应影响深远的设想几乎被无尽妥协所带来的附属细则彻底削弱。

唯一的例外，也是权力唯一显著的自主领域，是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权力。这在 20 世纪一直增加，并在最近重新上升，这背后是在反恐战争以及监控 / 安全机构中总统自主权的不断提升。其结果便是总统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使国家进入战争或和平状态。然而不幸的是，任何国际谈判都很难在国会通过，但国际谈判又越发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段。美国还没准备好抵抗其未来的衰落。

约翰·A. 霍尔：现在让我们谈谈别的国家，看看它们在世界舞台上有多活跃。在过去的七八年中，人们开始大量讨论金砖四国，我希望你能逐个点评。它们潜在的权

力似乎非常不同。所以让我们先谈谈俄罗斯吧。它真能成为有能力挑战美国之国的一员吗？



图片来自 NASA on Unsplash

迈克尔·曼：或许第一个问题该问，这些国家实际上能否形成一个集体。实际上不能，除了其 GDP 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它们罕有集体行动，并且差异性相当大。中国和俄罗斯、印度之间仍有领土争端，巴西和另外三个国家也很不一样。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劲。俄罗斯的经济更弱，非常依赖资源，并且也没能从灾难性的转型中完全恢复。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有强大武力，巴西没有。

约翰·A. 霍尔：俄罗斯要从法国购买它无法生产的船只，这体现了灾难性的衰退。当然，就生活水准和死亡率而言，转型是灾难性的，但历史性地讲，一个巨头的瓦解只伴随着数量如此之小的暴力，不啻为巨大的胜利。

迈克尔·曼：前提是它带来更好的未来。这的确非常不寻常、前所未有的。它从权力顶峰衰落，它因为共产党已然瓦解的凝聚力衰落，他们对本应追求的社会主义信仰失去了信念。党已成为官僚机构，不能再改革，也不能产生关于改革的政治辩论。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者们也没法提出前后一致的计划。当然，在准革命的情境之中，人们会踌躇着创造出新的政权，但他们在这方面失败了，失败的军事政变毁掉了他们，紧随而来的是失败的新自由主义。接着领导的政客意识到，没有大众的不安，新自由主义就无法实行，于是他们急转方向，于是我们看到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政策，他们又重返原地，只是比以前更依赖自然和能源资源。俄罗斯在其自身影响力范围内展示其权力，但无法帮助领导全球重构的项目。

约翰·A. 霍尔：我想，俄罗斯和同样在共产主义系统中生活了 40 年的中欧形成了鲜明对照。因其制度连续性，中欧得以在某些角度上恢复其在西方的地位，俄罗斯却成为第一场绝对失败的社会革命的发源地。有时候俄罗斯的案例会让人觉得相当困惑。

相形之下，你对中国共产党发动革命以及自身持续改革来积极加入现代世界的能力印象颇深。这改革的秘密何在？

迈克尔·曼：在苏联的经验之后，显然最重要的政策就是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以维持党的领导地位。

约翰·A. 霍尔：在政治开放 (glasnost) 之前进行经济改革 (perestroika) ？

迈克尔·曼：中国在其进行经济改革的数十年里，一旦他们进行的实验出了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就会说“好的，那我们应该停止这个”，然后转向别的路径。中央权力一直保持，并且一直可以决定何者成功何者失败。但我想还有别的辅助论点。另外，中共中央比起它的苏维埃同伴要更为去中心化，这则是因为革命发生的方式。在中国，革命是被位于不同地区（通常还是偏远之地）的红军根据地所发动的。每一个根据地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可以决定如何平衡不同的政策，是土地改革还是退租减息，决定让谁加入共产党，以及与国民党及其他当地军队的关系。因此共产党登上权力舞台之时就呈现出更具联盟色彩的结构，有更多的地方权力经纪人。汉学家们告诉我们，这被维持下来，其中有的人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顶层权力中大部分或接近大部分都是地方的党委书记。如果他们联合起来，那么被执行的将会是他们的政策，而不是党中央的。这种元素为更为去中心化的经济搭建了桥梁。

约翰·A. 霍尔：革命的性质是否意味着革命者被迫长期居住在乡村之中，因此更能看清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行的，这说法对不对？

迈克尔·曼：这在依靠乡镇企业实现增长的时期是十分重要的。本土企业一开始会占据主导。他们和当地的具有创业精神的家庭一起，发展起小而有活力的企业，带来了大幅增长。经济起飞的基础是苏联模式的指令经济，但带有去中心化的中国特色。前者确保了识字率、国民的基本健康、死亡率以及一定层次的工业生产在计划

体制下有所改善。人所共知，如果你专注于迎头赶上，那么一些国家计划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无论是日本和韩国式的资本主义计划，还是共产主义的指令结构。这带来实质性的工业发展。但正是后面的一种特征使得中国处于利于发展去中心化的、竞争性的工业结构的位置，这些特质常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独有的。

此外或许还有一种难以衡量的贡献因素，即这一直是个高度文明的社会。总体来看，在我们过去称为“南方”的地区，今日的经济发展与其过去是否是伟大文明有密切关联，比如在印度、东亚大部分地区以及东南亚。唯一没能如斯发展的是中东地区，石油寻租国家的诅咒对其停滞是重要的贡献因素。相对没有那么成功的地区，他们文明程度总体较低，早已被欧洲帝国所扫荡，正如拉美和非洲。在去殖民化后重建被证明是更为困难的。

约翰·A. 霍尔：目前大家普遍都很赞赏中国——在某些地区则是恐惧了。人们常常提到，中国很快就会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相反的论述则认为，以GDP衡量的中国人均生活标准还是非常低的。这个国家真的有能力进行挑战吗？就经济生活而言，它时常仍是复杂的装配之地，而不是工业研究的重要腹地。它在许多方面还是相对较弱，不是吗？

迈克尔·曼：你对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看法显然是对的，它们的数值仍然很低，仍需要很久才能达到诸如美国的水准。国内不平等的程度也同样很高。如果你去看北京和上海的兰博基尼经销商，再走入乡村去看看贫困的程度，你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贫富差距还很大的国家。这同样也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这部分是因为没有充足的福利。市民必须为其老年做好准备，而他们的储蓄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用的。这意味着中国并不是一个特别依赖外国资本的国家。它曾依赖外国企业和科技，但没有什么阻拦科技传播，看看日本就知道了。另一个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强大作用的特色即海外华人企业，它们长期统治了东亚和东南亚的区域贸易。海外华人带来的国外投资要高于美国和欧洲的。因为大多数科技活力都来自外国企业，包括海外华人企业，这就要求更多的科技转移。但是，似乎中国在例如替代能源的发展上并没落在美国之后。

所以我看不出任何他们不能继续发展的理由。近年来，领导人似乎意识到他们忽略了乡村的问题，也意识到不平等和差异带来太多混乱。这并不是可以轻易纠正的东西，但是政权已经意识到改进社会公民权是必要的。

约翰·A. 霍尔：或许另一个优势是中国更为种族同质化。它就没面临苏联的问题。但我承认，中国共产党似乎能够一方面通过自我净化，一方面通过变得更为技术官僚来稳住自己的根基，这很难得。

迈克尔·曼：中国90%都是汉族，这带来了社会凝聚力的优势。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重视秩序和经济增长，它的观点是党的团结是秩序的基础。不管他们如何存在分歧——他们一直存在分歧，他们也不会让分歧引发伴随苏联倒台的那种破坏性的派系之争。事实上，他们的纪律被苏联之变与“文革”之难所加强了。最终派系总是站在党的官方宣布的政策一边，不管那个政策是什么。这在内战时期已是如此。

约翰·A. 霍尔：而且在历史上，当中华帝国在1911年瓦解时他们也经历了区域战争。

迈克尔·曼：当然。而且这个国家仍将毛泽东尊敬地视作国家的统一者，也正体现了这种危机感，他们也试图去避免它。

约翰·A. 霍尔：现在让我们依次谈谈另外两个金砖国家，不过我们现在别忘了一个理论：它宣称强力的发展依赖于中心化的权力，这样方能进行教育和计划，但这种功能的需求可能会因此使得民主的地位大打折扣。战后，印度的民主似乎在很多时候限制了其经济发展，至少和中央集权的中国相比。就印度而言我们能说些什么？

迈克尔·曼：印度潜在的经济发展也建立在基于大量计划的经济之上。尽管印度有欣欣向荣的民主，但考虑到国家的宽广以及人口的多元，印度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还是存在精英的团结。确切来说，印度国大党青睐的并非社会主义，而是为一种混合经济的本土变种所吸引。它是相对世俗化的，但仍是印度教的。这为精英提供了团结的核心，这使得他们可以处理国家中的巨大差异。

约翰·A. 霍尔：民族主义者成功的奋斗是部分原因，并且在制度的层面，有印度军队的存在以及大量英国遗留的官僚技术。但其识字率远没达到中国的水准。在这个意义上，印度在创造大批在现代世界中游刃有余的人口方面还是存在巨大的问题。

迈克尔·曼：在中国也存在社会不公问题，但在印度，社会不公被更高的文盲率和乡村地区有产者更大的自主权和权力所加固了。就像东亚其他国家一样，印度的计划经济中逐渐出现了朝向更为去中心化的市场经济。和中国相比，印度的自主性程

度更高：其国外贸易的数额也更小，没那么依赖外部金融。外部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不太大。近来的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在世界范围内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你接受越多的国外资本，你就会发展得越不好，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发现。



图片来自 Dekler Ph on Unsplash

约翰·A. 霍尔：俄罗斯的案例也是相关的。它接受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而精英们将更多的资本输出给西方银行。最后的案例是巴西，1964年军事政权的格言便是“通过进步实现秩序”。进一步说，它有唯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一种孔德主义，你仍能看到实证主义的教堂。

迈克尔·曼：此处我必须承认自己的无知。我并不知道巴西为何近来取得了高速增长，我也不确定为何它会被放入“金砖四国”中。这是个很大的国家……

约翰·A. 霍尔：……并且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事实上，我们刚才所谈论的国家都有着广袤的疆土。

我们需要对金砖四国做一个总体的评价。他们或许比你刚才所说的要更为团结。他们似乎在诸如WTO这样的地方一起行动。美国最初创建了世界政治经济运行的规则，并且有时也有能力去改变它。金砖四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真正挑战它？

迈克尔·曼：他们有延缓协议的权力，这已在WTO中显现。他们中的一些国家可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行动，比如在处理气候变化方面。我们必须记住，许多更为穷困的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在外交和政策建议方面都是人力有限的。他们甚至不能派代表团参加国际会议。我认识一个埃及外交官，他时常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场合，但代表的是整个非洲，因为其他国家没有资源去派出代表。中国在气候变化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个庞大而专业的代表团，更为贫穷的南方国家依赖它来代表它们的情况。在谁污染了世界这个议题上，事关利益的冲突十分有名。发达国家从过去到现在都污染得更严重？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导致了污染加剧？中国仍然代表贫穷国家的利益，尽管它正在变得富有。因此，他们面对贸易和关税、全球变暖、环境、未来可能会有的金融问题，正开始争取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但这很少由金砖国家集体组织。

约翰·A. 霍尔：我们一直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讨论这些国家，讨论其政治经济学。但关于最近的金融危机有一个经济理论，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就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全球失衡在很多方面决定了个体国家的命运。中国的大量存款通过购买国库券的方式借给了美国，这使得利率非常低，它创造的房地产繁荣是这次危机的先决条件。凯恩斯在战争结束时对世界经济的最初计划是对债权国和债务国一视同仁地处罚。现在世界经济的规则需要得到管制以应对问题吗？同样的观点也可应用于欧元。希腊并不应负全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德国存款在寻找出口。

迈克尔·曼：但并没有以这样思考并且规制世界经济整体为目的而建立的制度。中国已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决定投入更多力量以扩大内需，但我并不认为全球失衡的问题可以像这样被突然解决。

约翰·A. 霍尔：好吧，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美国有时会促使中国少储蓄、多消费，这样它便可以恢复其出口产业，但这需要中国资本能有效地处理未来的岁月。这是非常棘手的事情，我也同意，现在无论是世界经济还是欧盟内部都没有这样的机构去处理这个问题。

关于特定国家作为变迁的行动者，我还有一些问题，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区域和类型上。欧盟宣称是一个集体。这个集体有无挑战美国的可能性？美国很长时间里都是保护性的，这对欧盟最初的团结是很重要的。但冷战结束后，部分欧洲机构开始想象一个美国作用减轻的世界。美国的支持对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仍是重要的，他们没忘了自己在苏联帝国中的位置，它们还能感受到威胁。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在谈论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时曾提到了这种区别，将欧洲分为“新”

欧洲和“旧”欧洲。这表明欧洲内部也缺乏团结。我认为欧洲人总体上仍希望美国存在，即便他们有时会抱怨其代价。因此我在其中看不到挑战。

迈克尔·曼：欧盟可以作为整体行动吗？有时可以，但不常有。然而，在气候变迁方面它制定了共同的政策大纲，尽管它允许成员国自发制定目标和遵从。从中还产生了领导人声明，其政策也比其他国家更为先进。然而在 2009 年 12 月的哥本哈根，美国和中国压倒了欧盟的领导人声明。是他们的最小排放方案而不是欧洲等国更先进的提议在气候大会上得到了半数通过。

欧盟内部也有问题。显然有许多在欧盟的机构内，以及在更广泛的欧洲的政治阶级中的人希望联邦主义会进一步发展，但这在近年来遭到民众的反击。对于联邦的计划而言，近 20 年公投的历史可不是个好新闻。公投的失败多于胜利，因此现在的改革试图绕过咨询选民进行立法，政府也变得更为谨慎。所以我认为欧盟在不远的将来会停滞在它目前所到达的水平。它现在有了新的永久长官，有了领袖和国外秘书。但他们相对而言不为人知，也不能动员作为整体的欧盟。欧盟并不作为一个明确的行动者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打交道，除了捍卫那些多年前就已确定下来的利益，比如农业方面——它在农业方面的利益被少数国家劫持了。农业对欧洲的预算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约翰·A. 霍尔：是的，并且我必须补充，欧盟的预算是很小的——差不多是欧洲 GDP 的 1%。

迈克尔·曼：欧洲不存在集体的武装力量。2009 年，法国要削减其军费开支，它做了件看似不明智的事情，削减的经费使得位处德国的法德旅中的法国部队返回法国。这件事公布之后，法国政府不得已匆匆说到这并没有发生，但这体现了其行事的优先等级。欧盟在地缘政治和军事上的弱点广为人知，然而作为地理经济行动者的欧盟，其弱点在当前大衰退中的第二轮才显现出来。

约翰·A. 霍尔：对于影响力位居前列的国家来说，没有政治联盟却有单一的货币是颇为奇怪的。而且这其中还隐含着一个大的冲突，即有些大国，尤其是英国，不属于这个单一货币体系。尽管如此，欧洲人还是做成了一件颇值得骄傲的事情。如果我们想想过去 40 年中外交政策的成功，那肯定没什么比得上欧洲南部以及后来的中欧新国家加入欧盟。

迈克尔·曼：还有民主的鼓舞。美国政府一直在谈论民主的扩张。欧洲人在民主东进方面做得则远为成功。讨论欧盟的扩展时，某些欧洲社会科学家会使用“帝国”一词，但我认为这并不恰当。这一扩张被加入欧盟所蕴含的激励和这些国家参与的欲望所主导，而不是强制。没错，加入是有条件的。预期中的经济激励是巨大的，作为回报，新国家需要做一些事情，比如民主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冲击横跨东欧和土耳其，这是近些年来民主最为显著的扩张。

约翰·A. 霍尔：是的，或许这也是最有稳定潜力的扩张——尽管对于那些基础不那么充分的国家，比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它们得花些时间才能充分稳固。

迈克尔·曼：当然，这些国家在两次战争间隙已经历了相当不完美的民主，其中一些国家现在更容易发展民主，因为少数族裔的问题在今天没那么突出。不幸的是，对少数族裔的种族清洗出现在战争及其余波之中。

约翰·A. 霍尔：让我们从潜在的挑战者转向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国家。拉丁美洲如何呢？

迈克尔·曼：拉美发展中的有趣现象是，当地土著对公民权的呼唤很晚才出现，尤其是在安第斯山国家。这使得政治更为左倾，转向土著和老左派代表的粗糙联合。这产生了影响，减弱了美国在南美的力量。

约翰·A. 霍尔：所以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在进行基本的国家建设，使得他们的历史处境与中国和印度大相径庭？

迈克尔·曼：征服的模式、叠加在种族差异之上的阶级差异，包括进口的奴隶，产生了高度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权。国际战争相对缺失，意味着税率很低，大众运动更少聚集于国家之上，国家依旧是虚弱和党派化的。这一切使得这块大陆在 20 世纪中期停滞不前。但现在，正如你所说，随着原住民要求完全公民权，民族国家正在获得巩固。与美国的短距离、美国在这个半球上的强大权力，都一直是个问题，但问题已经从海军转移到了毒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都因近邻美国对毒品的消费而大受其害。

约翰·A. 霍尔：这一跨国境之流通对社会科学家而言是一个问题，他们不但高度依赖于国家的数据，而且涉及其中的数字理应是巨大的。

迈克尔·曼：这可能是最大的全球工业，紧随其后的或许是武器市场，这些在国际统计数字中都不会出现，因为非法流动是当代资本主义最为真实的跨国特征。农民发现种植鸦片或大麻并卖给走私者有利可图。因为这是违法的勾当，此中还涉及准军事的武力。在哥伦比亚，它与土地战争紧密结合，左翼游击队会捍卫农民的利益。在墨西哥就没有这种联系，但它在摧毁墨西哥的国家、政党和警察系统。

约翰·A. 霍尔：拉丁美洲中自然也有不同的变体。智利的模式现在看来相当成功，阿根廷则颇为独特地受其民粹模式困扰，丧失了其原有的地位，它曾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思考着这些不同的种类，我们可以转向讨论失败的国家。对我来说，这一概念并不精确。人们想到的大多数案例，都是那些从没有过基础性权力的小国家，但这一概念也可应用于苏联！事实上，有的国家虽然失败了，但后来又恢复了。所以我们还是更为明确些吧，我们先从阿拉伯国家谈起——我还是更精确些，谈谈伊斯兰国家。它们当中有不少取得了相当成功的增长率。这是否会发生改变？我们或许该想想那现在已不为人信的旧观点：天主教抑制了拉丁美洲的发展。还有一种声音不时会出现：女性的地位——特别是低层次的识字率，还有生育模式的巨大后果——是发展的巨大阻碍。你怎么看？

迈克尔·曼：你提出了好几个问题。就中东而言，我们必须将石油国家和其他国家区分开。前者的独有问题，是国家攫取了主要的财富来源，因而也并没有显著的、和国家分离开的公民社会。唯一的主要财富来源由国家把持，因此也并不需要收税，其国民也并未因此发展出对公民身份的强烈诉求。他们在国家面前是恳求者，而国家将庇护给予那些它所需要的忠诚之士。至于不产石油的国家，它们常常也是局限的庇护国家（patronage state）。只有伊朗和土耳其有广泛的中产阶级群体（如“bazaar”，即商人工匠团体），并且也有工人要求更具代表性的政府。在阿拉伯语国家，《古兰经》压倒一切，其余书籍产量萧条，世俗文盲率也是个大问题。与之对抗的运动显然失败了。阿拉伯社会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有军事政权都没有带来更好的结果。

约翰·A. 霍尔：可能的解释包括，他们是半军事国家，他们觉得必须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以色列有所回应，这一因素影响了该地区社会发展模式。这是个尚未解决的地缘政治问题，让它与我们所讨论的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有所不同。

迈克尔·曼：这对非石油国家来说是这样，比如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埃及，他们都是以色列的邻居，他们参与的对抗以色列的战争总的来说都失败了，他们都维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当然，埃及和约旦现在得到了大量的美国援助，它们也不会和以色列开战，但目前外国援助在发展方面成效不大，并且埃及政权似乎变得更为威权主义，而非更不威权主义。

约翰·A. 霍尔：非洲也有许多变化，但人们普遍认为，其社会是被维持国家边界的外部协定凝聚起来的，这保护了那些缺乏民族团结的极弱小国。

迈克尔·曼：殖民主义的遗产在这里还是非常重要。有那么一两个地区曾聚集大量白人殖民者，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它们只有在拥有重要自然资源的地方才会发展起来。有的地区发展起了密集型经济作物农业、大农场和矿区，这些地区通常通过铁路或河流与首都（通常是港口地区）联系。但内陆的大多数地区、疆域的大多数部分，其实没被殖民权力真正控制过，它们大体上还是独立的。

现在殖民权力已经离去，有利可图地区的盈余也不再以运到伦敦或巴黎为主，但它还是被唯一的基础设施运送到作为整体的国际经济中去。内陆地区再一次失去联系。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帝国和法帝国的末日时期，以及紧随其后的岁月中，才涌现了针对发展方面的投资，这创造了更有教养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工业劳工。这对殖民权力并无助益，因为这些部门发展起了工会以及劳工反抗运动——这构成了非洲民族主义的基础。殖民权力被自己的创造物所驱逐。但新的民族主义在过去以及现在都很薄弱。并且，如果现在那个区域有了价值连城的资源，当地的精英可以谋求另类方式将资源送到全球市场上，绕过国家及其首都。这会导致内战的状态和国家进一步的衰弱。人们过于广泛地将“失败国家”的概念运用于非洲国家上，但它们的常态是这样一种弱国家，政权收买了可能导致暴动的城市人口，乡村精英则可与首都进行独特的交易。比起欧洲过去所为，或许印度和中国能更好地帮助当地的发展。

约翰·A. 霍尔：所以你的判断是，这些国家发生扭曲、缺乏发展，部分原因是帝国对待它们的方式？

迈克尔·曼：我是这样认为的。尽管要证明这一论述需要进行严肃的假设性历史分析，看看如果没有殖民主义会发生什么。殖民主义的确破坏了这些国家，因为它摧毁了既存的政治机构，尽管这结构通常并不强大，但它们是土生土长的，对当地的社会关系有所约束。如果非洲是独立的，我猜测这些约束能逐渐进一步发展，在区域上乃至后来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带来更丰富的生产和贸易。殖民主义摧毁了既存的制度，却不填补相应制度，这可能的确破坏了整片大陆。这似乎是大多数量化分析的结论——他们将殖民主义的年份与经济发展进行相关分析，当然其数据并不佳。

约翰·A.霍尔：我有个与前面的对话有关的令人烦恼的问题。在发达世界中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最后一步似乎是创造相对同质化的民族国家。人们不想看到非洲国家遵循欧洲战争中的种族清洗模式。你能想象这些国家可能会发展出一种制度，使得他们成功发展出拥有多民族特征的政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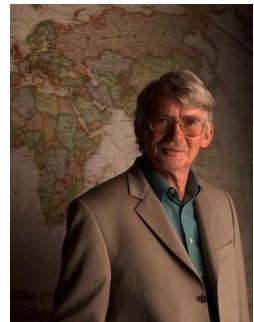
迈克尔·曼：首先，我们在过去数十年间得到了鼓舞。虽然我们还是会使用南方世界和北方世界这样的词汇，但是很多国家仍发展得很成功，和那发展似乎普遍受阻的时代，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如“依赖发展”“不平等交易”假定北方的成功之条件正是南方失败的时代大为不同了。东亚、东南亚、南亚、东欧、巴西、南非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的兴起似乎是鼓舞人心的。

其次，虽然同质性能有所帮助，但是它并不一定是必要的。印度就是明显的例外，巴西也是。最后，欧洲从多民族到单一民族国家的运动和他们的帝国竞争者 (imperial rivalries) 息息相关，与他们在战争中的失败和消耗密切相连。多民族国家在战争中的表现似乎不如民族更为单一的国家——至少这是政治领袖们自己总结出来的。但现在国际战争相对没那么频繁了。在非洲也不频繁了。欧洲史是国际战争的好例子，但这不是拉美和非洲的历史。

非洲的战争大部分是内战。其中半数都有某些民族特征，但我怀疑导致大多数内战的，不管是否是民族战争，都是地区间的权力资源冲突。由于我们在我们的媒体上只会听说非洲的坏新闻，我们通常没有认识到，大多数非洲国家并未被饥荒与内战撕裂。事实上，多民族并不具有普遍的危险性。如果民族甚多，那么政府必须至少和其中的部分族群联合。危险的情况是双种族或三种族国家，每一个群体都能组成政府，并且歧视另外的群体，我已在《民主的阴暗面》中提出这一观点。尽管如此，真正极端的结果只有在被歧视的群体觉得他们能够反抗时才会发生，并且这通常只有在这一群体能得到国外援助时才行。这就是卢旺达的情况。在苏丹，压力因环境变化而来，沙漠化将向南行进的阿拉伯牧民推向达尔富尔的非洲农民。这在非洲并不典型，或者说这在任何一个大陆都并不典型。

约翰·A.霍尔：现代世界的战争是否改变了性质，导致这些内部存在族群分隔的较弱国家成为冲突之地？

迈克尔·曼：但在任何时候，只有为数不多的非洲国家经历内战，并且战争只在一小撮国家频繁出现——苏丹、索马里、刚果——但就连这些国家，战争也是可解决的。非洲国家都有防止分裂的共同兴趣，因为如果分裂轻易发生，它们全会变得十分脆弱。外交制度也已帮助减轻国际战争的情况。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发展过程中，如果侧重地方基础，这一基础又通常与自然资源有关——比如石油——那么冲突就很容易在区域间滋长，比如尼日利亚的情况。区域间不平等或许会增加地区宣告自治或独立的可能。



迈克尔·曼

当代富有影响力的历史社会学学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杰出研究教授，曾执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艾塞克斯大学、剑桥大学等高校，2008 年被授予剑桥大学名誉教授头衔，2015 年同时当选美国和英国科学院院士。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on Unsplash



奥丁在北欧神话中是一位极为强大的神祇，但同时也是个骗子。他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被他用来换取了智慧。他的神力众多，比如唤醒亡者，平息风暴，治愈病患，以及令他的敌人失明。他还常常把自己变成一只动物：变成蛇的时候，他就获得了作诗的天赋，并且无意之间把这种神力传给了人类。

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奥丁，是一家销售基因工程实验用品的公司。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约西亚·扎纳 (Josiah Zayner) 把自己浓密的头发染成了金色，还在身上打了好几个洞，以及一个似乎是在提醒自己的文身：“创造美的东西”。他拥有生物物理学的博士学位，并且是个很出名的叛逆者。他做了很多前卫的事情，比如让自己的皮肤变得能够生产一种荧光蛋白；在一顶 DIY 的排泄物移植中吃下了一个朋友的大便；以及试图让自己的一个基因失效，以便让自己能长出更大的肱二头肌。（他承认，在最后这件事情上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扎纳称自己为“基因设计师”，并说他的目标是让人们想在业余时间改造生命的时候，就可以获得所需的资源。

奥丁提供的产品从写着“黑掉地球生物”的 3 美元小酒杯一直到一种“基因工程家庭实验室套装”。后者价格为 1849 美元，包括了一台离心机，一个聚合酶链式反应仪，以及一个凝胶电泳盒。我选择了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细菌 CRISPR 与荧光酵母套组”，花了我 209 美元。这个产品装在一个硬纸板的盒子里，表面印着公司的标志：一棵扭曲的树被一条双螺旋环绕着。我相信，那棵树代表的是“世界之树”。在北欧神话中，这棵树的主干就从宇宙的中心穿过。

在盒子里，我发现了各式各样的实验室工具：移液器用的吸头，带盖培养皿，一次性手套，还有一些小管，里面含有大肠杆菌 (E. coli)，以及我对它的基因组进行重排时所需的所有试剂。大肠杆菌被我放到了冰箱的冷藏室里，就在黄油旁边。其他的小管都放到了冰箱冷冻室里，跟冰激凌放在同一格。

基因工程到今天已经是人到中年了。第一种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细菌是在 1973 年被制造出来的。很快，1974 年就有了一种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小鼠。基因工程改造的烟草出现在 1983 年。第一种被批准可供人们食用的基因工程食品是“佳味番茄” (Flavr Savr tomato)，批准于 1994 年。但是这种番茄很令人失望，几年之后就停产了。基因工程改造的玉米和大豆是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开发出来的。与佳味番茄相反的是，这两种作物在美国已经差不多到处都是了。

在过去的十来年间，感谢 CRISPR 技术，基因工程也经历了它自己的转化。CRISPR 是一套技术的统称，其中大多是从细菌中借来的。有了这种技术之后，研究人员或是生物黑客们需要操纵 DNA 的时候就变得容易多了。（这个缩写的全称是“规律间隔成簇短回文重复序列”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RISPR 让使用者可以在 DNA 上剪一刀，然后就会让这个受到影响的序列功能被关闭掉，或者把它替换成一段新的序列。

由此而带来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詹尼弗·道德纳 (Jennifer Doudna) 教授是 CRISPR 的开发者之一。她对这项技术的评价是：我们现在有了“一种方法，能够以我们希望的任何方式来重写那个真正的生命分子”。有了 CRISPR，生物学家们已经创造了许多生命体，其中包括：没有嗅觉的蚂蚁；像超级英雄一样肌肉膨大的猎兔犬；能够抵抗猪流感的猪；有睡眠失调问题的猕猴；不含咖啡因的咖啡豆；不产卵的三文鱼；永远不发胖的小鼠；以及一种细菌——它的基因里编码了一系列图片，而这些图片是埃德沃德·迈布里奇 (Eadweard Muybridge) 那段著名的赛马奔跑影像中的每一帧画面。几年前，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称，他已经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例 CRISPR 编辑的人类——两名双胞胎女婴。据他所说，这些女孩的基因经过了轻微的调整，以使她们获得对艾滋病毒的抵抗力。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这一点至今仍不清楚。

我在遗传学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经验，自从高中之后再也没有做过需要动手的实验

非虚构 用基因工程消灭入侵物种， 真的能保护世界吗？

伊丽莎白·科尔伯特 | 新书试读

普利策奖得主、《大灭绝时代》作者
科尔伯特的新作

一个更热、更多洪水和干旱以及更多灾难降临的世界正在逼近。

我们处于一个全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人类不仅是在表象上改变了自然环境，而且是从里到外影响了海洋、森林、河流，以及超过半个地球表面的地形。我们甚至从生物基因上改变植物、动物的种类。人类的力量越来越强，却在更多层面上失去控制。

通过采访世界各地最前沿的科学项目，科尔伯特描述的是一个人工痕迹越来越多的世界：人类已不可能将自然恢复成原本的样子，甚至无法仅靠减排等手段减缓灭绝到来的速度，只有大胆而谨慎地干预自然，才有可能逆转全球变暖。

如果说《大灭绝时代》是对已经过去的“反常的自然史”的回顾，那么《白色天空下》就是对未来世界的展望。书中所讲述的未来并非遥不可及，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在有生之年就能够见证天空变成白色，碳被大量转换成石头埋到地下，经过基因改造的个体消灭入侵物种……我们甚至可能目睹这些为解决问题而进行的自然干预所带来的新问题。

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我们节选了第三章《升上天空》分享给读者。

室工作。然而，按照奥丁那个盒子里面的说明一步步做，我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竟然就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生物。首先，我在一个带盖培养皿中培养了一个大肠杆菌的菌斑。然后，我把不同的蛋白质加到上面，还有一点我存在冷冻室里的设计DNA。这个过程会把细菌基因组中的一个“字母”换掉：把一个A（腺嘌呤）换成一个C（胞嘧啶）。拜这一改变所赐，我这种新的改进型大肠杆菌真的就能藐视链霉素了——要知道，这可是一种强力的抗生素。在自家厨房里制造具有抗药性的大肠杆菌，这事儿感觉有点吓人，但它也的确有成就感。事实上，这种成就感太强了，以至于我决定开始做套组里的下一个项目：在酵母中插入一个水母基因，从而让它发光。



电影《传染病》(2011)剧照

坐落于吉朗市(Geelong)的澳大利亚动物健康实验室(Australia Animal Health Laboratory)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之一。它位于两道大门之后，其中第二道大门是被设计用来阻止卡车炸弹的。有人告诉我，它的浇筑混凝土墙足够厚实，能够经受住一架飞机的撞击。在这个设施内部有520个气闸门，以及四个安全等级。“如果是在僵尸世界末日中，你肯定会想要躲到这儿来。”这里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在最高的安全级别，生物安全4级区域，有一些管子中存放着这颗星球上最凶险的一部分动物传播病原体，其中包括埃博拉。(这个实验室在电影《传染病》[Contagion]上映后小小地火了一把。)那些在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中工作的研究人员不能把他们自己的衣服穿进实验室，而且在离开之前必须要冲最少3分钟的澡。而这家设施中的动物则根本不可能出得去。“它们能出去的唯一一条路就是通过焚化炉。”这里的一位雇员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吉朗位于墨尔本西南方向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在拜访范诺本的那趟旅程中，我也到这家实验室去看了看。它的缩写是AAHL(发音是“maul”这个词的韵脚)。我听说了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场基因编辑实验，并对此非常感兴趣。人们为一项生物防控计划所付出的努力跑偏了，结果导致澳大利亚受到了一种名为海蟾蜍(cane toad)的巨型蟾蜍的困扰。AAHL的研究者们还是希望再用另一种生物防控技术来解决这场灾难，这倒是回归了人类世的逻辑。在这个计划中就包括了利用CRISPR技术对海蟾蜍的基因组进行编辑。

一位名叫马克·蒂泽德(Mark Tizard)的生物化学家负责这个项目。他同意带我到处看一看。蒂泽德身形瘦小，发际边缘都已花白，蓝色的双眼炯炯有神。就像我在澳大利亚遇到的很多科学家一样，他也不是澳大利亚人，而是来自英国伦敦。

在研究两栖动物之前，蒂泽德主要是做家禽研究的。几年前，他和AAHL的一些同事将一个水母的基因插入了母鸡体内。这个基因跟我计划要插入酵母的那个基因很类似，编码了一个荧光蛋白。一只鸡有了这个基因之后，就会在紫外线的照射之下发出诡异的绿光。接下来，蒂泽德找到了一种办法，能够在插入荧光蛋白基因之后，确保它能够“传儿不传女”。结果就是，当一只母鸡产下的蛋还在孵化之中时，我们就能从荧光发光的情况来判断蛋中胚胎的性别。

蒂泽德知道，很多人都被基因改造的生物给吓到了。他们觉得食用基因改造生物这件事情很恶心，而把基因改造生物释放到大自然中则是很可恶的。虽然蒂泽德不是像扎纳那样的叛逆者，但他同样认为这些人对于基因改造的看法完全错了。

“我们有能发绿光的鸡。”蒂泽德告诉我，“所以会有学校组织学生来参观，当他们看到绿色的鸡时，你可以想象，有的孩子就会说：‘哦，这太酷了！要是我吃了这种鸡，我也会变绿吗？’而我大概就会说：‘你已经吃过鸡了，对不对？你长出羽毛和喙了吗？’”

无论如何，据蒂泽德说，当下如果还要去担心一两个基因的事情，已经为时晚矣。“如果你去看看澳大利亚原生的环境，你会看到桉树、考拉、笑翠鸟(kookaburra)

等生物。”他说，“但如果让我来看，作为一名科学家，我看到的是桉树基因组的多重拷贝、考拉基因组的多重拷贝等等。而这些基因组正在彼此相互作用。然后，完全是在突然之间，嘭！你把一个外来的基因组扔了进去——海蟾蜍的基因组。它以前从没有在这里出现过，而它与所有其他这些基因组的相互作用是灾难性的。它把其他这些基因组全给干掉了。”

“人们看不到的一点是，这已经是一个在基因上改造过的环境了。”他继续说道。入侵物种把整个基因组加入了它本不属于的环境，也就改变了环境。相对而言，基因工程所改变的不过是这里或那里的一两段DNA而已。

“我们所做的事情，最多只会是在海蟾蜍的两万个基因上可能再增加十个基因，而这些基因本不属于海蟾蜍。但是这多出来的十个基因会破坏其余的基因，从而把它们从生态系统中清除出去，恢复原有的平衡。”蒂泽德说，“人们对于分子生物学最典型的评价是：你们是在扮演上帝吗？好吧，不是。我们是在应用我们对于生物学过程的理解，来看看是否有可能让一个受到损伤的系统好起来。”

海蟾蜍的学名是Rhinella marina，身上长着棕色的斑点，四肢粗壮，皮肤上有很多鼓包。对于它们的描述总是不可避免地强调其大小。“海蟾蜍是一种硕大的、长疣的蟾蜍。”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是这样标注的。“较大的个体坐在公路上很容易被误当成是大石块。”美国地质调查局如此评论。有记录的最大的海蟾蜍长达38厘米，几乎有2.7公斤重，相当于一只胖乎乎的吉娃娃了。有一只名叫贝特戴维斯(Bette Davis)的海蟾蜍于1980年代生活在布里斯班市(Brisbane)的昆士兰博物馆，长达24厘米，也差不多有这么宽，跟一个晚餐用的餐盘大小相仿。海蟾蜍几乎能吃下任何可以放得进它们那张超级大嘴里的东西，包括老鼠、狗粮以及其他海蟾蜍。



海蟾蜍。图片来自 Wesley Goorachan@JungleDragon

海蟾蜍原本生活在南美洲、中美洲以及美国得克萨斯州最南端的地区。在1800年代中期，它们被进口到了加勒比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它们参加对抗甲虫幼虫的战争，这种虫子像瘟疫一样毁掉了当地的经济作物——甘蔗。(甘蔗本身也是一种人为引入的物种，它原产于新几内亚。)海蟾蜍从加勒比地区被运到了夏威夷，又从夏威夷被运到了澳大利亚。1935年，102只海蟾蜍在檀香山被装上了一艘轮船。其中101只撑过了整个旅程，来到了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甘蔗种植区的一个研究所中。在一年之内，它们就产下了超过150万颗卵。孵化出来的幼蟾被有意释放到了该地区的河流和池塘中。

存在疑问的是，这些海蟾蜍或许从未对甘蔗有过什么益处。甲虫幼虫生活的枝权离地面太高了，像大石块一样的两栖动物根本够不着那么高的地方。但这并不会让海蟾蜍们担心。它们发现了充足的其他可以食用的东西，并且继续产下了更多的幼蟾，多得可以装满一辆辆卡车。从昆士兰海岸边窄窄的一条地带，它们向北扩张进入了约克角半岛(Cape York Peninsula)，向南扩张进入了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在1980年代的某个时间点，它们进入了北领地。2005年，它们到达了一个叫作中间点(Middle Point)的地点，位于北领地的西部地区，离达尔文市不远。

在海蟾蜍扩散的一路上，一些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在入侵的早期，海蟾蜍前进的速度是大约每年不到10公里。二三十年后，它们的移动速度达到了每年近20公里。当它们到达中间点时，它们已经提速到了接近每年50公里。当研究人员对入侵前锋线的海蟾蜍进行测量时，他们知道了原因何在。在前锋线上的海蟾蜍的腿，要比后面昆士兰地区的同伴的腿更长，而且这一特征是可遗传的。《北领地新闻报》

(Northern Territory News) 在其头版报道了这个故事，标题是《超级蟾蜍》(Super Toad)。文章的配图是一张经过加工的照片，上面是一只披着披风的海蟾蜍。“它们已经入侵了北领地，而现在这些讨厌的海蟾蜍正在进化。”这篇报道叹息道。看起来这与达尔文的想法相反，进化能够被实时观察到。



登有《超级蟾蜍》的报纸

海蟾蜍并不仅仅只是大得令人反感，从人类的视角来看，它们还很丑，长着皮包骨头的脑袋。真正令人感到“讨厌”的是它们脸上看起来像是邪魅的表情。然而更麻烦的是，它们是有毒的。当一只成年海蟾蜍被咬或感觉受到了威胁时，它就会释放出像牛奶一样的黏液，含有能够让心脏停跳的化合物。狗常常会被海蟾蜍的毒性伤害到，症状从嘴上起泡一直到心脏停搏。那些蠢到去吃海蟾蜍的人，最后通常都会以丧命而告终。

澳大利亚原本并没有有毒的蟾蜍。事实上，这里原本就没有蟾蜍。所以这里原生的动物们并没有进化出来要小心毒蟾蜍的习性。海蟾蜍的故事就是亚洲鲤鱼故事的相反版本，或者说上下颠倒的版本。亚洲鲤鱼在美国成为问题的原因是没有动物能够吃它们，而海蟾蜍在澳大利亚成为一种威胁的原因是每种动物都想吃它们。由于吃海蟾蜍而导致种群数量骤降的物种名单很长，而且还在发生变化。其中包括：淡水鳄，澳大利亚人称之为 freshies；黄斑巨蜥 (yellow spotted monitor lizard)，能长到 1.5 米长；北部蓝舌石龙子 (northern blue tongued lizard)，其实是一种小蜥蜴；横纹长鬣蜥 (water dragon)，看起来就像是小型的恐龙；死亡蛇 (common death adder)，名副其实的毒蛇；棕伊澳蛇 (king brown snake)，同样是一种毒蛇。目前为止，这张受害者名单上的第一名是北方袋鼬 (northern quoll)，一种长相很可爱的有袋类动物。北方袋鼬差不多有 30 厘米长，尖脸蛋，棕色的皮毛上带有斑点。当小袋鼬离开妈妈的育儿袋后，妈妈四处活动的时候会把小袋鼬扛在自己的背上。

为了减缓海蟾蜍扩张的脚步，澳大利亚人已经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计划。‘蟾蜍净’(Toadinator) 是一种配有便携扬声器的陷阱，里面播放着海蟾蜍的歌声。有人把这种声音比喻为拨号音，也有人把它比喻为引擎的嗡嗡声。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诱饵，能够用于诱捕海蟾蜍的蝌蚪并消灭它们。人们用气枪射击海蟾蜍，用锤子砸它们，用高尔夫球杆打它们，故意开车碾压它们，把它们放在冷冻室里冻成冰块，或是给它们喷洒一种叫“停止跳动”(HopStop) 的化合物，号称能够“在几秒内麻醉海蟾蜍”，并在一小时内结它们。有社区组织了“灭蟾”部队。一个叫作“金伯利灭蟾人”的组织建议澳大利亚政府能够为每一只被消灭的海蟾蜍提供赏金。这个组织的信条是：“如果每个人都是灭蟾人，那么海蟾蜍就会被消灭了。”

当蒂泽德开始对海蟾蜍感兴趣的时候，他还从未亲眼见过一只海蟾蜍。吉朗所在的维多利亚州南部是海蟾蜍还没有征服的地区之一。但是，有一天在一个会议上，

他坐在一位研究两栖动物的分子生物学家旁边。后者告诉他，尽管有各种控蟾的措施，但是海蟾蜍仍在持续扩散。

“她说，只可惜没有什么新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事。”蒂泽德回忆道，“我坐下来，挠着自己的脑袋。”

“我当时想：毒素是由代谢通路产生的。”他继续说，“这就意味着有酶的参与，而酶必须要有基因来编码它们。好吧，我们有能够破坏基因的工具。也许我们能够破坏那些导致毒素形成的基因。”

蒂泽德让一位名叫凯特琳·库珀 (Caitlin Cooper) 的博士后帮忙开发这项技术。库珀的棕色长发刚刚及肩，笑声很有感染力。（她也是从别的地方来，具体来说是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此前从未有人试过对海蟾蜍进行基因编辑，所以需要由库珀来决定要怎么做这件事。她发现，海蟾蜍的卵必须先要清洗一下，然后再有条不紊地用一种非常细的移液器快速穿刺。这一切要在卵开始分裂之前完成。“磨炼显微注射的技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她告诉我。

库珀首先改变了海蟾蜍的颜色，这也算是一种热身练习吧。海蟾蜍的一个关键的色素基因编码了一种酪氨酸激酶，而这种酶控制着黑色素的合成（在人身上也是如此）。库珀推断，将这个色素基因关闭，应该会制造出浅色的海蟾蜍，而非深色的。她在一个培养皿中混合了一些卵子和精子，在得到的胚胎中显微注射了不同的 CRISPR 相关化合物，然后就是等待。最后出现了三只奇特的杂色蝌蚪。其中一只蝌蚪死了，另外两只都是雄性，长成了杂色的幼蟾。它们分别被命名为“斑点”和“金发”。“当这一切发生时，我绝对是着迷了。”蒂泽德告诉我。

库珀接下来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破坏”海蟾蜍的毒性方面。海蟾蜍在自己肩膀后方的腺体里储存毒液。在原始状态下，这些毒液仅仅只会让人不舒服而已。但是在海蟾蜍受到攻击时，它们会制造一种酶——蟾毒素水解酶。这种酶能够让毒液的毒性放大一百倍。应用 CRISPR 技术，库珀对第二批胚胎进行了编辑，删除了蟾毒素水解酶编码基因中的一小段。结果就是，一批无毒化的幼蟾出现了。

在我们谈了一阵子之后，库珀提出带我去看看她的海蟾蜍。这就需要进入 AAHL 的更深处，穿过更多的气闸门和安全层级。我们都在衣服外面套上了手术服，鞋子外面套上靴子。库珀给我的磁带录音机上喷了一些清洁液。一块牌子上写着：“隔离区域。违规重责。”我决定还是不要提奥丁，以及我自己那不怎么安全的基因编辑冒险为好。

在这些闸门的后面是一块无菌的空地，有点像一个农场大院，里面满是养着不同动物的各式围栏。空气中是医院与宠物动物园两种味道的混合。在一些小鼠笼子旁边，无毒幼蟾正在一个塑料箱中跳来跳去，数量有十来只，差不多十周大了，每只有七八厘米长。

“如你所见，它们很活跃。”库珀说道。这个塑料箱内布置着一个人所能想到的蟾蜍所需要的一切：假植物、一大盆水、一盏太阳灯。我想到了蟾蜍庄园，“到处都是现代化的便利”。其中一只海蟾蜍伸出了它的舌头，抓住了一只蟋蟀。

“它们几乎什么都吃。”蒂泽德说，“它们还会以彼此为食。如果一只大个子的海蟾蜍遇到一只小个子的，那就是一顿午餐。”

要是被释放到澳大利亚的自然界中，一小拨无毒的海蟾蜍估计不会坚持很长时间。其中一些会变成淡水鳄或蜥蜴或毒蛇的午餐，其余的则会与乡野间数以亿计的有毒海蟾蜍杂交。

蒂泽德心里为它们设定的未来是教育事业。对于袋鼬的研究表明，有袋类能够通过训练来学会躲避海蟾蜍。给它们喂食掺有催吐药的蟾蜍“香肠”，它们就会把海蟾蜍与恶心联系起来，并学会躲着它们。根据蒂泽德所说，无毒海蟾蜍会成为一种更好的训练工具：“如果它们被捕食者吃掉了，捕食者只会生病，但不会死，那它就会学到：‘我再也不要吃海蟾蜍了。’”

在它们能被用于教育袋鼬或其他任何用途之前，无毒海蟾蜍需要一些来自政府的批准才行。当我到访时，库珀和蒂泽德还没有开始着手起草相关的文件，但却已经想出了其他修改基因的方法来。库珀想，或许有可能来干预那些生产蟾卵表面胶质层的基因，从而让这些卵不可能受精。

“当她向我描述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她太聪明了！”蒂泽德说，“如果我们能够一步步削减它们的产卵能力，那绝对是太棒了！”（一只雌性海蟾蜍一次就能产下多达 3 万颗卵。）

离无毒蟾蜍几步远的地方，斑点和金发坐在它们自己的塑料箱内。那里还要更精

致一些，有一张热带地区的景观图片逗它们开心。它们已经有差不多 1 岁了，完全长大了，上腹部有着层层叠叠的肉，就像是相扑手似的。斑点总体上是棕色的，有一条后腿是泛黄的颜色。金发的颜色更为斑驳，后腿发白，前肢和胸口有一块块的浅色区域。库珀把一只戴着手套的手伸进了箱子里，把金发拿了出来——她形容这只蟾蜍为“美丽的”。它立刻就在她的手上尿了，脸上似乎是在幸灾乐祸地微笑。然而我意识到，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它那张脸也只有基因工程师才会喜欢。

根据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的标准版的遗传学，遗传是一个掷骰子的过程。比如说一个人（或者一只蟾蜍）从他的妈妈那里获得了某个基因的一个版本，称之为 A，又从他爸爸那里获得了这个基因的一个竞争版本，称为 A1。那么，对于他的任何一个孩子来说，获得 A 或 A1 的概率都是一样的。在新的每一代人中，A 和 A1 的传承情况是完全由概率的法则来决定的。

就像学校所教授的其他很多事情一样，这一描述也只是部分正确的。有些基因遵从这一规律，但也有一些基因背叛了这一规律，拒绝执行。这些例外的基因能够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修改游戏规则，而方法则是各不相同的狡诈。有些基因会干扰竞争对手的复制；另一些则会为自己建立更多的拷贝，从而提高自己被传承下去的概率；还有一些则会操纵减数分裂的过程，这正是卵子和精子形成的过程。这类打破规则的基因被称为会“驱动”的基因基因驱动，即 gene drive，这个术语的使用在科学界内部也呈现一种混乱状态。（基因驱动既可以指本文所描述的这种生物学现象，也可以指具备这种生物学现象的基因，还可以指能够达成这一现象的生物学工具。在下文中，译者将附加一些额外的界定，方便大家理解该说法出现时具体所指代的概念。）即便它们不会给生物带来适应性方面的优势——事实上，有时它们甚至还带来了适应性上的成本——它们还是一代代地传承了一半以上的后代。有些特殊的情况下，自我服务的基因被传承给了超过 90% 的后代。人们已经发现，在非常多的生物中都潜伏着能够驱动的基因，包括蚊子、拟谷盗（flour beetle）、旅鼠。据信，只要花费精力和时间去寻找的话，肯定还能在多得多的生物中找到基因驱动现象。（同样成立的一点是，最成功的驱动基因很难被检测到，因为它们已经导致了该基因的其他变体都淹没在了历史中。）

从 1960 年代起，生物学家们就梦想着能够利用基因驱动的力量，来名副其实地驱动某些基因。感谢 CRISPR 的出现，这个梦想如今已经实现了。

细菌可以说是掌握着 CRISPR 这项技术的原始专利，因为 CRISPR 在细菌中就是作为一种免疫系统来起作用的。拥有“CRISPR 座”的细菌能够把病毒的一小段 DNA 吸收到自己的基因组中。它们利用这些片段的方式就像是看嫌犯照片一样，能够帮助自己识别出潜在的攻击者。然后，它们会派出与 CRISPR 有关的 Cas 酶。这种酶工作起来就像是微型剪刀，能够把入侵者的 DNA 在关键位置剪断，从而使它们失效。

基因工程师已经能够让 CRISPR Cas 系统去剪切他们想要去剪切的几乎是任意一个 DNA 序列。他们还已经找到了办法，能够让被破坏的序列把自己与一段人为提供的外来 DNA 缝合在一起。（这就是我的大肠杆菌被哄骗着把腺嘌呤换成了胞嘧啶的方式。）既然 CRISPR Cas 系统是一个生物学的构建，那么它也是编码在 DNA 上的。而这就是创造一个基因驱动的关键所在。将 CRISPR Cas 的基因插入到一个生物中，而这个生物就能被编码执行对自己进行重编程的任务。

2015 年，哈佛大学的一组科学家宣称，他们使用这种自反式的技巧，在酵母中创建了一个合成基因驱动系统。（开始时是一些奶油色的酵母和一些红色酵母，而它们制造出的菌斑在几代之后全成了红色。）3 个月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者宣布，他们用差不多一样的技巧创造了果蝇中的一个合成基因驱动系统。（果蝇正常情况下是棕色的，而这个基因驱动系统能够推广一种类似于白化病的基因，得到了黄色的后代。）此后又过了 6 个月，第三组科学家宣布他们创造了一种带有基因驱动系统的疟蚊。

如果 CRISPR 具备“重写那个真正的生命分子”的力量，那么结合了合成基因驱动技术之后，这种力量就会得到指数级的扩增。假设圣地亚哥的研究者释放了他们的黄色果蝇。再假设这些果蝇找到了配偶，成群围绕着校园里某个垃圾堆飞来飞去，那么它们的后代也会变成黄色。进一步假设这些后代都活下来了，并且成功交配，那么它们的子孙后代结果也会成为黄色的。这种特征会持续扩散，从红杉林到墨西哥湾流，直到黄色统治一切。

果蝇的颜色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任何植物或任何动物上的任何基因都可以被重新

编码，使之变得能够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掷下遗传的骰子——至少理论上如此。这之中也包括了那些自身有过修改的基因，或是从其他物种借来的基因。比如说，完全有可能去设计一个基因驱动系统，使之能够在海蟾蜍中扩散那个破坏毒素的基因。有一天，也完全有可能去为珊瑚创造一个基因驱动系统，让一个耐热的基因扩散开来。

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界线，实验室与野外之间的界线，此前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而在合成基因驱动的世界中，这些界线几乎要消融不见了。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不仅可以决定进化要在怎样的条件下发生，人们也可以决定进化的结果——同样的，至少理论上如此。

几乎可以肯定，第一种装备了 CRISPR 辅助的基因驱动系统的哺乳动物，将会是小鼠。小鼠是所谓的“模式生物”。它们繁育速度快，易于饲养，而且其基因组已经被充分研究过了。

保罗·托马斯（Paul Thomas）是小鼠研究方面的先锋。他的实验室在阿德莱德市（Adelaide）的南澳大利亚健康与医学研究所内。这是一栋蜿蜒的建筑，表面覆盖着带尖的金属板。（阿德莱德当地人称这个建筑为“奶酪擦丝器”。当我去参观时，我觉得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头甲龙。）2012 年，一篇关于 CRISPR 技术的突破性论文刚一发表，托马斯就认识到这是一项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我们直接就投身其中了。”他告诉我。在一年之内，他的实验室就已经应用 CRISPR 构建了一只受到癫痫困扰的小鼠。

当合成基因驱动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后，托马斯又一次猛地扎了进去：“对 CRISPR 感兴趣，同时也对小鼠的遗传学感兴趣，我根本抗拒不了开发这种技术的机遇。”最初，他的目标只是看看自己能不能实现这种技术。“我们当时并没有太多经费。”他说，“我们当时只剩个油箱底儿了，而这些实验都相当费钱。”

当托马斯还只是在——用他自己的话说——“浅尝”的时候，有一个叫作 GBIRD 的组织跟他签了一份合同。这个缩写是指入侵啮齿动物的遗传性生物控制”（Genetic Biocontrol of Invasive Rodents）。而他们的精神或许可以被描述为加入了地球之友的莫洛博士。

“像你一样，我们想要为后代子孙们保护这个世界。GBIRD 的网站上说，‘希望仍在。’在这个网站上占主要位置的照片中，一只信天翁的幼鸟充满爱意地望着它的母亲。

GBIRD 想让托马斯帮忙设计一种专门的小鼠基因驱动系统——所谓的“抑制驱动”。抑制驱动是设计用来彻底战胜自然选择的。它的目的是要散布一种有害的特性，从而彻底消灭一个种群。英国的研究人员已经在传播疟疾的冈比亚疟蚊（Anopheles gambiae）中构建了一种抑制驱动。他们的目标是要最终在非洲释放这种蚊子。

托马斯告诉我，要设计一种自我抑制的小鼠，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可以尝试，其中多数都与性别有关。他尤其热衷于“X 粉碎者”小鼠这个想法。

小鼠像其他哺乳动物一样，有两条决定性别的染色体：XX 是雌性，XY 是雄性。小鼠的精子携带着单一的一套染色体，或是 X，或是 Y。一只 X 粉碎者小鼠经历过基因编辑，令其携带的所有带 X 染色体的精子都会失去活性。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精子库中的一半精子都被拿掉了。”托马斯解释道，“它们不会再发育出小鼠了。这就让你只剩下了带 Y 染色体的精子，于是就得到了全都是雄性的后代。”在 Y 染色体上装备了“X 染色体粉碎指南”后，小鼠的后代将只会产生儿子。在每一代中，性别失衡都会增长，直到不再有雌性可供繁殖。

托马斯解释说，在基因驱动小鼠上的工作进度比他所期望的更慢。不过，他还是认为有人会在十年的末期取得成功。它或许是一只 X 粉碎者，或者也可能是依赖于某种目前还想象不到的设计。数学模型表明，一种有效的抑制驱动会是极为高效的：在一个有 5 万只普通小鼠的岛上释放 100 只基因驱动小鼠，就能在几年之内让这个种群的数量下降为零。

“所以这也相当令人震惊。”托马斯说，“这就是要达成的目标。”

如果说人类世最明确的地质标志是地层中的一个放射性颗粒的峰值，那么人类世最明确的生物学标志就是啮齿动物的一个峰值。人类在这颗星球上定居的每一个地方，甚至只是他们曾经到访过的地方，小鼠和大鼠都会随之出现在那里，并常常导致危险的后果。

波利尼西亚鼠（Pacific rat, Rattus exulans）曾经一度被限制在东南亚地区。从大约 3000 年前起，航海的波利尼西亚人把它们带到了太平洋的几乎每一个岛屿

上。它们的到来开启了一波又一波的毁灭，至少导致了 1000 个岛屿鸟类物种的灭绝。后来，欧洲的殖民者又把黑鼠（ship rat, *Rattus rattus*）带到了这些岛上，以及其他很多岛屿上，于是又开启了更多波的灭绝，并且仍在持续。在新西兰的大南角岛（Big South Cape Island），黑鼠直到 1960 年代才登岛，而此时博物学家就能记录所产生的后果了。尽管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拯救岛上的动物，但还是有三个该岛特有的物种消失了，分别是一种蝙蝠和两种鸟类。

小鼠（house mouse, *Mus musculus*）起源于印度次大陆，而今你在从热带一直到非常接近两极的地区都能找到它。《小鼠遗传学》（Mouse Genetics）的作者李·西尔弗（Lee Silver）认为：“只有人类才具备同样的适应性（有些人说人类还不如它们）。”在适当的环境中，小鼠可以像大鼠一样凶猛，并且一样致命。戈夫岛（Gough Island）差不多位于非洲与南美洲之间中点的位置，是这个世界上最后 2000 对特岛信天翁（Tristan albatrosse）的家园。安装在这个岛上的视频摄像头已经拍到了一群群的小鼠在攻击信天翁的雏鸟，把它们活活吃掉。“在戈夫岛上工作就像是在一家鸟类的康复中心工作一样。”英国保育生物学家亚力克斯·邦德（Alex Bond）曾如此写道。

在最近一二十年，对抗入侵啮齿动物的主要武器是溴鼠灵（Brodifacoum）。这是一种抗凝血剂，能够导致内出血。溴鼠灵可以被掺入饵料中，放在喂食器中，或是手动播撒，也可以从空中播撒。（你先是把一个物种用船运到全世界，然后再从直升机上毒杀它们！）数百个无人岛已经用这种方式进行了无小鼠化和无大鼠化，而这些行动已经把一些物种从灭绝的边缘上拉了回来。其中就包括了新西兰的坎岛鸭（Campbell Island teal），一种小小的不会飞的鸭子；以及安岛黑蛇（Antiguan racer），一种颜色发灰的以蜥蜴为食的蛇。

从一只啮齿动物的角度来看，溴鼠灵的缺点是很明显的：内出血是一种缓慢而痛苦的死法。从一名生态学家的角度来看，它同样有不足之处：非目标动物也常常会吃掉饵料，或是吃掉已经吃过毒药的啮齿动物，毒药会以这样的方式在食物链的上下游扩散开。而且，只要有哪怕一只怀孕的小鼠在行动中存活了下来，那么她繁育的后代很快又会占据整座岛。

基因驱动小鼠能够驱散这些问题。入侵者们将成为目标。将不会再有出血至死的情况。而或许最好的一点是，基因驱动的啮齿动物也能被释放到有人类居住的岛屿上。谁都可以理解，在这种地方从空中喷洒抗凝血剂是不会有人同意的。

但往往事与愿违，解决一批问题又会带来新的问题。对于啮齿动物来说，带来的新问题很严重。极其严重。有人将基因驱动技术与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9 号冰”进行了对比。这种冰只要一小块，就足以把世界上所有的水都冻起来。只要有一个 X 粉碎者小鼠逃脱了，恐怕就会有着令人胆寒的类似效果：有点像是“9 号鼠”。

要预防冯内古特式的灾难，已经有人提出了不同的保险措施，例如“杀手—拯救者系统”“多重基因座搭配”，以及“菊花链系统”。所有这些方案都有着同一个基本性的乐观前提：首先要能够设计出一种有效的基因驱动，但同时又不能太有效。要想设计出这样的基因驱动，可能的办法包括：在几代之后将自身耗尽，或是与限制在单一岛屿上的单一种群中的一个特有基因变体耦合在一起。还有证据表明，如果一个基因驱动真的由于某种原因失控了，也可以向自然界释放另一个基因驱动来追捕它们，后者的特征是有一个所谓的“捕手”序列。还有什么可能出错的地方呢？

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想要离开实验室，去乡下看看。我想如果能看到一些北方袋鼬一定会很有趣。根据我在网上找到的照片来看，它们简直太可爱了，有点像是微型的獾。但是当我问了一圈才知道，观看袋鼬需要很多专业知识和时间，这些都是我所没有的。要想找到一些杀死了袋鼬的两栖动物倒是容易得多。于是，有天傍晚我与一位名叫林·施华蔻（Lin Schwarzkopf）的生物学家一起出发去猎蟾蜍。

碰巧的是，施华蔻是蟾蜍净陷阱的发明者之一。我们顺便去她在詹姆斯·库克大学的办公室看了看这种装置。这是一个跟烤面包机差不多大小的笼子，有一个塑料的翻板门。当施华蔻打开陷阱的小扬声器时，办公室里就回荡着海蟾蜍嗡嗡的叫声。

“雄性海蟾蜍会被任何听起来像是同类的声音吸引过来，哪怕只是有一点像而已。”她告诉我，“如果它们听到了发声器的声音，它们就会去往它的位置。”

詹姆斯·库克大学坐落于北昆士兰海岸，位于海蟾蜍最早被引入的地区之内。施华蔻认为我们应该在大学内就能找到地上的海蟾蜍。我们都戴上了头灯。当时大约

是晚上 9 点，校园里没什么人，只有我们俩和一家子跳来跳去的小袋鼠。我们四处游荡了一会，寻找着那种邪恶眼睛的目光。就在我开始失去耐心的时候，施华蔻在一堆落叶中看到了一只海蟾蜍。她把它拾起来之后，立即就鉴别出这是一只雌性。

“它们不会伤害你的，除非你让它们很痛苦。”她一边说，一边指着蟾蜍的毒腺，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两个垂着的小袋子。“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用高尔夫球棒去打它们。因为如果你打到了毒腺，毒液就可能会飞溅出来。如果它飞到了你的眼睛里，会让你失明几天。”

我们又转了会儿。施华蔻说，天气太干了，海蟾蜍可能缺水了：“它们喜欢空调室外机——任何能够滴水的东西。”在一个老旧的温室附近，那里有人刚刚浇过水，于是我们又发现了两只海蟾蜍。施华蔻翻开了一个大小和形状都接近首饰盒的腐烂木箱。“简直是个蟾蜍矿！”她说道。在不到 1 厘米深的脏水里有更多的海蟾蜍，数都数不过来。有些蟾蜍就坐在其他蟾蜍的上面。我以为它们会试着逃跑。然而与之相反，它们就坐在那儿，泰然自若。

一个支持对海蟾蜍、小鼠或黑鼠进行基因编辑的最强有力同时也是最简单的论点是：还有其他替代方式吗？把这样的技术作为非自然的存在而去抗拒，也无法换回自然的存在。我们不是要在“过去曾有什么”与“现在有什么”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要在“现在有什么”与“以后会有什么”之间做出选择，而经常出现的结果是，未来什么也不会再有了。这正是魔鳉、肃氏鳉、偏嘴裸腹鳉、北方袋鼬、坎岛鸭以及特岛信天翁所处的情况。严格从自然的角度来看，这些物种，以及其他数千个物种，都是即将灭亡者。当前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要去改变自然，而在于是为了什么目的要去改变自然。

“我们就像是神明一样，并且可能也变得擅长此道了。”这是《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的编辑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写下的一句名言，就在该期刊于 1968 年出版的第一期上。最近，作为对当下正在发生的全球转变的回应，布兰德发表了更犀利的声明：“我们像是神明一样，并且必须擅长此道。”布兰德与别人共创了一个组织，名叫“复活与复原”（Revive & Restore）。他们宣称自己的使命是“通过遗传补救的新技术来加强生物多样性”。在这个组织支持的那些更不切实际的项目之中，有一项努力就是要复活旅鸽。这项计划想通过对旅鸽亲缘关系最近的鸟类——北斑尾鸽（band-tailed pigeon）——的基因进行重新编排，以逆转历史。

更接近现实的一项计划是要把美洲栗树（American chestnut tree）带回来。这种树曾经是美国东部最常见的一种树，但是却被栗疫病全部消灭了。（栗疫病的病原体是一种真菌，在 20 世纪早期被引入了美国，几乎杀死了北美洲的每一棵栗树，据估计总计达 40 亿棵。）位于纽约州锡拉丘兹市（Syracuse）的纽约州立大学环境科学与林学院的研究者们创造了一种经过基因改造的栗树，对那种真菌具有免疫力。这种抵抗力的关键是一个从小麦中引进的基因。就因为有这样一个借来的基因，这种树被当作了转基因生物，需要联邦的审批。结果，这种能够抗真菌的树苗目前只能被限制在温室内，以及被围栏围起来的一块土地上。

正如蒂泽德所指出的，我们一直都在全世界范围内移动着基因，通常是以整个基因组的形式。这就是栗疫病最初到达北美洲的方式，病原体是由日本进口的亚洲栗树带进来的。如果我们通过移动仅仅一个基因的方式，就能改正我们早先犯下的悲剧性错误，难道这不是我们欠美洲栗树的吗？难道我们不该做这样的事情吗？“重写那个真正的生命分子”的能力为我们赋予了一种责任——对于这一点或许也存在某些争议。

当然，反对这类干预措施的观点也是强有力的。在“遗传补救”背后的原理，差不多也正是导致很多改变世界的项目搞砸了的原因。（看吧，就像亚洲鲤鱼和海蟾蜍。）设计某种生物干预措施来修正此前的生物干预措施，这样一部历史读起来有点像是苏斯博士（Dr. Seuss）的《帽子里的猫又回来了》（The Cat in the Hat Comes Back）。在那个故事里，猫在浴缸里吃了蛋糕之后，被要求要自己收拾干净：

你知道它是怎么打扫的吗？

用妈妈的白裙子！

现在浴缸完全干净了，

但是妈妈的裙子变得一团糟。

在 1950 年代，夏威夷农业部决定要控制巨型非洲蜗牛。这些蜗牛是在二十年前作为花园装饰被引入夏威夷的。而政府的控制手段就是引入玫瑰蜗牛（rosy wolfsnail），也被称为食蜗牛蜗牛（cannibal snail）。但是玫瑰蜗牛大多放着巨蜗牛不管，反而一路吃掉了夏威夷独有的几十个小型陆生蜗牛品种，制造了 E. O. 威尔逊所说的“灭绝雪崩”。

作为对布兰德的回应，威尔逊曾经评论道：“我们不像天神。我们的感知力和智慧还不足以让我们成为很多别的什么东西。”

英国作家和活动家保罗·金斯诺斯（Paul Kingsnorth）对此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像天神一样，但我们做得并不怎么好……我们是洛基，为了取乐而杀戮美好。我们是萨图尔，生吞了我们的孩子。”

金斯诺斯还评论道：“有时什么也不做强过于做点什么。有时则恰好相反。”



伊丽莎白·科尔伯特

美国记者，《纽约客》特约撰稿人和环境评论员。

常年行走在世界环境变化的报道一线，以惊心动魄的文字和严谨科学的考据，为世人传来冰川消融、物种灭绝和气候变迁的消息。因收录在《灾异手记》中的“全球变暖”系列报道获美国全国期刊奖，因《大灭绝时代》获普利策非虚构作品奖。她与比尔·盖茨和阿尔·戈尔一起，位列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环境观察员和行动者。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布罗茨基不是诗人》(2015)剧照

非虚构

像看电影一样，阅读流亡诗人布罗茨基的一生

马克西姆·古列耶夫 | 新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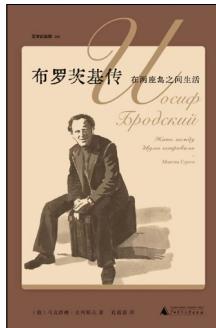
诺奖作家剧本式传记，
以电影手法重建流亡诗人的生活与艺术

涅瓦河与哈德逊河，故乡列宁格勒与流放地西伯利亚，祖国苏联与自我放逐地美国，国家阴谋与个人算计，恋人间的忠诚与背叛……诗人布罗茨基艰难地游移于诸多矛盾体的两极，生活在两座相隔遥远的孤独岛屿之间，勉力摸索，奋力把握着自我的平衡。

纪录片导演古列耶夫采用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传记叙事体，借用古希腊悲剧为架，以历史文献、诗人作品和同代人回忆录为骨，闪回的电影画面、富于戏剧感的对白穿插于每一幕，将诗人的生活和艺术搬上传记的舞台，完成了这部《布罗茨基传》。

个人经验、时代事件接踵而至，目不暇接：他的少年叛逆，秘密走上诗艺之路，与同代作家的交往，他的被捕与逃离，与双亲天各一方永不得见……《塔可夫斯基父子》的作者以一贯的细腻成功地从诗人神话中书写出一部充满动人细节的传奇。

经上海贝贝特授权，我们摘选了《第十场》一章分享给读者。



他们夜里来到了沃洛格达。在道岔前，运输专用车厢被人从“长途”列车上脱钩解了下来，然后用小马力内燃机车驱赶到有探照灯照明的备用线路上，探照灯把壁垒森严的递解监狱里里外外照得通亮。

车厢停下来之后，牵着军犬的自动枪手马上在车厢连接处到集结地之间的通道上排好队，集结地是个木质的简易板棚，有两扇特别大的门——大概就连卡车也开得进去——和几个封闭的、带格栅的窗户。

小马力内燃机车发出悠长的汽笛声，也许，这是在下令同时打开所有车厢连接处的车门，因为在一阵仿佛拔枪栓一般的嘁嘁嚓嚓的开锁声之后，车厢动起来了。而军犬嗅到了人们久未清洗的身体的气味、汗臭味、尿骚味、混杂着杂酚油、机油和煤烟气息的烟草味，开始厉声吠叫，奋力挣脱牵绳。

最先被赶下车的是惯犯，他们除了把双手交叠在后脑勺上之外，只能半蹲着移动身体。他们斜着眼睛瞄一眼军犬，再看看押送人员，傻里傻气地龇着牙。

约瑟夫在第二列队伍中。

几个老头走在队尾。

约瑟夫·布罗茨基：“这，可以说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或但丁的地狱之轮。他们不让您收拾，人们在上面小便，尿一直往下流。让人无法呼吸。而那些家伙——基本上都是惯犯。有的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判刑，不是第二次，也不是第三次，而是第十六次了！就在那节车厢里，坐在我对面的是个俄罗斯老头——克拉斯柯依笔下的人物，不是吗？具体说吧，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大胡子。一切都是注定。他从集体农庄的牲口棚里偷了区区一袋谷物，就被判了六年。而他已经上了年纪。显而易见，他会死在押解途中或监狱里。无论如何都活不到获释。没有一个有文化的人——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在西方——会挺身而出为他辩护。永远没有！只因为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他的事！”

经常有这种情况：军犬挣脱牵绳扑到囚犯身上，撕咬他们，这时就不得不朝天鸣枪或者向军犬开枪了。

新来的犯人在集结地被分配到囚车上，然后被送往车尔尼雪夫斯基区一所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

苏联狱政管理系统的内部章程规定，判刑后应在劳改营服刑的囚犯，先要从调查监狱（约·亚·布罗茨基是从克列斯特）转到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或临时监狱。等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凑够了人数，这些罪犯就会被送到分配营，在那里又被“分类”，分为几个小组，分派到不同的劳改营。

在苏联北部地区，如沃洛格达、凯米、阿尔汉格尔斯克及科特拉斯，羁押转运犯人的监狱就属于（现在仍然是）这样的分配点。

布罗茨基从沃洛格达羁押监狱被押送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

一九六四年三月之前，这里设有一号劳教所的三号营地，该营地是以苏联内务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管理局（劳改营与劳教所管理局）劳教所与劳改营管理局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为基础组建的。

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向外转运囚犯的区段，在该州的南部和西北部，有北德文斯克、奥涅加、科诺沙及维利斯克。

压缩流放途中的口粮，
与哗哗作响的枷锁相拥，
到达死神所在地之后，
我再次弹起了舌头。
俄语诗格放射着光芒
比火还要顽强、炽烈，
仿佛夜间最美的灯盏，
照耀着我的心房……

这几行诗是约瑟夫在这里——三号营地创作的。一九六四年四月初，他从这儿被转运到了位于阿尔汉格尔斯克以南六百多公里的科诺沙区中心的定居点。

约瑟夫·布罗茨基：“他们在科诺沙解除了对我的监管……然后打发我和其他流放犯到附近的村庄找工作……他们对我们说：你们到了那儿之后跟人家谈一谈——如果他们愿意录用，我们一定支持你们。就这样，我找到了科诺沙区的诺林斯克村。一个很不错的村子。我之所以喜欢这里，还因为它的村名和叶甫盖尼·莱茵当时那

位妻子的名字特别像。在那儿干活儿——就像做苦工！但这吓不倒我。相反，我喜欢极了。北方，寒冷，乡村，大地。多么抽象的农村风景。是我在生活中见过的最抽象的东西……首先是特有的植被。清一色的云杉，沼泽，按理说这并不吸引人。一个人不论作为移动的风景还是作为观赏者，在那儿全都无事可做。因为他在那儿能看到什么呢？这种异常单调的滋味最终会将世界和生命的某些信息传递给您……

（白夜）引发了荒谬绝伦的自然现象，因为它把太多的光抛洒在了完全不需要这种光亮的物体上。于是您会发现，您需要花更多时间才能看到一般情况下可以看到的物体……我来这里的时候恰好是春天，三四月份，他们刚开始播种。雪融化了，但这还不够，因为还得把一些巨大的顽石从田里挖出来。也就是说播种时村民们把一半时间都耗费在从田里翻腾大大小小的石块上了。为的是那儿好歹能长点什么。一提到这事就哭笑不得。因为如果说有什么事真的会惹恼我或者让我感到愤怒，那么就是发生在俄罗斯的土地和农民身上的事。我简直要气疯了！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只要有书可读就能忘却一切，对吧？而这些人毕竟以土地为生，此外他们一无所有。对于他们来说，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不仅不幸——甚至连出路都没有。不让他们到城里去，可是即便让去，他们在那儿又能做些什么？还有什么事可做呢？于是他们酗酒，沦为酒鬼，打架斗殴。也就是说只能自我毁灭。因为土地被破坏了，简直是掠夺……当地人完全不信教。这个村子里的教堂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拆毁了。村民们告诉我，苏维埃政权清理了教会。我年轻的时候，有些人家的角落里还挂着圣像，但这多半是保持旧俗和试图保留某种文化，而不是真正信奉上帝。也就是说，不能单凭他们的言行举止和所犯罪过就说他们有什么信仰。有时候他们似乎会叹息生活艰难，要是能做做祷告该有多好。但是最近的教堂距离他们也很遥远。因此，去教堂的事基本上也就无从谈起了。他们有时聚在一起，闲扯一阵，但通常这种聚会最后都变成了酗酒和打架。有几次还动了刀子。但主要还是打架——狠狠地扇耳光，扇出血来。总之，极其常见的农村生活。”

抽象的事物存在于北方抽象的动态风景画之中。

不知怎的，他突然间想起了弗朗茨·卡夫卡的《铁路旅客》：

以沾上世俗的污斑的眼睛看，我们的处境相当于在一条长长的隧道里出轨的火车的乘客，所处的地方恰恰是：来自隧道始端的光线再也看不到，而终端的光线微乎其微，以致不得不不间断地用目光去搜索，却一次又一次地失去目标，弄得连哪是始哪是终都没有把握了。可是，出于我们意识的混乱或是其高度的敏感，我们周围尽是怪物，而且出于每个人不同的情绪和烦恼，不断演示着一个或是令人着迷或是令人厌倦的万花筒。我应该怎么办或者为什么我要这么干，这些不应该是在这种地方提出的问题。

他决定从科诺沙步行前往诺林斯克。

他沿着十月大街上了公路，这条公路通往皮日马，再从那儿通向维利斯克。

既然这么快就撤销了监管，可见他们是信任他的，他们说，去吧。反正也无处可逃，特别是对一个城里人来说。

于是他就出发了。

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厌倦了尘土飞扬的碎石路，于是拐到了被木材运输车压得光溜溜的单线铁道上。

农机站的几个男人告诉他，这么走距离诺林斯克更近。他们还建议他不要去皮日马，因为那里的皮日马人都很好斗，把人往死里打。不久就出现了一片片松叶林，透着光亮，散发着松针馥郁的芳香。道路时而从肮脏的雪水中露出身形，攀援到覆满灌木、泥土松散的阶地上，时而骤然下降，陷入泥泞的沟壑中。再过一个半月左右，黑压压的、成片的蚊子和蠓虫就会让这里变得热闹起来。

将近中午，天气开始变热了。

森林爬上那个坡度徐缓、被一道道冲沟隔断的山岗之后，突然沉寂下来，停在那里，不再向对面移动了。

这也是一座适合攀登的山岗，从上面能看到木材厂采伐树木的遗迹和树干上流出的玻璃般的松脂。

同样是从这里，从高处瞭望，你会觉得天空仿佛在翻转，随风飘动的云彩被下面那层撕裂的铅皮（现在是夜间，确切地说，快要下雨了）包裹着，停留在一个敞亮的地洞中。

这里又是一处无名的湖泊。

尽管当地人知道该怎样称呼它——无底湖，黑湖，维利斯克湖，奇日科莫赫湖。

是的，北方的湖泊都有些神秘，所有人都知道，它们是望向天空的森林之眼：这些眼睛一眨不眨，无休无眠，永远像玻璃一样清亮。

《不闭之眼》是一副圣像，描绘的是年幼的基督睁着双眼的模样。无眠即无需睡眠，永远清醒，看尽世间万象。

途中，他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村落——几间空荡荡、带隔断的倒塌的农舍，一个用“铁爪”扒倒的、没有拱顶的小礼拜堂，礼拜堂的顶棚上有个洞，显然被人用生锈的屋面铁皮笨拙地补上了。

当然应该继续往前走，但他不知为何停住脚步，绕了过去。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上帝在乡村不是生活在角落里，
像嘲讽者所想象的那样，而是无处不在。
他照亮屋顶和碗橱，
公正地将门扇分为两半。
在乡村他一切都绰绰有余。每逢周末
他在铁锅里煮兵豆，
睡眼惺忪地在火光上跳舞，
向我这个目击者使着眼色。
他竖起篱笆，把少女嫁给
林管员，还闹着玩儿，
使打野鸭的护林巡查员
永远打不中目标。

不，这里听不到枪声，四周一片寂静，而沼泽地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干枯的树枝在沼泽上有节奏地摇摆。

这些地段原先有一些伐木场，但是现在只剩下采伐的遗迹——长满了灌木和幼林。

单线铁路顺着从科诺沙到维利斯克的电线的方向绵延开来。

用陶瓷绝缘材料包裹着的电线嗡嗡作响。

鸟儿在倒地的原木桩上栖息，这些原木桩被人用钢丝固定在了埋入土里的铁轨上。

约瑟夫望着这群小鸟，它们使他想起了那些在侧路渠里游弋（而且将永远游下去）、

“沉默不语的无声的鱼儿，那时他要去波罗的海火车站，路过侧路渠所在的施卡宾街区。

小鸟也望着约瑟夫，他被它们错认为那个姓佐托夫的大胡子护林员，他每隔一个月都要来这些地方一趟。

但小鸟毕竟不是鱼儿，布罗茨基也并非护林员。

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堆放在路边的原木也染上了黑色。

再来摘录一段卡夫卡的文字：

我们就像雪中的树干，表面上看来自平放在那里，稍一用力就能推倒它们。其实不然，你是推不动它们的，因为它们与大地紧密相连。不过你瞧，甚至这也只是表面现象。

眨眼间，原木变成了裹着劳改犯的粗呢大衣、在维利斯克农场所属的贮木场里酣睡的季节性临时工。

是的，现在这里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被沼泽吞噬了：先是腐烂，然后混入臭气熏天、冒着气泡的泥炭矿物——黏泥中。只有到了四月份，刺骨的冷风才能吹走枯死的松



布罗茨基在诺林斯克，一九六四年。

树树皮和窸窣作响、银光闪闪的鱼鳞浮渣，以及脚下咕咕直响的烂泥塘深处散发出的恶臭。

当他走上砾石路时，天已经黑了。他赶忙搭乘一辆“越野巴士”，二十多分钟后赶到了诺林斯克。

约瑟夫·布罗茨基：“起初他们以为我是间谍。因为有人收听 BBC 广播——用电池供电的祖国牌收音机能接收到这类节目……这意味着有人散布流言，说我是间谍。但是后来他们明白了，我不是，根本不是间谍。于是他们又认为我在为信仰而受难。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错的，我只好对他们解释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不过后来他们跟我处熟了，很快就处熟了。邀请我去做客……那里有一家商店，农村消费合作社，出售面包、伏特加，有时候也进点肥皂出售。有时候有面粉，有时候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鱼罐头。有一次我尝了尝，尽管我饿极了，还是无论如何无法下咽。我在那里时，这家商店正在翻修。所以我记得——崭新的柜台和货架上空空如也。只有一个角落——您知道摆放圣像的红角吧？——堆满了大面包和伏特加。再没有别的东西！……要知道这里是国营畜牧场，他们养牛犊。但他们从没看到过小牛肉。除非牛犊弄折了腿，他们就要忙乎一阵了：把牛锤死，编写正式报告，剥下牛犊的皮，把牛肉分给各家各户。还有，要是有人捉到了野猪，可以把野猪宰了。人们就是这么生活的。地方分局一个月派人来我这儿搜查一两次……两个人骑着摩托来木屋找我。顺便说一句，我那间木屋好极了。相处时完全不拘虚礼。我知道他们来这儿的目的。他们说：‘瞧，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们来做客了。’我说：‘好啊，见到你们很高兴。’他们说：‘得啦，该怎么迎接客人呢？’我就明白了，应该去买瓶酒。四五十分钟后我带着酒回来的时候，他们也已经万事大吉了，心满意足地坐着等我。可是他们从这些乱扔在那儿的书里能发现什么呢？这时我们坐下来开始喝那瓶酒，之后他们就离开了。”

在诺林斯克，约瑟夫被安置到了塔伊希娅·伊万诺夫娜·彼斯捷列娃家，不过他在那儿没住多久，之后就搬到了村边的康斯坦丁·鲍里索维奇和阿纳斯塔霞·米哈伊洛夫娜·彼斯捷列娃家。

地质学家、人口学家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巴比奥内舍夫（1938—）探望过流放中的布罗茨基，他这样描述布罗茨基的住处：“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原木小屋，整个俄国自古以来都是这种样式，它用三点五到四米长的原木建造，也就是说，总面积约为十二至十五平方米。一扇很小的窗户曾被云母片塞住，这在北方地区也很典型……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与臭虫作斗争的原始方式：四壁和顶棚，甚至连一部分地面，都密实地糊了一层旧报纸……城里人概念中的家具在这里是不存在的。窗户左侧有一个钉在墙上的木板桌，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一台打字机，还有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墨水瓶……这是阿赫马托娃送给他的礼物。桌子上方有个书架，书架上方，是一本打开的尺寸不大的乔托画册。一张铺了些稻草的简易木床，一张放着水桶的木凳，——这就是全部的简易家具……当然，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暖和的卫生间……院子里甚至没有害羞的城里人想出来的那种厕所。但是，这里有四堵墙壁，有屋顶和门，关上那扇门，就可以与整个世界隔绝，就可以思考，写作，与自己独处。”

约瑟夫来到诺林斯克后不久，根据阿尔汉格尔斯克“牲畜饲养”公司“达尼洛夫斯基”国营农场第 15 号令，他被第三生产队录用，成为一名工人。

他的职责范围包括——清理粪便，挖掘树墩，清除农田里大大小小的石块，扎篱笆桩（牧场的围栏），扬谷子，在拖拉机队播种冬季作物，种土豆和收土豆。

不过，很难说布罗茨基是一位勤勉的劳动者。

在保存下来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牲畜饲养’公司‘达尼洛夫斯基’国营农场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第 18 号令”中这样写道：“国营农场三分部工人布罗茨基·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于一九六四年及一九六五年第一季度（一月份十天，二月一日、二日、三日、五日、六日、十九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总共八天，以及三月十九日）屡次旷工，鉴于此，特对其予以通报批评。最后一次警告布罗茨基·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同志：如再无故旷工，国营农场将采取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直至在不作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将其解雇。”

以下内容摘自科诺沙区中心及诺林斯克村的居民对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茨基的回忆。

塔伊希娅·彼斯捷列娃，牛犊饲养员：“队长发给他一些木杆，让他扎篱笆。斧头都给他磨好了。可他哪会扎篱笆——呼哧呼哧地直喘气，手上也磨出了水泡。队长

只好……让约瑟夫去干轻松的活计。他就和老婆子们在打谷场上扬谷子，放牛犊，有时候也会坐到树莓丛里，吃够了才从里面钻出来……倒是没有给自己留下坏名声……确实挺和气的……后来约瑟夫搬到了另一栋房子里。一开始他就在小木屋前面种了一棵稠李树——是他从森林里带回来的。他经常说：‘每个人一生中至少应该种一棵树，好让大伙儿开心。’”

玛丽娅·日丹诺娃，邮局职工：“他靠在我们邮局的柜台上，望着窗外，快活地说，将来人们还会谈到他的。老实说，当时我就想，谁会谈论你这个寄生虫呢？我隐隐约约记得有这么一句话——谁需要你这个病病恹恹、百无一用之人，以后哪有人会谈论你。”

亚历山大·布洛夫，拖拉机手：“他从诺林斯克出发，走三公里路来上班——他会迟到，然后，要是把播种机卡在田里，约瑟夫就变成了废物一个。他总是招呼大伙儿抽口烟，说千万别出汗，否则会冻僵的。他把口袋翻转过来，吃力地往播种机里装满谷子，更多的活儿就一点也干不了了……我和他一起工作了总共一年左右，能不带他就尽量不带……在国营农场，约瑟夫每个月收入十五卢布——既然他不干活，干吗给他更多……总之这个男人挺可怜。他来上班的时候总要带三块蜜糖饼，这就是他的全部食物。我把他带到自己家里，给他些东西吃。我们不喝酒，是的……国家安全局常有人来，他们从一开始就警告我家女主人，让我别和他一块儿混……约瑟夫没给我读过诗，而我也从没细想过。在我看来，与其把他赶到这里，不如一下子驱逐出境才好。那儿才是适合他的地方：他的灵魂是封闭的，他的诗也枯燥乏味。”

德米特里·马雷舍夫，国营农场党支部书记，后来担任国营农场经理：“我和他是一组的。妇女们把用拖拉机挖出来的块茎放进口袋里，捆扎好，我们把那些口袋搬到小型拖拉机上。我和布罗茨基两人抓起一只口袋，扔到小车上。您说他以前有心脏病？我不知道。我在场时，布罗茨基干起活来一丝不苟的。偶尔休息一下，他会抽‘白海’烟。我们干活几乎不带休息的。吃午饭的时候，我去找那个和我同名的帕什科夫，阿纳斯塔霞·彼斯捷列娃带布罗茨基去她家，布罗茨基在诺林斯克时就住在她家。午饭后我们接着扔那些沉甸甸的口袋，一整天就这么过去了。布罗茨基穿着那种秋天才穿的大衣和短筒皮鞋。我问他：‘干吗不穿绒衣和靴子？’他不作声。可你能说什么呢，他明明知道有脏活儿等着他呢。年轻的时候可真是粗枝大叶。”

安娜·施布诺娃，科诺沙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我记得特别清楚，流放犯布罗茨基因为拒绝在‘达尼洛夫斯基’国营农场的田地里捡石头而被判处拘禁十五天。布罗茨基在科诺沙区内务局的牢房里接受处罚的时候，正赶上他的一个纪念日。有七十五封贺电发到了他的住处。我从通讯部门的一位职工那儿听说了此事，她是我们法院的人民陪审员。我们当然很吃惊——这是什么重要人物啊？然后我才知道，很多人带着鲜花和礼物从列宁格勒赶来为他庆祝纪念日。

“这些来庆祝的人去找区委第二书记涅费多夫，让他对法院施加影响。涅费多夫给我打电话，说：‘那帮列宁格勒人在这儿的这段时间，我们是否可以临时放他出来呢？’当然，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然后就彻底释放了布罗茨基。他再也没有进过牢房。”

一九六五年春天，约瑟夫结识了科诺沙区公用事业管理处行政科（行政管理科）的领导——参加过战争、当过陆军情报军官的敖德萨人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莫尔季科。行政科负责管理理发店、澡堂、生活之家及修理厂。

据说很久以前切尔诺莫尔季科在北方的劳改营里坐过牢，之后才来到阿尔汉格尔斯克边疆区。但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的科诺沙，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位名人，影响力极大。

因为热爱诗歌和文学，他与布罗茨基成了朋友。此外，切尔诺莫尔季科还亲自作保，为约瑟夫在当地图书馆登记注册（而这对囚犯和流放移民是绝对禁止的），他安排这位比他小十六岁的年轻朋友在当地的生活之家担任流动摄影师，也就是说把约瑟夫从农业工作岗位调到了城里工作。这件事之所以能办成，多亏了科诺沙区医院一位叫埃里克·安德烈（德国流放犯）的内科医生，他开具了关于布罗茨基患有心脏病的官方证明。

如此一来，列宁格勒的朋友们在他生日那天赠送的自行车以及父亲带到诺林斯克的相机就刚好派上了用场。热情的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莫尔季科照常发放了显影槽、照相放大机、化学制品、相机纸和胶片。

居住地原本就宽容的制度让约瑟夫在一定程度上感觉过得还算称心如意，这里唯一的限制，就是晚上必须待在诺林斯克。

显然，这是另类抽象概念中的一个完整的抽象概念——北国风光单调乏味，少有

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与季节变化相关。

一九六五年六月初，布罗茨基骑着自行车出发了。

他绕到了一些适合爬山的山岗上，从上面能清晰地看到木材厂采伐树木的遗迹，树干上流淌的玻璃般的松脂，散发着松针馥郁芳香的松叶林，灌木丛生的陡坡，泥泞的沟壑，沟壑里蚊子和蠓虫都复活了，黑压压的一片，此外还能看到集材车在坦克通道上铺砌的单线铁路，以及像森林一样参差不齐的地平线。

若干年后，回忆起自己的那几次短程旅行，布罗茨基写道：

森林——像一把断裂的梳子。

少年突然对自己生起一个念头：

“比灌木更高，比云杉更矮”

这念头让他震撼终生。隐约

可见的云雀在高空

纵声啼啭。夏天！该翻来覆去死记

各种公式，应付考试了；

有的人长出丘疹和横痃，有的人

生理期推迟——出于你无法克服的恐惧；

技术学校和中专的影子，甚至

时常在梦中浮现。唯有竿梢的细软枝条

和哨子才能驱走灾祸。

透过汇集的光束

凉鞋、草地上的自行车

清晰可见；镀镍的脚踏板

仿佛制服上衣的扣袢，又好像两枚奖章。

凉鞋上的橡胶和自行车的金属物件里

有些成分来自未来、来自欧洲的

世纪、来自铁路——它的支线

真的好像被风刮到此地，真实

展现绿色的铁路小站——

森林、水塔、农妇的面庞、

围栏——于是那些在畜栏侧板旁

挖出的蠕虫从你的铁匣子里

钻出来四处乱爬。随后——那辆

堆满麻袋的大车

和乡间小路也爬行着

从收割后的田间穿过……

流放犯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茨基被解除了看管。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父母和朋友可以探望他，与他通信，向他转交包裹，他还可以回列宁格勒休短假。

二〇一〇年，异见作家、政治犯鲍里斯·鲍里索维奇·瓦伊利去世前不久，对约瑟夫在诺林斯克的生活做了如下评述：“不久前我才第一次听说——让我异常惊讶的是——在被流放的一年半之内，布罗茨基去列宁格勒休了四次假……严格说来，布罗茨基不是被‘流放’，而是被‘驱逐’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十分模糊。‘流放是指囚犯需远离其住所，并且必须迁居某地。’‘驱逐是指让囚犯远离其住所，并禁止其在某些地域内居住。’‘驱逐’的等级低于‘流放’（紧随‘流放’之后的，则是‘劳动改造，但不剥夺自由’）。与流放一样，驱逐‘可用于裁定某些犯罪分子，这类犯罪分子在固定区域内居住，因而其社会危害性较小，他们在该区域有稳定的犯罪联系人，或者能协助他人实施犯罪行为’。驱逐（流放）的目的，在于中断这种联系……”

解除监管后，布罗茨基在诺林斯克所享有的特殊条件当中，还应当列入相当重要的一条，即他（在拍照之余）被获准从事文学工作——写作及翻译诗歌。根据“偶然”得到的消息，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侨民期刊——《新俄语》（纽约）、《播种》和《界限》（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上积极地发表作品。这些期刊也登载了弗丽达·维格多洛娃对布罗茨基案件的庭审速记。这份预先指定供内部地下出版的文件究竟是如何流到境外的——我们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一九六五年八月到九月，经区党委批准及“委员会”核准，科诺沙《呼声报》在“致本地诗人”一栏中刊登了约瑟夫·布罗茨基的两首诗——《黎明时分的拖拉机手》和《秋色》。显然，关于发表这两首诗的最终决定，是由包括《呼声报》主编谢拉菲玛·叶廖明娜及弗拉基米尔·切尔诺莫尔季科在内的区委会做出的。事实上，这是诗人在苏联发表的最早的成人作品（一九六二年，布罗茨基为孩子们创作的诗歌在列宁格勒《篝火》杂志上发表，这是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及苏联作协的机关刊物）。

阿尔贝特·扎巴卢耶夫，列大毕业生，记者，《呼声报》编辑：“那是一九六五年八月的事。当时我在处理读者来信的部门工作。也写诗。有一天，天气好还是不好——我记不清了，来了这么一位小伙子：穿着牛仔裤，普通衬衫，没打领带，非常时髦。他问我：‘可以在你们这儿发表东西吗？’我说：‘按理说可以，干吗不能呢？’他说：‘但是有个小问题，也许会给你们带来麻烦。’‘什么问题？’‘我是流放犯，所谓的寄生虫。’‘那又怎样？只要文本不反党……’这在当时很重要。他说：‘不会的，文本应该是符合规定的。’于是我就看了看……标题是‘拖拉机手’。我当然看上了这个文本。文字表达生动形象，比方说‘寂静如劈柴般土崩瓦解，落到地平线的两端’以及别的诗句。我们决定用这首诗，准备把它发表出来。说实在的，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加工、文本干预，它已经相当不错了，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区级水准的刊物来说。作品发表后，过了一周，他又来了，又带来一个文本，标题是‘秋色’。好吧，我又看了看，说：‘第一个文本比今天带来的这个更好。’他回答：‘没有可比性。实际上，这个文本比先前那个要好得多。’我对他说：‘当然了，见仁见智嘛。我现在去吃午饭，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去吧。’就这样，我们一边走——这段路有一千米左右，他一边给我‘整理思路’——他是这么说的……特别幸运的是，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没认出布罗茨基，否则他就没法在我们这儿发表作品了，这是肯定的。”

拖拉机和公鸡一齐醒来，

公鸡和拖拉机

与发动机和犁铧一齐醒来，

拖拉机用手斧子劈开寂静，

然后在及膝的晨雾中

隆隆作响地排开队列。

寂静如劈柴般土崩瓦解，

落到地平线的两端

生起炉火。炊烟直冲云霄。

鸟儿朝雏鸟俯下身躯。

森林仿佛一把巨型电锯，

用锯齿锯出朵朵云彩……

当然，约瑟夫有时无法赶到诺林斯克，这时他就留在科诺沙，在利季娅·米欣娜——康斯坦丁·彼斯捷列夫（布罗茨基在诺林斯克就住在他家）的侄女——或弗拉基米尔·切尔诺莫尔季科家过夜。警方对此自然一清二楚，但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切或许是一个既幼稚又下流的游戏的组成部分，这个以布罗茨基为中心的游戏早在一九六〇年就开始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卷入其中，毫无疑问，他们每个人都致力于谋取私利，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有着不同程度的了解，因此能够设计最不可思议的内容纲要，让这些事件充满真实的情感和意外的碰撞。

对于布罗茨基来说，这一切就像一场游历、一次漫游，如同当年陪伴玛丽娜·巴斯马诺娃夜游列宁格勒时一样。莫名的恐慌与狂热的好奇心展开了竞争，忠诚与背叛相互对抗，而自信也变得与孩童般的幼稚相差无几。

这种状态在我们前面提到的弗朗茨·卡夫卡的作品《过路人》中，传达得似乎格外准确：

若我们夜里沿着一条街散步时，看见一个男人，而且老远就看见——由于眼前这条街是上坡路，且今晚是满月——他在前方迎面奔来，我们不会拦下他，即使他身体虚弱且衣衫褴褛，即使有人在他身后追赶并且大声喊叫，我们也只会让他继续跑下去。

因为入夜了，我们也无法确认，这条街在满月的光照射中，是向上陡升的；而且关于此事，也许那两位进行追捕是因为自顾自地玩闹而激动起来；也许那两位在跟踪某个第三人；也许前面一个是无辜被跟踪的人，也许后面的人想要谋杀，那样我们就会成为谋杀案的共犯；也许这两人互不相识，他们只是各自赶着要回家；也许他们是梦游者；也许前面那人身上有武器。

说到底，难道我们不能觉得累吗，我们不是喝了这么多酒了吗？我们很高兴，因为后面那人已不见踪影了。

一切皆有可能……此刻只须相信自己的感觉，与自己对话，就像与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布罗茨基、玛丽娅·莫伊谢耶夫娜、雅科夫·戈尔丁、叶甫盖尼·莱茵、阿纳托利·奈曼、德米特里·鲍贝舍夫、米哈伊尔·梅伊莱赫，当然还有玛丽娜·巴斯马诺娃对话一样，他们从一九六四年秋就铺好了从列宁格勒到诺林斯克的道路。



马克西姆·古列耶夫

俄罗斯著名纪录片导演，作家，编剧，记者，摄影师。其执导电影以纪录片和艺术片为主，共执导六十多部纪录片，包括《果戈理的最后旅程》《列夫·托尔斯泰的悲剧》《当代英雄》等，荣获俄罗斯和世界各地众多电影节奖项。在俄罗斯《十月》《旗》《各民族友谊》《新世界》等重要杂志上发表多部作品。另著有《塔可夫斯基父子：阿尔谢尼与安德烈》。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Knut Troim](#) on Unsplash

大西洋鲑鱼充满悖论。一方面，这种鱼已成为海洋中最罕见的动物之一：我们中很少有人能有幸见到它（或是吃到它）。然而，鱼类养殖又让它成为全世界最司空见惯的动物之一。在短短几十年之内，水产养殖已经把这种原本仅为少数人享用的美味，变成了一种全球化商品，以及全世界交易最广泛的鱼类。或许，在人类饲养牛、猪和羊的一万年之后，我们把这种鱼也带到了同样的道路上：通过人工养殖，这种动物在笼中（海洋里的水下鱼笼）大量繁殖，却在自然环境中消失。然而，我们不得不担忧野生大西洋鲑鱼的命运。这种鱼是地球状况的天然标志，有着无可企及的地位。它可以自行从淡水鱼变成海鱼，然后再变回淡水鱼。这就意味着，随着生命周期的发展，它会从内陆河流来到海洋，然后再回归河流。通过鲑鱼，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人类活动（从砍伐森林、修建水坝、污染、过度捕鱼到推动气候变化）对自然界产生的累积影响。这种鱼类的锐减为陆地和海洋发生的变化鸣响了警钟。我们如果想要拯救鲑鱼，就要停止破坏地球——就是这么简单。

这种鱼难以捉摸，它的生命周期更是神奇。一条雌性鲑鱼会在河流的砾石之间产下约 8000 粒鱼卵，然后雄性鲑鱼会竞相以精子令这些卵子受孕。8 周后，小鱼就会从金黄色的蛋中孵化出来，并在之后的 30 天内依靠卵黄囊中的营养物质成长。它们从小鱼长成幼鱼后，便能离开铺满砾石的浅水流域，游向更深、更危险的水域。在深水区，一条鲑鱼必须存活长达 3 年，并找到足够的食物，生长到 15 厘米长，且有着足够的肌肉，才能最终完成游向大海的伟大旅程。鲑鱼必须在大西洋中完成几千英里的耐力游泳，才能在大西洋北部找到丰盛的食物来源。之后，它如果足够幸运地躲过了捕食性动物和风暴，就会在两三年之后逆流而上，克服途中的所有障碍，回到最初孵化它的砾石小河。它会在这个标志着它的起点和终点的地方产下鱼卵。在最初产下的 8000 粒卵子当中，只有两个能完成前述的整个生命周期。这是自然界最令人惊叹的过程之一。

为了离开其在淡水河的家乡，并游入含盐分的海洋，鲑鱼会经历一种名为“溯河洄游”的体态转变。数百万年前，随着海洋冷却并成为更丰富的食物来源，鲑鱼演变出了这种生物特性。这个过程使鲑鱼得以“银化”；它的体态会更具流线型，外皮会变成银色，且更易反光，能更好地在大海中自我掩护。在河流中，鲑鱼具有很强的领土意识，攻击性也很强；随着它游到更深的水域，并与其他鲑鱼汇聚成一群，它的性情也变得越发温和。在更接近大海的河流下游，鲑鱼会在它即将离开的水域中最后汲取一次水中的化学成分。科学家们认为，正是这一“印记”帮助它在大海中遨游数千英尺后，依然能找到回家的路在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入海口。鲑鱼会转换鱼鳃并改变呼吸方式以便适应新的环境，在贴近海面的地方游泳。在那里，它能找到甲壳类动物、鱿鱼、小鱼和磷虾等大型浮游动物来填饱肚子。然而，它们在捕猎其他生物的同时也成了猎物。它们的捕猎者包括鸬鹚、鲨鱼、海狮、海豹，当然还有人类。

鲑鱼种群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就发生在北大西洋，跨越了欧洲和北美的 2000 多条河流和支流。北上挪威，南至西班牙和葡萄牙，东起俄罗斯，西到加拿大，都能找到大西洋鲑鱼。然而，无论它们的起源地在哪儿，大西洋鲑鱼最终都会聚集到格陵兰西海岸和法罗群岛附近的海域捕食。在这里，所有鲑鱼都会长到原先的两倍大，还会贴膘，以抵御北大西洋的寒冷，并为洄游提供能量储备。

鲑鱼生命周期中发生的许多事都应该纳入蕾切尔·卡森的“终极之谜”。我们并不真正了解鲑鱼是如何找到洄游的路（那或许是记忆、气味、太阳领航和地球磁场的综合作用），也不清楚它们是如何判断何时洄游的。我们只知道鲑鱼会不惜一切代价洄游。在爱尔兰多尼戈尔郡的克洛亨镇附近，沿着 40 英里长的芬河，鲑鱼遇到了一个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水顺着 10 英尺高的瀑布奔涌而下，猛烈地撞击着坚硬的岩石。鲑鱼会从底部的水池向上游，然后不断地尝试跳跃。一些鱼用尾巴将自己甩离水面或岩石表面，进行阶段性的弹跳，而另一些鱼则一跃飞天。在这个阶段，洄游的鲑鱼依然在消耗身体里的能量储备。一旦回到河里，无论需要几天、几周还是几个月才能回到出生地，它都不再进食。然而，鲑鱼已在大海中捕食多年，各方面能力都正处于巅峰。因此，对于在岸边等待它的捕食者（人类和其他动物）而言，洄游时的鲑鱼正处于最佳状态。

诗人谢默斯·希尼从小就喜好垂钓，他在北爱尔兰多尼戈尔郡的克洛亨瀑布以东垂钓鲑鱼。他说，自己曾看见鲑鱼银光闪闪的身躯、蓝绿色的鱼鳞和鱼雷般的脑袋，它们破水而出，奋力游向其出生的水域。希尼的诗《鲑鱼垂钓者致鲑鱼》刊发于 1969 年。当时，野生大西洋鲑鱼的总数在 1000 万左右。如今，这个数字不到 200 万。相形之下，另一种鱼类——太平洋红鲑鱼（2000 万年前，与鲑鱼出自同一进化群体）则数以千万计地洄游到其出生的河流。正因如此，大西洋鲑鱼的大幅减少才如此可怕。50 年前，每 100 万条离开河流游向大西洋的鲑鱼之中，就有一半成功洄游，在家乡产卵，并完成

非虚构 为什么食物的种类 变得越来越少？

丹·萨拉迪诺 | 新书推荐

除了美味，我们还将失去什么？

人类吃过的植物多达 6000 种，而如今 50% 的摄入能量来自水稻、小麦和玉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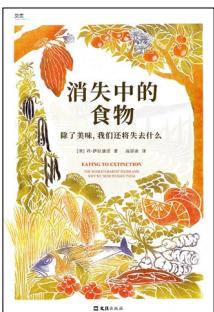
全球每年宰杀 700 亿只鸡，但大多数是同一种鸡的后代——它是 20 世纪中期的肉鸡比赛冠军“明日之鸡”？

大西洋鲑鱼在产卵前逆流回到出生地的浪漫与悲壮逐渐消逝，而仅在苏格兰利文湖，养殖场就为 1600 吨鲑鱼制造了洄游的假象？

无论来自哪里，我们喝下的啤酒中，每 4 罐里就有 1 罐出自同一工厂？

繁荣之下，是选择的贫瘠。除了美味，我们还将失去什么？每一种食物的消失都是蝴蝶效应的起点？《消失中的食物》作者丹·萨拉迪诺寻访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记录 40 余种濒危的食物与传统工艺，如纪录片般揭露食物消失的赫然真相，也传递着温暖的希望。

经贝贝授权，我们摘选了《野生大西洋鲑鱼》一章分享给读者。



其生命周期。如今,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3万条鲑鱼。虽然全世界都在努力搞清楚此事的始末,但是我们依然无法完全明确,大西洋鲑鱼为何会遭遇此等锐减。对任何物种来说,当个体数量变得如此之小时,其未来都将举步维艰。一些海洋科学家认为,野生大西洋鲑鱼真的有可能会灭绝。

想象人类与任何鱼类之间的最初相遇,是一件颇为复杂的事情;在考古学记录中,软骨和皮肤并没有留下多少线索。在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的一个山洞中,考古学家找到了人类与鲑鱼互动的迄今最古老的证据。在山洞里,尼安德特人留下了一堆鲑鱼的大骨头,它们可以上溯到大约4.5万年之前。大约在2.5万年前,智人不仅捕捉鲑鱼来吃,还把它们画进了岩洞的壁画。在法国的多尔多涅地区,靠近多尔多涅河畔莱塞济镇的地方,一位狩猎采集者将鲑鱼的形象刻画在了山洞顶部的软石灰岩上。他肯定花了很多时间来制作这幅长达一米的精细图像,画中鲑鱼的尾巴、鳍和鳃上有着数百道微小划痕。它上翘的下巴和张开的嘴体现了这条鱼是如何筋疲力尽地逆流而上,为的就是回乡产卵。在这幅古老的壁画周围,有一些全然不同的划痕:笔直的、印记很深的线条,几乎可以肯定,它们不是史前留下的。1912年,有人试图将这条刻画在石灰岩上的鲑鱼挖走而未果,这正讽喻了人类几个世纪以来对鲑鱼的所作所为。

除了艺术品,考古学家还在土壤中找到了关于鲑鱼对大西洋地区早期定居者的重要性的证据。他们在爱尔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最初的定居点之一,就位于谢默斯·希尼最爱的班恩河附近。9000年前,这里的狩猎采集者带着鱼叉和用柳条与黏土制成的鱼兜,靠捕食鲑鱼生存了下来。这种鱼对于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和俄罗斯部分地区的游牧民族萨米人也殊为重要。4000年前,沿着流经挪威和芬兰的塔纳河,萨米族的渔人乘着木船逐个停经沿岸的水潭,用诱饵钓鲑鱼。在威尔士的泰威河、泰菲河和塔夫河,渔人的传统做法是驾驶科拉科尔(*coracle*)小舟,拉网捕捞鲑鱼。这种圆形小舟以一支桨掌舵,只能坐得下一位渔人。在坎布里亚,渔人依然沿用“哈夫捕鱼法”(*haaf netting*),也就是在浅水处行走,用一张类似足球网的渔网捕鱼。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每年春天,佩诺布斯科特人的祖先就会在流经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的河流中,利用长矛和由桦树皮制成的独木舟捕捉鲑鱼。在这些气候寒冷的地方,人们无法用盐来保存鲑鱼(阳光不足,难以彻底蒸发鱼肉中的水分),便将鲑鱼埋在地下,任其发酵(创造出一种与法罗群岛的发酵羊肉干同样奇特的食品)。后来在1世纪,普林尼曾提到,居住在法国西南部阿基塔尼亚河畔的高卢人更喜欢鲑鱼,“胜过所有海鱼”。也就在彼时,这种鱼被冠以鲑鱼之名。罗马军团惊讶地看着鲑鱼在莱茵河谷逆流而上,穿越激流,沿着瀑布往上游,并将这种鱼命名为“*salar*”,即“跳跃者”,这就是后来其学名“*Salmo salar*”的由来。

在苏格兰的东海岸,也有人同样对鲑鱼充满惊奇。在7世纪,皮克特人在其文化彻底消失之前,建造了刻画着跳跃鲑鱼的石碑。在其中一块石碑上,一条鲑鱼在一条蝰蛇和一面镜子之间周旋。它的象征意义是考古学家仍在试图解开的另一个鲑鱼之谜。

多方证据显示,野生鲑鱼是一种地位较高的食物。1000年前,就在捕渔业大变革热火朝天之时,在法国中部索恩-卢瓦尔省的克吕尼修道院里,修道士们留下了非同寻常的记录。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迫在沉默中度过,主要依靠手语交流。在一份写于1090年的手语指南中,“鱼”的手势就是将双手手掌相合,在胸前扭动。然而,鲑鱼却有单独的手势——将双手大拇指放在下巴下面。这可以理解为只有“非常骄奢、富有的人才能经常食用这种鱼”。

正因为鲑鱼价值高,在13世纪的爱尔兰,鲑鱼的每次捕获、出售和购买都被严格地记录下来。修道院是最大的地主,掌控着大多数河流和鲑鱼贸易。这门生意利润丰厚,数吨爱尔兰鲑鱼被抹上盐、装进桶里,运往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港口。据记载,到了17世纪,这些货物的规模十分庞大,以至于“普通人看到都会吓一跳”。

同样是在爱尔兰,鲑鱼数量的锐减也得到了详细的记录。19世纪末,作家奥古斯塔斯·格林布尔为了研究鲑鱼而走遍了爱尔兰。格林布尔说,在北方的班恩河,鲑鱼损失最为惨重。“可怜的班恩!”他写道,“我们从未见过如此不幸的河流。别的河或许会遭遇一两桩或者最多几桩恶行……但在悲哀的班恩河,却发生着可以将鲑鱼置于死地的、所有可以想见的恶行。”这些“恶行”包括沿河而建的亚麻厂排放污染物。工厂向河流排放的废物(包括石灰、漂白剂和染料)“毁灭了所有残存的鱼”。政府虽然颁发了法令,“但是罚款额度很低,做出这些恶事的人也毫无羞耻感”。与此同时,幸存的鱼遭到过度捕捞。正如格林布尔所描述的那样,“大规模偷捕”相当普遍,“覆盖了方圆数英里的渔网就在海上防卫队的眼皮底下非法捕捞”。



图片来自 Drew Farwell
on Unsplash

班恩河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这些来自陆地和海洋的压力对欧洲鲑鱼群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鲑鱼在淡水河的往复旅途延续了数百万年,如今却为越造越大的水坝所阻挡。鲑鱼依然坚持不懈,试图跃过这些巨型的混凝土障碍物而未成功,直至死去。随着完成生命周期的鲑鱼越来越少,它们也在沿岸居民的生活中渐渐消失。在德拉纳河上,就有一座建于“二战”时期的大坝。2016年,一位渔民称在德拉纳河看到两条鲑鱼,当时这件事还上了新闻头条。这是50多年来人们第一次在德拉纳河里看见鲑鱼。

20世纪50年代,更严格的欧洲环境法使野生鲑鱼所生活的许多河流得以恢复,但鲑鱼的衰落似乎势不可挡,其数目再也没有恢复到历史水平。在爱尔兰农村,野生鲑鱼活了下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它们一直是村民享用的美食。著名的厨艺大师科里根就是在那个年代长大的,他生活在都柏林西部米斯郡的沼泽地。在那里,鲑鱼每年都会出现一次。清晨时分,他会听到家里的渔民朋友将农场的门打开,并把麻袋挂在后门。他们会在厨房里打开麻袋,当里面的鲑鱼掉到桌子上时,便能看到一道银光,并听到“砰”的一声。他的父亲会拿出一把旧切肉刀——专门用来切这些珍贵的鲑鱼——将整条鱼切成若干厚块,然后在铸铁平底锅里用黄油烹饪。科里根说:“我们向往鲑鱼油的香味。”他们将一片片苏打面包浸在鲑鱼油里,一口一口慢慢地吃着,一言不发。“我们很穷,但在那些早晨,我们吃得就像国王一样。”

尽管鲑鱼十分稀有,且处境也很危险,但鲑鱼的捕捞并未因此减少。人类不停地捕捉鲑鱼。从维京时代开始,爱尔兰沿海的渔人就会将岸上的船推下海,并撒下小型围网。这些围网形似降落伞,从海里将其拉出来,就有可能逮到鱼。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最权威的鲑鱼科学家肯·惠兰(当时还是个孩子)曾在肯梅尔湾看见渔人们坐着船,围在一起,等待“那种鱼”的出现——他们就是这样形容一大群鲑鱼的。他们会连续数个星期仔细观察河水,寻找鲑鱼游入海湾的标志:水面上会出现一个V字型。一旦有人见到鲑鱼,镇上的人们都会兴奋不已。“大多数渔人都已经60多岁了,”惠兰说,“但他们拉网时的动作快如闪电。”

有一次,鱼群规模很大,渔人们试图把渔网拉上来时,渔网太重而撞上了一块岩石,他们因此错失了大量鲑鱼。回到岸上,他们似乎有些沮丧,但其中一位微笑着对围观者说:“哎呀,好吧……就把它们留给河流了。”这些渔人知道自己捕鱼的方式效率不高。“正因如此,这个方法才行得通,”惠兰说,“总要有足够的鱼留在河流。”

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围网为漂网所取代。漂网的一头系在船上,其余部分钩在浮子上漂着,可以覆盖数英里。而且,由于漂网是用尼龙细网制成的,鱼就无法看见它们。潜艇声呐探测技术也被用来定位鲑鱼。两三张漂网就能覆盖整个海湾,那些使用围网和小船的老渔人就什么都捞不到了。捕捞鲑鱼成了热门行当。有许多年,颁发捕鱼许可证就像撒五彩纸屑一样。惠兰说:“每一张网都成了巨大财富的来源。”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鲑鱼数量的急剧下降,政府试图限制捕鱼。结果,爱尔兰西海岸附近的水域就成了战争地带,非法漂网使用者和渔业工作人员正面交锋,其中海军巡逻船和漂网渔人也发生交火。一夜之间可以收缴8英里长的渔网。然而,在更遥远的海域,大西洋鲑鱼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问题。

大西洋鲑鱼最主要的觅食区域就位于格陵兰的西海岸,来自不同河流的数千条鲑鱼聚集于此。如今,这块海域成了工业化捕鱼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挪威的大型船队每年都能捕获200万至300万条鲑鱼,比如今全球的鲑鱼总数还要多。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了一份国际协定,以阻止肆无忌惮的劫掠。如今,大多数营利性的鲑鱼捕捞都被禁止,而在爱尔兰,仅有少数历来就有许可证的渔人才能在河口捕鱼。在苏格兰、英国和挪威,撒网捕鱼的现象也大大减少。然而,鲑鱼的数量依然不断下降。我们的河流和海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肯·惠兰认为,海洋温度的改变是一大潜在因素。他说:“在鲑鱼觅食的部分区域,浮游生物已经消失了。”与此同时,爱尔兰的南海岸出现了新的鱼类。“变暖的海水引来了加勒比海的炮弹鱼和地中海的鲷鱼,它们与鲑鱼争夺食源。海洋正在发生变化,而鲑鱼

就是受害者之一。

悖论就此产生。虽然野生鲑鱼的数目在下降，但是大西洋鲑鱼的总数却在迅速增加。据估计，仅在挪威海岸，任何时候养鱼围栏里都有约 4 亿条鲑鱼。仅 10 个这样巨型的养鱼围栏里的鲑鱼数量，就超过了全世界所有河流、小溪和大西洋里的野生鲑鱼总数。随着野生鲑鱼数量减少，养殖鲑鱼却在茁壮成长。有些人认为，两者是有关联的。

全球大多数养殖鲑鱼都出自少数几家挪威养鱼公司，包括莱瑞海产集团和萨尔玛，而最大的则是美威。美威在挪威及其法罗群岛、苏格兰、加拿大、爱尔兰的水域都设有养殖场，其产出的鲑鱼数量接近全球总消耗量的四分之一。美威的全球业务甚至将大西洋鲑鱼养殖场延伸到了赤道以南的智利沿海。我有幸在苏格兰的西海岸从头到尾地参观了美威的养殖业务。在孵化场，我看到刚孵化出来的小鱼苗，它们的眼睛紧紧包裹在卵鞘里。美威在苏格兰拥有 25 个养鱼场，我在其中一处看到了数十万条鲑鱼在鱼棚里不停地绕着圈游，不时也会有一条鲑鱼冲破水面，一跃而起。“我是以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身份进入这个行业的，”美威的一位经理伊恩·罗伯茨在带我参观渔场时这样说，“我想要阻止渔人从海里捕捞仅存的野生鲑鱼，便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他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近几十年来，全球对于鱼类日益增长的需求大多是通过水产养殖来满足的。人类食用的海鲜有一半以上来自水产养殖。

在苏格兰西海岸内陆，有一家隶属于美威的养殖场。在那里，鲑鱼生命周期的前 7 个月都是在一个仓库般的巨型孵化场里度过的。在这个位于洛海勒特工业园的孵化场里，鲑鱼生活的所有微小细节都受到全天候的控制和监测。只要维持较低的压力水平，鲑鱼便能保持较快的生长速度。在金属楼梯的顶端，我看到 15 万条鱼在一大缸消过毒的水中沿着顺时针方向游动。为了引起鲑鱼的生理变化，使其从淡水鱼变成深海鱼，养鱼场会用光线来诱导鲑鱼。在连续几周内，光照都非常弱，为鱼群创造一个“虚假的冬天”；之后，仓库会被照亮，宛如春天降临。这样一来，鱼群便会开始朝反方向游，它们的鳃和皮也开始发生变化。但在洛海勒特的孵化场，它们无法沿着河流游向大海，取而代之的是沿着巨大的管道游到油罐车里。你只会看见一群慌乱的黑影在水泵的拉力面前奋力挣扎，而其中最厉害的“游泳健将”也只能在透明的管道中停留那么一秒。一艘改装过的捕鲸船会将这些送到岸上的鲑鱼运往下一个目的地：在湖中用笼子固定的多只鱼栏里。在那里生活一年半以后，它们会被宰杀并经过加工处理。其中，有一半会成为英国超市货架上的货品，其余的则会出口（如今，养殖鲑鱼是英国最主要的出口食品之一）。

我看到的其中一只鱼栏就位于威廉堡附近的利文湖。在那里，美威每年能产出 1600 吨鲑鱼，而这不过是美威全球养殖场 50 万吨总产量的一小部分。从岸上看，这些鱼栏就像是湖中心的若干小岛。我坐着小船来到鱼栏附近，才看到水中插着用来固定鱼栏的金属杆，而鱼栏上方则设有防止飞鸟捕食鲑鱼的网。每过几分钟，鱼栏旁边的木甲板上就会传出一阵撒播声，就像是在沙滩上踢石子的声音。那是一架自动旋转器，将蛋白质颗粒撒到水里。在水下 22 英尺深，隐藏着 16 个鱼栏，里面有 50 万条鱼正在进食。

按照目前的趋势，从大海中捕捞到的野生鱼类将越来越稀少，而水产养殖则将越来越发达。一种起源于中国的做法如今在全球流行了起来。在稻田系统中，鱼可以为水稻作物控制虫害，其粪便则为作物施肥。20 世纪 70 年代，水产养殖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挪威的两兄弟西韦特·格鲁特维德和奥韦·格鲁特维德意识到了野生鲑鱼的衰退，便针对封闭式鲑鱼养殖进行了一项试验。他们在自家位于希特拉岛的养鱼场附近，将野生大西洋鲑鱼投放到了漂浮在峡湾里的一个围网里，试验结果相当成功，两兄弟卖了鱼，也挣了钱。后来，挪威渔民便相继仿效他们的做法。然而，他们都开始意识到生产力受到了鲑鱼本身的限制。野生鲑鱼生长得太慢了，而且并不能高效地将鱼食转换成脂肪和肌肉。鱼类养殖者所需要的是“明日之鸡”或“大白猪”的水产版本。此时，挪威的一批动物饲养员参与了进来。

为了解决问题，他们参考了水产养殖的 200 年历史经验。罗伯特·贝克韦尔在 18 世纪制定的原则依然站得住脚。20 世纪 40 年代，改造了美国肉类加工行业的美国科学家杰伊·卢什进一步发展了贝克韦尔的理论。挪威的饲养员借鉴了贝克韦尔和卢什的想法，在几年内就改变了野生鲑鱼的基因。他们从三条河中选出具有不同特点的鲑鱼，培育出一种比野生鲑鱼长得快且吃得少的品种。第一代鱼的生长速度比过去的品种快了 15%；10 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番。饲养员所养殖的鱼无疑是鲑鱼，但从基因角度看，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品种。一些科学家认为，养殖鲑鱼和野生鲑鱼 (*Salmo salar*) 之间的区别非常大，应该将新品种命名为“家养鲑鱼” (*Salmo domesticus*)。

无论对挪威的饲养员还是对全世界而言，这都是一大突破。“绿色革命”的小麦和水稻喂饱了人们空空如也的肚子，牲畜专家创造出了更便宜、更充足的肉类供应。养殖鲑

鱼可以让更多人吃到这种鱼。他们相信，这种新品种的鱼可以提供新的蛋白质来源，同时也有助于解决过度捕捞的问题。然而，事实上，其中的利弊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图片来自 NOAA on Unsplash

我于 2020 年 2 月来到利文湖的这座美威渔场。而在此两周前，这家公司位于科伦赛远海的一只鱼栏被撕破了。渔网无法承受台风布伦登的一顿猛击，有 7.4 万条养殖鲑鱼逃出鱼栏，游入了大海。将鱼栏放置在更遥远、水流更湍急的海域，解决了在内陆海域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在鲑鱼行业中，鱼栏内产生的废物——鱼食、粪便和化学品——会对鱼栏之下的海洋生物和海湾生态产生影响。反过来，海湾生态也能毁掉鱼栏里的鱼：厚厚的藻华会威胁鲑鱼的生命，破坏其鱼鳃，并消耗水中的氧气。这样一来，数千条鲑鱼都会丧命。

鲑鱼行业还面临着另一个同样棘手的问题：海虱。在野生环境中，这种身长半厘米的寄生甲壳类动物与鲑鱼共同进化。当鲑鱼生活在海里时，它们身上或许会有那么几只海虱，但它们无法在淡水中存活，因此会在鲑鱼逆流洄游的过程中脱离鱼身。然而，装满了数万条鱼的鱼栏则为海虱制造了机会。一旦鱼栏里有海虱出现，它们就会快速繁殖。海虱会在鲑鱼表皮移动，寻找鱼脸和鱼鳃附近最柔软的肌肤组织，一旦找到了就开始啃食。鲑鱼遭到过度啃食后，就会死亡。与此同时，这些“养殖”的海虱会更广泛地传播，危及野生鲑鱼种群。另外，逃脱的养殖鲑鱼会对野生大西洋鲑鱼的长期福祉造成威胁。

在天然环境中，两条来自不同河流的鲑鱼之间的基因区别，会超过两个人之间的基因区别。经过无数代的进化，每一种鲑鱼都适应了自己家乡的环境：河流的长度、河流的湍急程度、河中可觅得的食物量、河水的温度，以及河水中的各种味道和气味。每条河里的鲑鱼品种都适应了当地环境，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劣势，并发展出特有的、适合自身的生命周期。而成就这一切的，正是野生鲑鱼的洄游本能——回到它们出生的水域进行繁殖的本领。

养殖鲑鱼却不同。它们的养殖基于一系列严格甄选的基因，目的只有两个：大量进食、快速生长。它们不具备野外生活所需的基因工具箱，也无法完成从河流到海洋再回到河流的伟大旅程。在数十万条养殖鲑鱼从鱼栏中逃脱后，它们或许会与野生鲑鱼杂交。养殖的雌鱼有可能存活下来并产下卵，而这些卵则会在河流中受精。专家担心，这样的基因渗入——野生鲑鱼和养殖鲑鱼的基因混合在一起——可能会逐渐改变野生鲑鱼，增加其得病和被捕食的风险。

在爱尔兰，野生鲑鱼的衰减也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消逝。莎莉·巴恩斯经营着全爱尔兰最后一间专门熏制野生鲑鱼的熏制房。她在爱尔兰西南角的卡斯尔敦申德村工作和生活，距离斯基柏林镇 5 英里远。这里曾经有数百家熏制房，在春、夏两季会接收许多鲑鱼。熏制房里的师傅们很善于用盐和烟让鱼肉中的水分蒸发，这样腌制好的鲑鱼便能保存下来，以备食物不足或长途旅行的时候食用。如今，莎莉·巴恩斯和她的雇员每年只能收到 300 多条鲑鱼。正是那些依然持有河口捕鱼许可证的渔人把这些鱼卖给了她，而这些渔民的人数也越来越少。

她会手工剖开每一条鲑鱼，取出其内脏，将鱼身切成块。她经手的每一条鱼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故事：生于哪一条河流，如何历经数千英里游到海洋，又如何千辛万苦地洄游。巴恩斯说：“这是养殖鲑鱼所缺乏的。”她就像外科医生一样，仔细剖析这些鲑鱼，以研究出最合理的熏制方法——估算出熏制的温度、需要多少烟和盐，以及要熏制多久。她研究鲑鱼的骨头和肌肉结构，以及它们身上一层层的脂肪。有时，这些鱼被送来的时候，由于旅途波折而受了皮肉之伤，而她能温柔地按摩鱼肉，让伤痕消失。她将鲑鱼放入小熏箱后，就开始摆弄烟道，并调整穿堂风，将桦木屑发散出来的烟调到最佳。巴恩斯熏制一条鲑鱼所需的时间，短则 12 个小时，长则 3 天。“那要看湿度，”她说，“每次熏鱼时，都得仔细观察周遭。”熏好的鱼呈浅粉色（从来不会是亮橙色），并带着甜美而温和的烟熏味。烟熏之后，她会手持小镊子，将鱼身上所有的细小鱼骨都拔掉。“过不了

多久，我就要失业了，”她说，“我可以改而熏制养殖鲑鱼，但我不想那样妥协。我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条野生鲑鱼，逆流而上了。



丹·萨拉迪诺

记者和播音员，加入 BBC 超 25 年，为《粮食计划》(The Food Programme) 提供深度报道。他背上行囊，北往法罗群岛，南至坦桑尼亚，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寻找濒临灭绝的食物，记录它们的故事。他的首部作品《消失中的食物》斩获饮食作家协会图书奖、福南梅森图书奖、格里格森奖、英国自然与旅行写作至高奖温赖特奖，以及堪称“美食界奥斯卡”的詹姆斯·比尔德奖。他还曾入选伦敦年度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死亡诗社》(1989)剧照

专栏

082 Jack

所以，你原本依赖的东西 其实是很脆弱的

杨樱 | 接力访问

“我其实有意无意训练自己，

不要依赖于任何一个停滞不前的东西。”

和 Jack 聊完之后有好一会儿，我都在消化他的自信。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对如今社会变成了什么样心知肚明的人，也是一个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生一清二楚的人，他的自信之处在于，在这两样很多人会觉得不可调和的前提之下，他有了一个小孩，并试图把所有可能的“镣铐”从小孩身上拿开，不作哪怕一点点妥协。至于他自己的生活，也是一样。他并没有把这些企图隐藏起来，相反，他试图联结更多人来巩固这种生活方式。

“关于自信，我自己的解读是，一定的通识和对媒介与技术等 under the neath 的运作机制的熟悉，得以祛魅专家、技术、消费、绩效等；加上对世界本身的兴趣让我不需要完成什么‘成就’为人生目标，这样就自然无缘所谓政治性抑郁，且较充实的状态。”

在我问到既然他的追求与现有环境如此格格不入，为何不离开的时候，他说：“因为你有很多可以行动的事儿，超多的。”

这些描述可能过于笼统，那我们还是回到 Jack 是谁这个本初问题上吧。Jack 大学本来是学数学的，后来赶上学校开设软件工程专业，第一届面向校内招生，于是就去学了。也就是那一年，他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电脑。

Jack 是 1982 年出生的，江西人。这个年龄能不早不晚赶上不少好时候，加之他在上海读大学，便利条件就更多一些：计算机已经迭代到更用户友好的阶段，但还保留着一点点硬核本色；互联网基础设施已然铺设完成，信息自由来去，伦理和监管的高墙都未筑起，而人与人之间尚且怀着好奇和诚意，互联网的公共空间叫做 BBS，还不叫社区；在流量时代到来之前，互联网还保留着一种 nerd 气质……用 Jack 的话说，他得以基于兴趣成长。这带来两个好处，其一是有机会体验计算机世界的方方面面，其二是做事

不用依循固定轨道，虽然当时还没有“独立开发者”这样的说法，但知道只要自己的工具箱够大，就可以着手创造自己的世界。这两个认知对于后来他的生活至关重要，也为他的自信提供底色。

Jack 的工作履历并不复杂，最早在一个较大的游戏公司做技术安全支持，在陆家嘴工作一年之后，就随着公司扩张去了广州，直至现在。中间和朋友一起创业，做的是游戏社区，从结果上不算成功，但他开始琢磨什么叫做产品，那时候他有个愿望，就是把自己最初在互联网上“受到感召的东西”放进自己的产品里。

“那是是什么呢？”

“就是参差不齐的人，各有所长，碰撞观点，迸发讨论。它从来不是特别规范的，有大量的口水、无意义的争吵和不礼貌的行为，但相比现在，大家有某种自觉，就是每个人的动机是比较单纯的，大家都会试图去理解对方。”

从产品形态而言，他试过不少东西，都走在真正的浪潮到来之前：游戏直播、基于社交平台的大数据管理……“整个过程我一直都挺开心的，没太意识到所谓时间流逝。只有我完全独立之后，才会去选择所谓的方向。”Jack 说：“但无论是行动空间、规模还是商业上，我都没有看到特别有趣的东西，只是在原有的东西消亡的过程中，我才发现有哪些东西更重要，才想去维系住那些东西。这时候我就必须舍弃，提取最重要的部分，就不会太在意商业或者规模了。”

离开公司后有一个阶段，Jack 依然想开发一个社区，既包括内容，也提供工具，可以让用户创造自己的内容。这种想法来源于他对国内大型社交平台的不满，以及对备案、技术资质等等大环境的警惕。最终他止步于 demo (测试版)，既因为客观上的困难，也因为目标用户可以很容易翻墙使用国外类似的软件，后者的设计和环境其实很接近他心目中理想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想，一个线下的社区会是怎么运营的？

在这个时候，Jack 已经是一个父亲。他的女儿出生于 2013 年，在女儿出生之前，他就在思考教育这回事。“自己是怎么成长的、学习是怎么回事、动力从何而来，等等……”他是那种自由派：学历和文凭不重要，体制必须远离，在这样的前提下去观察现有的教育环境，他认为一无是处。

“就不说什么意识形态问题，质量问题或者小朋友开不开心的问题，哪怕这些都不提，你依然发现它也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所谓“对的”，在 Jack 看来，是可以教育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人应该拥有怎样的自我，在公共空间——也包括虚拟的公共空间——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从这个标准出发，Jack 不但极少发现能有共识的教育资源提供者，就连一些公共资源，比如说媒体，也觉得不堪信任。

“你看到过整个网络空间如何蓬勃发展，然后又看到它慢慢没有了，这个时候你才意识到：我们怎样才能提供给孩子一个既能发展、又不太会受到媒介限制的东西？”

简单来说，Jack 希望给他的以及更多的小孩创造一个更干净的世界——这是我的说法，他的说法是，“做得比一个负分的东西更好，这事儿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能想到他的表述会招致怎样的反馈，会有人觉得异想天开，会有人觉得傲慢，换个角度看，不管怎样，他要做的事其实也并非那么简单。

关键在于“工具箱”，技术上的能力让 Jack 可以让自己和家庭规避掉很多人不得不承受的压力，而信息上的视野让他明白自己该做什么。Jack 和太太试过很多东西，比如说教会组织里的育儿机构，比如不同的家庭学校。他们很快把各种家庭学校排除在外，因为“大部分还是在追求一个所谓的捷径，并不是去教育一个完整的人”。很显然，Jack 和太太不只是想让孩子不用高考而已。

后来他们发现，只能通过点对点的联系，只有靠自己才能逐步建立可信任的网络。有那么一阵子，Jack 的太太会开着车满广州找“合适”的家庭，线索来自于不同的小区论坛，或者别的在线社群，找到就约出来玩，合拍就建立长期联系，慢慢累积了一种自组织一样的群体。Jack 的女儿和一群固定的伙伴玩耍，不是同学，不是亲戚，也不是邻居，甚至不一定同龄，但是“合适”。出于什么都试试的角度，女儿也去公立学校上过一学期的课，后来就没再去了。

在和更多的孩子、家长接触之后，Jack 发现“共识”的稀缺。比如说游戏，让他惊讶的是，很多人对游戏的理解还停留在他小时候那种“洪水猛兽”的阶段。[推荐 Jack 来做接力的是静远](#)，他们是通过一个叫渡渡鸟的自然教育组织认识的。静远信任 Jack 对于教育的理解，彼此就建立了一些合作，既包括一些产品开发上的技术支持，也包括类似于工作坊（和很多人一起看杨德昌的《一一》然后写作）的活动。正因如此，Jack 开始在微信上和人深度聊天，在此之前，他是一个不怎么用微信的人。

Jack 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投身教育的人，教育只是他做事的切口，恰好可以把他对当

下的很多认知揉合到一起。比如他目前计划开发一款独立游戏，可以让家长和孩子一起玩。还计划开发一些数字工具，可以让代际交往变得更方便。他已经不再追求去做一个线上社区，“因为你发现大家对于技术和媒介如此钝感，（社区）基础会很薄弱。”即便在做产品，他也不再去思考规模，而只想实现针对具体的人的具体效用。

“更多去看人看他们的真实一面是什么，更深层次的需求是什么，你会想怎么让他发展，怎么让他实现理想，或者对很多人而言都没有到实现这一步，而是这个人不知道能不能有理想，怎么区分愿望和理想。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该追着所谓的需求去做产品，你会追求更深层次的东西。”

我把和 Jack 聊天过程里他的更多想法以口述形式整理如下，对于他为何会形成这样的教育观念，这些想法息息相关：

关于我对教育的讨论，其实是基于个人的现实需求出发。我把它叫做“完全指向个人的公共性”。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公共性很强的人。

我是 80 后，从那样一个时代过来，又是完全基于兴趣进入互联网行业。我们那个时候互联网一点都不热门，很新潮。早期的同事来自各行各业，很多都是凭兴趣自学来的，和现在的培训上岗完全不同，这样整个行业其实特别有趣。

我们理所当然认为，其实所有的教育是指向你这个人最后有个什么样的自我，以及在虚拟的公共社区，就是网络，你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

我看到过整个网络空间的蓬勃发展，又看见它慢慢没有了，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我们要怎么样给一个孩子一个“既能发展，又不会太受到媒介限制”的东西。跟别的家长交流，我很少碰到能敞开聊这些的人，聊作为一个人的成长路径。他们可能会跟你聊一些烦恼、教育手段，但对于教育目标或者过程，就没有什么人可以聊。

我在工作或者所谓创业过程中一直是有很大自主权的，但这种自主权和现实相比，又无法转化为多少主动性。因为一切讨论还是限制在一个非常巨大的框架下面。

(一个产品)在商业和规模上是要有追求的，对吧？以前我在那种繁荣的、往上的过程中，不太会考虑这个社会需要什么，因为虽然当时我们还算处在比较开放的互联网里面，每天还能够体会到一个向上的空间的各种好处，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一定要为这个东西去做什么谋划和打算。是的，所以我那时候拥有的自由度虽然很高，可以决定很多东西，但没有意识到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做什么，只是在追求公司的目标，成为繁荣的共同体的一份子。

后来的技术，即使刨除掉比较热的 AI、再早一点的比特币、Web3.0，哪怕刨除掉这些，技术上也是一直有新东西出现的。所以不是技术出现了问题，而是你肯定不能单纯做一个技术乐观派。2012 年以后，商业本身是虚弱的，或者得勾结很多东西，你会发现它不是多么强的力量，它不会必然导致什么发生，无论资本也好，技术也好，它们都不会导致什么发生。

所以，你原本依赖的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这个行业)感受其实很明显。比如说禁用语，最早是在游戏论坛和聊天室出现的，最早的文字审查就是出现在那里。

我看内容特别多，也特别早。不是说有一个公共事件会特别打动我，而是说这些公共事件我全部都记得。然后我会默认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所有的公共事件，大的小的，我不是突然有一天幡然醒悟的。当然，我知道从数据上来看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但另一方面我又感觉，至少所有行业的人都知道，至少像我一样在上网的人都应该知道。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尤其对于技术和资本，直到现在，我去接触很多新入行的、或者入行稍微晚一点的人，他们都还存在很多、很多幻想。我跟更多的人去接触，跟更年轻的人去对比，我才意识到这种失去是如此的明显。

有些人已经进入了后遗症状态：虽然立场跟你一样，但是起点跟你不一样。他知道丧失，但并不知道丧失之前发生了什么。这很奇怪，尤其是特别年轻的人。我的感觉是好像大家都没有了常识。他们都不记得那些事，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讨论的是我们十几年前讨论过的事情。

我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是真实的，它也确实是真实的，对吧？比如说我有相近的朋友，可以讨论事情。那时候网络是可以随便讨论事情的，对吧？你不会觉得你是独特的。虽然也不会天天说这些事情，但是大家会讨论社会议题，尤其广州的氛围，我最初还蛮喜欢的。这边靠近香港，我感受过香港那边更开眼界的氛围。

所以我一直会觉得我并不特别。后来好像也没过多久，好像大概 90 还是 95 那一代的人，我表弟他们这一代人，我发现这些话题我已经跟他们对不上话。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们是感知力强的人。

最初我不认为我需要站出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我只要做好分内的事——当然不是给自

己划个框，该做什么做什么，倒也不是那样——而是你会对自己提特别多的要求，你会觉得只要足够多的人像你这样，其实这个社会就已经 OK 了。所以没有“站出来做点啥”的意识。

现在我去接触更多的人，更年轻的人和不同行业的人，会发现这个社会很多地方完全停留在停留在窗口期前面的那个年代。大家对“媒介”的理解，对“多元”的理解，等等……跟你同龄的人，或者其实也就是比你小 5 到 10 岁的人，居然是停留在窗口期之前的，你会觉得一切退化得很明显。

我在(计算机)这个行业里面，也看到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以我其实在有意无意训练自己，不要依赖于任何一个公司，不要依赖于任何一个停滞不前的东西。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会说“一定要站在技术的一线，无论你怎么做管理”。其实是让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都知道一些、什么都能干”的状态，最终(做什么)只是取决于你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而不存在说你干不干得了——当然，这是理论上的——你还是有很多干不了。

所以我其实一直在准备着做点什么，发现了能做的东西，就可以去做，本质上没有什么能够制约我。最终我想，这个环境里面我能做什么。当然，行动空间会变小，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那种“行动力上的丧失”我是没感受到的，或者不那么直观。

后来我接触不同行业的人群，广义上的创新教育、公益或者是艺术，这个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做的准备是不错，但跟大家的共识也很重要。这跟我以前在创业公司里那种共识其实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走”，因为我有很多可以行动的事儿，对，超多事情可以做的。

Q: 你最近遇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人吗？

A: 很早我就对游戏引擎感兴趣，但是一直到和孩子一起做游戏的时候，才会具体地去看更细的东西，比如如何建模。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全球范围内已经发展出很完备的工具，就很兴奋，比如可视化建模这样的东西，然后 AI 现在又加进来。你会发现行动空间如此之大。

Q: 你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 把我们家重新收拾一下，按照一个公共空间的概念来整理。我之前提过一个自习室的概念，在没有外部条件的时候，家里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替代场所。这算是要解决的问题吗？

Q: 你想要推荐谁来接力？

A: 廖细雄。有个我们共同的朋友这样评价她：“如果你把这件事做一辈子，做到死，那你就是个圣人”。我不觉得她的事和方法都是我认同的，也不觉得教育是圣人之为，但她是我理解整个虚假的大环境里，比较“真”的那部份。



题图来自“重 D 音”乐队

专栏

083 A 鬼 这几年， 你的精神支持从哪儿来?

杨樱 | 接力访问

比如说有个乐队，那它是在为什么而唱歌？

A 鬼的 A 要大写。小写是给广东人看的，因为他们万事喜欢加一个“阿”。大写的话就不一样，大写是扑克牌里的 Ace，北京话里的“尖儿”，重庆话里的“冒”，普通话里的“一流、很棒、了不起”。这是搜索引擎跟我说的。A 鬼说，就是“很大”的意思。然后我们都同意，不管大写还是小写，这个称号会让名字排在微信通讯录的最上面，一般做销售的和打广告的都喜欢这么弄，醒目，好找。A 鬼不是为了这个。

A 鬼是湖南人，怀化的。他说这个地方好。跟贵州交界，赶集可以赶两次。比如说怀化赶初三、初八和十三，贵州那边是初五和初十。大家都是五天一次。两边都赶，生意可以做两遍。

A 鬼 2004 年到深圳，他在这地方做了许多事。一开始是打工，后来和朋友一起成立了摇滚乐队并担任主唱，参加深圳双年展，开过一家湖南粉店并使之成为工友信息周转中心。现在 A 鬼是个滴滴司机。[推荐他来接力访问的武老白说](#)，他佩服 A 鬼“在生活的缝隙中尽可能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边开车边聊音乐，还卖自己乐队的 CD”。聊天之前，我搜了 A 鬼所在的“重 D 音乐队”，有很多报道。标题都是，“工人用歌声让生活更有尊严”，“珠三角流水线上孤独的音符”，“与音乐共振，只为拥有生活”，等等。聊完之后我发现，A 鬼摇滚的是他整个儿生活，不光是音乐。

但 A 鬼的摇滚劲头确实得从音乐说起。2008 年那会儿，他在深圳工友书屋参加了一个吉他班，不要钱，老师叫董军，董军的妻子黄小娜当时在工友书屋实习，后来也加入了吉他班。这就是“重 D 音”最核心的三个成员。在乐队 2011 年正式成立之前，吉他班一度有 20 多个成员，但赶上金融危机，工厂倒闭，工人维权，最后人变得越来越少。工友书屋的另一个好处，是还开设劳动法学习班，A 鬼就是在那学到了如何合法拿

到自己的工资。

乐队给了 A 鬼稳定感，在这之前他觉得自己是麻木的三点一线流水线工人。那会儿他在印刷厂上班，工资按件算，他最珍惜的就是每月四天假，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去找乐队那几个人，和他们待在一块儿，哪儿也不去。不过就算这样，工厂还常常多占他几天假期。后来他的人生目标就调整为，得找一个一周工作五天，一天八小时的工作。

他的运气不错，不仅人生目标得到了满足，精神世界也得到了拯救。这两件事差不多是前后脚发生的。2009 年，A 鬼去参加了北京工友之家办的第二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新工人”是“工友之家”对自己流动人口身份的命名。那次艺术节和后来的“打工春晚”一样，都是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孙恒和“工友之家”主创王德志的策划，目的就是让工友用自己的方式说自己想说的话。认识这群人让乐队找到了方向——如果不是这样，他原本的想象就是自己可以去做一个酒吧驻唱歌手——董军后来写了《这年头不好混》，成为“重 D 音”的代表作之一。

后来 A 鬼离开印刷厂，去了一家美资玩具厂，工作是戴着“像《反恐精英》一样的”防毒面具全副武装给玩具喷油，8 小时工作之外人身自由，规则清晰，请假容易，每周五只工作上半天。刚进厂的时候，A 鬼留长发，公司说没意见，他自己喜欢就好。就凭这一句话，A 鬼说，“我决定干到它倒闭”。那会儿“重 D 音”已经开始全国巡演，他们总在周五下午出发。他们也参加每一届“打工春晚”，每次都带着自己的原创。

工人乐队在深圳其实并不罕见，但因为流动性和其他原因，持续下来的并不多。之前还有来自富士康的“五角星”乐队和“重 D 音”一起存在，一度只剩下了“重 D 音”，直到“五角星”2023 年重新复出。

A 鬼没有干到玩具厂倒闭，他后来开了一个粉店。粉店是 2019 年开的，之前两年，他主要在做乐队，还参加了深圳双年展，在草埔地铁站的一个展厅里展出工人的故事，包括工人音乐、关于工人的摄影，还有工伤。他在那里认识了满宇，湖南老乡，一个后来对他的精神世界支持很多的人。还有武老白。

粉店第一年生意特别好。店面是从老乡手里接过来的，在横岗城中村里，有烟火气，很多老乡都住在附近。“接过来之后我就不仅仅想做生意，更想让大家周末一块在店里聊聊天。总有人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比如家里着急回去要找车的，比如要换工作的，这样信息有一个共享的地方。”

“当时那个店承载的作用就是为我们那边的湖南老乡提供这么一个空间。都是说家乡话的，在那个空间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为什么用‘温暖’这个词，和我出来时间比较长有关系。我 04 年来，头五年没啥感觉，一点都不想家，但久了之后你就越发想回到那个地方。”A 鬼说。

A 鬼又说：“以前觉得深圳钱很好挣，遍地是黄金，随便干个工作都比在家强。但是你出来很多年之后，希望是破灭的，是骗人的。你明白真相之后，你就开始想着怎样能在深圳让自己更有归属感了。那就是那个粉店承载的作用。”

粉从湖南老家寄过来。有人因为 A 鬼去粉店，有人因为“重 D 音”去粉店，但也有人因为粉店知道“重 D 音”。可以搜到一个简笔笔记，撰写人认识 A 鬼但没有那么熟，她带着孩子去吃粉，看到粉店一角有张书桌，CD 音响和几本书堆在书上。书桌的墙面上方有粉店的菜单，很艺术地用高低错落的竹排竖着陈列，周围是几张照片和一张黑胶。手工粉 10 块钱，炒粉 12 块钱。还有米酒和杨梅酒。另一面墙上，“重 D 音”巡演的照片几乎排满。

A 鬼一个人做粉店，每周二乐队排练就闭店。做餐饮起早贪黑，他又是一个人，生意一直不错，他忙得停不下来，觉得自己这么干下去迟早有天会猝死。后来疫情到来。最严重的时候，城中村封闭，不是社区里的人无法进出。一切都冷清下来。

“走了很多人，我们社区有个餐饮群，你每天都能在群里看到有转让东西的，几百家店铺，每天都有人转让，有的转让费都不用，卖点桌椅就想离开深圳。”

“其实我觉得很多这种干小餐饮的都是出来工作很多年，挣了一点钱，就想自己做点小生意，跳出工厂的环境。事实上你没有跳出来，可能觉得做生意不错，实际干了以后就觉得还不如厂里面。和很多对疫情解封抱有幻想的生意人一样，A 鬼总觉得快解封了，借了网贷去交房租。

最终粉店在 2021 年关门。

实体空间不存在了，粉店还有个虚拟“遗产”：一个微信群。群原本是信息共享用的，人数上限 500，始终维持满人状态，有人出去马上就有人加进来。做企业的老乡在里面找临时工，没工作的老乡在里面问工作，还有做过某一行的会告诉大家哪家厂是坑哪家厂还不错。

“所以我当时知道很多老板之前干得不错，比如横岗最多的就是眼镜加工，那两年到了很多。做镜架的老板来聊天，之前都带个茶叶来，后来说自己也不行了，也得去打工了。”A 鬼说，很多离开深圳的工人都去了浙江和江苏，那边工厂还有活，而且房租吃饭便宜，但工资也要低一点。大家都知道家回不去了，因为生活习惯已经改变，地也没得种了，而且确实还得继续赚钱。

粉店还没有正式关闭的时候，“重 D 音”去华侨城演出。A 鬼再次见到了在那里做展览的满宇。他挺感动：“这么多年没见，大家做事的方向一点都没变，只是方式不一样。”他带着酒和粉过去，现场做，和朋友们一聊就聊到深夜。

2022 年 5 月，A 鬼开始跑滴滴。服务业，绿码一天一检，出车之前没有上传就出不了车。有的时候出去了，街上也没人，所有的地方都封了。最久的时候，他连续半个月待在家里。

后来他去广州找朋友们，碰到坚果兄弟在筹划 **重金属乡村巡演**，正在找全国巡演的乐队。A 鬼“一下子就答应了”。他没带着“重 D 音”，而是和西三乐队的蔡所临时组了一个乐队，叫“土壤改良”。

关于土壤改良这个名字的来历是这样的：当时 A 鬼和朋友们住在广州西三村对面是广州大铜钱“瑰丽大厦”。“大铜钱”每到晚上 7 点都会准时开灯，楼面闪动着巨大的广告，其中有一则化肥广告，“土壤改良”四个字在广告词里反复滚动，每天至少半个小时之久。于是大家说，我们不是做重金属污染吗，就叫“土壤改良”吧，几千万的广告费都不用出了。

第一站坚果和“土壤改良”去了广东阳春，这里铜泥污染，村里拿被污染的泥烧出来的砖盖房，砖块在晚上发出绿光，村民生病，法律诉讼迟迟没有解决问题。按照原计划，大家到现场会写一首歌，邀请当地村民来看表演。实际上在 A 鬼他们入住酒店之后，正准备出发，酒店被警车、防疫车和救护车包围了，各种部门和组织的人涌进标间，告知他们：如果出门演出，就要被就地隔离 14 天。

“我们就临时说，那我们在床上演。那个视频就是这么出来的，叫‘床上运动’，因为想起来列侬和大野洋子。没想到做了以后反响特别大，这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A 鬼说。演出完毕，一行人被“护送”到高铁站，庞大的队伍一直看着他们坐上高铁。

下一站是湖南娄底。A 鬼知道娄底有煤矿，但不知道煤矿污染的影响力。“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在收稻。你看那稻子长得很好，但是里面没有米，全是空壳。”

娄底之后是昆明，从香格里拉再往上走，3500 米海拔以上的地方，铅污染严重超标。坚果兄弟的“重金属污染巡演 2021”一共有两支乐队，分别负责南方和北方，北方的叫“老头乐”，南方的是“土壤改良”。A 鬼从香格里拉回到昆明，又从昆明到了上海，和朋友做了一次现场表演。

“所以不做店之后，我就是靠这个项目把整个人从非常低谷的状态里拉出来。没有这几个项目，我可能就抑郁了。”

“重 D 音”已经极少有演出了。也就在这个时候，A 鬼他们在重 D 音工人乐队去掉了工人二字，正式改名“重 D 音”，为的是“少惹麻烦”。即便这样，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也常常被拉闸。本来要办的 10 周年纪念活动也没能办成。如果没有和朋友们一起“做项目”，A 鬼就得一个人在家待着。

2021 年底，A 鬼和武老白做“无人认领”。他的虚拟资产粉店微信群发挥了作用。他在群里召集老乡，问谁要搭免费大巴一起回家过年。这辆大巴有点特殊，上面有一块亚克力板，板上有 2000 多个在深圳因为不明原因去世的打工人。一起回乡的人要叠一些纸钱，中途找个地方烧给逝者，烧的时候得挨个叫亚克力板上的名字，“叫他们回家”。

有些人认为过年是喜庆事，做这个不吉利，但大多数人表示了理解。一天之后，报名满了。车从深圳横岗走到了湖南。武老白、郑宏彬和 A 鬼住进酒店，那边也已经“等候多时”。大家去派出所做了笔录。A 鬼记得那天是年二十八。出了派出所，大家各自回家过年。

A 鬼后来再遇到武老白，跟他讲了一件事。

“我有个朋友，跟我一块住了很多年，他在北方做乐队。那年回贵州过年的时候，在路上去世了。当时我刚做完那个项目。”A 鬼说：“咱也不信那个东西，但是做完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做了这么一个梦。梦里我朋友一直冲着我笑。就感觉他挺认可我们的，算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我觉得。”

A 鬼还说，如果那段时间没有这个项目，他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现在 A 鬼每天出车 10 个小时，早出早收工，晚出晚收工。他租了一辆新能源车，在车上贴一个卖乐队专辑的招贴。有乘客上车愿意聊就聊起来：“和乘客聊天的过程很重要，就是听别人的故事，然后把它变成歌词。我觉得这也是我创作的一个途径，一个来源。我记录了别人的故事。”

“重 D 音”从 2023 年 5 月就不排练了，除非有演出，就赶在演出前排一下。大家都

得忙活生计。在所有成员里，A 鬼一人吃饱全家不愁，其他人都有各自的压力。不过排练房还租着，大家平摊租金。

发稿之前我看 A 鬼朋友圈，“重 D 音”在原鼓 Live 演出。A 鬼穿一件白衬衫，头发还是很长。背景板上的中文写着“重 D 音乐队”，底下有一排英文，“Power Base D Worker Band”。Worker 还在。

Q: 最近觉得什么比较有意思？

A: 我觉得做项目才有意思，不做一点意思都没有。

Q: 最近有什么想解决的问题？

A: 我就想重 D 音的 10 周年能不能给它做了。我当时对 10 周年的憧憬还挺大的。因为那么多朋友，每到一个地方的朋友都会问你们 10 周年什么时候搞，我没做项目之前，去找朋友们的时候就跟他们都说了，所有认识的人我都说了，但现在还一直没消息。这是我的心病。

而且我当时不仅仅希望只有重 D 音在，我希望比如和坚果、老白或者宏彬，和大家身边的这些艺术家合作，把它弄成一个艺术节，有画展，有艺术展，一个工人乐队加艺术家的现场，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重 D 音 10 周年音乐会。当然了，我当时畅想得可美。

Q: 你希望找谁来接力？

A: 西三乐队的蔡所，一个沉迷于实践性音乐现场的画家。



专栏

084 牟昌非 当一个人在城市里 想留又留不下的时候

杨樱 | 接力访问

一场包含了大量农村现实的艺术实践，
和一个人对自身处境的考量。

我本来是要和牟昌非聊他的“乡村戏剧节”的。[提名他做接力访问的怡宁说](#)，很想知道这么多年是怎么做下来的。当时我说，作为一个在自己长大的村里做戏剧节的人，我更想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在一群知根知底，更重要的是和你父母知根知底的人面前做一件极其文艺的事情，这事放我身上我不太能想得出来。至于怎么做，我想一个人既然想做，就会知道怎么做。

结果真的和牟昌非聊起来的时候，既没有从“怎么做”开始，也没有从“为什么要做”开始。后面这个问题我们后来聊开了一一不可能不聊——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聊报道他的人。我能找到的“乡村戏剧节”报道都很官方，这让我一下子“看不到”牟昌非的样子，至少不敢全信自己读到的东西。所以，我们的聊天就从他这么一个人，为何需要官方媒体背书开始。

“为了不让它被当场掐死。”牟昌非说。他很直接，我后来在整理录音的时候重新感受到了这种直接。这种直接带着很清晰的逻辑。

牟昌非是 2016 年开始做戏剧节的。他有自己的智慧。十一国庆开始做戏剧节，卡在之前两三天发公众号推文，这样万一有什么官方反应，戏剧节也趁着时间差做完。媒体很快就报道了，而让他去补办手续的人要到年底才来，那时候报道的媒体就更多了，“乡村戏剧节”已经成为了一个既定存在，有了名气，不好被随便“掐死”。

牟昌非说了 2 个多小时，接近独白，就好像他事先排练过一场关于乡村戏剧节的演讲。他有一个语言习惯，叫“后来我想”，日常反思可能对于他这种出口成章有极大帮助；另一个反复提到的是自己的人生处境，“无法留在城市，也无法久居乡村”，可以说，这是“乡

村戏剧节”诞生的契机。

但是“后来我想”，那些看起来水到渠成的事情，发生之前不知道有多少细小的抉择和波动的情绪，虽然牟昌非不谈，但是看得出来，日常的反思让他和各种事物的接触都带着道德自觉：什么是边界，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平等。

在采访他之前，我看一篇很长的公号，[内容是他和别人的争论](#)，还交给了第三方评判。争议的核心是一个去村里的朋友是否能买村里老人的一块木雕。事情本身不重要——且复述起来很不简洁——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这次购买行为里的道德审视。当时觉得有意思，因为花这么大力气“计较”原则问题的人实在不是太多。

“乡村戏剧节”于牟昌非而言，既非工作、也非事业，更谈不上靠它赚钱和博名（比如说，参与某个当代艺术评奖之类），可能自己还得往里面搭一点。这个戏剧节和牟昌非一样，是游走在村和城之间的存在。可以说，有牟昌非这么一个人，才会有这种混合气质的戏剧节，而它的存在，对牟昌非本人的意义可能比对任何人的都大。

在发稿之前，牟昌非在公号里发布了[第十六回乡村戏剧节的招募](#)。时间还是定在 2024 年五一节。地点：山东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牟家院村。除了九大演出场地的介绍，还罗列了参演人员的伙食：大饼卷鸡蛋，卷葱卷蒜抹大酱，蚂蚱酱。

还有个汤，叫“打辣酱”。牟昌非写：中国北方牟家院村饮食汤类之一，用干狗光鱼，姜末，潍北干辣椒，葱花，粉条，香菜，面粉加水。文火熬制，又辣又腥又鲜又香，大汗淋漓，不亦快哉。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食谱描述让我想起他说话的样子。

公号推文最后，是所有采访过“乡村戏剧节”的媒体报道列表。[好奇心日报](#)也在其中，但我回想了一下，那篇报道并没有那么关心这个人，和所有的报道一样，它把事情弄清楚，就走了。但是人不清楚，事情也不会清楚。不过当时还在事件热头上，事隔多年，再和牟昌非聊他、聊他做的事情，可能更清楚了。

以下是牟昌非的口述，除了办戏剧节的初衷，他更多在解剖他自己。



有钱没钱我都会办，就算只来一个人我也会办。现在镇上放映，只要不是龙标的，任何片子都不能放。但是我又不能不放，如果按这个要求的话，这个节就连办都不用办，完全不需要办，按他们的说法，戏剧节就演地方戏，他们希望这是一个城市成功的青年返乡回馈老乡，给村里带来这种传统戏曲娱乐的事。

田野里的戏不行。他们认为田野土地是脏的、不卫生的，不符合现在新农村这种整洁的面貌。这和我的初衷是截然相悖的。我们村和那种旅游村完全不是一类。我们村还有一个小学，还算是周边村的一个大村，2000 年左右撤校并点，周边村都并到我们小学来上学。到了今年升学，我一问他们的在校生多少，去年还能到 120，今年成了 80 个，还是 3 个村。这种村小可能用不了三五年，就非常正当地取缔了，因为已经没有多少生源。村里年轻人几乎没有，都拼了命地要进城买房子，现在我们这边的政策是，你在区里没有房产，孩子不能上区里上学。

戏剧节今年正好是第八年，在我这儿，时间刻度感没有这么明确。我从小在这个村长大，整天贪玩，父母忙于赚钱种地弄大棚，顾不上孩子。放养反而让我和我哥和自然接触比较多，也知道自己的兴趣点真的在哪儿，不用理会社会上怎么样，那套紧箍咒很难戴到我头上。上学的时候我们那的小学就开始撤点并校，到初中往上不到两年学校又撤，后来大学到了烟台，没毕业就跑了，去北京，因为从小喜欢书画、写毛笔字，觉得怎么也得从事一点和自己爱好相关的，就一直在漩涡里转，自己闷头写。

后来从北京回来，家里一看你从北京回来了，你快认怂，快找个地方上班。一个亲戚给我联系了银行押钞，一押押了好几年。这种工作很懒散，上班其实是下班状态，所以我就把上班当做一个玩，下班排得非常满。搞活动，由着兴趣来，什么创意市集，组织摊位，真人图书馆，反正看看新闻你有啥点子就一一张罗，大家报名一起玩一玩。后来觉得，

像戏剧节的练手，像把很多活动都汇集到了戏剧节里。

那段时间我其实已经看到了，虽然在城市工作，但是我在城市留下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首先工资就很少，不用说买房置业，日常的工资还房贷都还不上，何况买房对我来说比较遥远，难度比较大。但是回村又不现实，因为从小家长各种鼓励你，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都知道乡村这种处境，但凡有点希望就不要在村里。当家长这么说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失败者的位置，你也从小默认了这一点。

前几年的时候，家里种玉米、小麦，再种点果树。那时候流行种果树，就弄了梨园，5亩，将近500棵，当时也是梨树管理成本相对玉米小麦低一点，省事一点。头几年还不错，一年毛利也有一两万块钱，比（种）玉米小麦多。但自己干活不算工钱，就把化肥农药套袋这些明确费用算进去，稍有盈余。

那几年梨树春天开花的时候，我还领着朋友去看看花，到了秋天摘个果，我觉得还挺好。你看老人在村里，我哥哥也在区里打工，自己在城市留下了。老人家年龄还可以，身体还不错，有这么个梨园。我在城市虽然留不下，但是感觉彼此都相安无事，不至于过于牵挂。

在城市留不下的时候，我就开始找退路了，因为知道留不下。就开始关注国内一些人，比如碧山村，媒体上有。看来看去我觉得和我也没什么关系。就是一帮明星去了一个贫瘠村子，就像“一条”里那种，谁放弃了2000万年薪去种山里红，就这种叙事。我觉得和我没关系。

那时候碧山有个杂志，发行量不大，我偶尔看到了其中一篇文章。当时北京有个纪录片导演叫吴文光，做口述。**就是三年饥荒的口述历史影像**。我一看这个事，光山东和潍坊就好几个人跟着吴文光一起做，好几个片子都已经出来了，还经常放映。

我看这个事很简单，无非就是找个拍摄设备，回到自己村拍一拍。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当时月工资不够，当时从来没超过3000块——已经不在押钞了，去了潍坊当地一个美术馆，做布展。我用了两个月的工资买了DV，直接杀回村里，周六周日就去拍。

我先找60岁以上老人拍。回了村，行李不放家，直接上户里去。我初中就住校，你以为很熟悉的乡亲，平时叫大爷奶奶什么的，其实非常陌生。但是我一敲门，说大爷我是那谁的孙子，就报我爷爷的名字，他就会说来来，你有什么事，我无话不谈。就这么一扇门一扇门去敲。

就这样找了将近100个老人，在我感兴趣的这三年里。一开始我还真的拿那三年去靠每个人的个体经验，后来发现这个方法有点愚蠢。有时候你套不上。后来我放弃了设置好的问题，就跟他们聊天，想聊什么聊什么，有时候聊到DV都没电了，天也黑了，太阳也下去了，他们就那样对着我说，我也这么听着他们说。我发现人和人这么面对面聊天的时候，你就完全沉浸在在里面了。他们讲的东西，又陌生又荒诞，但是个人亲历，感觉每个人在那几年里，在大跃进之类无休止的运动里都非常荒诞。那些事其实就像把一些人强力驱赶到一个设置里，谁也挣脱不开，只能配合，不问结果，就像蚂蚁被狗尾巴草穿进脖子，在挣脱不开的情况下，你其实有意无意接受了任何的结果。个体的灾难，无休止的灾难都是被设置好的。我就发现，这么弄下去，我成了谁了？就是这些苦难，他们现在自己讲起来也觉得当时很可笑，这么单向度向你倾诉的时候，你是接不住这些话题的。你接不住。一个人经历过那个时代，以一种很超然的、像自己完全没有参与过的态度去讲，像在讲一个遥远的笑话。而你不知道这些，没有经历过，本身完全是作为一个小兴趣、小话题这么去聊。他们可能太缺倾听者，自己的孩子也很难这么去坐下来，一对一地去聊，有时候说说还容易被孩子说你太唠叨了，成天这么陈芝麻烂谷子的。

他们每个人都像《二手时间》里的那种。一个人，把事儿只告诉了你，而你又接不住这个事儿，要把这些事儿散布出去，你又做不到。它是一个个很具体的、很个体化的、很真实的事儿，同时这些个人又在集体之中，又模糊、又清晰。

这种撕扯的感觉我就受不了了。在我奶奶去世的那一年，2014年，我终止了这个事情。到现在在这批影像我还放着。有好朋友提意见，说你可以整理出来一批，像吴文光的学生一样。但是这些年以来，我访问的人很多已经去世了。你知道特殊年代还有一些人和人的纠纷，你已经不能去征求那些人的同意，或者就连征求同意本身，在我看来都是不对等的。所以我就没整理、没发布。只有他们的后人，知道我拍过一些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具体拍了谁他们也不清楚，只是偶尔回家听老人说起——在老人去世之后会来问我。我也在听说谁去世之后，把自己拍过的影像尽量用网盘发给他们，作为一个留念。

所以我感觉我退回乡村的这条路没有走通，反而给自己增加了难度。这事儿像大石头一样压着我。

那几年我又不上班了，从美术馆里出来了。因为一天中午临时闭馆，要清场，进来一

个大爷。他说，你们这个地方还挺大，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美术馆。大爷你在哪住？大爷说，我就住后边儿。我觉得你们这个地方高大上，不敢往里进。

就是这个事拍了我一下。你说美术馆，这种传播美育的地方，一个在边上住了一辈子的老人，只是因为偶然来找孙子才误入了这个馆。我后来想，确实，我们平时这种独立策展工作，也就是艺术家走秀，市场画廊来卖画。还有官方的一些展览，有时候观众不够还需要从周边小学临时拉来一帮观众，因为开幕式上站的领导多了，下面观众太少了，就需要调几个过来好看。

大爷这么一说，我就感觉这些年我一直做的其实和我理解的艺术是不相关的，而且我已经进入了一个很强的设置里面，反而离我想要的更远了。你觉得你在管理、做事，做幕后工作，在自己喜欢的小空间里成天挂画，但观众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欣赏状态了。以前美术馆的朋友，一旦彼此转成了雇佣关系，也非常别扭。你闲着他就觉得不行，得安排活儿。我就直接不上班了，不上班也饿不死，自己去找个工作室，自己说了算，是吧？

于是就看中了一个快要开不下去的咖啡馆，加了点转让费，也不用装修，就迅速转过来了。这个工作室弄了5年。我就写字、篆刻，保证有流水付房租和日常开销，就还可以，起码自由。一个人自由之后还赚不到钱，那可能是因为懒惰，我是这么看的。

这样以后我就想，回去更不可行了，同龄人都出来了，你回去干什么？那些回村的人去做个什么，更像是一个成功者在村里寻找反馈，他们不是真实生活在村里，回馈一点，显得人更高尚一点，成了这么一个事。乡村是被回避掉的。

我就感觉回去这个事怎么都失败，怎么去涂抹都不行。正好“口述历史”停了，我就开始思考梨园。

梨园那时候收入已经不行了。原来村里十多户种梨，陆续都砍了，地承包出去种玉米什么的，还能赚个承包钱。我父母原本在中秋节那会儿，梨快要落的时候会叫我回去，以前果贩会开车过来，拉走一部分，一开始量大来得多，后来种梨的人少了，果贩也不来了，所以得自己找梨贩。5亩地，梨同时下来上万斤，不耐运输，又不能长期放，必须几天内卖出去。所以梨贩哪怕来了也杀价，不杀价人家就不要了，你只能认怂。一年辛苦，一万元还不到一万块钱。5亩地，不到3万斤，最后算下来都是赔本的。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他们是怎么做下来的，反正很多人用脚投票，进城打工去了，我父母还在做这个事。

一到中秋节，我就得回家骑着三轮车到周边村卖梨。平时他们一块多一斤，我一块就卖，卖完好进城。卖梨成了一个悬在我头上的事儿。本来我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我不混下去找我的办法，梨园这事儿又把我拖回去了。

我发现这事我躲不开。只有把这事解决掉才会安稳做自己的事。这时候乌镇做了戏剧节，还做得这么大。你看潍坊青年要看话剧，都得去济南、青岛，或者北上广。直到2014年左右潍坊才有了保利大剧院，孟京辉他们才开始过来演。那时候就看《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什么的。你会隐隐看到城市青年的这种生活方式，工作之外的消遣，看个话剧啊，听个音乐啊。那时候傅聪来潍坊开音乐会，一张票才20块钱。我看太便宜了，买了近10张送人。现场还是没有多少人。那时候你就知道潍坊有了新的东西，原来你觉得遥远的东西开始出现了。

我想乌镇可以办企业，还可以办戏剧，我这梨园要是真的找几个梨园子弟，反正都是卖梨，会不会卖得更好？但这事得让我有主动性。我对戏剧不了解，只知道这是城市年轻人的流行，虽然看不懂，但我知道戏剧是新潮的，戏曲是偏老龄化的、陈旧的。乡村的经验和城市的经验混合之后，我脑子里好像有两个人一直在打架，彼此不相让。后来我觉得镇都能做——在我心目中镇就比村高一级，镇上面是区，区上面是市——我更敢做了，做失败了我无所谓啊，在我看来怎么都不会做坏。

我还想到不能叫“农村”，阶级属性太明显，大家对“农村”有偏见，那种素质低的想象。很熟的朋友，有意无意“农村人素质就那样”，我听了就非常不舒服，虽然他们说的不是我，但你知道人的偏见真的会内化。所以我用了“乡村”，更唯美，没有那种城乡对立，能缓解城乡的关系。



还是从梨园来做，一年两回，春种秋收。我的设置是，戏剧节分两项，一块戏曲，一块话剧。戏曲就是村里常看的京剧、吕剧、梆子戏，老百姓愿意看的，在广场演。话剧是为了拉城市里的年轻人或者村里的年轻人。就粗略这么分。还有一个板块，纪录片单元。就这么弄了第一回，当时不叫“回”，叫“届”。那天因为没看天气预报，下了雨，反而增加了在梨园里的效果。很多人躲在树下、爬到树上来看，地里演的戏后来不得不转到村里的一家大饭店，纪录片也在那里放。弄了一天，挺兴奋，想秋天接着弄。这时候有本地媒体开始报这个事，秋天的时候《澎湃新闻》就来了，引起了更多关注，有朋友就问我需要什么，我支持你一点，完也想参与，他们就出了一些青年剧团的差旅费用。就这样连续两年，从广州到香港，从东北到宁夏，还有北上广的，呼呼地都来了。村里也热闹，周围村的地方戏也来演，村民自己组的小团，唱歌跳舞的也来。外面来的团体会探索村里的各种空间。

后来我想这个事，更像是一个问题中的人回到了问题本身。我自身是从乡村出去的，看似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其实只是城乡二元对立导致我被动出去的，我没有选择。不对等导致只能单向流动。当然这个问题也很难找到出口。我其实是遇到了困难、痛苦，被现实打回原形，又不得不回到问题中心，只是我迟迟没有去面对而已。我发现我越绕，越拧巴，这根线扯得越紧，最后还是得回去。

2016年秋天有一个剧，是广州肢觉剧场演出的，叫《荒——致大地上的无名者》。那年秋天的主题是“荒”，取“田园将芜胡不归”之意。他们提前送了一个本子过来。我本来抱着不干预，你们来演，自己找场地，我给他们设置了几个剧场，比如说，有老百姓挖土盖房，后来《土地法》拉了红线，只能从自己的口粮地里取土，村里就经常出现突兀的大坑，我就把这种叫“下沉式剧场”。真的下沉。还见过各种打麦场，大家收麦子之后晾晒的地方，随着机械化这种空间都没用了，长出了野草，这就是村里的地理形态。



《荒——致大地上的无名者》
演出现场

剧团在这里驻地一周，排练非常有热情。正好是玉米秋收的时候，他们选了一块玉米地。还有两天就要演出的时候，说坏了，那个场地被人用了。我一问，是村里有人借村里一笔钱，还不上了，就用他的机器给村里耕地还账。地刨了就软了，一踩就陷进到里面去，排练就被打破了。他们问，怎么办？

我就领他们村里转转，领到村口一个大麦场，我们叫“场院”。我说我对这个地方感兴趣。这地方乍看全是乱草，有老人种点豆子，也跟乱草差不多。为什么我感兴趣，因为这个地方以前夏天干旱，是老人祈雨的地方。弄上桌子，摆上贡品，一起围着唱一唱。完了以后烧纸，桌上的点心就会分给小孩吃。我就很感兴趣，因为有点心吃。但是后来没人再弄这个东西了。年轻人不信，年纪大的也不弄了。

剧团听我说，问我还能找到当时的老人吗。找到一个。剧团很兴奋，还把老人的歌录下来，又找了村里会点文艺的老人，听他们谈一谈，唱一唱，还邀请他们到时候去看演出。到了那一天，他们演一个默剧，没声音，就把村里人的生活动作化到他们的演出里。剧讲了一个故事，“土地上长了一棵树，树生了一批人，人在土地上生活、繁衍生息，小孩从出生到长大。他们靠天吃饭，突然天不下雨了”——他们就把当时的祈雨仪式演出来了。

当时打麦场四周站满了人。因为那天有集。我凑着集安排戏剧节，摆摊的和演戏的就会有交流。但我也没见过这么多人。他们跪在地上祈雨的时候，音响师就把前几天录的老人的祈雨歌放出来了，旁边老人一听，这太熟悉了，于是就跟着唱起来跳起来了。

就这一瞬间，我觉得这个事成了。真的，我又回到了童年，人们还相信他们那一套，相信祷告是有用的……就凭这个一瞬间，我觉得这个事有人看没人看，做成什么样，在我来说都无所谓，我肯定会做下去。

我们村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地方，基础设施都没有，各方面都不属于优选之列。后来朋友说很难支持了，因为我不收门票，商业注入也很难，村里也没年轻人了，所以费用慢慢没有了。很多人觉得这个节目要垮了。恰恰我认为，如果一直有费用在支持，可能短时

间内规模会越来越大，但从我们村的现实处境来说，又不可能产生持续的商业点，所以费用迟早会断的。如果各种设施都很完备，我只是做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又和我的真实处境相悖。所以费用的来去，在我看来是必然的，我更得把事情做下去：这种逆不是为了逆而逆，而是在我真的朝向去解决自己痛苦的时候，你的行为被大家说是逆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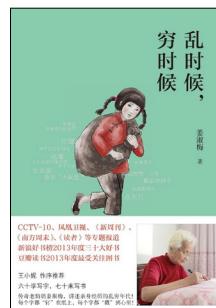
所以我就跟来表演的人说，差旅没有了，大家可以自己选择来或者不来。很多人说路费不是问题，让我不要担心。我就尽量在村里提供吃住，更像一个互助，人来了，吃在家里吃，老人和朋友帮忙；住都是去农户家里，按性别分开，农户腾出一个屋来。多的时候有上百人，分到村里50多户。

慢慢地到了疫情，我觉得还得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还有空间。外省的不能来，我就邀请做线上，哪怕是论坛、工作坊、讲座都可以。本地的还能流动。后来实在不行，就停了一回。后边继续做。谁也不知道一下子就过了三年。

2020年，武汉封城，我一看这个事很容易就被搞成一个很顺手的事，一下子全部封，顺手这么一来，全国都很方便。我看不行，我得撤。11月我就把工作室转让了，全部搬回村里。也恰恰是我回去了，否则后面真的很难看，转都转不出去。

我回到了亲密关系之中。其实之前偶尔回去，很多问题不会暴露出来，等我住回家里，我就发现父母怎么整天为日常争吵，问题会从一些小事的缝隙里溢出来，在整个日常里弥漫开来，我一开始还试图讲理，后来发现无解，我就只能用我的办法。我说妈妈你可以看点书——我希望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我就给她看了杨本芬。

我认为杨本芬已经不是素人写作了，她的文学水平已经很高了。结果她看不进去。余秀华也看不进去，她觉得用词造句不是他们能用的话语。我又给她看了姜淑梅，书叫《穷时候乱时候》，更口语化，像讲故事一样。她看了两本，说这个也能写书？我也可以！我的故事比她精彩！这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一看她想写，我说抓紧写，弄个小本，把你想到的题目都列出来，能长则长，能短则短。



一开始还煞有介事这么记在本子上，一开始还是象征性地去做，但是我观察几下，发现不对劲，好像不是这么应付的，晚上她也挑着头灯在那写。当她真的去回忆的时候，好多事都挤着要冲出来。

我发现这个事有点闯祸了，这个事了不得。她已经不再随便讲个故事，而是晚上不睡觉，闷着个头在屋里挑着灯这么去写。

过年的时候，我和我妈回姥姥家，我姥姥姥爷都去世了。我把一个老相框拿下来，拿到我舅家，让大家按照各家的都分一分。突然一张照片，上面的人我不认识。我母亲在那已经绷不住了。我母亲是家里第一个孩子。那是她一周岁，爸爸妈妈抱着她，在潍坊市里（离村好几十里路）照了一张周岁照。

我妈妈当时在娘家的家庭生活非常好。挨饿的时候，她能吃饼干——在村里不可想象——因为我姥姥家做点小买卖，和村里种地的收入不一样。她是1958年出生的。因为家里缺劳力，就念到初中，再说我姥爷有点重男轻女，不让她读书了。她其实非常委屈，到现在说这个事还非常生气。后来嫁到村里，这辈子都在种地生孩子。我还属于超生的，罚了2500，本来家里就没什么收入，夫妻关系也不是很好。

所以她一看到这张照片，想到小时候那么受宠爱，真的——我后来想起杨万里的一首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我母亲的故事就是这样。她后来小本本不用了，直接用挂历，白的，很大。村里人家不用的也要过来了，断断续续写了俩月。一共13万字，我给发到我的公众号上。她说写完之后一块石头落地，本来60多年的事情一直没有忘，等写完了，都忘掉了。人重生一次。

我没回村之前，好多朋友鼓动我，说你回村里开个图书馆。我不缺书，村里也不缺房子，无非就是要把书运回去，定期开门。但我一直没有做，因为我觉得让我去村里守着，就是把我拴住了。这事永远做不了。

等我母亲的 13 万字发出来以后，一个朋友，在潍坊做女童保护的萤火虫公益助学中心郑凤鸣，她本想鼓动我在村里做个乡村图书馆，说这回找到馆长了。我说是谁。她说就是你妈妈。我一想，确实。



萤火虫图书馆是去年五一开的，完全靠社会捐赠，租了我家后邻的一个南屋，有个 30 平米。有月捐人制度来支持房租和馆长的基本补贴。保证定期开门。我后来觉得，现在很多图书馆、乡村书屋都在村委里，不可能开放，所以必须独立出来。老百姓不可能去村委看书。然后图书配送，你得有固定藏书，还得不定期更新。第三就是要固定开门。这三点做不到，乡村图书馆在哪里都不能落地。

萤火虫图书馆主要是针对孩子，书都是城里家庭赠来的绘本。有将近上千本。我们村小学，有附近三个村的孩子在这上学，一到六年级，今年有 80 个，多的时候能来四五十个。

图书馆就成了我妈妈的主业，我爸负责家里。梨园 2020 年我回来就停了，及时止损。我妈妈整个人焕然一新。我就发现其实乡村里的人，被太多东西压抑住了，本来有很多可以伸展的枝条，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但都被砍掉了。她现在不写自己的事儿了，开始记录她身边的人的事。

她用一个词，叫“上货”，买东西那样，这个词是从姜淑梅那儿来的。她就上她女儿住的社区老太太家里去采访，把她们的故事“进进来”，写出来，就叫“上货”。我妈现在也是。

我从村里回到了城市，又去城里动一动，教教写字，刻刻印。又开始这种流动。戏剧节这几年费用相对少了，人也没来这么多了。做三天节的话，有人提前来，差不多有 7 天都有人，每年花个万儿八千的，还能承受。

有人劝我和官方合作。为什么我不这么做？我们镇里小学，有一年要搞创新案例。我就看到一个小孩，放假回来穿着一个小八路的衣服，学校排戏弄的，放了假她都不脱下来，穿着上同学家玩儿，非常自豪。我就在想，我现在弄个戏剧节，又是乡村振兴，如果主动去和政府合作，我能迅速想到让我抓住村里的小孩排红色剧，那是打死我也不愿意的。这种可能性我不需要做证明都能想到。我只要合作就会迅速变成那样，那我还不如不做。现在哪怕戏剧节没几个人来了，这是它本身的边界，就是这么着了，要是合作了，我再叫停，也不是我想停就能停的。

村里人给戏剧节报剧目，其实也是所谓的样板戏，老年人唱的还是那些。从公共生活来说，村民自发参与，我无法拒绝，虽然我个人反对，但这是基于自由选择的情况下。我不干预我认为的自由，但是往下宣教不一样。

我一直抱着“做一回算一回”的态度。每年我被动报备，各种签字，你真的能看到各种基层权力层层加码，你本来就不会当成一个可持续的事情。

我小时候在课堂里不是一个学习好的学生，但后来我发现，我学的一些成语都非常好：刻舟求剑，掩耳盗铃，亡羊补牢。

我这几年对这几个成语理解得非常确切：刻舟求剑，你从村里被动出来在城里又留不下，不得不谋事打工，看似抵达了自己的爱好，哪怕再边缘你也觉得自己是处于靠近的状态，但实际上越靠近、越远离，你就不得不重新去校准，重新问自己，试图重新去确认自己的行为。所以河流流动、船流动，当你看到宝剑落下去的时候，刻一个标记对于你是否能寻找宝剑已经不重要，只是你的本能反应，你自身的一个刻度：证明你自己是真实的，哪怕是痛苦的，这痛苦都是可触的，而不是虚无的。

Q: 你想找谁来接力？

A: 潍坊今秋天开了家独立书店，大风书店，书店主人 Luly，独立书店对一个城市来说太重要了，对一个人来说更是如此，就像萤火虫图书馆之于牟家院村，图书馆之于我母亲。

Q: 你最近觉得什么东西比较有意思？

A: 我妈妈的“上货”挺有意思。以及我现在又能进城了，村里没有快递，有时候他们寄书都到不了村里，只能到镇上。我去镇上取快递都像旅游一样。几个月前我重新开始教课，觉得大家又流动起来了，很有意思，很好。

Q: 你最近有什么想解决的问题？

A: 看看能不能在潍坊再找一个相对小一点的空间做工作室。



题图来自电影《脸庞，村庄》(2017)

专栏

085 小王 为什么一个 i 人 会愿意上街摆摊为人写诗?

杨樱 | 接力访问

因为她不觉得这需要勇气，
而且，她到了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

苏州人小王目前在三个地方摆过“小王的路边诗摊”，上海、苏州、香港。香港的摊摆在维多利亚港，苏州则是十全街，上海更流动一些，南昌路淮海路巨鹿路都摆过。都是随机的。有人邀请，有朋友张罗市集，她看着顺眼……都可以。她还有自己的“老地方”：长乐路上一家服装店门口，商铺虽临街，门却距离街面有几步距离，这就形成一个“凹槽”。凹槽很适合让小王放两把马扎，就是那种长得像个垫子的可折叠马扎，她坐一个，来让她写诗的人坐一个。也有不坐的，比较少。

摆摊的设备也经历过几次迭代。一开始，也就是在淮海 755 楼上那个天桥——那是她第一次出摊——她只是用一张 A4 纸张贴出了一排字：你给我词语 我给你写诗。后来除了纸笔（普通的带横线的作文纸），也就多了两把马扎。再后来有了阵仗，小王的爸爸出手送了一条横幅（蓝色、字体较圆），配四个吸盘，“可以用扎螃蟹的那种线穿到里面，走的时候剪掉线，把吸盘拔下来就可以”。吸盘不会伤害店家玻璃。小王摆摊常常要背靠某家店的橱窗。

没人要求过创作时间，不过小王自己给自己设定了 10 分钟。她觉得现在的人愿意为这种事停留的时长差不多就是这样。其实没什么人做“做这种事”。她之前在伦敦留学的时候看到路边有这种，她和妈妈都很感兴趣。不过等到小王在上海自己做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来的人都会有点意外。

比如有一次长乐路夜摊。有三个女生远远走过来，其中一个在哭（小王强调，很美好的夜晚她在哭）。另一个女生把小王指给她看，说，这里有写诗哎。她们就到了小王面前。小王问，她为啥哭？朋友说，因为友情，觉得被辜负了，耿耿于怀。然后给了几个词。小王

写好了。女生一看，变成了大哭，“可能释怀了”。本来小王以为这事就到此为止了。结果三个女生决定留下来围观，其中一个还朝路边喊：大家来看，上海原来有这么美好的事情。然后对哭泣的女生说，你不要哭，你看还是有很多很好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发现的。

另一次是在南昌路，在开吉茶馆门口，那天小王的“客人”挺多，一度需要排队。“客人”里有个上海阿婆，小王形容她像个“高知”，一个人来喝茶闲逛。高知阿婆问小王，你怎么会那么勇敢，会到街面上来写诗？

这些“客人”的反应让小王有点困惑——客人打引号是因为小王写诗不收钱——后来她去苏州十全街摆摊，大家都说“啊，浪漫”，“啊，好有诗意”，但是不会意外。这就让小王对上海“客人”的反应加倍困惑了。不是街道气氛的原因，她去的地方“都很 chill”。有一度她觉得，肯定是疫情封控有关系，所有街头的事情变得需要勇气。

对小王来说，需要勇气的不是上街摆摊给陌生人写诗，是别的很难说清楚的一堆事情。

比如说工作。小王工作 2 年多，主要在做媒体，已经换到了第三家。第二家老板有一次开会，警告员工不要觉得自己好到哪里去，他们的工作随时可以被 ChatGPT 取代。那时候 ChatGPT 刚出来，老板估计也是说个时髦，爹兮兮地图个嘴上高兴，并没有仔细想过自己的业务和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关系。据小王说，这个媒体比较像广告公司，吃喝玩乐，做商户合作的内容“会多一些”。小王很和气的，她觉得“这也蛮锻炼人的”，“让她变得更善于和人打交道，以前自己是进度条拉到百分之百的 i 人，很希望自己补足能量的那种”。不过 nice 如小王，也觉得事情不至于像老板说的那样，她作为一个人类对自己也有自信之处。于是她就辞职了。

包括第二家和现在这家在内，老实说，小王做的媒体属性都没啥太大的区别。生活方式媒体。因为生活方式的丰富程度和广告客户的预算与日俱下，工作有时候确实挺锻炼人的。好在小王入这行的时候它就是这副腔调了，所以小王不会感觉到什么道德层面上的挑战。不过小王还有审美。去年有一阵子，朋友圈都在转一个讨论“简中已死”的帖子。小王也看了。她觉得，“不管死没死，我觉得（公司）做的事情都在把它往死的方向推”。

她想解决的问题是，“我能为这个社会带来些什么？”这个说出来我笑了。小王以为我在嘲笑她。我赶紧解释我只是有一种看到了稀有生物的感觉。她就有点不好意思，说自己就是有点理想主义的。后来她又为自己的理想主义不好意思了好几次。

其实小王也蛮折中的，毕竟当时她还继续在做这个“让她想吐”的工作。所以她当时的迫切点是，得做点事，为工作找到一个平衡。

摆摊的契机出现得很随机。有一次朋友搞市集（就是淮海 755 那次），叫小王去，小王本来想卖点自己拍的照片，后来觉得这样有点单调，于是她就打了张告示，还发了朋友圈。当时她想的是，这其实比较像一次即兴交流，一次共创。

她是靠一个前同事开张的。神使鬼差，前同事提到了“ChatGPT”，还提到了当时小红书挺火的一个武康大楼保安拍照的事。这些都是小王关注、但没有和前同事细聊过的事情。她觉得蛮有缘份的。

一般来找小王写诗的人，在她创作的时候都会等待，有的会拍拍照，有的会搭话闲聊。小王的灵感来得都挺快，如果写到一半发现哪里不对劲，她也会悄悄改掉字词，那些稍纵即逝的纠结通常都不会被人发觉。

她的父母都很支持她摆摊，爸爸觉得这是历练，妈妈觉得给城市带来了诗意，就像伦敦看到的那种一样。小王的爸妈觉得自己的女儿总得来说应该出国，一部分原因是了解她的理想主义，不过既然女儿选择留在国内，一腔理想主义要是撞到了墙灰头土脸，那也没什么，“也是历练”。

小王没有灰头土脸过，但有过失望。

她研究生学设计管理，开题报告定了“苏州平江路社区改造”。那是 2018 年。

小王执意要做家乡有关的项目的原因稍微有点复杂，如果说简单，就是她对自己原生家庭的一次重新审视。小王和外公外婆非常亲近，但是父母为了让她好好学习，隐瞒了外公重病的消息。小王耿耿于怀。就在外公去世的 4 个月后，她交了开题报告，因为想“探索一下自己长大的空间”。

从城市设计的角度说，小王做了一份很有人味儿的设想。用她的话说，就是为苏州平江路“构建一个动态平衡、各方都成为 stakeholders 的系统，让不同的人在空间相遇，产生更多交流”——乍看上去，这个设想最乌托邦之处在于，她认为城市的居民真的可以决定自己生活的空间，并且成为所有者（stakeholders）。

不过，比这个乌托邦更乌托邦一点的地方在于，小王出于“我想为你做点事”的动机设

定了这份研究项目,就这样找了居委会、街道、大学和政府下属文化机构。爸妈帮了一点忙,他们认识一些人。但这忙也帮不了太多。大家都对小王很客气,很愿意听一听她是怎么想的,有可能是有人介绍多少好一些,有可能像小王说的,“留学生的想法可能也值得听一听”。

她做了很多调研。当时平江路还没那么旅游化。她走访居民,咨询大学教授,就连涉及城市改造、河道利用的问题也去咨询建设相关部门。

“什么是你以前住在苏州的时候没发现,但通过这个项目发现的?”我问她。

“他们恨……。”收尾两个字很轻,我仔细辨认了一下,是“政府”。

“他们是谁?”

“苏州原住民。”

“苏州原住民是谁?”

“平江路上的原住民。”

小王说的是因为旅游化被拆迁到郊区的居民。有很多是老人,七八十乃至九十,丢失了熟悉的生存环境和人际网络,生活从此充满陌生和恐惧。

小王的项目没有落地。这不奇怪。不过她发现,就连自己的毕业论文其实也是不成立的。

“就在我准备回学校、最后一个礼拜去平江路的某一天,我发现一扇门上贴了一张告示,应该是我之前没有路过忽略的。落款时间是2019年七八月的样子。我发现的时间是9月中旬。告示说,2020年前要迁出三分之一原住民。他们没有用这个词,但意思就是这样。”

换句话说,小王临到收尾才发现自己在一个拆迁地上做了社区宜居规划。

她看着那张纸,马上联系导师,说还要不要做,好像不太对劲。“英国导师永远觉得interesting。他说完全没问题,你把真实的调研放进去,从过程的角度上说你是做完了的,虽然没有达到你的目标,但是无所谓。”

我问她:“在这之前,这些事情你都没想过?”

小王的回答让我想了一会:“我觉得它存在。就是这样。”

小王说,她小时候是会背出苏州市长和副市长都是谁的人。不是参政议政那种关心,是一个平和、温暖、顺利的家庭会有的那种关心。不过现在她有点不一样,看到“媒体同事和大环境的变化”。不过,“还是有一些东西促使我还留在上海”。

我们讨论了一会儿上海。小王突然福至心灵。

“我好像有点知道了,为什么在苏州摆摊和上海不一样。因为苏州并没有那种‘苏州应该是怎样的生活图景。虽然疫情之后它的旅游属性变强了,但是它没有上海这么景观化,不会那样被观看,或者说被膜拜。”小王说,“因为上海被赋予太多被观看的因素。”

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

国庆节的时候,小王被另一个朋友的市集邀请在苏州摆摊,电视台都来了,小王接受了“小时候吃饭时候会看的新闻节目”那样的采访。一个无人机飞上来,她要朝无人机挥手。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有一次摆摊,5月20日,还是在长乐路。一个城管来了,他念出声,“小王的路边诗摊”。小王以为有“客人”了。结果城管坐在车上,对小王说,“你可以撤摊了”。小王说,我是免费的。小王还带着微笑。城管说,免费的也不行。小王看着他,心想如果你下车赶我走我就走。然后城管走了。小王想,关我屁事。

于是我们又讨论了一阵子疫情里的控制。小王说,“那时候我最讨厌听到的一个词就是:配合。”

附上一首小王自己喜欢的诗:

关键词:毛肚、火锅底料、八分熟、猴面包树、拿铁

毛肚在火锅底料里翻滚
直至八分熟
像极了你我之间的情愫
而我真正渴望的是那种
猴面包树之于沙漠中的旅人
拿铁之于上海街道的关系
是那种百分百的热烈、真挚和救赎

Q: 最近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A: 前阵子去东京旅游,走进有73年历史的早稻田松竹影院看电影,我发现每一个椅背上都有一个突出的小孔设计,看它所在的高度(靠近地面)应该不是用来放

杯子的。那天正好下大雨,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白发爷爷,他把长柄伞收纳好,放进那个圆孔里,刚好。那一瞬间再次感叹,日本人真的很爱用长柄伞!

Q: 最近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A: 想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最想解决还是怎么可以在写作过程中,不仅投入其中,又可以不过分沉沦,保持适度清醒。

Q: 想找什么人来接力?

A: 么西,一位沪漂餐饮从业者,坚持在上海做了3年的免费地下放映。从2020年开始,么西启动了地下放映活动,到2023年已经成功举办了几百期,每期活动都是免费的,每期的电影都经过精挑细选,大部分电影都不是院线会关注的片子。沪上艺术电影爱好者就这样跟随着放映活动,从书店漂到咖啡馆,再漂到酒吧,甚至漂到么西家里,形成了一个没有界限的类似于“家”的组织。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小鸟文学出品
卷三十六，2023.12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